

中州学刊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24/09

中州学刊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二〇二四年第九期(总第三三三期)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河南省一级期刊

学者风采

陈万球 1966年生，湖南宁远人，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担任中国科学史学会工程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伦理学会副会长，湖南省科技哲学与科技伦理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高校思政课教指委副主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科技伦理、工程哲学、公共管理等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科技领域道德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工智能自我意识的可能性及其伦理问题研究”等4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持省部级重大重点项目10余项。出版《NBIC会聚技术的伦理问题研究》《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伦理反思》等专著6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公开发表论文100多篇。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中州学刊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24/9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梦奎 邓伟志 刘国光 李君如 吴敬琏
冷 溶 迟福林 张首映 袁行霈 葛剑雄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承哲

副主任 李同新 王玲杰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四新 万银峰 王建国 王承哲 王玲杰 闫德亮
阮金泉 李同新 吴宏亮 余 丽 谷建全 完世伟
张 昆 张宝明 张宝锋 张富禄 陈宝良 苗连营
徐正英 高卫星 曹 明

主编 王承哲

社长 闫德亮

主管单位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政治与党建

邓小平关于改革的重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刘志明 朱思远 / 5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专题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生性思考 李俊 邓清源 / 13

从西方现代性问题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 曹丽 郭强 / 22

经济理论与实践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路径构建研究 郭夏 庄忠正 / 29

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的机制、障碍和路径 邓线平 / 39

“三农”问题聚焦

耕地保护考核和粮食安全考核“合二为一”的基础与推进路径 刘慧 钟钰 / 47

以新发展理念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目标、问题与路径 姚志 高鸣 / 55

法学研究

数字社会平台化的样态特征、内在张力与调试路径 陈新宇 阮嘉禾 / 64

我国铁路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的法律构想 宋纪萍 / 76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新时代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与行动策略 王凯 马华 / 82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 刘辉 / 90

伦理与道德

大语言模型的教育升维、教育降维与伦理干预 陈万球 / 99

哲学研究

范仲淹经学核心思想探析 姜广辉 唐陈鹏 / 108

文化安全主体的现实境遇及其当代变革 易华勇 韩璞庚 / 117

历史与文化

论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符号化及文化意义 李 鹏 周忠元 / 125

邢侗与山左书法话语的建构和传播 刘中兴 林苑茹 / 133

文学与艺术研究

宫观官制度与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 张振谦 / 141

“王荆公体”特征新论 李 唐 / 151

新闻与传播

导航作为平台媒介的三重逻辑分析 秦红雨 / 160

教育融媒体建设的时代价值、现实挑战与未来进路 张 珊 / 171

· 本刊声明 ·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及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及维普网、国研网、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等收录，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费一次性给付；另外，本刊微信公众号对本刊所刊载文章进行推送。如您不同意大作在以上数据库中被收录，或不同意在本刊微信号中被推送，请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MAIN CONTENTS

- Deng Xiaoping's Important Thought on Reform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 *Liu Zhiming, Zhu Siyuan*(5)
-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Guo Xia, Zhuang Zhongzheng*(29)
- The Mechanisms, Obstacles, and Paths of Digital Consumption Driving Industries Upgrading
..... *Deng Xianping*(39)
- The Foundation and Promotion Path of Integration of Farmland Protection Assessment and
Food Security Assessment *Liu Hui, Zhong Yu*(47)
-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Future Goals, Key Issues and Path *Yao Zhi, Gao Ming*(55)
- The Forms, Tensions and Direction of Platformization in the Digital Society
..... *Chen Xinyu, Ruan Jiahe*(64)
- Practical Logic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 *Liu Hui*(90)
- Educational Dimension Enhancement, Educational Dimension Reduction, and Ethical Intervention
of the Big Language Model *Chen Wanqiu*(99)
- The Core Thoughts in Fan Zhongyan's Confucian Classic Studies
..... *Jiang Guanghui, Tang Chenpeng*(108)
-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ntemporary Revolution of Cultural Security Subject
..... *Yi Huayong, Han Pugeng*(117)
- On the symbolization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Ji Kang's Image in the Liu-Song Period
..... *Li Peng, Zhou Zhongyuan*(125)
- Xing Dong and Construction and Spread of Shanzuo Calligraphy Discourse
..... *Liu Zhongxing, Lin Yuanru*(133)
- The Palace Official System and Literati Group of Neo-Confucianism in Jian Zhou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Zhenqian*(141)
- The New Study on "Wang Jingong Style" Characteristics *Li Tang*(151)
- Triple Logical Analysis of Navigation as a Platform Medium *Qin Hongyu*(160)

邓小平关于改革的重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刘志明 朱思远

摘要: 邓小平深刻总结近代中国落伍教训,敏锐洞察时代主题转变,顺应世界改革发展潮流,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系统完整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这些思想包括改革的目的、性质、内容、原则、方法、评价标准等一系列重要观点。邓小平关于改革的重要思想系统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改革要改什么、怎么推进改革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成功指导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研究邓小平关于改革的重要思想,有利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关键词: 邓小平;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005-08

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列宁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先河,毛泽东则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做出了先行探索和奠基性贡献。在前人的基础上,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并成功地付诸实践,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24年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系统回顾和深刻总结邓小平关于改革的重要思想,对于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改革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

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后果为基础的。”^[2]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都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都是为了解决时代的问题,都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因此,要全面掌握一种科学理论,首先要了解它产生的时代条件。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也是如此,它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指出:“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3]“文化大革命”后,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在徘徊中前进,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拉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能够突破苏联模式的传统框

收稿日期:2024-07-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两个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23ZDA006)。

作者简介:刘志明,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朱思远,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84)。

架,发展缓慢。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新科技革命飞速发展,我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进一步扩大,落后于时代,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中处于劣势。在这样严峻的情况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必须回答“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这一决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的重大时代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和鼓舞下,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壮大,超出了一国范围,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掀起了反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浪潮,这是社会主义的重大胜利。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各国,在发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社会主义一度欣欣向荣。但后来由于没有根据时代变化和结合本国国情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体制和机制逐步僵化,导致这些国家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面临严重困难。

反观资本主义阵营,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了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起到了巨大的调节和改良作用,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了新科技革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抓住了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统治阶级也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和政策,如实施一定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建立广泛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等,以缓解社会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工人阶级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

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历史,是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在领导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我们党便带领全国人民投入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极大地发展了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包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以及大量的自主科研成果与研发技术,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和水利基本建设,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存在曲折和失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和苏联经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走过一段弯路。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提出“以苏为鉴”,要摆脱苏联模式,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进行了艰辛探索。虽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我们党最终没能从根本上完全突破苏联模式,没能成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不少弯路,曾一度放缓甚至停滞,经济发展没有跟上世界的步伐,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拉大,发展落后于时代,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又该如何”这两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邓小平洞察世界发展大势,敏锐地发现了时代条件的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邓小平深刻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5]³⁷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为了使社会主义走出发展困境,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就必须毅然决然地走改革之路。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潮流。总之,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产生,基于对近代中国落伍教训的深刻总结和中华民族赶上时代的迫切希望,是对新的时代主题的适应和对世界改革潮流的顺应。

二、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丰富内涵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系统完整的改革思想,包括改革的目的、性质、内容、原则、方法、评价标准等一系列重要观点,系统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改革要改什么、怎么推进改革等一系列关于改革的基本问题,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深刻理论总结。

1. 关于改革的目的

第一,改革的直接目的是赶上时代。近代以来,中国多次错失发展机遇,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时间压迫,中国由古代时的领先国家沦落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进行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使我国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由于底子太薄弱,再加上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些曲折和失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6]163}。因此,改革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赶上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5]242}第二,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历史上的历次革命,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6]311}“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6]128}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6]231}。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改革的最终目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5]241}

2. 关于改革的性质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科学分析。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但这种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得到解决。在毛泽东先行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找到了解决这种矛盾的正确途径,这就是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这就是改革的性质。邓小平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5]142}从人类历史来看,革命是人类解放生产力的主要途径,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不仅能发展生产力,也能解放生产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深刻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5]113}这是对改革性质的精准概括。

3. 关于改革的内容

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要以经济领域为重点,协同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邓小平深刻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5]237}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随后拓展到城市,从农村的集体经济拓展到城市的国有经济,然后又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这既是改革必然要经过的历史进程,也是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标志,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基本原理。邓小平还就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进行了精辟阐释:“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5]164}他富有远见地指出,我们党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民主,“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5]241}。此外,“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5]256}。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紧密依存、相辅相成的。邓小平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5]78}要将改革和开放作为一个整体,将对外开放纳入改革发展的全局之中。

4. 关于改革的原则

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了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确保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邓小平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曾多次强调,改革是有原则的。第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深刻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6]¹⁶⁴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前提,也构成了邓小平关于如何推进改革的基本原则。“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7]¹³⁶³,集中表现在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改革开放的根本政治保障。“四个坚持”与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7]¹³³²“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7]¹³⁶³原则决定方向,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牢牢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改革的干扰。他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5]¹³⁸第二,坚持两条根本原则。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5]¹⁴²四项基本原则侧重于思想和政治领域,而这两条根本原则是四项基本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在当时为我国刚刚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总的方向和原则。这两条基本原则后来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至今仍然是指导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方针。第三,坚持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改革的立足点。独立自主既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又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所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还是我们党总结百年历史得出的“十个坚持”的宝贵经验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独特道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无一不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探索和取得的。改革也是如此,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5]⁹⁵，“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

办”^[5]²⁸⁶。邓小平深刻指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5]⁷⁸“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5]³

5. 关于改革的方法

邓小平在参与和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具备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提出了关于推进改革的若干重要方法。第一,“胆子要大,步子要稳”^[5]¹¹⁸。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国的改革也是一场伟大的实验,前人没有留下太多的经验可供参考,只能在实践中自己摸索,出错是难以避免的。邓小平鼓励大家克服一个“怕”字,“大胆地试,大胆地闯”^[5]³⁷⁴。他号召全党:“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5]³⁶⁷同时,邓小平还指出,改革不是蛮干,不能太急,要学会总结经验。“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犯了错误,及时发现,及时改正。”^[7]¹⁰⁴⁹总之,“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5]¹¹³。“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一改革总方针的通俗而生动的表达。第二,“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8]。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科学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出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需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同推进,因而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包括“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9]。这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邓小平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5]¹⁵⁴这深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领导和推进改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第三,“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在改革中正确应对国际变局的重要方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东欧剧变、西方制裁,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不利。邓小平对当时的国际局势进行了冷静的观察和客观的分析。他指出:“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

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5]354}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应对不利的国际局势的方针和策略,他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5]321}这最终指导我们渡过了难关,抓住了机遇,赢得了发展的一个大好时期。

6. 关于改革的评价标准

东欧剧变后,国内外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党内一些同志在改革的问题上迈不开步子,理论界也展开了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问题的争论。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提出了判断改革性质及成效的标准。他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372}三个“有利于”的提出,不仅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许多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使大家解放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团结了全党,而且在实践中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阶段。

三、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实践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3]4}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10],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成功指导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使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1. 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经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仅有1.75%,与印度的1.59%相当,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主要发达国家。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赶超德国、法国,上升至世界第三位。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

总值总量再次超越日本,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1]。截止到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3]12}。

此外,我国还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农产品产量也跃居世界前列,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对外贸易等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和重大成果。在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生产力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和跨越式发展,这标志着我国正在大踏步赶上时代。“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3]13}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那时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12]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2.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实现根本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

邓小平坚持通过改革推动制度创新,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他领导全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经济制度层面,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新概念。他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5]148}“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5]37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73}他首次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改变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些重大的制度创新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制度基础。

在政治制度层面,邓小平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他强调:“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5]73}“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5]345}在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坚持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建设伟大目标的战略高度,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依法治国,不断健全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长期实践中得到持续巩固、发展和完善,为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制度保障。

3. 成功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引中国改革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3}长期以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163}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源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正确革命道路,而中国的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成功则要归功于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邓小平同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13]22}道路问题是根本问题。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贡献,也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重大实践成就。我们正是通过改革才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道路决定命运,邓小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深刻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

的一招。”^{[5]368}对于改革的伟大成效,邓小平曾进行过精辟的概括:“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5]142}

4. 大力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孕育了改革开放精神,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6]367}他强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5]28}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到20世纪末需要抓紧做的4件工作之一,郑重地向全党提了出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方针,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的根本任务。全国广泛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涌现出了一批时代楷模,有效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丰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全民族理想信念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伟大实践还孕育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勇于担当、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3]14},为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四、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现实意义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法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7]1059}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新时代改革事业取得伟大成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要求“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14]。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的理论结晶,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1. 明确改革的目标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鲜明特色。邓小平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6]³³³建立一套行之有效、成熟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避免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失误,是邓小平推动改革的初心,也是我们党改革的目标。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仍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和定型饱含希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5]³⁷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4]这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改革事业的航向。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14],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可靠的制度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13]¹⁰⁴⁻¹⁰⁵

2. 保持持之以恒推进改革的战略定力

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挫折和失误,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会因此左右摇摆。特别是东欧剧变之后,国际国内很多人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怀疑和动摇。邓小平以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5]³⁷⁰⁻³⁷¹正是在邓小平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信念和持之以恒推进改革的战略定力的影响下,全党统一了思想,及时稳住了全国的局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

辟广阔前景。”^[14]在新时代,我们“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14],更加深刻地认识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更加自觉地把握改革的规律性,更加坚定地肩负起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责任。改革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5]⁴这一论述深刻阐述了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坚定信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保持持之以恒推进改革的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16]

3.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高度重视改革的方向和性质问题。他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5]¹⁵⁸他始终将改革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多次强调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7]¹³¹⁷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一切伟大成就的取得,都建立在我们党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之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坚持的若干原则,其中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等^[1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15]¹⁴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落脚点,坚持改革为了人民,坚持改革依靠人民,坚持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我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15]15。

4. 坚持系统观念,科学运用改革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邓小平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6]249-250他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立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统筹分析国内和国际形势,正确处理了改革中出现的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改革方法论。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个大局”再到妥善处理美苏关系等,表现出了领导改革的卓越政治艺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贯彻坚持系统观念^[14]。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也是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涵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方方面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17]因此,必须坚持科学的改革方法论,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各领域的改革,正确处理好改革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其中包括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掌握这些改革的方法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1.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 [3]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4]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451.
-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8]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666.
- [9]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8.
- [10]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
- [1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
- [1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4]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全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4-07-19(1).
- [15]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16] 习近平.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J].求是,2024(13):4-8.
- [17]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0-21.

Deng Xiaoping's Important Thought on Reform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Liu Zhiming Zhu Siyuan

Abstract: Deng Xiaoping profoundly summarized the lessons of modern China's backwardness, keenly observed the changing themes of the times, and followed the trend of world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promot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he formed a socialist reform ideology with rich connotations and a complete system. These ideas inclu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viewpoints such as the purpose, nature, content, principles, method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of reform. Deng Xiaoping's important ideas on reform systematically answered a series of basic questions such as why China needs reform, what reforms need to be made, and how to promote reform, and successfully guided the great practic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Studying Deng Xiaoping's important ideas on reform is beneficial for us to deeply study and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urther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s, and continue to improve and develop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refor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思 齐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生性思考

李俊 邓清源

摘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以其历史的主动性和责任担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实践中开创、发展、丰富和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关人类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其规律的基本原理和现代民族思想为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提供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历史基因;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成功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关键词: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共产党;“两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G122;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013-09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党的二十大召开后,习近平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时首次提出的具有标识性的概念^[1]。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他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系统阐述了中华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2]。习近平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战略任务的深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与发展,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担当,有必要弄清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机理,

回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而来”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真理之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为基石的新的文明形态,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追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将实践引入唯物主义,推进了对“客体的或者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和“抽象能动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的变革,实现了由追究“世界何以可能”的旧哲学到探索“全人类的解放何以可能”的新哲学的转变,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人类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融入人类社会之中的文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基本原理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

收稿日期:2024-03-11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主体性问题研究”(2023BKS024)。

作者简介:李俊,男,信阳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信阳 464000)。邓清源,女,信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河南信阳 464000)。

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把唯物主义一般世界观贯彻于社会历史领域,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与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的统一。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的,人类生产方式发展变化是科学揭示社会形态演变历史的钥匙。生产方式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共同活动的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其中,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进行了具体阐述:“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3]532-533}这启示我们,在研究社会发展或社会文明时,需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去进行把握。

民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有其产生、发展、演变、融合和消亡的过程,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组合形式。原始社会末期至阶级社会初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野蛮开始向文明过渡,部落开始向国家过渡,人们逐渐克服活动区域的局限性,在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古代民族,即部族。恩格斯在论述希腊人的氏族发展时明确指出:“希腊人,像皮拉斯基人以及其他起源于同一部落的民族一样,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按照美洲人的那种有机的序列——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组织起来了。”^{[4]111}随着分工的出现,“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4]190-191}。接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使得维护社会阶级利益的“国家”最终形成。因此,“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4]193}成为必然,这说明国家是文明社会、文明时代的标志性产物,是我们研究现代文明必不可少的一环。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民族思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发展方向,推动了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斯大林曾指出:“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5]资本主义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

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封建格局的消灭、各地区间联系的扩大,是现代民族产生的经济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6]404}“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6]404}

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有限进步,但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力榨取其剩余价值的剥削性,并没有实现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波兰的演说》中就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产生的根源和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只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3]694-695}恩格斯还指出:“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3]696}现代资本主义的民族问题,不仅表现为国家内存在民族压迫和剥削,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因为“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405}。列宁依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进一步强调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联系起来,他指出:“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意味着民族压迫在新的历史基础上的扩大和加剧。”^{[7]77}“我们应当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族问题的革命纲领联系起来。”^{[7]78}为此,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民族发展上,强调世界上所有民族不分大小、历史长短,都各有特点和长处,都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各自的贡献,都应享有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同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在民族压迫、阶级统治的社会,必须对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性的改造,通过消灭剥削制度、消灭生产资料私

有制,实现民族的平等、民族的团结、民族的富强。因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6]⁴¹⁹。

可见,民族现代化进程所体现的文明进步不仅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更有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其中,国家的产生、民族国家的发展是文明社会的重要体现。这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厚底蕴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尽管“中华民族”^①一词是近代才出现的,但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组成了不同的社会组织关系。经过远古氏族、部落、部族的更替,到各民族间的交流、交汇与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可以说,自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就已经形成。中华民族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和对人类社会的改造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基本内核,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蕴含着深厚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基因和历史底蕴,是我们推进和拓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及生态等方面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起到历史奠基作用。

1.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政治目标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体现了古代先哲们对未来理想世界的美好愿景,表达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合、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天下情怀,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政治目标的重要思想源泉。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8]“公”可理解为“共”,指人们的公共道德意识、公德心。天下为公就是指生活在一起的人们都互相关心、守望相助,大家是休戚与共、紧密团结的整体,是具有“社会意识”的个人形成的社会共同体。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中国人对“天下”范围的认知,建立在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延伸的空

间。但天下为公的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关于政治社会发展的政治目标。中华民族自古有之的社会理想被马克思主义中有关人类解放的部分激活,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实现。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消灭剥削制度,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内推动实现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都是中华民族对“天下大同”的政治追求的鲜明体现。

2.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理念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主治理思想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理念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深沉的精神追求,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主治理思想提供认识论基础。《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礼记·缙衣》记载:“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论述都表明,民众是立国之基,民心是政治之本。孔子曰:“人道,政为大。”孔子认为,“为政”是人道之中最重要的部分。如何“为政”,则需“以德”。《礼记·大学》中有言:“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以德”强调人的道德品行在“为政”中的重要性。《论语·为政》中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表明道德对政治具有深远影响,如果统治者能够以道德来治理国家,那么就会如同北辰之于众星,群臣百姓会自动围绕、拥护这样的统治者。为政以德,即可使民心所向,天下归之。“为政以德”是“民为邦本”的基础,“德”是获得人心的前提,如何进一步落实“德”的内涵,则需要敬民、爱民、为民。中国传统的民本理念,既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特色,也与西方的“以资本为中心”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民本思想,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和人民至上的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意味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是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要更加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与合理诉求。

3.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思想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富民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先圣先贤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民本导向和道义原则,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尚书·大禹谟》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管子·治国第四十八》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孔子在回答子贡问政时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些有关富民厚生的论述均体现了重视民生、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的理念。《国语·晋语》中指出：“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夫义者，利之足也。”《礼记·大学》中指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还有已成为儒家“义利之辨”经典论述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映了孔子所倡导的君子名利观。这些义利兼顾的思想反映了中华传统经济伦理中道义与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实践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完善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打赢脱贫攻坚战、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措施，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智慧，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谱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了文化滋养。

4.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道德观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价值引导和社会基础

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道德观体现了古人对自身道德修养及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向上向善和责任担当，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伦理支撑和社会基础。“厚德载物”始见于《周易·坤·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指君子应像大地一样用宽厚的德行包容天下万物，体现了古人对人与社会、自然的认识以及对自身道德修养的追求。“明德弘道”是根据《尚书》《礼记》等经典总结出来的，“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主张以崇高的道德、博大精深的学识服务社会、国家，推崇以“厚德”“弘道”作为社会认可的价值标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无时无刻不在践行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道德观，始终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理想信念，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新时代，传统文化中的“厚德”“弘道”依然能激励人们追求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和兼容精神，追求向上向善敢于担当的崇高精神；有助于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价值指引和精神力量。

5.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自然理想为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包容开放的和谐世界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自然理想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睦共处的文明观，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包容开放的和谐世界提供了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周易·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这些都是古人对“天人合一”的阐释与论述，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之间的贯通性。“万物并育”出自《礼记·中庸》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荀子也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人合一、万物并育”体现出中华民族尊重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高度契合，赋予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独特的精神标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中蕴含着普遍联系的哲学思维和对个体尊重、包容的思想，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塑造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态观提供了宝贵的文化源泉。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探索确立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实践基础上生成的，是以社会主义道路为基石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态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独立民族国家而进行的。近代之前，中华民族主要是基于族类、文化、王朝的认同，表现为以“郡县制+六部制”为主要国家治理体系的封建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结构。封建制度的独特性及其所形成的“超稳定结构”，阻碍了封建社会内部商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生长，使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和新的生产方式带来的民族进步与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

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近代中国人民进行了苦苦的求索和不屈的抗争。其中,有期望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道路的洋务运动,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发动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权专制制度、确立了现代民族共和理念,并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础^[9]。但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民族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最终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辛亥革命之后,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由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先进分子组成。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开启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民族现代化之路。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开启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独特道路

社会的性质决定革命的性质。“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10]666}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策略进行了阐述,明确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成为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动指南,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扫清了障碍;最高纲领明确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与发展方向,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发展确立了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我们党认识到“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10]605}。毛泽东指出:“正确的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10]605-606}

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思想武器。它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领导中华民族建设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而进行的一系列自我完善的革命活动,包括党的政治

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等。通过党的建设不断夯实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不断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不断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提升党的领导能力、组织力、战斗力,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主要形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对抗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10]610}中国共产党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实践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优势和经验。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民众支持,进而获得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基础。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0]645}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先后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通过横向的统一战线,争取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甚至部分地主阶级的支持,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在发展统一战线的实践形态中,探索出著名的“三三制”原则,即规定在政权机关人员配备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国家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革命道路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从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维度初步阐释了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的基本思路与路径选择,彰显了对现代文明的理想追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社会主义前途时指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

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10]663}毛泽东强调:“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10]663}他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and 主要特征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民族的”文化就是指“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10]706}文化。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但不应排斥,还应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他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10]707}“科学的”文化就是指“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10]707}文化。“大众的”文化就是指“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10]708}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提出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和理论资源。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探索,通过“第一个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之路”、中华民族的“独立之路”以及中华文化的“正确发展之路”,不仅挽救了中华文明的衰落,更使中华文明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走向现代化转型道路。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提供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和物质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不仅要推翻旧制度,还要建设新的社会。1949年3月,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确定了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也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后发国家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历史选择。因为,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取代少数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社会公平的分配方式取代主要依赖于资本、市场机制的分配方式,以国家计划和指导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形式取代主要由市场机制驱动的私有经济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反对靠剥削和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方式发展工业化,以自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深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独立民族国家的建设是中华民族现代形态的首要标志。国家建设首先要构建政治制度。毛泽东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11]1472}“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11]1478}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通过,表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正式确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确立,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发展提供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保障。

在政治制度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以“四个现代化”为战略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案。1954年,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2]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体现。对工业化的追求之中,不仅蕴含着对现代化的追求,更蕴含着对现代文明的追求。随后,周恩来将现代化的内涵表述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3]。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文中对“四个现代化”的内容表述做了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4]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表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追求目标的不断明晰,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任务的不断深化与明确。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实践探索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内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这一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以发展的战略眼光和客观谨慎的态度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理论上的重新思考和实践上的创新发展。

第一,提出并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主题。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5]2-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不仅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而且回答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国家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年后,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做出精彩论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16]23}

第二,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在生产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论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党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也使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第三,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内涵。在继承原有“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人民的幸福线。党的十三大报告里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表述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7]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认识的升华,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关注,从而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内涵。可以说,“富强”是生产力发展在经济领域的要求和体现,“民主”是生产力发展在政治领域的要求和体现,“文明”则主要是生产力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为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and 目标的现实需要,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写入党的基本路线和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强调,将“美丽”作为目标之一写入党的基本路线。

第四,将改革开放纳入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点。邓小平依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5]113}。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既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也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其实质和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我国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之后再启动城市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由点及面地有序推进,逐步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一体两面,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坚持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原则。现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融入并促进世界的发展。我国的对外开放目的在于充分利用一切外部条件,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发展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18]

4. 新时代的探索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焕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规律,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样式的新的文明形态。

第一,明确中国共产党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的实践目标。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党的初心使命和奋斗主题,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使命感,而且增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党的初心使命和奋斗主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近代以来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它贯穿于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伟大实践中。

第二,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构建起“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依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意味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面临许多新要求。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是有效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措施。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然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之路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党“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并“按照这个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6]¹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性实践活动的拓展和提升,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成果。

第三,在总结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概括提出并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 and 实践中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所取得的创新性、突破性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集中阐述,明确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明确规范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重大原则”,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规律。2023年2月,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条件、发展要素和时代逻辑。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21]“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21]这表明,我们党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现代化模式,展示了具有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态,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

结 语

文明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文明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生相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也是现代文明兴起和演进的过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逻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共同结合“成就的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肩负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党以其巨大的勇气、责任感和使命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深入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的伟大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是致力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2]。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延续发展且从未中断过的文明所蕴含的重要元素和所塑造的突出特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文化基础和历史基因，它“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2]。

注释

①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后经历了“约指华夏—汉族”到“确定为中国诸族之总称”的演变过程。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9(1).
- [2]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1).
-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斯大林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395.
-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8]礼记[M].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419.
- [9]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32.
-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
- [13]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2.
-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17]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
- [1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8-19.
- [1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77.
- [20]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8.
- [21]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1).

On the Endogeneity of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 Jun Deng Qingyuan

Abstract: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created, developed, enriched and establish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its historical initiative and responsibility,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concrete reality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uniting and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practice of striving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people's liberation and achieving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people's happiness. Marxism provides a scientif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and mankind. Its basic principles on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laws of human society, as well as modern national thought, provid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renewal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important elements and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contained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ve laid a profound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historical genes for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successfully created the modern fo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wo Combination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责任编辑:思 齐 弈 寒

从西方现代性问题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

曹丽 郭强

摘要: 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途径之一。这一途径可概括为:批判地汲取西方现代性的文明成果,同时探寻文化传统中影响、塑造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信念,以此确立现代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西方现代性的问题或危机,主要表现为人的神化与人的物化的两极趋势;摒弃主体主义、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虚妄之后,现代性观念依然有其正当性。中国人数千年生活经验凝聚而成的人间情感和入道精神,以及将现在与传统之间认取为“亲属关系”的历史意识,不仅为当下中国人确认与文化传统的精神关联指示了路标,而且蕴含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希望原理”。

关键词: 现代性;现代性问题;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022-07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并指明了实现这一使命的基本路径:“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1]当前学界围绕“第二个结合”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阐释,本文则关注“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这个问题,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探讨:何谓欧美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如何批判地汲取西方现代性成果?如何立足于本土化的视野,将西方现代性成果融入中国现代文明秩序之中?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如何确认与文化传统的精神关联,形成既是“现代的”同时又是“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念?

一、欧美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广泛流传同时又缺乏明确界定的概念。在笔者看来,广义的现代性

指称根源于欧洲的现代文明秩序,特别是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为核心的整体结构;狭义的现代性则表征“现代意识”或“现代观念”。无论是社会现代化,还是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的理念形态,其演化早已超出欧洲的范围而成为全球性现象。在此意义上,“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2],对中国现代文化价值观念的考察需“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2]。

西方现代性在观念层面体现为两种激进的现代意识:启蒙主义的现代性和审美主义的现代性。哈贝马斯指出,自法国启蒙运动之后,欧洲人出于对科学的坚定信念,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道德改良无限发展,形成一种企图摆脱所有特殊历史束缚的现代意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造成了一种抽象的对立^[3]。审美主义的现代性在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生活与书写中得到典型体现。他将现代性定义为“短暂、飞逝、偶然”,企图“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诗意的东西,从飞逝中抽出永恒”,这种“注重现

收稿日期:2024-03-28

作者简介: 曹丽,女,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云南昆明 650500)。郭强,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

在,当下即是”的生存体验和生活态度,不仅影响了先锋派艺术,而且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中,形成一种“瞬间化的生活制度”,由“先锋”变为时尚^[4]。

无论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演化,还是现代意识的扩展,都始终没有摆脱危机,因此西方现代性的建构同时也是“现代性问题”的弥散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问题与现代意识危机最尖锐的反思与批判,迄今为止依然来自欧美的思想家和学者。资本主义在欧洲和美国刚刚兴起之时,马克思就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内在矛盾的对抗性,以及“资本的统治”所形成的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无法克服。涂尔干则关注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危机,即社会结合的丧失和个体人格完整性的解体。韦伯关于现代性即理性化的阐述,体现了他对工具理性扩张与价值理性分裂后果的悲剧性洞察。工具理性在科技、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渗透与扩展,形成了理性化的“铁笼”——韦伯的这一思想,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与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的全面批判。主体观念是现代意识的核心。在欧洲文化语境中,贯穿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人的解放”,表征的是从中世纪神权理性的独断中获得解放,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围绕超越、修正抑或克服现代性,在当代欧美文化语境中形成了三种思想话语。后现代思潮试图超越现代性的主体观念。不过,所谓“后现代性”,其实只是现代性的延伸,实际上构成了现代性论述的一个激进的变种。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社会理论家们则在反思启蒙理性的同时坚持现代性的正当性,认为现代性的制度和方案依然是未完成的,需要重新规划。而列奥·施特劳斯、沃格林等20世纪欧美反启蒙主义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则试图从精神上克服现代性主义的虚妄。尽管哈贝马斯与列奥·施特劳斯、沃格林在思想立场上相互对立,但他们的思想开启了重新考察“现代”与“传统”、“现代性”与“古典性”内在关联的致思路向,对于当下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针对丹尼尔·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论述,哈贝马斯认为,新保守主义错误地将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现代化所造成的负担归咎于文化现代性。在他看来,对现代性方案的怀疑和绝望,根源于经济与行政的合理性标准导致生活世界的分裂——日常生活实践中认知、道德—实践与美学—表现之间“不受约束的相互作用”已遭到了破坏,文化的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在这一过程中只

是扮演了中介的角色。问题不在于放弃现代性方案,而是应当以“交往理性”重建生活世界的统一性。一是需要一种社会改良运动,使社会现代化可以被引向其他非资本主义的方向,并且生活世界可以在经济和行政体系之外独立地发展自身的体制;二是需要将现代文化与传统中有活力的、积极的遗产重新联系起来,因为“现代”乃是与古典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一种时代意识,这种时代意识是通过更新其与古代的关系而形成的。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建构可以说是一项旨在拯救主体性的努力,他所强调的“健全的理性”或理性的整全性,实质上是主体的社会性:个体是在与他人的交互关系中获得界定的。至于在重建生活世界的统一性中如何将现代文化与传统重新联系起来,哈贝马斯明确反对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关于宗教复兴的主张,认为日常生活实践“会因为纯粹的传统主义而变得赤贫”。哈贝马斯见解的意义在于:立足于作为生活现实的“现代情境”,对传统中有活力的、积极的遗产加以确认和择取,使之进入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和意义架构之中,以此充实现代意识。

列奥·施特劳斯和沃格林同为坚守保守主义立场的政治哲学家,他们从观念史的视角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列奥·施特劳斯思想的立足点是关于古典德性概念的阐释。他心目中古典时代的政治哲学意指:普遍确信人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够知道什么是正义的(just)或者好的(good)或者最好的(best)社会秩序。这是一种基于自然法的人性观念和政治秩序理念:存在着人的完善状态,它是被人(作为理性的、社会的动物)的自然本性所规定的,这意味着自然本性是善的;人在存在的整体秩序之内占据了一个相当崇高的位置,但他并未创制这个秩序;人的权能是有限的,善的生活便是按照自然本性去生活。以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卢梭及其德国古典哲学后继者、尼采和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深刻地改变了西方的精神趋向,以“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一现代性观念,拒绝古典德性概念,以之构成欧洲自由民主制的理念根基。然而,这种相信理性的权能(power)的现代文化,在其演化过程中却从相对主义走向虚无主义,正如斯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所指证的那样:“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5]由此来看,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就是主体性观

念和理性主义的危机。

与此相似,沃格林拒绝关于理性的现代经验,通过对启蒙时代的批判和反思,回归欧洲文化传统中关于理性的古典经验,以此拯救“失控的现代性”。沃格林认为,在古典哲人那里,理智意义上的理性被发现既是塑造秩序的力量,又是评价秩序的标准。在对自身的观照中,哲人认识到,人并非自我创造的、自足的存在者,其生存的起源与意义均不在于自身。他们发现,更值得过的生活是作为发问者,追问从哪来、到哪去之类的问题,追问他的生存的本原与意义。在沃格林看来,古典哲人的这种理性经验,乃是对“神性实在”的回应,正是在人的心灵对神性实在的回应、参与中,真正的人性得以形成^{[6]7}。然而,现代的启蒙理性强调人的主体性,对科学设置了“对于形而上学的禁忌”,在此禁忌的限制下,“实在的神性本原”这样的话题被排除在科学之外^{[7]77}。同时,为了弘扬人本主义(humanism),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对人的欲望、激情进行了正当化论证,使人性缩减为贪欲自我,并助长了人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的权势欲^{[7]79}。由于现代人“谋杀上帝”,被启蒙释放了对自由之渴求的人们面临着一个难解的问题:个体的生存总是有限的,来自无定深处的压力总是使经过启蒙而充满自主意识或主体性认知的人面临着归于虚无这一前景^{[7]88-89}。

观念论的立场,如哈贝马斯所言,是否混淆了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之间的区分,并夸大了精神气质、生活态度对现实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结构的影响?这一质疑不仅针对丹尼尔·贝尔,同样适用于列奥·施特劳斯和沃格林。不过,二者的思想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一是他们的批判揭示了西方现代性在意义架构上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人的神化与人的物化的两极化趋势。源于西方现代性的科学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虚无主义在人伦实践、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使现代性本身成为一个问题乃至病灶。二是尽管列奥·施特劳斯的意图是恢复自然法传统中的古典德性观念,沃格林则回归古典哲人的理性经验,但他们也意识到,作为生存处境或生活现实的“现代”是无法拒绝也无法摆脱的。列奥·施特劳斯指出,对理性的现代信仰是自由民主制度危机最深刻的原因,但“理论危机并不必然导向实践危机”,“自由民主制的有力支持来自一种决不能被称为现代的思之方式:我们西方传统之前现代思想”^[5]。沃格林承认,以神性实在为目标的生活绝非人们唯一可能的生活:“当人体验

到自身的生存时,人并非无形体的、由理性塑造其秩序的心灵。他通过其身体参与有机的、动植物的实在,也参与到物质领域之中;在其心灵中,他不仅体验到朝向秩序的理智运动,而且体验到来自各种激情的牵引。”^{[6]6}身体、心灵、激情、理性,这些因素从不同方向作用于人,它们之间的此消彼长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换言之,激情、贪欲无法从人的生存中取消,而“里比多反抗逻各斯”(舍勒语)或许正是“现代”的命运。三是列奥·施特劳斯和沃格林洞察到西方现代性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他们共同的诊断是汲取欧洲古典文明中蕴含的精神信念,拯救现代人的心灵秩序。对于非西方国家和文明而言,这一点同样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在现代进程中重新确认自身的文化之“根”。

二、如何批判地汲取西方现代性成果

与自足的、“大全”式的“古典性”相比较,现代性最珍贵的精神品质恰恰是内在地包含着自我限定、自我反思。正因为如此,现代文明的秩序和价值仍有生长、改进的空间。具体而言,摒弃主体主义、科学主义与物质主义的虚妄之后,现代性观念依然有其正当性。

第一,生命内在的极限和紧张,对于古今中西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恒久的难题。与古典时代的超验信仰相比较,现代思想的正当性在于,它让人有信心或勇气在一种历史情境中安置其生存,在这个特定的世界中构建任何可能的东西,“纵使上帝并不存在”^[8]。不过,当人试图取代上帝(神圣者、超越者)将自身神化时就会堕入主体主义,而忘记了一个基本的生存论事实:所有生命及我们自身都在努力塑造一种并非为我们的认识和行动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向人类而且也向动物敞开,人和其他生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世上,与世界共存^{[9]27}。这意味着,所有的生命种类“看”周遭世界中的事物,都离不开各自的“有限视角”和“初始处境”。人作为生命世界中的一个成员,并不拥有所谓的“上帝视角”。“轴心时代”的中西哲人突破了部落本位主义的狭隘人性,以不同的方式体悟到普遍的人性,赋予人在宇宙中独特的地位,但也自觉地对其做了限定。比如,将自觉的道德意识作为人性的基本标志,是“轴心时代”以来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作为“道德性动物”,恻隐之心是人先天具有的,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也有达尔文所言的“社会性本能”,特

别表现为雌性对后代的关照。其差别在于,人能凭借教化对恻隐之心“扩而充之”,超越血缘纽带,直至面向一切有生、无生之物,在一种情感意义的关联中,与人间万象、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然而,恻隐之心只是人性的潜能(孟子所谓的“心之端”),人同样可以使之消失殆尽,而有种种非人性、反人性行为。人有向善的潜能和倾向,也有先天的私欲,后者在群体层面同某种社会处境和文化心理、习俗、观念相结合,或者在个体层面作为自发、盲目的力量,推动群体或个人做出践踏人性的恶行。善(善意、善行)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不善(恶)则是无穷无尽的。无论意向、观念还是行为,人能够听从人性的呼声,一心向善,也能够泯灭人性、无限作恶。因此,我们认为,要守护基本的人性,以人性作为人道与非人道的评判准则是现代主体观念的价值根基。

第二,现代科学以数学—实验的方法探究(物理)自然,知识由此不断积累,同时又不断探索出未知的领域,而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及其社会应用,在其合理方式上充分体现了“利用厚生之道”。西方现代科技的精神背景,出于西洋宗教的基源,“在基督教传统中所孕育的那种无餍求得的现代精神,只有在一个丰裕经济中才能充分发挥,成为领导一个时代的基本力量”^[10]。但是,科学主义与单向直线式的进步观念相结合,在现代文化的知识层面造成了一种狂妄的自信和乐观,同时在精神和道德层面,它们又培育了一种极端的怀疑主义和武断的取消主义^[11]。事实上,现代科技的破坏性力量是20世纪人类所遭受的空前惨烈人祸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因此,科学万能论和对技术的崇拜,并非现代文明的成就,而恰恰是危机的体现。经过这样解构之后,可以看到,现代科学及其蕴含的方法和精神,最可贵的一点就是“自知其所止”,而不是像各种形而上学和神学,断然宣称已洞悉了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奥秘,仿佛任何现象都能解释。换言之,在认知乃至行动领域,人类无法通达无遮蔽的真理。“我们现代人并不拥有原则上向着知识和行动敞开的理性世界,而是有一种充满保留和限制的艰深知识和艺术,一种并不排除裂缝和空白的世界表象,一种怀疑自身并无论如何也不自诩为得到所有人认可的行动。”^{[9]38}现代科技如果要成为一种文明的建设性力量,唯有服务于人道范围内的事物才能实现。

第三,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善以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在西方,“科学技术催生的理性精神、市场经济带来的商业化潮流和民主

政治所仰仗的个人权利自由主义等现代性基本要素,共同创造了近代以降西方社会持续世俗化或淑世主义社会运动”^[12]。如今,社会世俗化已成为全球性趋势。西方的世俗化根源于对基督教神圣信仰的“祛魅”。不过,传统的习俗、制度和信仰在现代生活中逐渐丧失权威,不再具有神圣性,则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世俗时代”的双重困境已昭然若揭。一方面,科技—经济的物质主义所提供的“单纯的、没有反思的满足”^{[13]278},“使得自己削弱人的力量并导致自己自身的堕落”^{[13]284};另一方面,人们在这个时代陷入了一种恶性的相对主义:“理解”一切,但什么都不承诺^[8]。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我们认为,“世俗时代”的这种生存处境,可以承受,也应该承受。在世俗化过程中,物质生活的正当性得到承认,而且普通个体的苦痛和欢欣愈来愈得到真实的呈现,多元的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已成为现实。经验的、俗世的生活,或许从来都是破绽百出的图景,所谓“绝对”,遥远而虚幻。然而,哪怕破绽百出、伤痕累累,这是在大地之上、在人间的生活。没有被启示、被安排、被预告的“至真、至善、至美、至如”的“大全”,现实世界和人世生活或许从来都是“顺顺逆逆,情不尽性,用不得体,而势无已时”^[14]。那又何妨?人活着,守护常识和良知,同时直面人类生命中的模糊和困难,便已有依托。

正如由欧美向全球扩展的现代化使农耕文明中的人们逐渐摆脱了经济匮乏和形形色色的人身依附关系一样,个体权利也在法律上逐渐得到扩展。基于对神权理性的拒斥和对人自身的肯定所衍生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如进步、发展、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公正、和平等,无论对于欧美社会还是非欧美社会来说,都是工业社会中具有现实影响的“现代性经验”,需要结合特定的“现代情境”加以修正或给予约束,但不能也无法全盘拒斥。

三、如何立足于本土化的视野 融合西方现代性成果

中国19世纪后期以来的现代转型,其核心是物质技术基础由农耕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结构变迁。与此同时,中国延续数千年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价值理念和日常生活方式也随之裂变,呈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在这种背景下,不仅一个一个的人成为中西文化的战场,而且整个社会也成为中西文化的战场^[15],古、今、中、西纷然杂陈。一部分

事物用西方文化解释,另一部分事物用传统文化解释;一部分问题用西方的方法解决,另一部分问题用传统的方法解决。社会、历史、自然、人生得不到统一的解释,缺乏共同的价值根基。“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便致力于构建与政治经济的现代转型相适应的中国现代文化价值观。正如毛泽东所言,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都是“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16]。这一过程不仅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伴随着源于欧美的现代性文明成果的本土化。

作为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观念表征,“中国现代性”这一概念包含两个紧密联系同时又有所区别的构成要素:现代性在中国与中国的现代性。从前者来看,农耕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是身处“现代”的人最基本的生活境遇,由于“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马克思语),历史发展第一次显示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作为“物质生活过程”的现代化,是源自欧洲、扩及全球的人类发展趋势,现代科技和工商业强烈影响着200多年以来的人类生活现实。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等都是无法分割的你—我、你们—我们,有相似的生存状态、共同维护的行为准则和共同遭遇的生活困境。贯穿于社会行动,成为社会制度正当性基础的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意识。尽管脱胎于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社会形态和理念形态的历史性转化,但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从后者来看,现代化的文化要素并不是一个简单地从“西方”到“东方”的移植过程,它同时还涉及中国自身社会结构的制约、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和价值选择。事实上,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从来就不是“文化中立”的。在多数情况中,民族文化,特别是有深厚底蕴的民族文化,总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蓝图做选择性的接受,且加以改造,由此形成了多元性的“文化转型”^[17]。严复在清末便已认识到,近代西方诸国富强的根源乃是其“学术”和“政教”,他将西方“政教”的特质归结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但是,民主、法治的制度安排以及生活方式,在西方是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前提的,而西方近代个人主义价值观又是基于宗教信仰世俗化的伦理信念。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当初严复、梁启超等人将民主运作的价值前提即个体自由观念引入中国时,没有也不可能将基督教传统的世俗化形态(如宗教宽容精神、政教分离原则)一并移植,

因此,个体自由的伦理信念需在中国固有的传统中发掘^[18]。严复在1919年4月26日致熊纯如的信中说:“四书五经,故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19]这样一种对儒家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的工作,在清末的新式知识群体中便已经开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形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章太炎及在其影响下的国粹学派则通过“国粹”与“欧化”之间的调和,致力于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之后,发扬传统文化精神以重建现代中国价值系统的文化理念和学术取向更趋自觉,并从不同的方向展开。方向虽有不同,但在运用“新式机器”汲取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精神这一点上则是类同的。胡先骕“以欧西文化之眼光,将吾国旧学重新估值”之言,便是一个恰当的写照。从学术思想领域来看,无论是“中国文艺复兴”,还是“社会科学本土化”,其意涵在于全面、深入地吸收西学,“会通”并且“超胜”西学,形成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

总之,广义的中国现代性,就是指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主要包括技术、制度与观念三个基本层面;狭义的中国现代性,指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价值观念和现代中国人心理情感模式的建构,包括日常生活领域的礼俗规范、政治经济转型中的制度价值和心理—观念领域的意义架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需要首先回应“现代中国人应当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秩序中”,在寻求新制度——包括人伦秩序、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教制度——的实践过程中,确立中国现代文明的制度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西洋近代文明”中所“请进”的文化价值观——个性独立、民主观念和科学精神,直至当下仍具有现实意义,但要反思、克服以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或对立为前提的激进意识。与此同时,则要探寻数千年文化传承中影响、塑造中国人的精神信念,在接纳源自欧美的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以中国文化中的实践智慧充实中国人的心灵秩序,并以中国现代化实践在生活方式、制度模式、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创新,为现代人的安身立命提供借鉴。

四、如何确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关联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包含着双重目标:形成现代中国的“社会世界”(社会秩序)与“意义世界”(心灵秩序)。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凸

显的文化问题可概括为:化解生活世界的分裂状况,确立现代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在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安身”,地球上的人们日益趋同或者不得不寻求共处之道。至于“立命”,即获得精神寄托,则有不同的历史遗产和文化选择。除了对现代情境的基本认同,对当下的中国人而言,或许还需要一种能真切体验到的、与自身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的精神信念,如此方可谓“立命”。

现代化全球扩展形成的不同模式,与特定民族—地域、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明/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正如艾森斯塔特所言,根源于欧洲的现代化文化方案和基本制度格局确实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却产生了多种迥异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现代性与西方化并不是同一回事”^[20]。查尔斯·泰勒进一步指出,哪怕是在西方内部,现代性也是某种特定文化的产物;在各个非西方社会,由于不同的文化作为变化的起点都会对变化的结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那么就很可能自然会出现种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非西方的其他文化是以它们各自的方式成为现代的。泰勒不仅强调现代性的文化根源的重要性,而且认为一些行为规范可以取得跨文化的共识: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都会同意对种族灭绝、谋杀、酷刑和奴隶制度等的谴责。不过,普遍规范恰恰需要“特殊文化支撑”,比如,人权标准在西方以人道主义为基础,因而对人权的捍卫就与对人类主体性(human agency)的张扬相关,而佛教哲学的出发点则是“不害”的要求^[21]。这一看法的意义在于:在现代情境下,人们可以基于不同的精神信念形成行为共识,并从“单纯的共识”走向“更深的共同理解”,达到行为、情感和观念的视域融合——现代性的“复数”或多元性,在很长的历史行程中凝聚为具有普遍性的文明成果。

作为非欧美国家,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首要问题是回答:什么才是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中华文明的未来?唯有切身体认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身份和心理情感,方能回答这一问题。这意味着在当代中国的生活现实中需要重新确认与传统的精神关联,体会中国文化之美善。通过温习两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感受,或许能够为当下的国人提示某些路标。

第一位是鲁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既有祥林嫂这样的人物,又有闰土、阿顺这样的人物。如林毓生所言,鲁迅对后一类人物的描写倾注了深刻的人

间情感,它是由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人情和善意:“中国人的道德情操中的最高境界里,有一种设身处地的同情心,它会产生不同身份下的同一之感,这种平等比由上而下同情式的平等要高得多。”^[22]在我们看来,这种人情和善意根源于中国人数千年生活经验凝聚而成的人道精神,鲁迅去世前不久的一篇文章对此有感人至深的描写:“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23]

第二位是费孝通。1945年,访美归来的费孝通结合历史材料和亲身见闻写成《初访美国》一书,书中有一部分内容以人类学家的细腻笔触描述了他在中美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取舍。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写作特色是从亲身接触中去感受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别在日常生活上的具体表现。在他看来,文化的深处时常不在典章制度之中,而是在人们洒扫应对的日常起居之间;由于每个人从小就受着一套从潜移默化中得来的价值体系的影响,因此愈是基本的价值,我们就愈是不假思索。从这种观察文化的视角出发,费孝通描述了中国人与美国人在文化基本价值体系上的差异,以及他本人在不同价值对照中所进行的判断和选择。其中最动人的,是他对中国“鬼的世界”的理解和感悟。中国人普遍生活在一个有“鬼”的世界中。“传统成为具体,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神圣,成为可怕可爱的时候,它变成了鬼。”^[24]²⁹⁷费孝通从追念年少时的经验出发,认为能在有鬼的世界中生活是相当幸福的,而且“衷心觉得中国文化骨子里是相当美的”。他从小在鬼世界里长大,对于鬼慢慢地从恐惧变成好奇,从好奇变成爱慕。费孝通对于鬼的态度发生改变是在祖母去世的那一年。往常,祖母总是在近午时刻下厨房看午饭预备得怎样,她到厨房看了以后就快开饭了,这是费孝通幼时熟悉的情景。祖母逝后不久,有一天费孝通独自坐在庭前,向祖母的卧房望去。也是在近午时刻,他似乎看到祖母的影子又从卧房中出来到厨房中去。过了一会,想起祖母已死,有一些惆怅,决不是恐惧,而是“逢到一种不该发生的缺憾竟其发生时所有的感伤”^[24]²⁹⁸,“同时好像又领悟到了一种美的情景既已有了就不会无的认识”^[24]²⁹⁸。“永恒不灭的启示袭上心来,宇宙展开了另一种格局。在这格局里我们的生命并不只是在时间里穿行,过一刻,丢一刻;过一站,失一站。生命

在创造中改变了时间的绝对性:它把过去变成现在,不,是在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成为一串不灭的,层层推出的情景。”^[24]²⁹⁸鬼的世界展示了具体、生动、活着的历史,费孝通从中感受和领悟到了传统积极的方面——现在与传统之间是一种“亲属关系”,在认取这一关系时,我们给予新旧之间一种承续和绵延的意义,凭借着这种历史情感,个体的生命不再是片刻的串联,而历史也成了灵感的源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从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这一路径来看,一方面,要全面深入地吸收体现了时代精神的世界文明有益成果;另一方面,通过自身文化传统的传承与转化,“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25],形成现代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这不仅是中国人希望自己如何生活的安身立命之道,同时也蕴含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希望原理”。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2]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
 [3] 哈贝马斯.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M]//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上.丁君君,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08.
 [4] 唐文明.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74-77.
 [5] 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M]//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上.丁耘,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157.

[6] 沃格林.理性:古典经验[M]//杨国荣.思想与文化:第29辑·沃格林与中国.叶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7] 叶颖.反启蒙者沃格林[M]//杨国荣.思想与文化:第29辑·沃格林与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8] 瓦莱士.《近代的正当性》英译者导言[EB/OL].张卜天,译.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实践与文本”,(2015-02-28)[2023-05-15].https://ptext.nju.edu.cn/c1/66/c12241a246118/page.htm.
 [9] 梅洛-庞蒂.1948年谈话录[M].郑天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10] 费孝通文集:第4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09.
 [11]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27.
 [12] 万俊人.现代性的多元镜鉴[J].中国社会科学,2022(7):4-20.
 [13] 史华慈.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M]//王中江.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林同奇,刘唐芬,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14] 金岳霖.论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77.
 [15]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215-216.
 [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69.
 [17] 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M]//金耀基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88-89.
 [18]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92-193.
 [19] 严复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668.
 [20]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M].旷新年,王爱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7.
 [21] 童世骏.“多重现代性”观念的规范内容:兼论其与普遍主义的关系[M]//杨国荣.思想与文化:第3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05.
 [22] 林毓生.现代知识贵族的精神:林毓生思想近作选[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482.
 [23]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42.
 [24] 费孝通文集:第3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0.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Modernity

Cao Li Guo Qiang

Abstract: Promoting the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cultures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ways to build modern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 This approach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critically absorbing the civilization achievements of western modernity, and exploring the ideological concepts and spiritual beliefs that influence and shape Chinese people in cultural traditions, so as to establish the way for modern Chinese people to settle down. The problem or crises of western modernity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two extremes of human deification and human materialization. After abandoning the illusion of subjectivism, scientism and materialism,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still has its legitimacy. The human emotion and humanitarian spirit condensed from the thousands of years of life experience of Chinese people,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recogn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tradition as “kinship”, not only indicate the roadmap for Chinese people to confirm the spiritual connection with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at present, but also contain the “hope principle” facing modernization, the world and the future.

Key words: modernity; modernity issues;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责任编辑:思 齐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路径构建研究

郭 夏 庄忠正

摘 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蕴含了因地制宜的思想,强调生产力发展必须尊重自然条件、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关系差异,同时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综合考虑传统生产要素、科技创新和行业等三个维度。中国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已取得显著成绩,并形成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发展形态,但仍存在体制机制僵化、区域协调发展不足和创新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全面发展。这一现状要求我们在体制机制构建过程中,基于资源禀赋和传统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形成多样化技术创新路径,构建符合区域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区域间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

关键词: 因地制宜;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 F01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029-10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供应链重构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以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被加速推进,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中国需要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摆脱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依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但目前政府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盲目跟风、忽视传统产业等问题,引致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

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1]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要求,也为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理论支撑和遵循方法,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2]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因地制宜”,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为推进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因地制宜的发展思想并未直接以“因地制宜”这一术语出现,但马克思和

收稿日期:2024-06-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话语体系的演进逻辑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2YJC710019)。

作者简介:郭夏,女,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工业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14)。庄忠正,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对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论述,实际上已蕴含了因地制宜的思想。以下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有关因地制宜发展的具体内容。

(一) 区域差异性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3]532-533}由此可以看出,社会阶段不同,工业发展程度不同,生产方式等均存在差异。马克思通过分析英国、法国、德国等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指出了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体现在具体的生产方式、劳动组织形式以及资本积累方式上。“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15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4]823-824}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较早,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迅速提升。“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其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留着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还居于统治地位……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但除了莱茵河左岸,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完全消灭。”^{[5]353-354}法国与德国由于历史和社会条件不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也有所不同。生产力的发展受地理环境、资源状况、社会历史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意味着,不同地区由于在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历史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方式各不相同。基于这种区域差异性要求,各地区在制定生产力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自身具体情况,因地制宜采取适当的发展措施。新质生产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发展质态^[6]要求我国践行创新主导发展战略^[7]、产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要求^[8],并在不同地区坚持不同的发展路径。发达地区可能更加注重高科技产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可能更多依赖自然资源和初级产业。因此,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时,必须面对现有的“感性确定性”,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发展策略。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提升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科技创新能力强,可以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中

部地区资源丰富,可以在重工业和制造业的基础上,推动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应重点发展生态经济和可持续产业;东北地区则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振兴传统产业,实现经济转型和发展。在新时期实现“需要”“生产方式”和人的真正的历史性发展^{[3]533}。

(二) 自然条件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自然条件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9]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气候条件、土壤肥沃度等,直接影响到农业、工业等部门的生产能力。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时强调了自然条件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他认为,土地、水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分布和利用,对发展生产力起着基础性作用。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土壤质量和气候条件,而工业生产则需要充足的矿产资源和能源供应。因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必须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合理利用和开发资源,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现代经济中,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大自然的支持。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继续发展下去往往会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0]。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只有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中国西北地区日照充足、风力资源丰富,可以重点发展太阳能和风能产业;南方地区水资源丰富,可以大力发展水电产业;东北地区土地肥沃,可以继续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同时,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应加强环境保护,避免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的破坏,确保可持续发展。

(三) 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依赖于自然条件,还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3]520}不同地区由于社会结构、历史发展进程和文化传统不同,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也有所不同。这种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要求我们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必须尊重各地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采取因地制宜的

发展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强调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和路径。“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3]520}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进程中,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和形式也有所不同,生产力发展需要因地制宜。正是基于个人与其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样需要考虑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既依赖于技术和资源,也需要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以及历史发展相匹配。地区的社会制度和背景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选择,从而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和路径。因此,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要尊重当地的社会历史背景,以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具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地区,可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促进经济发展;在社会制度相对完善、法治环境较好的地区,可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传统农业区则可以通过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提升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同时,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应注重社会公正和公平,确保各社会群体共享发展成果。

(四)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5]591}他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与生产关系相适应,不同地区的生产关系各不相同,决定了各地区具体的生产力发展形式和路径也不同。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要考虑当地生产关系的实际情况,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方式,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往往是生产力发展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剥削劳动者实现资本积累,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然而,当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导致社会变革的发生。因此,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时,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确保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在现代社

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样需要与新发展阶段具体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生产关系的优化。不同地区的区域经济状况、市场机制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决定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和方式也各不相同。调整优化生产关系,可以释放生产力潜力,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市场经济发达、制度环境相对完善的地区,要通过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促进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在制度环境相对薄弱、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地区,则需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支持,助推生产关系的调整优化。在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应注重社会公平和公正,确保社会各群体共享发展成果。

(五) 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4]698}生产力的发展会加快社会进步。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力发展时也指明,技术进步不仅表现在工具和机器的改进上,还表现在科学技术本身作为生产力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之中。科学技术不仅是推动生产工具进步和生产方式改进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力量。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通过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改进来实现,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直接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在新发展阶段,科学技术的发展仍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基础和核心驱动力。新质生产力是生产过程更加高效、产品质量更加优良、资源利用更加合理的生产力形态。

马克思在其理论中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样需要通过优化生产关系来构建高效的创新体系。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方面,要引入先进技术和工艺,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新兴科技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新质生产力的构建离不开完善的创新体系。科学技术发展依托于强大的创新体系,包括研发机构、创新企业、科技政策和创新文化等多个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体现在绿色科技的应用和可持续发展上。生态自然观要求生产力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绿色科技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的保护。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强调因地制宜的思想,提出发展生产力需要尊重自然条件、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关系的差异,并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具体分析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当地特点的发展策略,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原则。因地制宜的思想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其现实价值更加凸显。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规划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从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11]。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生产要素涵盖了传统的劳动、资本和土地,还包括技术创新、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本等新型要素。各要素的跃迁过程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系统性的政策支持。统筹协调这些要素,有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一) 基于传统生产要素维度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通过劳动者、资本和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跃迁实现生产力的全面提升。在劳动者方面,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提升、从单一技能到复合技能的转变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成为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资本方面,通过优化资本投入结构、实物资本向知识资本转变以及金融工具创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在土地和资源方面,通过提升土地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以及生态资源保护,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坚实的基础。

1. 基于劳动力要素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劳动力作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其知识水平、技能结构和创新能力直接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的推动力,更广泛的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12]。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特征和作用。在工业发展初期,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劳动者数量和劳动时间的投入,较少通过技能培训和劳动条件的改善来实现。然而,随着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劳动力逐步实现了从体力向脑力、从单一技能向复合技能的转变。知识经济和创意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劳动要素实现质变,愈发强调人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各地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水平不同,决定了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角色不尽相同。城市地区的劳动力普遍素质较高,更适合进入高科技产业领域;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则可以通过技能培训,转向现代农业和服务业领域。劳动力素质存在差异,要求各地因地制宜进行劳动力的开发和利用,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建立教育和培训体系,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是实现劳动力要素跃迁的关键。劳动者通过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和企业内训等可以有效提升自身竞争力。健全的劳动力市场机制可以保障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等方式促使区域间的劳动力供求关系达到平衡状态。

2. 基于资本要素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资本要素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最终投入产品、劳务和生产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和金融资产,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般的生产要素角度来看,资本要素指的是用于生产的资金、厂房、设备、材料等物质资源,这些资源用于生产其他商品或产生收入。资本要素的积累和有效配置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资本形式更加多样,资本的内涵不断丰富。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新型资本形式的出现,拓展了资本的概念,提升了资本的使用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在现代经济中,资本要素的作用和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各地区资本积累方式和资本市场发展水平不同,决定了各地区资本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不尽相同。发达地区的资本市场较为完善,风险投资和创新资本更为活跃;欠发达地区则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外部资本的投入。资本积累方式存在差异,要求各地区因地制宜进行资本的开发和利用,充分发挥地区资本的比较优势。通过完善金融市场

体系,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可以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率。现代经济中,资本形式十分多样,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更多选择。知识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新型资本形式成为推动生产力跃迁的重要力量。在知识资本的积累和利用方面,可以通过强化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 market 价值;在技术资本的投资和开发方面,可以通过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发展推动新技术的应用,提升生产力水平;在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方面,可以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和人才引进,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 基于土地要素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土地作为传统生产要素之一,其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它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由于供给弹性极低,需要依据土地的地域特性决定其在不同地区的利用价值和形式。随着我国科技进步以及地区管理水平的提升,土地的利用方式和价值产出呈现出新的特征。高效的土地利用技术、智能化的土地管理系统以及绿色发展的理念,使得土地要素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升级。在传统视角下,土地的利用主要依赖于自然条件和初级开发,土地的产出效率相对较低。而在跃迁视角下,这一局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各地区土地资源分布及地理环境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也存在差异。平原地区适宜发展农业和工业,山区则更适合发展生态旅游业和特色农业。土地资源的多样性及差异性要求各地在土地利用上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比较优势。通过引入先进的土地利用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大幅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智能农业、精准种植等技术的应用,使得土地资源得以优化配置。通过数据分析和物联网技术等智能农业技术的应用实现农作物的精准种植和管理,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同时,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集约利用,提升土地的生产效率和生态效益。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土地的利用必须兼顾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在土地开发过程中注重生态效益,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推动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可有效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环境保护措施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集约利用提供保障,避免了城市扩张带来的环境问题。此外,加强土地管理和环境监管,可有效控制土地资源的

过度开发,避免生态环境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 基于科技创新维度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技术创新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技术创新可以分为模仿创新、自主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三种形式,每种创新形式在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要通过这三种技术创新形式推动不同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1. 基于模仿创新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模仿创新,即通过引进、学习和改进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的先进技术来实现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升。对于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或技术积累不足的地区,模仿创新是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模仿创新的过程是技术引进的过程,更是技术吸收和再创新的过程。各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模仿创新能有效缩短地区技术差距,提高生产效率。技术水平较低的地区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可快速提升生产力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通过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可改善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其次,模仿创新可以促进技术的本土化和适应性改进。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环境和市场需求不同,直接引进外部技术可能引发适应性问题。因此,在模仿创新过程中,各地应注重技术的本土化和适应性改进,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进行技术调整和优化。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改进和优化,使其更好地适应本地的生产条件和市场需求,提高技术的适用性和经济效益。最后,模仿创新可以推动技术扩散和产业升级,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升级,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和完善。通过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先进技术,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同时,模仿创新还可以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应用,提高区域内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

2. 基于自主创新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自主创新,即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研发和优化,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自主创新是实现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是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自主创新的过程不仅是技术研发的过程,更是技术积累和

能力提升的过程。首先,自主创新能增强技术自主性和竞争力。通过自主研发和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形成技术壁垒,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提升区域的技术自主性和市场竞争力。其次,自主创新还能推动技术积累和能力提升。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可以积累丰富的技术经验和知识,培养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和创新团队,提升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因此,自主创新的过程既是技术研发的过程,也是技术积累和能力提升的过程。最后,自主创新可以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和改造,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3. 基于颠覆性创新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颠覆性创新,即通过全新的技术和产品,彻底改变现有市场和技术格局的创新。颠覆性创新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同时具有巨大的潜力。对于技术水平较高或具有创新基础的地区,颠覆性创新是实现技术突破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颠覆性创新的过程是技术突破的过程,更是市场重塑和产业重构的过程。首先,颠覆性创新可以实现技术突破和跨越式发展。通过颠覆性创新,实现技术的突破和跨越式发展,形成全新的技术体系和市场格局。在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形成全新的技术体系和产业形态,推动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其次,颠覆性创新可以推动市场重塑和产业重构。颠覆性创新要对技术进行突破,对市场和产业进行重塑。在实施颠覆性创新的过程中,要打破现有的市场格局和产业结构,形成新的市场和产业形态。通过颠覆性创新,可以形成全新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市场的新需求,开辟新的市场空间,重塑市场格局和产业结构。最后,颠覆性创新可以助力区域创新生态的形成和发展。颠覆性创新需要良好的创新生态支持,包括创新政策、创新环境、创新资源等。在颠覆性创新过程中,通过政策支持、环境优化和资源整合,可以形成良好的区域创新生态,支持和促进创新的发展;政策支持为创新提供资金和资源,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和动力;通过环境优化,可塑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吸引创新人才和企业聚集;通过资源整合,可以形成创新合力,推动创新发展。

(三) 基于行业维度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13]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三方面入手,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以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然而它们普遍存在效率低下、资源消耗大等问题,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消耗,实现绿色发展。例如,在制造业领域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自动化技术,可以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在农业领域应用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机械化装备,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在服务业领域引入数据分析、云端服务等新业态,可以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

2. 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壮大

新兴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包括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这些产业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和市场前景广阔等特征,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培育和壮大新兴产业,需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强研发能力建设,推动产学研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例如,在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大力发展元宇宙、云端传感、脑机接口等技术,可以推动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信息化水平,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生物医药产业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推动新药研发和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提高医疗水平和健康保障能力;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发展光伏、风能、核能等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能源结构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在新材料产业领域,通过研发和应用新型材料,提高产品性能,拓展产品应用领域,促进产业升级。

3. 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

未来产业涵盖量子信息、脑科学、深空深海探索等前沿科技领域。这些产业目前虽然处于起步阶段,却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中国发展未来产业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研发,抢占科技制高点,提升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例如,在量子信息产业领域,加强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在信息处理和传输方面实现革命性突破,提高信息安全性和处理效率;在脑科学领域,加强对脑功能和神经机制的研究,推动人工智能和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提升智能化水平和人机协同能力;在深空深海探索

领域,加强对宇宙和深海资源的探测和开发,拓展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

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实践

近年来,中国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形成了许多创新性体制机制。但体制机制僵化、区域协调发展不足和创新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依然存在,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全面发展。

(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地区经验

1. 深圳市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

深圳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建立了灵活多样的政策体系,坚持以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深圳市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注重灵活性和适应性,针对不同产业和企业制定多样化的支持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深圳市在短短几十年内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和高科技产业中心。《深圳市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23 年,深圳市的 GDP 超过了 3.46 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 14489.68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1.9%,形成了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其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 5717.12 亿元,数字与时尚产业增加值 4099.01 亿元,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增加值 571.20 亿元,绿色低碳产业增加值 2213.58 亿元,新材料产业增加值 352.57 亿元。深圳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建立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深圳市建立了健全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科技园区、创新孵化器、风险投资基金等。南山区的高新科技园和福田区的 CBD 成为吸引高科技企业和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其次,健全政府扶持政策。深圳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例如“孔雀计划”,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创新项目;简化行政审批流程,优化营商环境。最后,推广产学研合作。深圳市积极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建立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与华为、腾讯等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进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2. 浙江省的“数字+创新+开放”模式

近年来,浙江省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展现了强劲优势,区域创新能力连续两年位列全国前列。《2023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23 年,浙江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 9867 亿元,逐步形成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浙江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浙江省牢牢把握“科技创新”这一核心,建设高能级科创平台,实施关键核心领域攻关工程以及深化“双尖双领”计划,形成了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变革和布局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其次,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浙江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优势,推进数据交易流通,培育数字化企业,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构建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再次,在对外开放方面,浙江省坚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参与 RCEP 等国际合作,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促进了国内和国际资源的高效配置和要素的有序流动。在现代化产业布局方面,浙江省依托自身产业特色和生态优势,优化调整产业布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和效率驱动,通过“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建设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最后,在科技体制改革中,优化平台、项目、技术、机制和人才布局,探索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科技创新模式,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这些体制机制经验为浙江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为我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示范。

3. 江苏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验

近年来,江苏省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2023 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23 年,江苏全省 R&D(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达 3200 亿元,占 GDP 的 3.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江苏省在纳米材料、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拥有超过 100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和重点实验室。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2023 年江苏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 1.2 万亿元,占全省 GDP 的 15%,数字经济蓬勃发展。2023 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6.2 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超过 13%,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达 30%。江苏省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江苏省坚持科技创新,建设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实施关键核心领域攻关工程和重大科技专项,形成了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变革和布局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江苏省通过推动产学研

合作,建立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其次,江苏省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优势,推进“智慧江苏”建设,推动区块链、智能制造、物联网等技术在各行业中的应用,促进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融合,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江苏省还积极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和竞争力。再次,在对外开放方面,江苏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江苏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通过国际合作开展联合科研,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力。同时,在现代化产业布局方面,江苏省依托自身的产业基础和优势,优化调整产业布局,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和效率驱动。江苏省通过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形成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最后,江苏省在深化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江苏省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对企业在金融、人才、税收、创新等方面的痛点难点问题精准施策,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江苏省优化平台、项目、技术、机制和人才布局,探索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科技创新模式,建立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助力更多科技成果在江苏省落地转化。

(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障碍

1.体制机制僵化

在许多地区,地方政府的管理和决策机制较为僵化,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这种僵化体现在政策制定和实施往往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未能充分考虑到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采用统一的产业政策和标准,而忽视了各地在资源特色、经济基础和社会需求等方面的不同。此外,地方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往往缺乏必要的调研,未能制定健全的评估反馈机制,未能及时调整和优化策略,导致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以某些西部地区为例,这些地区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僵化,未能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同时,统一的政策标准和考核机制使地方政府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政策,从而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地方政府转变管理理念,增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充分考虑

本地的具体情况和特殊需求,制定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发展策略。

2.区域协调发展不足

由于缺乏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许多资源丰富的地区未能充分发挥其产业优势,而资源匮乏的地区则面临发展瓶颈。一方面,区域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发展不均衡,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交通网络和物流体系不完善,限制了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和合作不足,未能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区域协调发展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区域间缺乏有效的合作和协调。各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以自身利益为先,缺乏全局观念和合作意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普遍存在。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推动区域间的沟通与合作,促进资源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平台,推动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区域经济竞争力。

3.创新资源分布不均

创新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创新能力和水平相对较低。创新型企业和研发机构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和良好的创新环境,能够吸引和培育大量的创新人才,而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创新资源匮乏,难以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态势,使欠发达地区难以吸引高端人才,很难引进先进技术,难以利用和共享发达地区的创新成果,制约了欠发达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东北地区历史上曾是中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但由于产业结构单一和创新资源不足,近年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东部沿海地区如上海和深圳等地,凭借其丰富的创新资源和良好的创新环境,吸引了大量的高端人才,引进了先进技术,形成了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态势使东北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较大挑战。

创新资源分布不均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环境的差异。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改善创新环境,促进创新资源的均衡分布。可以通过设立创新基金,支持欠发达地区进行科技研发和创新创业;通过加强科技合作和人才交流,促进创新资源的流

动和共享,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创新能力和水平。

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对策建议

(一) 基于资源禀赋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深入了解和评估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研条件。评估要做到因地制宜,不仅包括对传统生产要素,诸如自然资源、人口素质、基础设施等的考察和分析,还需要深入探讨这些要素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的潜力与限制。对于土地要素而言,各地应根据土地资源的实际情况优化土地利用模式,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在城市地区可以通过土地集约利用和城市更新改造,推动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在农村地区可以通过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现代农业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同时,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确保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对于劳动力要素而言,各地应通过提升教育水平和特色技能培训,优化劳动力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城市地区可以依托高等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培养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满足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需求;农村地区可以通过开展农业职业教育和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现代农业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推动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资本要素的优化配置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环节。各地应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发达地区可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吸引风险投资和创投基金,支持高科技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欠发达地区则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吸引外部资本的投入,促进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

(二) 推动形成多样化的技术创新路径

技术创新包括模仿创新、自主创新和颠覆性创新,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各地应根据自身的科研条件、技术基础 and 市场需求选择和实施适合的技术创新路径。对于技术水平较低或技术积累不足的地区,模仿创新是切实可行的路径。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快速提升生产力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在模仿创新过程中,应注意技术的本土化和适应性改进能否给当地人文与经济发展带来切实的推动作用。根据本地的生产条件和市场需求进行技术调整和优化,确保引进技术的

有效应用和最大化利用。自主创新是技术水平较高或具有一定技术基础的地区实现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的关键。通过自主研发和创新,这些地区有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增强技术自主性和市场竞争力。在自主创新过程中,还应注重技术积累和能力提升,建立健全科研体系和创新机制,培养高素质科研人才和创新团队,提升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颠覆性创新是实现技术突破和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具备较强科研条件和创新能力的地区通过颠覆性创新可以实现技术的突破和跨越式发展,形成全新的技术体系 and 市场格局。在颠覆性创新过程中,还应注重创新生态的构建和优化,共同建立良好的创新生态,支持和促进颠覆性创新的发展。

(三) 构建符合区域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构建符合区域实际和地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对未来产业进行前瞻性布局。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产业基础、产业链水平和产业模式特点采取相应措施。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可以推动传统技术的改造和升级,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城市地区可以通过引进先进的制造技术和管理模式,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农村地区则可以通过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推广,提升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生产效率,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实现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各地应选择和培育符合区域实际的新兴产业,在资源丰富和科研条件较好的地区进行重点布局,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的集聚发展和规模化发展。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布局是确保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各地应通过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的产业布局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四) 促进区域间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

区域间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是实现全国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各地应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实现协同发展和共赢发展。首先,应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优化。通过打破地区间的市场壁垒和政策障碍,实现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加强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其次,应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力量在各区域间的合理布局,促进科技资源的共享和合作。建立跨区域的科技创新联盟和合作平台,实现科技资源的共享和优势互补,提升

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水平。再次,应通过产业协同和市场共建,推动区域间的产业合作和协同发展。建立跨区域的产业合作机制和市场共建平台,实现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链条的完善,提升区域间的产业协同效应和市场竞争能力。最后,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支持,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政策支持,引导资本、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要素向欠发达地区流动,提升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N].人民日报,2024-03-07(1).
[2] 陈传善,周毅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命题的出场逻辑与实践路径[J].江海学刊,2024(4):111-118.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和发展重点[N].人民日报,2024-03-01(9).
[7] 李永强.发挥创新主导作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J].红旗文稿,2024(6):15-18.
[8] 周文,张奕涵.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内在关联与重点突破[J].学术研究,2024(6):73-82.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8.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560.
[11]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3-8.
[12] 董振瑞,李臻.当前国内新质生产力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J].党的文献,2024(2):13-23.
[13] 政武经.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N].人民日报,2023-11-09(6).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Guo Xia Zhuang Zhongzheng

Abstract: *The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Furthe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emphasizes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for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The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contains the idea of adapting to local conditions, emphasiz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must respect the differences in natural conditions,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while also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requires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ree dimensions: traditional production factor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es.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has formed a series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tern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rigi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insufficient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which restric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situation requires us to develop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 endowment and traditional production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constructio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diversifi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aths, build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hat is in line with regional reality, and promote resource shar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Key words: local adaptabil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责任编辑:刘 一

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的机制、障碍和路径

邓线平

摘要: 数字消费通过改变传统消费的消费安排、消费行为和消费目标,形成了与传统消费不一样的产业驱动力。数字消费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了产业质量提升,加速了产业融合。数字时代,跨地域消费激发了产业竞争,促进了生产质量、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提升,推动了不同产业相互融合。消费效率的提升推动了我国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引发了产业边界的系统性重塑,转变了产业发展模式。主动性消费促进了产业链重组,推动了产业智能化以及新兴产业发展,有利于加强服务业对产业生产的赋能和引导作用。当前,我国数字消费的发展存在诸多障碍,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同时面临诸多现实障碍。以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要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推动数字消费技术创新;要引领数字服务业规范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要消除产业垄断,推动高水平数实融合;要推动产消互动,提升产业的消费吸纳能力。

关键词: 数字消费;产业结构;产业质量;产业融合

中图分类号: F7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039-08

消费是驱动产业升级的有效力量,消费升级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消费升级的结构性变化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与传统消费不同,数字消费会形成不一样的产业驱动力量。现有研究大多强调数字技术可以连接消费与产业,从而功能性地驱动产业升级。数字消费的渠道线上化、偏好智能化、模式服务化变革,在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提高产业发展质量、促进产业融合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1]。数字消费助推精准生产,促进高效流通,形成新型分配,创造场景融合^[2]。数字消费推动了数字产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缩小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差距,吸引消费回流。数字消费有助于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厂商参与国际竞争^[3]。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同样体现在数字技术对消费和产业产生的网格化影响上,数字技术网格化改变了消费过程安排、消费效率和消费目标,以及网格化改变了产业结构、产业质量和产业融合。满足消费需求是技术生产的目标,是技术价值的实现^[4]。本文着重从技术变革

角度阐述数字消费的革命性改变,探讨数字消费对产业结构、产业质量和产业融合的技术性影响。

一、传统消费、数字消费与产业升级

消费是人们利用社会产品来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消费安排,即通过什么样的过程实现消费。二是消费行为,即消费过程中精神、身体与产品的互动。三是消费目标,即消费指向什么。传统消费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消费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消费与产品的地域获得便利性以及消费行为的相对固定有关。传统消费与传统产业生产紧密关联,消费安排对应的是一种实体技术消费。传统产业生产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生产技术存在地域限制,生产规模和生产内容都与地域范围有关。消费品从生产到被消费会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进行,形成群体性消费。本地有什么样的生产,消费者就会选择相应的产品进行消费;本地没有的产品,

收稿日期:2024-04-02

作者简介:邓线平,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精神文明研究所研究员(广东广州 510635)。

在传统消费中就很难被消费,或者即使被消费,也需要较高的消费成本。消费的地域性决定了消费安排。传统消费体现在特定的消费习惯和消费产品中,消费者习惯于以特定的方式消费特定的产品,消费惯常路径与消费过程安排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密切相关。不同群体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不同,消费安排不同,其消费效率也不同。传统消费的目标指向与生活补偿有关,人们往往受限于现有产品消费,缺少选择。所谓生活补偿,不是对个别财产的财产价值补偿,而是对作为整体的人的生活的本身予以补偿。在生活补偿背景下,消费有固定路径,从而拉动相对固定的产业生产。在一定范围内产业生产安排具有规律性和稳定性。

数字消费使消费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数字消费的过程安排有明显的跨地域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消费者轻点鼠标即可实现跨地域消费。跨地域消费的基础是数字技术将不同地域的产品以网格化的形式予以呈现,消费者面对网络即可轻松实现全域产品的消费。传统消费受实体产业生产影响较大,消费安排相对被动,消费路径相对固定,可选择的消费范围较小。数字消费的跨地域性极大地提高了消费者消费的主动性,更大范围的消费选择使消费者的消费规划更加灵活。数字消费促使产业生产通过灵活组合和灵活销售的形式进行,克服了产业生产的地域限制,也使得消费者在时间安排和产品使用上更加灵活,消费者有更充裕的时间安排重要消费,从而提高了消费效率。数字消费催生了更多的尝试性消费,也使不同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数字消费既催生了线上消费,也丰富了线下消费。因为存在更多选择,传统固定的消费路径就会被突破,消费就更贴近消费者的真实需要。数字消费的发展使生活消费与工作消费联系更紧密结合。“数字消费促使消费结构从对物质的需求向精神层面的满足转变、推动消费层次由发展型向共享型和服务型演进。”^[5]

传统消费驱动产业升级体现在消费与生产安排的转变、消费量的改变、消费质的提升等方面。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在这些方面均有体现,但升级路径与传统消费不尽相同。传统消费与生产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进行,具有相对固定的路径,大多数情况下是生产驱动消费,然后以消费量的增长反过来带动生产扩张。传统消费量增长的基础是收入增加提升了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在固定的消费模式下,消费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消费效益会明显降

低。消费量的增加也表现在生产出的产品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被接受,或者有更多的下游产业。传统消费质的提升,既是收入增加的结果,也是创新消费的结果。埃弗雷特·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6]认为,消费先驱是最早使用或采用新的消费品的人,他们对于消费质的提升起关键作用。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实现消费质的提升需要消费者改变传统的消费习惯,这需要较长的适应过程,又或者集中于自身需求进行消费。在传统消费中,“产品拥有购买的最小单元和消费金额的最低门槛,产品价格、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产品的必要性程度共同决定和限制了消费者能够购买的产品种类”,这制约了消费产品品质的提升。

数字消费促进了消费与生产安排的转变、消费量的改变、消费质的提升。数字消费的消费对象是数字商品或数字化商品。“数字商品”是指产生于数字领域,并完全由数字技术支撑、构成的商品,如统计数据、社交软件、网络游戏、数字藏品、短视频等。“数字化商品”则是指原本不属于数字领域,却以数字形式存在的商品,该种商品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被转化为数字形式的商品,如网购商品、数字货币、线上会议、远程教育、数字图书等。数字化商品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输和交易,消费者可以在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情况下购买和使用数字化商品,同时也可以有效避免制作实体商品所需的物质、能源和环境成本。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数字化商品的需求不断扩大,市场前景广阔,为消费者带来了更为便捷和多样化的购物体验 and 生活方式选择。数字操作、数字交易、数字运输简捷高效,促进了数字消费量的改变和质的提升,带来不同于传统的消费与生产安排转变。数字消费拉动产业生产,促进了消费的网格化发展和生产的网格化发展,使得两者在更高水平上互动。消费网格化将消费者个人的消费行为纳入产业化发展轨道,与产业网格化对接起来。原先的内部消费行为转变成为推动产业生产的直接动力,刺激产业生产更加顾及个人消费需求。在传统消费中,消费品与产业生产不直接关联,其对生产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数字时代,原先的内部消费行为转变成为推动产业生产的直接动力。消费量的增加从特定时空范围内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网络上的不同消费者在不同时空范围内的消费量的增加。产业生产由提供现实需要的消费品,转变为提供数字迹象显现的消费品。数字消费和传统消费中消费创新和消费文化改变引发消费质的提升。数

字时代,数字生产的多样化供给和数字消费的多样性选择推动了消费质的提升。消费质的提升从普遍意义上的地域消费品质量的提升,转变为消费者个性化选择中的质的提升。

二、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的机制

产业升级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优化、产业质量提升和产业融合。产业结构优化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在调整中不断优化,工业及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服务业)。第一产业是与自然界资源打交道的产业,该产业通常需要利用自然资源,产品来源于自然界。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二产业以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程度较高,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也较高,因此产业技术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较大。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是保证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力量,提供社会保障和服务,连接生产与消费。工业及服务业比重提升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指标,离不开技术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从受制于自然向依靠技术和消费服务方向转变。产业质量提升主要指生产质量、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升。生产质量提升包括生产的稳定性和创新性水平提升,生产稳定供给是产业质量的重要保证。产品质量提升主要指产品使用体验的提升,有些产品重在使用过程体验,有些产品重在使用寿命体验。服务质量提升指从生产到消费、从消费到生产过程的整体质量提升。生产到消费主要满足消费者需求,消费到生产主要满足生产需求。产业融合指一、二、三产业的相互融合,通过产业融合可以简化生产到消费的各个流程,使技术得到精细化发展。

(一) 数字消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互联网的发展使生产和消费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实现了关键性要素、产品和服务的跨区域流动和有效配置。跨地域消费使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不断提升。传统消费很大程度上依靠消费者的自主安排,很难推动产业化发展。传统消费服务聚焦于产品输出,围绕普遍性的产品输出进行产业布局。数字消费关注消费者对产品的输入,围绕产品输入进行个性化的产业服务布局。数字消费依赖

线上技术,将消费服务从实体店扩展到消费者家里,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互联网的发展可以推动生产和消费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实现关键性要素、产品和服务的跨区域流动和有效配置。数字消费不仅是跨地域消费,也是跨时间消费,消费者可以为未来定制消费。“数字消费将突破传统消费的单一性、滞后性和时空限制性。”^[7]由于可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近年来,数字消费服务相比于传统的消费服务的需求量剧增。与传统服务相比,数字消费服务与个性化需求以及个性化生产相连接,需要更精细的技术安排,这又推动了产业技术的升级。数字时代,数字消费服务与数字化生产通过网络实现一体化发展,以服务带动生产,以生产推动服务。

消费效率提升推动了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实践中以消费实现的速度以及消费实现的完善程度衡量消费效率。数字消费不仅节省了消费时间,而且实现了从传统的一次消费向多次消费的转变,大大提升了消费的完善程度。想要客户多次消费,就要向同一个客户提供更多价值,围绕客户需求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向同一个客户提供更多的客户价值,实现多次交易。多次数字消费推动了产业发展的智能化变革和科技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的智能化变革拓展了产业发展的空间。传统产业围绕主导技术进行相关创新,智能化发展则围绕产业的分化组合进行创新。智能化发展是数字时代我国的主要发展方向,实体产业内部需要重组发展,实体产业链上下游同样需要重组发展。例如,华为、小米等企业通过其操作系统和智能管理软件,整合和连接空调、电视等各类家电产业,构建了智能家居产品体系。在智能化发展过程中,传统产业与数字产业联合程度加深,形成了更精细复杂的产业分类,科技服务业发展迅速。“消费偏好的智能化变革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从领域内和渐进式向跨领域、多方向、颠覆式转变,在改变产业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加快了产业发展模式的数字化转型。”^[8]

主动性消费促进产业链重组,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主动性消费意味着消费产品的选择更加多样,产品组合更加丰富。传统消费产品受产业生产限制,产品组合缺乏多样性。传统消费围绕产业生产展开,数字消费主要满足消费者个体生活需要。两者驱动产业发展的方向、过程和后果不同。传统产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技术创新,通过创新形成相对封闭的技术及产业领域。数字消费推动产业技术的

数字化变革,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生活需求。依靠数字技术,企业可以提供更多种类的个性化和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并将产品和服务面向目标客户进行精准推广,一些新兴产业应运而生。与传统产业相比,数字技术引领产生的新兴产业朝生产服务一体化方向发展,将一些原有的贴近消费的生活技术纳入产业化发展过程中。

(二) 数字消费推动产业质量提升

跨地域消费激发了产业竞争,推动了生产质量、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升。消费者选择更高质量的产品、更可靠的技术、更优质的满足灵活需求的服务,会促进产业竞争,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生产。数字化竞争与传统产业技术竞争存在差别。传统产业技术竞争是整体竞争,主导技术决定竞争成败。一项产品的主导技术存在优势,与主导技术附和的技术,即使存在单独竞争劣势,往往也会在整体的产品竞争中获胜。数字化带来的产业竞争是技术分化组合式竞争,优势技术通过网络相互连接,从而形成更大的优势,推动产业质量提升。跨地域消费使产业生产实现灵活组合。生产方面,通过优势的生产技术组合或者弹性的生产技术组合形成稳定的生产输出,满足数字消费的需求;在产品方面,通过技术优势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在服务方面,通过从生产到服务各种优势的结合,形成更优质的服务。

消费效率提高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转变产业发展模式。传统的被动消费及一次消费具有稳固落后产能的作用。传统消费中,受地域限制及消费模式限制,消费者对落后产能容易形成依赖。先进产能可能激发人们的风险意识及不习惯心理,使它短时间内难以替代落后产能。数字消费的尝试性和多次消费提升了人们对新事物的接纳能力,消费者在众多选择及多次尝试后,对优质生产、优质产品、优质服务有了更强的筛选能力。数字消费的发展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传统产业大多由实体技术主导,由先进与落后技术共同作用形成。数字消费加速了实体产业的模式转变,推动了产业技术变革,促进了技术创新以及技术之间的优势连接。新的产业模式将优势技术及优势技术组合很快筛选出来,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为提升产业质量打下坚实基础。同时,数字消费通过提供更加透明的市场环境,激发了产品质量竞争,进而提高了产业发展质量。

主动性消费促进了产业智能化以及新兴产业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消费行为将呈现主导性加强特征。”^[9]消费者交叉灵活选择消费对象,促进了

生产及产业服务的精细化、智能化发展。传统生产及产业服务围绕主导技术进行,具有单一性和固定路径。数字时代的生产及产业服务打破了原有的技术模式框架,朝着智能化的灵敏生产方向迈进。智能化生产又促进了数字消费^[10]。智能化生产的核心要求是将实体技术及产业发展建立在数字智能之上,智能化生产突破了传统产业固有的路径,驱动了产业智能化以及新兴产业发展。

(三) 数字消费加速产业融合

跨地域消费在推动消费行为服务化的同时,也推动了不同产业的相互融合。产业融合推动了不同产业之间关系加强,有利于各产业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个性化消费要求一对一的生产和服务,推动了产业生产与消费服务的内部融合。传统产业生产在特定的区域内完成,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生产与服务关系。传统消费与传统生产休戚相关,产业融合程度由生产技术融合程度决定。数字消费的跨地域性,将不同技术生产与消费置于同一平台,形成全方位互动态势。跨地域消费推动了产业的跨地域的整合,某个区域的工业产品可能需要另一区域的服务产品与之配套。在数字消费驱动下,工农业生产主动寻找与自己配套的服务业。不同产业相互配合,产业融合度提升。随着跨地域消费的发展,产业融合速度加快。“工业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是提高产业发展质量、补充产品智能化功能、加快服务化转型的必由之路。”^[11]

消费效率提高引发了产业边界的系统性重塑,推动了不同产业的融合。数字消费通过数字技术将不同类型的消费形式连接起来,从消费端重塑产业边界。传统消费具有明显的产业特征。在数字消费中,消费者通过网络完成大多数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数字消费实现了对产业边界的系统性重塑。“消费者通过社交网络、短视频分享产品信息和使用体验,加强了消费的网络效应。”为了完成统一的消费过程,工农业生产逐渐向数字化生产转变,农业工业化、数字化步伐加快,工农业生产技术加速融合。

主动性消费加强了服务业对产业生产的赋能和引导作用。主动性数字消费使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提升。这种提升不是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意义上的服务业比重提升,而是数字消费所带来的个性化服务引致的服务业占比增加。“年轻一代普遍热衷于年轻化、品质化和个性化的新产品、新体验。”^[12]数字消费服务对产业生产形成二次赋能和引导作用,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灵活的消费需求,而

且可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生活组合需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生活组合需要,产业生产要从满足简单生产需要向满足产品生产的生活服务化需要转变。个性化服务要求个性化生产。个性化生产意味着要改变相对固定和单一的生产模式,并向灵活生产和生活生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应运而生。“随着数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新技术、新业态和新产业不断涌现。”^[13]

三、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的现实障碍

当前,我国数字消费的发展存在诸多阻碍,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同时面临诸多现实障碍。

(一)数字消费发展障碍

数字消费发展障碍主要表现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以及数字鸿沟抑制跨地域消费,数字技术创新不足且与当地消费行为不匹配抑制消费效率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且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抑制主动消费。

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以及数字鸿沟抑制跨地域消费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包括网络基础设施,如5G/6G、卫星互联网、新一代通信网络、未来网络等;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如云计算中心、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服务平台、物联网服务平台、平台型互联网企业应用服务平台等;科技创新支撑类基础设施,如超级计算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支撑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及关键行业信息化应用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等。数字基础设施对跨地域消费的阻碍体现在设施的地域布局上。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由于地理、经济、文化等因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较大差距。欠发达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信息服务基础设施、科技创新支撑类基础设施以及支撑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及关键行业信息化应用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等建设不完善,发展较为滞后,无法满足数字消费发展的需要。数字基础设施对跨地域消费的阻碍同时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的产业区别上。2022年,我国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10.5%、24.0%、44.7%,同比分别增长0.4%、1.2%、1.6%^[14]。数字基础设施布局要适应数字消费需求,但现在仍存在着数字基础设施在消费端供给不足的问题。对于一些较高水平的数字

消费需求,应配套供应高水平的数字基础设施。由于存在数字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以及数字鸿沟等问题,我国数字消费发展受到限制,难以实现从传统消费到数字消费的跨越。

2.数字技术创新不足且与当地消费行为不匹配抑制消费效率提升

数字消费效率与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以及其与当地消费行为的适配程度紧密关联。数字技术水平越高,数字操作越便利,数字消费选择越丰富,数字消费效率越高。推动数字消费水平提升,需要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数字技术创新不足,可能导致数字消费被限制在某一阶段或某一水平上,成为制约消费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与当地消费行为的适配程度越高,消费效率也越高。数字消费要融合生产与生活,同时表现出人文化和个性化特征。支撑消费的数字技术要贴合人文化需求,更好地将数字技术与消费行为结合,从而提升消费效率。现有的数字技术创新大多缺乏人文性特征,这可能抑制消费效率提升,如数字操作过于复杂可能会抑制消费。数字时代,消费表现出个性化特征,数字技术创新往往优先基于区域群体需要进行,很难与诸多消费者的个性化消费需求配套,这也可能抑制消费效率提升。

3.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且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抑制主动消费

数字消费最主要的目标指向是服务居民生活。传统服务业是指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各种服务的行业,大都历史悠久。传统服务业的需求是传统的,即其需求在工业化以前就广泛存在;传统服务业的生产方式是传统的,大多表现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家仆服务和传统商业等,广大的个性化消费服务被排除在传统消费服务之外。近年来,数字消费快速发展,其人文化、个性化特征愈发凸显。但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总体较为滞后,可能抑制主动消费。一方面,有些地区数字消费服务提供能力有限,只限于提供简单的数字消费服务,满足居民简单的数字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贯穿个性化生产到个性化消费全链条的数字服务发展相对滞后,抑制了消费者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追求人文化、个性化数字消费服务的热情。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是抑制消费者数字消费主动性的重要障碍。传统消费维权具有地域便利性,但数字消费脱离了时空限制,消费者进行数字消费,其跨地域维权难度更大,亟须完善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

(二) 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障碍

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面临诸多现实障碍,主要表现在服务业不规范阻碍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垄断阻碍产业质量提升、政策缺乏阻碍产业融合等方面。

1. 服务业不规范阻碍产业结构优化

随着数字技术发展以及数字消费兴起,我国消费服务业和生产服务业蓬勃发展。传统服务业主要依赖于传统产业生产,形成从生产到消费的垂直单线连接,服务业只是在技术创新的有限范围内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数字时代,生产到消费的扁平化结构特征愈发明显,数字生产将不同产业的生产技术进行数字化提取,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生产界限以及从生产到消费的产业界限。在这一过程中,规范的消费及生产服务可以有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反之则会形成混乱,阻碍产业结构优化。服务业不规范主要表现为服务消费不规范以及驱动产业生产不规范。服务消费不规范,主要表现为盲目追求市场占有率、销量扩大、利润提升,忽视服务对象的人文化、个性化消费需求;盲目简化服务流程,忽视服务对象的权益保护和事后的服务追踪;盲目统一服务场景,忽视服务对象的个性化和高质量要求。服务产业发展不规范主要表现在盲目追求产业垄断,忽视产业创新和质量提升;盲目追求产业隔离,忽视产业沟通和灵活组合;盲目追求产业扩张,忽视产业有序成长和合规竞争。

2. 产业垄断阻碍产业质量提升

数字时代的产业垄断有两种:一种是数字技术垄断,另一种是实体产业数字化形成的垄断。数字时代,数字化成为传统产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与数字企业相比,传统企业的数字技术相对落后,数字化进程相对缓慢。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数字企业依赖数字技术形成垄断,通过与落后产能结合,形成对实体制造业的逆向淘汰。数字企业依靠其技术优势,实现对实体企业的恶性竞争。传统实体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要在实体生产的过程中进行创新,加强各环节的数字化连接,最终实现生产的数字化连接。既要在生产内部进行技术创新,适应数字化连接要求,通过技术数字化连接实现数字灵活生产,又要推进技术生产的智能搭载,实现智能驱动生产。“传统产业实现产品智能化需要为产品搭载智能管理系统、开发手机APP等终端智能管理软件,所需较高的数字技术能力使传统产业常借助数字科技平台企业的操作系统和管理软件实现智能化转型,而

科技平台企业的网络外部性则为垄断创造了条件。”^[15]

3. 政策缺乏阻碍产业融合

数字消费驱动产业融合,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政策调整。数字时代的政策缺乏主要表现为,政策被限制在原有的产业融合范围内,以传统产业融合方式驱动数字化产业融合。原有的产业融合是传统技术创新限度内的融合,如果超出技术创新限度,各产业就会回到各自隔离的状态。数字化产业融合以数字连接驱动产业融合,推动技术创新。原有的政策倾向于在产业内部起作用,通过传统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融合,通过产业发展和不同产业的相互博弈逐步推进产业融合。以数字化驱动产业融合,需要突破原有的产业融合路径。数字化引领产业融合是建立在扎实的制造技术创新基础之上的,形成了与传统产业融合不同的技术创新要求。数字时代,如果没有数字产业发展的明晰的政策指引,那么可能出现融合路径误置和“伪产业融合”等问题。

四、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的路径

针对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的现实障碍,要从数字消费及产业发展的两端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出发,做好数字服务与消费以及产业发展的连接,以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

(一)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推动数字消费技术创新

数字消费发展越迅速,其对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越明显。数字消费受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及数字消费技术影响。数字消费根本上是个性化消费,数字基础设施布局以及数字消费技术创新既要照顾到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各自的特点,推动其均衡发展,又要照顾到数字消费的个性化要求。数字消费的发展建立在传统消费发展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引领传统消费实现转型升级。要根据各地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推动数字消费技术创新。要在地区内部实现差异化技术布局,允许不同消费水平的数字消费的存在。为此,要避免平均布局基础设施和数字消费技术。平均布局会提高数字消费的技术成本,容易造成浪费。

(二) 引领数字服务业规范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

与传统服务业相比,数字消费服务在消费服务范围、消费服务即时性及消费服务满足程度等方面

更贴近消费者的实际需要。“线上消费场景需要消费者进行个人身份认证、提供电话和住址等隐私信息,以便邮寄产品、管理消费者账户、提供定制化服务。”传统服务业向数字服务业转变,服务的数量、质量、范围和时效性均发生明显改变。数字消费服务连接了数字消费和产业发展,要以数字化可追溯方式引领服务业规范发展,然后以规范的服务业推动实体产业发展。要避免两种不规范倾向:一是以服务消费者为借口,忽视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消费可以拉动生产,生产可以驱动消费,但很多时候两者之间并不直接发生作用,中间需要各种服务业的填补。以服务消费者为借口,忽视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可能引发产业生产的畸形化。二是单纯从产业发展需要出发,忽视真正的消费服务。数字服务若仅以满足生产为目标,可能导致实体产业主导网络销售,产生大数据杀熟、定向投喂等数字服务乱象。要将服务业规范发展与保护消费者权益紧密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是协调消费与生产的核心所在,要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中心,推动消费、服务、生产协调发展。

(三) 消除产业垄断,推动高水平数实融合

数字消费可能引致产业垄断,引发产业层面的数字化垄断或者产业生产与消费层面的数字化垄断。消除产业层面的数字化垄断,要推动不同产业的均衡发展,避免单一的产业化以及单一的产业数字化发展。不同产业的数字化均衡发展,在于以数字服务业规范发展推动不同产业的均衡发展。消除产业生产与消费层面的数字化垄断,要做好从产业生产到数字消费不同环节的均衡发展,避免将消费者固定在特定的消费路径和消费环节之中。在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数字化要起到均衡、引领、规范产业发展的作用,同时要与现实产业发展相匹配。实现高水平的数实融合,既要发挥数字化的均衡、引领、规范作用,也要照顾现实产业的发展节奏和路径。高水平的数实融合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高水平的不同产业的数实融合,二是从生产到消费的不同环节的数实融合。

(四) 推动产消互动,提升产业的消费吸纳能力

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需要在新的条件下打通从消费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传统的产业吸纳消费主要是在生产推动消费的基础上,依靠消费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促进产业增长,形成产业结构升级、质量提升和产业融合。数字化消费与产业连接的过程是实体消费的数字化过程、实体生产的数字化过程

以及数字化连接过程。通过数字化连接,个体消费形成了对产业生产的驱动作用。数字时代,推动产消互动,提升产业的消费吸纳能力,一要进行更广泛的数字化连接和更精细的数字化分类。通过更广泛的数字连接,推动消费与生产之间形成更广泛互动;通过精细化分类,推动消费与生产的连接和互动。二要推动消费与生产结合。传统的生产与消费是分离的,数字化推动了消费与生产的实时互动和虚拟结合。通过实时互动和虚拟结合,不断拉近消费与生产的距离,实现个性化消费与生产的相互促进。三要围绕生活主动性周期进行产业安排。消费与生产结合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灵活生产和满足个性化需求,将传统的围绕生产周期进行产业安排改变为围绕消费者个性化、人文化需求进行产业安排。

结 语

当前,我国面临扩大消费和产业升级的双重压力。传统消费模式正向数字消费模式过渡,数字化和数实融合是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数字消费对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愈发明显。传统消费侧重于产业对生产的推动作用,而数字消费侧重于消费对生产的拉动作用。本文从数字消费与传统消费的产业升级驱动原理出发,从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质量、促进产业融合三方面,论述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数字消费的新特征及其对产业升级的驱动作用,从而推导出数字消费驱动下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趋势。具体而言,跨地域消费扩大了服务业的服务范围,提升了生产、产品及服务质量,促进了产业内部融合。消费效率提升可以推动灵活生产,淘汰落后产能,重塑产业边界。主动性消费促进了产业链重组,推动我国智能化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增强了服务业对产业的赋能和引导作用。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存在诸多障碍。如果数字消费被传统产业发展所束缚,那么跨地域数字消费可能被抑制,不利于生产效率提升和主动性消费,从而阻碍产业结构优化、产业质量提升和产业融合。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的路径主要表现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引领数字服务业规范发展,消除产业垄断以及提升产业的消费吸纳能力。

参考文献

- [1] 贺俊, 庞尧. 数字消费驱动产业升级: 理论机理、现实障碍和推进路径[J]. 技术经济, 2023(12): 28-34.

- [2] 赖立, 谭培文.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数字消费的内涵、困境及发展路径[J]. 经济学家, 2023(12): 95-103.
- [3] 毛中根, 贾宇云. 把握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24(2): 3-13.
- [4] 邓线平. 消费促进技术进步的成因及途径分析[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6(1): 78-81.
- [5] 高振娟, 赵景峰, 张静, 等. 数字经济赋能消费升级的机制与路径选择[J]. 西南金融, 2021(10): 44-54.
- [6] EVERETT M R.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3: 357-373.
- [7] 张峰, 刘璐璐. 数字经济时代对数字化消费的辩证思考[J]. 经济纵横, 2020(2): 45-54.
- [8] 贺俊, 庞尧. 数字技术驱动的产业融合发展范式与面向融合范式的政策体系调整[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4): 71-79.
- [9] 马香品. 数字经济时代的居民消费变革: 趋势、特征、机理与模式[J]. 财经科学, 2020(1): 120-132.
- [10] 李宗伟, 陈楚欣, 张艳辉. 住宅智能化、消费者异质性与支付意愿: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实证分析[J]. 技术经济, 2023(7): 152-164.
- [11] 刘洋, 董久钰, 魏江. 数字创新管理: 理论框架与未来研究[J]. 管理世界, 2020(7): 198-217.
- [12] 马玥. 数字经济对消费市场的影响: 机制、表现、问题及对策[J]. 宏观经济研究, 2021(5): 81-91.
- [13] 韩庆龄. 数字经济推动消费升级及其路径探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22(10): 50-54.
- [14] 中国信通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R/OL]. (2023-04-30) [2024-02-20].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P020240326636461423455.pdf>.
- [15] 陈永伟. 平台经济的竞争与治理问题: 挑战与思考[J]. 产业组织评论, 2017(3): 137-154.

The Mechanisms, Obstacles, and Paths of Digital Consumption Driving Industries Upgrading

Deng Xianping

Abstract: Digital consumption has formed an industry driving forc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onsumption by changing the consumption arrangement, behavior, and goals of traditional consumption. Digital consumption has promoted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ed industrial quality, and accelerate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cross-regional consumption has stimulated industrial competition,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quality, product quality and service quality, and enhanced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improvement of consumption efficiency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 industry,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elimination of outdated production capacity, triggering the systematic reshaping of industrial boundaries, and transforming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 Proactive consumption promotes 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 promotes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the enabling and guiding role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onsumption in China, and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es driven by digital consumption also faces many practical obstacles. To drive industrial upgrading through digital consumption, we should improve the layou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in digital consumption; lead the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ervices and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eliminate industrial monopoly and promote high-level integration of data and reality;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enhance the consumption absorption capacity of industries.

Key words: digital consump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ustrial quality; industrial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刘 一

耕地保护考核和粮食安全考核“合二为一”的基础与推进路径

刘 慧 钟 钰

摘 要: 为让耕地保护目标更好地服务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总目标,我国开始推动耕地保护考核和粮食安全考核“合二为一”。从制度基础看,修订后的《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和《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都经过多年应用实践,在奖惩措施、结果运用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从实践基础看,地方探索取得初步成效,典型省份的耕地面积、粮食播种面积都稳中有增。然而考核只是手段,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都实行不久。更好发挥这两项考核“合二为一”对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见效的作用,还需要从根本上理顺关系、构建机制,为此,应着力从以下两方面推进:其一,推动形成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重点是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待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问题,厘清党政权责界限,统筹协调各部门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和督察“利剑”作用;其二,构建以主产区为主、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共同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格局,重点是主产区优先享有政策扶持和利益补偿,主销区对主产区承担横向利益补偿义务,加快产销平衡区经济发展。

关键词: 党政同责;考核;耕地保护;粮食安全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047-08

在中长期国内粮食产需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和全球粮食供给体系不稳定性增加的背景下,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面对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以下简称“二调”)以来的10年间全国耕地减少1.13亿亩的严峻形势和部分地区出现的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倾向,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严格省级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并严格考核,是新形势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这一安排将地方党委也纳入本行政区域内耕地保护和保障粮食安全问责的主体范畴,把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崭新的政治高度^[1]。

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密不可分。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最根本的基础性资源,耕地资源的稀缺性与不可再生性决定了耕地保护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逻辑起点^[2]。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且开发成本较高;同时,我国还面临着优质耕地持续减少、耕地总体质量不高、现有部分耕地还要退出等突出问题^[3]。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耕地保护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将耕地保护考核和粮食安全考核“合二为一”符合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有助于确保耕地数量、质量,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4]。为此,自2022年起我国开始积极推动耕地保护考核和粮食安全考核“合二为一”。2023年年初中央印发了耕地保护和

收稿日期: 2023-12-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耕地-技术-政策融合视角的‘两藏’战略研究”(21ZDA05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下的地方政府粮食生产保障行为及机制研究”(21BJY131);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10-IAED-06-2024)。

作者简介: 刘慧,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81)。钟钰,男,通讯作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81)。

粮食安全考核办法,标志着考核工作整体制度框架基本建立^①。然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都实行不久,将这两项考核“合二为一”是否具有较好的制度基础?近期地方探索是否形成了较好的实践基础?下一步应如何推进及需要关注哪些重点?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更好发挥这两项考核“合二为一”的作用,以确保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确保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见效,全面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

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耕地保护考核和粮食安全考核“合二为一”的制度基础

系统梳理我国耕地保护责任制考核办法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办法的演变过程,可以回答耕地保护考核和粮食安全考核“合二为一”是否具有较好的制度基础这一问题(见表1)。

表1 耕地保护责任制考核办法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办法的演变

项目	阶段	标志	施行年份	核心内容
耕地保护责任制考核办法	探索形成	《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	2005年	明确规定了考核标准、考核办法、奖惩措施和考核结果应用等具体事项
	调整完善	修订后的《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	2018年	优化了考核组织方式,完善了考核指标与标准,强调了奖惩措施和考核结果应用
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办法	开始探索	“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1995年	明确规定了负责的具体内容,包括保证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增加储备等
	正式建立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	2015年	明确规定了考核内容、评分办法、实施步骤、奖惩措施、结果运用和工作要求等具体事项

(一)耕地保护责任制考核办法的演变过程

耕地保护责任制考核办法作为国家一揽子耕地保护政策的一部分,随着我国耕地保护形势的变化和人们对耕地保护认识的深化逐步完善。

1.探索形成:《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

1998年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快速增加,农地由于取得成本低而成为补充建设用地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在复种指数高的南方和部分中部地区^[5]。1998—2003年,全国耕地减少面积达到9000多万亩,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耕地减少最快的时期。特别是2003年一年全国净减少耕地面积就达到3806.1万亩^②,粮食产量也减少了2639万吨^③,耕地骤减导致的粮食安全隐患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6]。

在此形势下,国家明显加大耕地保护力度,进一步完善耕地保护政策体系,开始探索各级政府“一把手”负总责的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制度。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负责,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为第一责任人,并对考核标准、考核办法等都作出了明确具体规定,同时将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结果,列为省级人民政府第一责任人工作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2.调整完善:修订后的《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

2004年起我国耕地减少趋势有所缓解,到2008年共减少了942.6万亩^④,2009—2016年共减少了695.55万亩^⑤。但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加之部分地方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的主体意识依然不强,滥占耕地现象屡禁不止。2009—2016年,年立案查处违法用地案件最少也达到4.71万件,涉及耕地面积最少也达到10.32万亩^⑥。与耕地数量相对稳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耕地质量明显下降。2014年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明显高于林地(10%)、草地(10.4%)和未利用地(11.4%)。《2016年全国耕地质量监测报告》显示,65.5%的监测点耕层厚度较浅,25.9%的监测点土壤容重大于适宜作物生长的标准。

在此形势下,我国耕地保护政策进入数量管控、质量管理和生态管护“三位一体”阶段并不断强化,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举措。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提出要完善《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2018年1月修订后的《考核办法》印发施行,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一是优化了考核组织方式。简化对规划期内一般年度的检查,突出对规划期中、规划期末的

检查考核。二是完善了考核指标与标准。考核内容进一步突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等内容,补充耕地休养生息等生态保护相关内容。三是强调了奖惩措施和考核结果应用。增加在安排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土地整治工作专项资金等时向成效突出的省份倾斜的条款。增加将考核结果作为省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工作业绩考核、相关考核评价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重要依据的条款^⑦。

(二) 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办法的演变过程

我国自1994年开始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自2015年开始实行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并建立了考核机制,都与当时的粮食安全形势密切相关。

1. 开始探索:“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农业机会成本提高,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明显的缩减粮食特别是稻谷种植的倾向,导致1991年、1992年连续两年粮食减产且结构矛盾突出^[7],每年由北方调入南方的玉米、小麦由1980年代的150万吨增加到1992年的1300万吨左右,1993年开始又出现了“北米南调”的现象^[8]。

在此背景下,国家基于粮食是一种全国性的公共品及其战略性和特殊性的考虑,认为有必要加大地方政府在解决粮食问题上的责任。1993年《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发布施行,要求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切实加强粮食管理。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通知》发布施行,明确提出要贯彻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负责的粮食管理原则,实行省(区、市)政府领导负责制。199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明确负责“米袋子”就是负责本省的粮食供应,包括保证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增加储备、调剂供求和稳定价格。尽管随后我国又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强调要落实好这项制度,但是并没有制定相应的考核办法和奖惩措施,这就让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9]。

2. 正式建立:《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

1995年起,我国粮食产量有所增长,虽有波动但基本实现了供求平衡、丰年有余。随着我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的建立及不断完善,2004—2014年,全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一连增”,并由注重数量增长转向数量质量并重^[10]。然而,我国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还不牢固,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种粮比较效益明显下降,外部环境趋于复杂^[11]。特

别是一些地方依然存在放松粮食生产、忽视粮食流通、过度依靠中央的现象^⑧,突出表现为粮食生产向主产区集中趋势愈加明显。2004—2014年,13个主产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比重由73.9%提高到75.8%,而7个主销区由10.6%下降到5.5%^⑨。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通过经济手段解决粮食供需区域不平衡问题特别是主销区的粮食问题,需要分年度下达产量等计划目标并将目标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和主要负责人政绩的主要内容,使发展粮食生产由“软约束”变成“硬约束”^[9]。

在此背景下,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必须切实承担起保障本地区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全面加强粮食生产、储备和流通能力建设,并提出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施行《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考核内容设置了增强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等6个方面63项指标;指标的分值针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差异分别确定,主产区在粮食生产、落实收购两方面共23项指标的分值高于非主产区,非主产区在落实地方粮食储备及管理、完善粮食调控及监管体系两方面共13项指标的分值高于主产区;明确规定了奖惩措施及将考核结果作为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多年的应用实践证明,通过考核,地方政府粮食安全意识普遍增强,对粮食工作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但也存在基层政府重视不够、考核结果没有很好发挥作用、考核指标设置不科学等不足^[12]。

修订后的《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和《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尽管还存在不足,但都是经过多年探索的结果,也都经过多年应用实践,在考核内容、实施步骤、结果运用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尤其是都制定了严格的奖惩措施,为耕地保护考核和粮食安全考核“合二为一”提供了较好的制度基础。

二、耕地保护考核和粮食安全考核“合二为一”的实践基础

梳理近期典型省份在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方面的探索情况,并都以2020年为基期,用耕地面积变化反映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考核取得的初步成效,用粮食播种面积变化反映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取得的初步成

效,可以回答近期地方探索是否形成较好的实践基础这一问题(见表2)。

表2 典型省份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

典型省份	耕地面积(万亩)				粮食播种面积(万亩)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四川省	7773	7793	7815	7865				
安徽省	8280	8312	8327	8342				
黑龙江等5个主产省份					67473	67858	68269	68510
山西等4个产销平衡区省份					17285	17410	17484	17503
广东等3个主销区省份					6048	6082	6132	6143

数据来源:耕地面积数据来自各省份自然资源部门,粮食播种面积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一) 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考核的地方探索

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虽然是在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的,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4月30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强调,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并对在耕地保护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失职渎职的严肃追究责任。此后就有省份特别是主产区的省份开始探索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并制定了考评细则,开展了考核。

“二调”以来的10年间四川耕地面积减少最多,共减少了2239万亩,耕地面积占全国比重的位次也从第6位下滑到第10位,耕地保护利用形势十分严峻。四川于2021年12月出台全国首个耕地保护党政同责省级考评细则并进行了“首考”。考核内容贯穿耕地保护全链条,包括耕地保护目标完成、耕地面积变化、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供后监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推进等情况。从2023年5月通报的“二考”结果看,各地在耕地总量指标上都未扣分,但是在违法用地、督察整改等方面与目标还存在一定差距^⑩。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由中央和地方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作为刚性指标实行严格考核、一票否决、终身追责。按照一号文件要求,越来越多的省份探索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安徽于2022年3月印发《安徽省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若干措施》,明确对年度未完成耕地保护责任目标的市县实行“一票否决”,对任期内未完成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目标任务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实行“终身追责”,这是省级层面首次提出耕地保护实行“一票否决”“终身追责”^⑪。江苏在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考评中实行耕地保护“一票否决”制,即年度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耕地占补平衡的任何一项不达标,党政主要负责人都

不能参与评优^⑫。地方在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加大追责问责力度的同时,正向激励也在加强。如,湖南已连续3年对获得耕地保护激励的市、县分别给予300万元、100万元奖励。广东规定省财政每年安排5000万元、省自然资源厅每年安排3000亩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用于省级考核奖励。

从初步成效看,2021—2023年全国耕地总量连续3年实现净增加,耕地总量持续快速减少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⑬,四川、安徽全省耕地面积也都连续3年实现净增加。但是违法违规用地问题仍较突出,2023年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案件20.9万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公开通报123个违法违规重大典型问题,集中约谈28个问题突出地市主要负责人^⑭。

此外,由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田长,实行网格化、全覆盖的耕地保护监管机制“田长制”已在全国26个省份开展^⑮。浙江、广东、江苏、四川等地已开展省、市、县多级实践,通过数字赋能耕地保护全周期管理,实现对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这些举措都为落实好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考核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的地方探索

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首次提出是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早于耕地保护党政同责的提出,地方的探索也更早一些。与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最大的不同是,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明确产销平衡区、主销区也要保面积、保产量,并要求分区域细化考核指标。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主产区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这主要是基于粮食净调出省份快速减少的考虑。2003年主产区中粮食净调出率在5%以上的省份有10个,2014年减少到7个^[13],目前只

有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吉林、安徽 5 个省份。下面以这 5 个省份为例分析主产区的探索。黑龙江把粮食生产任务纳入全省主要经济考核指标并按季度对各地进行考核。河南制定了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方案和具体考核办法,把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作为硬性指标纳入考核。内蒙古将粮食产量列入年度主要预期目标并开展考核。吉林将粮食播种面积指导性计划完成情况纳入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将黑土地保护纳入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安徽在全国率先制定《省委常委委员会委员粮食安全工作责任清单》《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粮食安全工作责任清单》,推动市、县党委和政府全部出台“两个清单”。2021—2023 年,5 个省份粮食播种面积都连续 3 年净增加,较 2020 年累计增长了 1.5%;除河南 2021 年受洪涝灾害影响和 2023 年受严重“烂场雨”天气影响、黑龙江 2022 年受低产大豆对高产玉米的替代影响,粮食产量较上年略有减少外,其余省份粮食产量都连续 3 年净增加,5 个省份粮食产量较 2020 年累计增长了 3.3%^⑯。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产销平衡区确保粮食基本自给,这主要是基于产销平衡区由粮食基本自给转变为需求缺口不断扩大、有向主销区滑落的趋势的考虑。2000 年产销平衡区粮食平均自给率为 90.4%,2020 年下降到 65.1%,除甘肃外其余省份粮食自给率都在下降^[14]。下面以粮食需求缺口相对较大的山西、陕西、贵州、甘肃 4 个省份为例分析产销平衡区的探索^[15]。山西把粮食播种面积纳入 11 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粮食安全考核内容。陕西将粮食播种面积作为市(县、区)党委政府的考核内容,将粮食产量作为职能部门的考核内容。贵州将粮食生产纳入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和高质量发展考核。甘肃把粮食生产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考核。2021—2023 年,4 个省份的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总体都稳中略增,较 2020 年分别累计增长了 1.3%和 4.8%^⑰。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主销区切实稳定和提高粮食自给率,这主要是基于主销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而粮食自给率却在快速下滑,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的考虑。2000—2020 年,主销区粮食平均自给率由 51.2%下降到 16.8%,一些省份的降幅甚至超过 50%^[15]。下面以广东、浙江、福建 3 个省份为例分析主销区的探索。广东把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首次写入广东地方性法规《广东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浙江将考核结果作为对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绩效评定、

干部任用的重要内容。福建将粮食安全任务完成情况列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内容。2021—2023 年,3 个省份的粮食播种面积总体稳中略增,较 2020 年累计增长了 1.6%;粮食产量连续 3 年净增加,较 2020 年累计增长了 2.5%^⑱。

从初步成效看,2021—2023 年,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都连续 3 年增加,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主产区分别较 2020 年累计增长了 1.3%和 3.0%,产销平衡区分别较 2020 年累计增长了 3.8%和 7.9%,主销区分别较 2020 年累计增长了 3.3%和 4.1%^⑲,产销平衡区、主销区增幅高于主产区,有效缓解了主产区增产压力。典型省份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总体也都稳中有增。但是,生产只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仍较突出,2023 年 12 月,最高检发布 10 起粮食购销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涉案人员级别高,犯罪金额大,社会影响恶劣^⑳。

三、推进路径及需要关注的重点

根据以上分析,将省级耕地保护考核和粮食安全考核“合二为一”,符合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具备较好的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然而,考核只是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见效的手段之一,耕地保护党政同责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都实行不久,“合二为一”考核更是 2023 年才开始实施,考核指标设置等具体事项是否存在不足还有待观察。当前,违法违规用地问题、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仍较突出,更好发挥“合二为一”考核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还需要从根本上理顺关系、构建机制。为此,必须从推动形成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构建以主产区为主、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共同支撑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格局两方面推进。

(一) 推动形成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党政同责将实际掌握重大事项决策权的地方党委纳入保障本行政区域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问责的主体范畴,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党委把握方向、谋划全局的优势,有利于制度要素间的配套联动^[16],也意味着党政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机制在法律框架基础上同时涵盖了行政责任和政治责任,更为突出政治责任^[17]。推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到实处,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需要关注以下五个重点。

第一,从讲政治的高度、谋全局的眼光看待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问题。近年来,国家自然资源督察

机构开展例行督察和全国土地卫片执法发现,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非法批地、违法征地、主导推动违法占地问题较多,一些地方对往年督察发现问题整改推进不力、弄虚作假^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查处和通报的粮食购销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反映出监管缺失缺位、内外勾结、执法不严等问题突出^②。这些都折射出领导干部政治站位不高、政绩观有偏差,地方党委政府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增强做好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强化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政治担当。

第二,厘清党政权责界限。党政结构逻辑关系决定了党委和政府对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的履行应该分工协作,即地方党委和政府协同推进、共同承担责任,同时要明晰党政同责制度下党委和政府的履职重点,避免党政职责边界模糊化,保证党的领导既不缺位也不越位^[18]。党委在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工作中处于政治领导地位,承担领导责任,把方向、管大局,侧重于研究部署重大任务,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政府在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工作中处于行政领导地位,承担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侧重于认真贯彻落实党委的决策部署等具体事项。可以参考安徽的做法,省、市、县党委和政府都制定“两个清单”,明确责任界限,推动责任落实由粗到细,细化为实实在在、量化可控的具体任务。

第三,统筹协调各部门形成合力。耕地保护需要多部门协作配合,法院依法审理涉耕地案件,检察院行使行政检察监督职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活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要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共同推动实现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粮食安全涵盖多个环节,国家层面要求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粮食和储备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牵头负责。考虑到大多数市、县粮食主管部门并入发改、工信、商务等单位,少数粮储公司隶属国资、财政,以及人员配置明显不足等问题突出^③,可以在市、县成立政策性粮食管理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就政策性粮食收购、储存和销售出库等管理工作建立常态化工作协调机制。

第四,强化考核“指挥棒”作用。目前,中央对省级已制定了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合二为一”考核办法,但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即使同一省

份内不同区域也存在较大差异,各省要以此为指导,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对省以下基层党委政府“合二为一”的考核办法并及时总结实践中存在的不足,进一步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提升考核的精准性、科学性^[19]。各地对考核结果的运用要坚持激励约束并重,突出正向激励主基调,建立赏罚分明的奖惩制度,对考核优秀的除通报表扬外,还要给予项目资金奖励;对突破年度耕地保有量、粮食生产、种植结构调整等重点事项的实行“一票否决”,实现以“考”促“干”、以“考”促“改”。

第五,发挥督察“利剑”作用。土地例行督察对地方政府形成了较强的政治压力和行为管制,促使地方政府按照中央政府目标行事,有利于强化地方政府的耕地保护意识^[20]。应继续加大土地例行督察的实施力度,通过督察不断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耕地保护行为的约束。尤其是粮食购销领域相对封闭,粮食购销部门对粮食的定价采购、销售方式具有垄断性,“靠粮吃粮”问题易发多发。自然资源、粮食和储备等部门要持续开展常态化监督,加强与公安、司法机关的协同联动,并通过公布典型案例以起到警示教育作用,持续释放深入整治违法违规用地问题、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的强烈信号。

(二) 构建以主产区为主、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共同支撑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格局

我国中央对地方的激励主要有财政激励(“利”)和晋升级激励(“义”)两种模式。从激励效果看,财政激励明显好于晋升级激励^[21]。中央调动地方抓粮积极性则采取“利”“义”并重模式。实行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是“义”,确保“义”的效果根本上还要从“利”着手^[22]。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耕地保护利用现状和粮食自给水平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责任共担中的角色定位不同,如何从“利”的视角分区域推进,需要关注以下三个重点。

第一,主产区应优先享有政策扶持和纵向、横向利益补偿。主产区是国内粮食生产的核心区域,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存在明显的正外部效应,需要中央干预进行政策扶持和通过转移支付补偿^[23]。一直以来,中央对主产区的政策扶持和纵向利益补偿居主导地位且力度不断加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财力紧张状况,但是放缓的财政支农支出难以支持主产区持续健康发展^[24]。为此,一方面,中央在保障农民种粮合理收益、全方位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特别是耕地保护和质

量提升方面的政策扶持应继续向主产区倾斜,中央财政对主产区的纵向利益补偿至少要满足保障基层政府维持正常运转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另一方面,统筹考虑主产区和主销区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相关因素,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作为中央财政对主产区纵向利益补偿的重要补充,以进一步缩小产销区经济发展差距。

第二,主销区应对主产区承担横向利益补偿义务。主销区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问题突出,通过将粮食安全问题转嫁给主产区极大地获取了发展非农产业的收益,为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责任共担方面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效应。作为国家农业布局和粮食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主销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理应遵循“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对主产区进行横向利益补偿^[25]。一种实现方式是深化主销区和主产区的多渠道产销协作,由单纯的供需协作深入推进到“产购储加销”一体化供应链合作。多年的实践证明,产销协作能促进主销区涉农企业参与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通过延长主产区粮食产业链提高农民收入。另一种实现方式是主销区直接给予主产区一定的资金补偿。补偿标准是关键,具体实施办法还在研究中,理论上主要依据应是本省份生产粮食数量与粮食实际需求量之间的缺口和单位重量粮食的补贴金额^[26]。

第三,加快产销平衡区经济发展。产销平衡区地处我国水资源最短缺、生态环境最脆弱的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需要践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对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和主销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然而,产销平衡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等方面均明显落后于主销区,购买、调入粮食的能力弱,粮食安全潜在风险更高。为此,一方面,中央对产销平衡区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扶持重点应是提升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特别是推动高效节水灌溉农田建设,使其粮食生产与水资源承载力相匹配。另一方面,中央财政应继续加大向中西部财力薄弱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支持力度等。主销区应积极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上台阶,帮扶重心由帮助脱贫转变为加大产业转移和项目引进力度^[27],以进一步缩小产销平衡区与主销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此外,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加强耕地资源监测监管的基底作用,加快推进智慧粮库建设,为严格耕地保护考核和粮食安全考核“合二为

一”做支撑,也助力减少违法违规用地问题、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

注释

- ①王立彬:《我国耕地保护考核和粮食安全考核将“合二为一”》,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2023-07/11/c_1129744130.htm, 2023年7月11日。②④⑤⑥此处数据由笔者根据自然资源部网站(<https://www.mnr.gov.cn/sj/tjgb/>)历年公布的《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数据整理计算所得。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03.htm, 2004年2月26日。⑦《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自然资源部网站, <https://www.mnr.gov.cn/dt/zb/2018/gdbh/jiabin/>, 2018年1月25日。⑧《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网站, http://sousuo.lswz.gov.cn/html/c100358/2018-06/29/content_238266.shtml, 2015年1月22日。⑨此处数据由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⑩⑪⑫⑬车娜:《为“中国饭碗”挑大梁算大账——综观粮食主产区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中国自然资源报网站, <https://www.iziran.net/news.html?aid=3492871>, 2023年7月3日。⑭王皓然:《全国耕地总量连续三年实现净增加》,《经济参考报》2024年6月26日。⑮《2023年中国自然资源公报》,自然资源部网站, https://gi.mnr.gov.cn/202402/t20240229_2838490.html, 2024年2月29日。⑯⑰⑱此处数据由笔者整理计算所得。初始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关于2020年粮食产量数据的公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0927.html, 2020年12月10日;《国家统计局关于2021年粮食产量数据的公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294.html, 2021年12月6日;《国家统计局关于2022年粮食产量数据的公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673.html, 2022年12月12日;《国家统计局关于2023年粮食产量数据的公告》,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12/t20231211_1945417.html, 2023年12月11日。⑲《最高检发布10起粮食购销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312/t20231209_636320.shtml#1, 2023年12月9日。⑳《自然资源部通报2023年督察执法发现的56个违法违规重大典型问题》,自然资源部网站, https://www.mnr.gov.cn/dt/ywbb/202309/t20230908_2799720.html, 2023年9月8日。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十起粮食购销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https://www.ccdi.gov.cn/toutiao/202301/t20230129_243305.html, 2023年1月29日。㉒浙江省纪委监委课题组:《用强有力监督筑牢粮食安全防线》,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https://www.ccdi.gov.cn/yaowenn/202207/t20220714_204903.html?eqid=94121d4800062b690000000664867848, 2022年7月14日。㉓刘焕鑫:《深化东西部协作促进乡村振兴》,《经济日报》2022年8月22日。

参考文献

- [1]刘慧,赵一夫.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制度完善与分区域保供路径[J].中州学刊,2023(1):52-60.
[2]朱新华,陈浮,郭维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

- 协同的挑战、任务与建议[J].土地科学动态,2023(5):19-22.
- [3]于法稳,代明慧,林珊.基于粮食安全底线思维的耕地保护:现状、困境及对策[J].经济纵横,2022(12):9-16.
- [4]宋侃,陈秋红,孙泉坤.近20年来国内农业经济研究:议题、脉络与走向[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5-96.
- [5]刘丹,巩前文,杨文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耕地保护政策演变及优化路径[J].中国农村经济,2018(12):37-51.
- [6]唐正芒,李志红.简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耕地保护的理论与实践[J].中共党史研究,2011(11):26-36.
- [7]宋洪远.“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及其对粮食生产、流通和宏观调控的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1997(2):28-32.
- [8]张红宇,黄其正,颜榕.对“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的评述[J].中国农村经济,1996(5):23-27.
- [9]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研究司课题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运行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1997(B9):18-28.
- [10]杜志雄.70年中国粮食发展的成效与经验[J].人民论坛,2019(32):16-19.
- [11]韩一军.对国家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认识与思考[J].粮食问题研究,2016(1):4-7.
- [12]赖应辉.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的提案[J].中国粮食经济,2019(1):47-49.
- [13]辛翔飞,王济民.须高度重视我国粮食净调出省份过度集中[J].宏观经济管理,2016(10):53-55.
- [14]华树春,钟钰.我国粮食区域供需平衡以及引发的政策启示[J].经济问题,2021(3):100-107.
- [15]普冀喆,周琳,钟钰,等.我国粮食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粮食自给底线设定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22(7):113-123.
- [16]刘明月,普冀喆,钟钰.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党政同责机制构建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5):29-37.
- [17]马丽,尧凡.党政领导干部环境责任追究的机制演变与逻辑阐释:兼论党政对公共行政的调节[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2):66-73.
- [18]马迅,李尧.党政同责的逻辑与进路:以食品安全责任制为例[J].河南社会科学,2020(12):31-36.
- [19]甘林针,普冀喆,钟钰.注意力、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和粮食生产[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3(4):435-445.
- [20]刘佳,朱珊,彭佳.中央土地督察对地方土地出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例行督察的准实验研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4(3):93-115.
- [21]乔宝云,刘乐峥,尹训东,等.地方政府激励制度的比较分析[J].经济研究,2014(10):102-110.
- [22]张哲晰,炎天尧,穆月英.健全粮食安全利益保障体系的机制设计与政策建议[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2-23.
- [23]钟钰,洪菲.构建粮食主产区发展补偿机制的思考[J].中州学刊,2019(6):30-36.
- [24]魏后凯,贾小玲.中国粮食主产区萎缩态势及其福利损失[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5):65-79.
- [25]胡冰川.深化农村改革 加强智库建设:第十一届全国社科农经协作网络大会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16(6):93-96.
- [26]郑兆峰,宋洪远.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实基础、困难挑战与政策优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3(2):214-221.

The Foundation and Promotion Path of Integration of Farmland Protection Assessment and Food Security Assessment

Liu Hui Zhong Yu

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overall goal of ensur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China has begun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farmland protection assessment and food security assess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the revise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Farmland Protection Responsibility Objectives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Provincial Governor Responsibility System for Food Security*” have been applied for many years and have high reference value in terms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measures, result application, etc.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local explorations have achieved initial results, with the cultivated land area and grain sowing area in typical provinces steadily increasing. However, assessment is only a means, and the joint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for farmland protection and food security has not been implemented for long. To better leverage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two assessments and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various policy measures, it is necessary to fundamentally streamline relationships and establish mechanisms. To this en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ly,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work pattern of joint management by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with a focus on viewing farmland protection and food security issues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clarifying the boundaries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ies, coordinating various departments to form a joint force, and fully leveraging the role of assessment as a “baton” and inspection as a “sword”; Secondly, we need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food security pattern that is mainly supported by the main production areas and jointly supported by the main sales areas and the balanced production and sales areas. The key is to give priority to policy support and benefit compensation to the main production areas, and the main sales areas should bear the obligation of horizontal benefit compensation to the main production areas,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alanced production and sales areas.

Key words: Party and Government Co-responsibility; assessment; farmland protection; food security

责任编辑: 澍 文

以新发展理念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目标、问题与路径

姚志 高鸣

摘要: 建设高标准农田可以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随着新发展理念在“三农”领域的应用与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也面临着创新发展乏力、协调发展滞后、绿色发展受阻、开放发展受限与共享发展困难等重大现实问题。为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与建成,亟须以激发创新发展潜力为核心,推进基本农田建成现代化农田;以增强协调发展能力为导向,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并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以提升绿色发展动力为重点,优化农田水利生态系统;以提升开放发展活力为目标,产出优质农产品并打造国际品牌;以凸显共享发展实力为优势,激励多元主体参与农田共建共享并维护农民权益。

关键词: 新发展理念;高标准农田建设;远景目标;关键问题;行动路径

中图分类号: F1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055-09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具体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的内容。以新发展理念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解决耕地撂荒闲置与低效利用问题的现实需求,是破除土地细碎化经营格局的重要举措,是保障农民土地权利的具体体现,是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的内在要求。我国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自2004年中央首次提出以来,就开始逐年推进建设并进行提档升级。20年来我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并不断完善推进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已经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①。20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增长,连续8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仅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活了20%的世界人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①。但是,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粮食产业面临着人多地少水缺、水土资源不

匹配不协调^②、耕地质量水平总体偏低^③、耕地退化形势依然严峻^④、农业劳动力“弱质化”等问题,长期阻碍着农业高质量发展;我国的主要粮食供求格局仍然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面对上述严峻形势,推动全国永久性基本农田建设建成高标准农田十分必要与迫切。

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动因与作用价值两方面的内容。在发展动因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助于解决农村劳动力短缺、素质偏低的问题^[2];通过平整土地可以破解土地细碎化难题^[3],改良土壤并提高土地产出力^[4],有利于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5],加快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进程。在作用价值方面,学者们认为,建设高标准农田,可以抑制耕地撂荒现象^[6]、带动农地流转市场转型^[7]、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8-9],进而巩固人口大国粮食

收稿日期: 2024-05-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与政策优化研究”(22BJY218);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新阶段湖北省中国农村土地延包问题的战略解构及路径研究”(Q20221316);延安大学产学研合作项目“中国农村撂荒地再利用效果评价与提升路径”(YA2024004)。

作者简介: 姚志,男,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北荆州 434023)。高鸣,男,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10)。

安全保障能力^[10];可以提高要素投入质量和降低农业碳排放^[11];还可以通过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带动化肥投入减量^[12-13]、农药使用量降低^[14]、农膜循环利用等,减轻农业面源污染^[15],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不仅如此,高标准农田建设还提高了粮食质量^[16],推动了农业技术进步^[17],带动了农民增收^[18]。总体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关的已有研究日渐丰富、自成体系,但微观实证研究较多,宏观理论性探索偏少,仍存在一定的拓展和优化空间。具体而言,一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关键任务和核心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明晰。二是鲜有文献从建成农业强国的长期性视角给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远景目标。三是现有研究结果几乎都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积极效果”,在实施过程中

产生的一些负面作用和重要问题尚未得到明显关注。本文拟结合新发展理念,探究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农业强国建设中的远景目标,依据阶段性和差异性特征总结出面临的关键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行动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远景目标

量质兼备的耕地资源是保障人口大国粮食安全的基石。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建成,是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农业强国建设目标的重要举措(见图1)。可以预见,我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继续重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并强化运营管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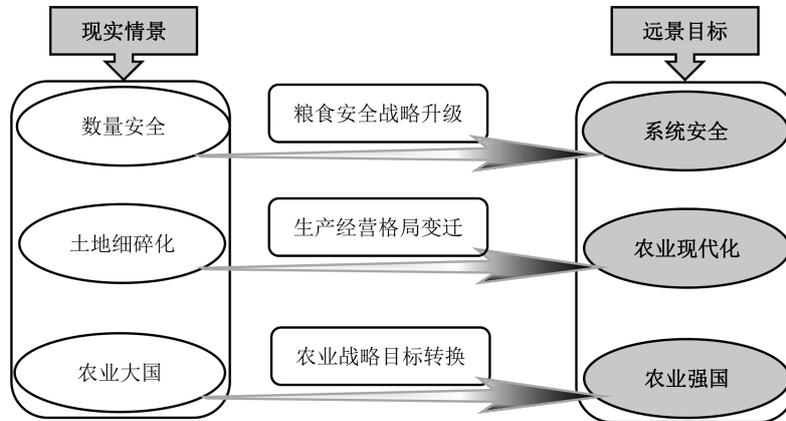


图1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未来远景目标图

(一)在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夯实人口大国粮食安全根基

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建成,可以全面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口大国粮食安全根基。未来一个时期,坚持新发展理念,在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管护过程中实现农业产业创新、协调与绿色发展,可以推进现代农业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从粮食安全视角来讲,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耕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新一轮十亿斤粮食产能提升^[19],从而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促使国家粮食安全目标从“数量安全”向“系统安全”的全面转型。

粮食“系统安全”目标,是指未来中国粮食系统向着更丰富多样、更绿色健康、更营养美味、更生态可持续、更公平、更具韧性的目标转变。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未来需要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重点在强化财政资金投入的同时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主动推进经营主体与社会力量参与。确保高标准农田的工程质量安全,提高抵御

自然灾害与极端气候的能力,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内容^⑤。

(二)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征程中破解土地细碎化经营格局

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建成,可以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征程中破解土地细碎化经营格局。从农业发展形态来讲,推进新型科学技术、精深加工技术、现代营销管理技术应用,可以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战略转型。建成农业强国与实现农业现代化,均需要破解土地细碎化难题,形成规模化的农业经营格局。然而,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从事农业经营的主体中,98%以上是传统小农户,户均承包经营耕地面积仅6.8亩^⑥。长远来讲,细碎化的小农经营格局亟待突破。高标准农田建设需要与现代农业的本质要求相适配,促进农业经营规模化,提高生产效率。

对农田细碎化治理来说,结合土地整治项目,以“小田并大田”为手段^⑦,推进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最终确保经营主体拥有稳定的“一整片田”,可以提

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20]。从农民收入视角来讲,共同富裕目标下亟须快速推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建设高标准农田不仅可以带动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提升土地流转率,增加农民的土地租金收入;还可以推动建立健全承包地有偿退出常态化机制,鼓励部分“离农离土出村”的农民群体退出农业,获取补偿资金。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在面临“未来谁来种地”问题时,建设高标准农田需要充分考虑广大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未来,应以保护农民农地产权与提高种粮收益为核心,以激励多元化主体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养护为手段,实现高标准农田共建共享,推进共同富裕。

(三)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

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建成,可以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这种历史性跨越迫切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科技赋能为内核,全面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未来,应重点从农业科技、数字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方面入手,整合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通过引入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等方式优化数据、信息和资本等农业要素组合,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一方面,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建成,提升耕地质量,可以增强农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亟须将细碎化的耕地进行集中连片,为规模化经营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带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因此,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需要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提升,还需要全面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加速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奋力实现农业强国建设目标。

二、以新发展理念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建成面临的关键问题

虽然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显现出了多维的积极效果,但仍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厘清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与建成后面临的关键问题。依据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建成后面临着创新发展乏力、协调发展滞后、绿色发展受阻、开放发展受限与共享发展困难等关键问题。

(一)创新发展乏力: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的生产经营效率与管护问题

1.高标准农田的生产经营效率不高

第一,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仍然出现了撂荒闲置问题,严重浪费耕地资源。即使已有研究通过对全国10省的调查数据(包括陕西省在内),得出了农户撂荒概率会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加1个单位而下降4.9%的结果^[6]。但在实践中,陕西省宁边县仍然撂荒了6000亩高标准农田,且撂荒现象已经持续7年之久^⑧。该高标准农田项目曾投资了每亩约1.3万元的建设资金,打造了西北地区特色的“改排为蓄、水地共处、和谐共生、优化生态”的盐碱地变高标准良田模式。现如今,却因撂荒问题而无法实现“高产稳产”的基础性目标。这块历经试种、承包、整改的高标准农田,最终被撂荒的原因可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设中不能“按章执行”,二是建成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不能“切实管用”,三是地块流转中没有明确“交易约束与行为规范”,四是经营中的高标准农田系统不能确保现代化的“科学管理”。

第二,高标准农田的产出效率有待提升。虽然建设高标准农田在理论上可以通过规模化经营、机械化、技术进步等路径提高粮食产量,但实践中仍存在诸多困难与挑战。一方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和管护环节均需要先进的技术支撑,包括土地整治技术、水利灌溉技术、农业机械化技术、农业信息化技术等。然而,目前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且少有管护人才,也缺乏创新和突破。另一方面,在高标准农田建成初期,由于种粮农户面临着生产管理技术及设备的更新与转型,大部分传统种植户很难在短时期内“全部掌握”现代化的耕作方法与技术,例如,统一规划、布局、建设、管理的现代方法与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信息数据化等的先进技术。种粮农户已有的种植行为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使得适应高标准农田的现代化经营管理方式推广难度加大,可能会影响粮食作物的产量与质量。

2.高标准农田的后续管护工作滞后

第一,高标准农田建设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的问题。过高的建设费用标准,使得大多数地方政府、项目建设单位、基层村委或承包农户均无财力单独提供后期的管理养护经费。农田基础设施相关设备的维修费用难以保障,养护人员不足,使得农田的长期效益难以发挥。目前存在的如规划设计不合理、工程施工不规范、竣工验收不严格、后期管护

不到位等问题,共同造成了部分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不高、产出效益偏低的结果。未来,亟须推动高标准农田项目从“重建设、轻管护”到“三分建、七分养”转型,确保“建得起、建得好,护得住、养得好”。

第二,后续管护工作责任模糊。“产权关系明晰、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高标准农田管护模式能够实现高效产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但实践中,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田间基础工程设施产权不清晰。农田基础设施的产权权利由村庄集体、土地承包户、实际经营者享有,还是由项目建设公司或地方政府享有,尚不明确。按照现存的“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显然很难真正明确农田基础设施的产权归属主体和管护主体,这是因为村集体、承包户、经营者均可能同时属于受益主体。产权无法明晰,也就无法进行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的维修与养护工作。地方政府承担了部分“高建设”费用,在地方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也不太可能完全承担后期养护费用。因此,管护资金不足,管护技术人才缺乏,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更没有形成常态化的管护与监督机制,最终会影响高标准农田的综合产出能力。

(二) 协调发展滞后: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问题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现代农业协调发展局面尚未形成

第一,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未能较好地融入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中。现阶段,龙头企业、优质合作社等现代农业经营主体还未能很好地发展成为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经营、管护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局面尚未形成。但在高标准农田建成之后,以上经营主体与种粮农户很可能成为未来高标准农田的经营主体。因此,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与高标准农田协调发展难度大。同时,由于缺乏统一的建设、经营与管护模式,高标准农田经营管护问题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加大了其与农村三次产业发展的难度。

第二,高标准农田建设未能完全融合现代农业经营方式。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并未进行农地制度创新,只是在传统农田格局基础上进行小修小补,尚未建成高标准的现代化农田。它们不是重新规划建设机耕路和渠道,而只是简单地进行硬化处理^[21]。数量众多的传统小农难以适应现代农业经营方式,成为制约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业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土地分散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下,农业机械、新型栽培等现代装备和技术采

纳困难,土地托管、统防统治等现代生产方式发展受阻^[22]。

2. 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村特色产业融合协调发展受限

第一,高标准农田建设影响了农村优势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现实中,为了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占用了一些果蔬林特色产业基地,建成之后又必须种植粮食作物。可见,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将高标准农田项目实施与特色瓜果林药产业发展进行有机融合,实现协调发展,仍需要精心布局与科学规划。

第二,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旅产业融合发展滞后。高标准农田项目实施必须依据地方特色,在保持原有农田、梯田等自然风光的基础之上,积极完善田块、道路、水系等农田设施。如何在确保农田集中连片的同时避免“千篇一律”,并完美融入当地农旅产业发展蓝图,已成为各地在建设高标准农田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未来,需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形成“以田塑旅、以农带旅、以旅促农”的新格局,推动农旅产业融合发展。

第三,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农旅融合产品创新不够。现阶段,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生态产品创新有限,农旅服务有效供给数量不足、质量堪忧,融合产品与服务的增值潜力挖掘不够,市场价值难以充分体现。

(三) 绿色发展受阻: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中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

1. 耕地质量提升存在较大困难

第一,耕作表层熟土流失,土地整理后的地块质量偏低。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采用现代机械开垦整治,必然会打乱原有表层土壤结构。现实中,一些施工建设单位为了节约成本,缩短工期,往往会忽视“土壤改良、植被恢复、生物多样性重建”等项目,导致建成高标准农田质量偏低。

第二,建成后的掠夺性生产经营行为难以控制。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的经营管理,需要谨防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者过度滥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迫使农田地力下降、土壤修复难度增大。化学品在杀灭害虫的同时,也带来了土壤污染、水源污染等问题。长此以往,将会导致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被破坏,土壤板结,肥力下降。土壤退化不仅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还可能导致农田水利生态环境恶化。同时,水源中的有害物质逐年积累,不仅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和营养,更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的威胁。

2. 高标准农田建设可能加重农业面源污染

第一,水资源污染状况可能会加重。水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合理利用和保护水资源对于维持农田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在建设高标准农田过程中,可能产生建筑垃圾残留,进而加重农田水污染。同样,“掠夺式”经营方式可能会使农田水资源浪费与水污染问题更加严重。农田水污染不仅危害人类的饮用水安全,还对农业灌溉甚至水利生态系统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农田生物多样性可能会下降。高标准农田建设破坏了原有沟渠、田埂、田坎等地表结构,使得一些沟渠生物、植物无法生存,很可能会因此影响到农田沟渠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甚至打破农田的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的下降不仅会影响农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还可能降低农田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使得农田生态系统变得更加脆弱。

第三,农田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缺乏。在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管理与养护往往缺乏对农田生态环境的监测评估与修护。虽然农业农村部出台的《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明确要求,重点推进农田建设与生态环境监测评估,但当前各地未能完全落实。例如,农业大省吉林省虽然探索出了智慧“田管家”等监管监测模式,但面临运营成本高、资金压力大、技术人员不足等问题,绝大部分现代农田仍以传统人工管理为主^[23]。

(四) 开放发展受限: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提增问题

1. 高标准农田的产品质量不高,国际市场竞争力不足

第一,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仍然不容忽视。高标准农田建成后促进农产品质量提升十分关键。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2014年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约20%的耕地受到金属污染^⑨。据陈锡文等的估算,全国范围内每年被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间接经济损失超过了200亿元^[23]。近十几年来,中国先后发生了“皮革奶”、三聚氰胺奶粉、“瘦肉精”“大肠杆菌超标”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社会公众对农产品安全的信心。食品安全事件也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品牌形象和国际市场贸易。

第二,高标准农田建成后仍然难以同时推动农产品质量提升与成本降低。为了防治害虫、提高产量,一些高标准农田经营者在生产时可能会超量施用农药、化肥;在农产品加工中使用不达标的食品添

加剂、保鲜剂、催熟药等,降低农产品品质,破坏产品营养结构。这些行为将严重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影响消费者身体健康,同时对农田水利生态环境造成危害。低质农产品必然缺乏国际竞争力,难以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开放发展受限。在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过程中,高标准农田必须产出“低成本、高质量”的农产品,才有机会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开拓国际农产品市场。

2. 农产品质量检测与追溯体系缺乏,影响国际消费者信心

第一,高标准农田产品质量的一致性难以保证。当前,我国缺乏一个完整的农产品质量监测与追溯体系,难以系统化把控规模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无法与国际接轨,限制了国际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大多数现代化农田地块应该会集中于涉农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规模经营主体手中。未来,经营主体不仅要高效产出足够数量的农产品,还要保证农产品质量和安全,以提高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第二,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提升困难。提高高标准农田的投资回报率,不仅需要农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控制,提升产品竞争力,还需要以高品质产品推动品牌建设,加强国内外市场营销,保障经济效益。高质量产品与良好的经济效益,可以确保农田的可持续利用。然而,高标准农田经营主体在产前面临农业资料、劳动力、技术等要素价格过高等问题,在产中面临服务费用高、现代科技采用少、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等问题,在产后面临大宗产品质量上不去、农产品价格低、深加工能力不足、附加值无法提升等问题。总之,高标准农田经营主体赢利困难,难以突破国际贸易市场约束,开放发展受阻。

(五) 共享发展困难:农民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与权益保障问题

1. 农民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管理的积极性不够

第一,高标准农田建设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建设主体多,市场化主体少。高标准农田项目主要以县级、乡镇政府为主导开展组织实施,承建方主要是企业。但农田的生产经营者长期属于农业经营主体或小农户,主体不同、环节不同,所追求的目标也存在较大差异。当行为实施主体和行为受众不对等时,实施主体可能会“偷工减料”,进而导致出现

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问题。

第二,当前中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多为留在农村的老龄耕作者,他们难以参与“高技术标准”的农田建设。尽管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过程中可以提供少数短期岗位,但仅能确保少数农民参与,大多数农民参与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都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目前,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的监督体系,普遍存在内部监督不到位、外部监督不及时、监督结果不公开等问题,农民的监督作用也无法充分体现。

2. 建设中存在产权风险导致建成后农民利益极易受损

第一,农田建设中容易产生产权纠纷。首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必然涉及细碎化耕地的集中整合或调整,这意味着要打破原来的地界,在南方省份甚至可能需要进行“互换、合并、重组与再分配”。如果当地农民担心失去原有土地的耕作面积与熟土,可能会因顾虑自身产权利益受损而不参与、低参与,甚至抵制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其次,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补偿金额与分配机制不公的问题。在耕地集中、农田改造的过程中,如果补偿标准不透明,分配不公或者补偿发放不及时、不公开,均可能导致农民出现“遭受直接经济损失”的心理。长此以往,农民可能会对政府和相关机构失去信任,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最后,农地确权后的人均土地面积和农户差异会降低农民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积极性。1984年以来的农村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导致一些地区农户之间拥有的土地面积存在较大差异,人地矛盾比较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⑩。如果在下一轮承包期内,农村新生人口仍然无法获得耕地承包权及相关产权利益,就可能因没有土地产权而遭受经济损失。

第二,农田建成后农民利益极易受损。首先,当农民选择继续经营自家的高标准农田时,建设初期需要对土地整治、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等方面增加投入。这些投入可能会让普通农民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从而进行“非粮化”生产或产生撂荒行为。其次,当承包农户扩大经营规模、耕作邻居家的高标准农田时,往往会采取差异化的农田管护措施和耕作方式,这可能会降低高标准农田的产出效能。当流转期限届满时,租出户可能需要花费更大的代价去维修高标准农田的基础设施与恢复地力,长期利益容易受损。最后,当农户选择将高标准农田流转给村集体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时,在极端气

候频发的现实背景下,产出下降、利润降低,将可能导致经营主体毁约、弃租、降租、逃租等行为发生。

三、以新发展理念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建成的行动路径

习近平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全力提升耕地质量。”结合前述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需要以新发展理念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最终推动永久性基本农田形成现代化生产经营格局,全面提升农田的综合生产能力。

(一) 以激发创新发展潜力为核心,推进基本农田建成现代化农田

第一,强化现代农田科技支撑与服务。一方面,推广和创新土壤改良技术。通过推广耕地轮作模式、科学配方施肥、使用土壤调理剂等,提升种植结构灵活性,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提高农田土壤肥力。选择种植适宜性、抗逆性强的品种,减少病虫害发生的同时增强农作物的气候适应性。另一方面,强化智能化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与推广。改善农田水利设施,实现“旱能浇、涝能排”,大幅降低极端天气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应用智能化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使用无人机、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技术和手段,快速推进农业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精准化。实时监测气象变化、土壤营养状况,及时调整种植管理策略,实现科学防灾减灾,将“看天吃饭”转变为“知天而作”。

第二,坚持吸引外来人才与培育本地人才并重,形成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的人才队伍。既要强化先进技术的创新与研发、推广与应用,更要“寻觅和培育”与高标准农田相适配的现代化专业种植能手和管护专家,从根源上保障与提高现代农田的生产力。一方面,可以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依托高标准农田项目创业,逐步吸引外来优质劳动力。另一方面,加大本地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力度。整合跨区域的职业教育资源,构建一个全面覆盖基础技能普及、专业技能培训以及创新创业指导的立体化职业农民教育体系,为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经营、管护提供优质劳动力。

(二) 以增强协调发展能力为导向,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并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第一,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培育相融合。可以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加大资金用途倾斜力度,重点用于鼓励多元化主体参与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与管护。鼓励农业企业尝试通过品牌、技术、服务加盟参与建设;鼓励农户通过土地股权化、劳动股权化参与建设项目;吸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机械设备、社会化服务加盟参与建设。创新多元主体协同管护模式,强化主体责任,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

第二,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业集约化发展相融合。可以采取经营权互换、入股等方式,将碎片化的“井”字形小块田变为“一户一块”“全村一大块”的机耕田。推进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集中连片,带动有序流转,以土地规模经营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创新融合模式,协同带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在优先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打造融合产品,丰富农旅业态,形成产业融合发展格局。结合各地自身资源禀赋和农业产业发展定位,围绕油、蔬、果、花、药、水产等特色产业需求建设高标准农田,打造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以农塑旅、以文带旅、以旅彰文,实现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促进完善相关产业链条。统筹推进农田、村庄与景区建设,实现田园生态改善和乡村旅游发展有机融合,变田园为公园^[24]。以多类型的创新模式促进农村三大产业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三) 以提升绿色发展动力为重点,推进农田水利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第一,推动农田土壤改良,提高土壤肥力。在农田土壤改良方面,施用有机肥料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使用土壤调理剂以改善土壤酸碱度,促进土壤微生物活动;推广深耕、深松等措施以解决土壤板结问题,提高土壤的通气性和保水能力。在农用地整治方面,继续推进农田生态系统建设,开展生态廊道建设,提高田间生物多样性^[25]。加强高碳蓄积度的土地保护,优化调整多种用地的生态布局,提升固碳增汇能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在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方面,对损毁土地进行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生态系统重建和配套设施建设。尽快改善土地利用条件,重构土壤生产力,保持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群落稳定。

第二,打造农旅休闲农业、循环农业,推广生态农业。在使用已经建成高标准农田的过程中,要推广生态农业,减少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使用,减少对农田水利生态环境的污染。首先,贯彻绿色发展理

念,优化高标准农田生态系统。其次,加强水资源保护,合理利用水资源,防止过度开发和浪费,对已经污染的水体进行全局化治理。再次,推广绿色农业技术,维护农田生物多样性。最后,强化政策引导,提高农民环保意识,鼓励农民采取环保型农业生产方式,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田生态环境保护。

(四) 以提升开放发展活力为导向,产出优质农产品与打造国际品牌

第一,高标准农田建成后推进品种培优。首先,加大良种研发力度。加大高校、农业科研院所、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培育建设良种重点实验室;围绕国内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国际市场需求,推动选育研发一批具有突破性、革命性的粮食品种。其次,积极应用与采纳优良品种。充分发挥村庄大户的示范作用,创新宣传方式,强化品质性状优良作物品种的示范推广。最后,加速推进常规农作物品种更新换代。以高品质产品需求为导向,加快恢复培育、创新发展传统地方民族特色品种。建立与高标准农田相配套的种植业“三品一标”基地,实现品种创新。

第二,推进高标准农田产品的品质提升与飞跃,提升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强化农田肥水管理。可以应用数字技术改进并深入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创新与简化关键技术应用软件,确保高标准农田的经营者“易接受、会使用”。另一方面,以绿色防控技术应用与推广改变经营者生产行为。大力推广生物防治、生态控制、物理防治、高效低风险农药等绿色防治技术和产品。推行专业化统防统治管理技术,推进化学农药减量,在实现农业面源污染快速降低的同时,提升产品品质。

第三,健全农产品检测追溯评估体系,创建世界知名品牌。推进高标准农田实行标准化生产,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平台,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产出农产品检测追溯评估体系。按照“绿色健康、高质高效”的基本要求,打造具有世界知名度、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品质特色品牌,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

(五) 以凸显共享发展实力为优势,激励多元主体参与农田共建共享并维护农民权益

第一,创新农田共建共享模式,推动市场化转型。按照“整县设计、市场运作、以田养田”的思路建设高标准农田,探索市场运作模式。强化组织领导,推进整县统一规划设计,统筹衔接农田水利资源利用、农业产业发展等。突出农业企业主体,激发市场运作活力,挖掘县域内耕地潜力。鼓励社会工商

资本、农业经营主体等投入资金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管用一体,推动以田养田,探索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的经营收益与管护绩效并重的使用和管理机制。积极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农田管护,不断提高市场化运作的投资比例。

第二,激励多元化主体参与。以共享理念指导高标准农田建设,坚持“村民自建、控制成本、促农增收”的指导思想,推行农民主体建设模式。以“以工代赈”方式,实现平台公司带动、村民自行建设的目标,让农民在农田建设发展中受益。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控制工程成本,提高农民与经营主体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与经营的积极性。坚持共建共享,实现促农增收,通过分包劳务,使农民能够在熟悉的农业领域稳定就业。

第三,探索建立多元利益联结机制,维护农民的产权收益。一方面,鼓励农民以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形式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其后续运营,共享农业产业化成果。另一方面,创新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的农田产权分配与利益共享机制,保障农民的产权权利,逐年提高农民种粮收益。此外,还可以推行“田长制”,明确田长职责,确保每一块高标准农田都配有专人管护。制定管护考核标准,培训管护人员技能,提高农田管护水平。

结 语

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建成,可以进一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本文从新发展理念出发,探究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远景目标;从创新发展潜力、协调发展能力、绿色发展动力、开放发展活力、共享发展实力等五方面深入讨论了高标准农田建设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并指出了未来的行动路径。

本文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粮食生产、农民收入、绿色发展等诸多方面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完全是“积极效果”。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深入推进,也可能衍生出一系列重要的现实问题,亟待社会各界关注与解决。第二,虽然各地建设高标准农田的目标一致,即推进全国永久性基本农田建成“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现代化生产经营格局,但在实际建设中,区域特征十分明显,这是历史性与现实性、阶段性与差异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统一的结果。第三,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高成本”已是不争的事实,未来能否实现“高收益”和农田基建能否从容应

对频发多变的极端气候,仍需要时间与实践的检验。

全面建成高标准农田之后,未来仍需要继续探究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第一,谁来经营管护高标准农田?管护效果如何衡量与评价?本文虽然指出了通过鼓励涉农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多元主体参与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管护,但多元主体协同管护下“耕地地力提增、应对极端气候”的实现机制如何构建,实践效果如何,仍需在实践和理论上进一步深入探索。第二,高标准农田建设收益谁来获取?又如何农田基础设施承建主体单一与农田产权分置多元的现实背景下,实现多维主体收益合理分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已有的“谁建设、谁使用、谁管护”的原则并不能完全适应千差万别的地方区域实际。因此,在继续细化农田产权权利内容的思想下,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共存、共养的实现机制亟待进一步明晰。第三,未来如何规范管理农田经营主体的生产行为?理论中期望的“产权关系明晰、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高标准农田经营模式,需要在产权分置背景下成功规范与限制农田经营主体的掠夺性生产经营行为。因此,未来如何实现高标准农田的高效产出和长效利用,仍需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进一步深入探究。

注释

- ①刘超:《农业农村部:到2023年底 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超10亿亩》,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cj/shipin/cns-d/2024/07-24/news995516.shtml,2024年7月24日。②康绍忠:《中国农业节水十年:成就、挑战及对策》,《中国水利》2024年第10期。③韩杨:《中国耕地保护利用政策演进、愿景目标与实现路径》,《管理世界》2022年第11期。④《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新华网,http://m.news.cn/2021-08/26/c_1127797077.htm,2021年8月26日。⑤孙智蒲、陈晨:《高标准农田建设如何提质升级》,《光明日报》2023年4月20日。⑥《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stats.gov.cn/sj/pcsj/nypc/202302/U020230223531273769774.pdf,2023年2月23日。⑦《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13/content_5741370.htm,2023年2月13日。⑧游天燧、杨乔:《陕西定边6000余亩高标准农田缘何撂荒7年?》,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3/0605/c428181-40006392.html,2023年6月5日。⑨陈凤霞、吕杰、史元等:《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生态环境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生态经济》2015年第2期。⑩《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459130.htm,2019年11月26日。

参考文献

- [1]高鸣,姚志.保障种粮农民收益:理论逻辑、关键问题与机制设计[J].管理世界,2022(11):86-102.

- [2]高鸣,江帆.回答“谁来种地”之问:系统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J].中州学刊,2023(12):45-53.
- [3]韩杨,陈雨生,陈志敏.中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展与政策完善建议:对照中国农业现代化目标与对比美国、德国、日本经验教训[J].农村经济,2022(5):20-29.
- [4]梁鑫源,金晓斌,韩博,等.藏粮于地背景下国家耕地战略储备制度演进[J].资源科学. 2022(1):181-196.
- [5]许先春.习近平关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思考[J].中共党史研究,2023(4):5-17.
- [6]张禹书,张应良,龚燕玲.高标准农田建设抑制了耕地撂荒吗?——基于全国10省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3(12):59-67.
- [7]王术坤,林文声.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农地流转市场转型效应[J].中国农村经济,2023(12):23-43.
- [8]孙学涛.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3):150-160.
- [9]刘春芳,刘立程,何瑞东.黄土丘陵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生态系统服务响应研究:以榆中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12):124-130.
- [10]钱龙,杨光,钟钰.有土斯有粮: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了粮食单产吗?[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32-143.
- [11]陈宇斌,王森.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农业碳减排效果评估:基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的事件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3(6):67-80.
- [12]梁志会,张露,张俊飏.土地整治与化肥减量:来自中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1(4):123-144.
- [13]孙学涛,张丽娟,王振华.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基于农业要素弹性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23(4):89-108.
- [14]张梦玲,翁贞林,高雪萍.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药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西省605户稻农的调查数据[J].中国土地科学,2023(9):106-116.
- [15]XU R,ZHAN Y T,ZHANG J L, et al. Does construc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improve recycle behavior of agricultural film? Evidence from Sichuan, China[J]. Agriculture,2022(10):1632.
- [16]GONG Y L,ZHANG Y L,CHEN Y. The Impact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olicy on grain qu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cultivated land quality[J]. Agriculture, 2023(9):1702.
- [17]孙学涛,张丽娟.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48-159.
- [18]马雪莹,邵景安,曹飞.重庆山区县域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综合成效评估:以重庆市垫江县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18(12):2183-2199.
- [19]高鸣,魏佳朔.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的源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贡献[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5-27.
- [20]姚志,高鸣.中国农村承包地确权:政策演进、关键问题与产权优化[J].中国软科学,2022(06):72-84.
- [21]王海娟.面向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农地制度创新:小农户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89-98.
- [22]梁琳,金光敏.农业强国背景下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升级的路径研究:以吉林省为例[J].税务与经济,2024(4):106-112.
- [23]陈锡文,罗丹,张征.中国农村改革4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47-460.
- [24]高鸣,郑兆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阶:基于浙江“千万工程”的经验与启示[J].中州学刊,2024(2):14-22.
- [25]李寒冰,金晓斌,韩博,等.“双碳”目标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学理研究与实践路径[J].地理研究,2022(12):3164-3182.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Future Goals, Key Issues and Path

Yao Zhi Gao Ming

Abstract: Building high-standard farmland can promote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With the applicat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the key issues facing are given; such as the lack of innovative, the fetters of coordination, the difficulties of green, ope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To this end,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comple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farmland into modern farml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farmland infrastruc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 industries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apacity, and optimizing the farmland and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ecosystem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green development impetus. To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open development as the guide to produce high-quality health products to build international brands, to highlight the sharing of development strength as the fundamental incentive for multiple subjects to participate in safeguarding far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high 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future goals; key issues; path

责任编辑: 澍 文

数字社会平台化的样态特征、内在张力与调试路径

陈新宇 阮嘉禾

摘要: 数字社会平台化的典型样态是平台型企业、平台型政府及二者的冲突-合作互动。平台化突出反映了数字社会的再中心化机制,呈现为私权力中心化和公权力集中化的双重趋势。数字社会平台化内含公共自主和私人自主、封闭性权力与开放性平台以及技术逻辑和合法性逻辑的张力。数字社会平台化的调试路径在于平台公共性的实现、平台技术治理逻辑的矫正,并通过法律的媒介作用对技术进行转译,以作为法律核心概念的权利、作为法律内生意义的稳定、作为法律认知机能的开放和作为法律合法性构造的程序为支点,从技术生成的权力手中还法于民。该调试路径的原则在于社会治理主导,助力市场治理,补缺政府治理。

关键词: 平台型企业;平台型政府;平台化社会;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 D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064-12

我国“十四五”规划将数字化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新引擎,并在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以及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四个方面为未来的数字化发展指明了发展思路^①。其中,“数字”与“平台”密不可分。平台被视为数字化的基本架构,平台发展情况成为数字经济和数字政府的核心能力体现,也是数字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表征。

平台化意味着借助新技术发展带来的组织变革和治理水平突破。“基于过往的平台研究,Anne Helmond 首次提出‘平台化’的概念,将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基础设施、经济模型,以及社会结果等进行概括与概念化。Nieborg 和 Poell 则将‘平台化’过程定义为‘将数字平台的经济、治理和基础设施的框架渗透到网络和应用生态系统中’,强调了平台化逻辑对其他数字生态的影响。”^[1]以数字平台组织形式进行新型治理的策略,主要源于一种“通过组织增强灵活性”的治理发展方向^[2]。不论是对企业还是对政府而言,在一个市场急剧变化、竞争压

力不断增长的时期,通过平台实现去中心化、增强灵活性并保持一体性,都是一种寻求转型发展的新路径。

新兴平台主要涉及三大问题,即如何监管平台型企业,如何规划平台型政府,如何治理平台化社会,其中涉及市场与政府关系,横向的立法、行政、司法权力配置,纵向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等深层逻辑,影响着法治国的实现。在数字社会平台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平台化能否真正改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结构性偏差,突破市场经济发展的滞碍,解决政府运行中的传统问题,以及这种组织与技术耦合的新形式本身会带来哪些新问题,如何破解其潜在的风险。近年来有关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数字治理、平台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但是所涉内容较少从法的社会理论角度看待平台化社会背后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平台化社会的典型样态、权力结构共性、内在张力及其调试路径等方面对数字社会平台化进程进行理论性反思。

收稿日期:2024-06-07

作者简介:陈新宇,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4)。阮嘉禾,女,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清华大学法学院近代法研究中心兼任研究人员(北京 100084)。

一、数字社会平台化的典型样态： 平台型企业与平台型政府

在数字社会,新兴技术的发展为组织变革创新带来新的机遇。平台本身就体现出一种价值的灵活性,具有对内部变化和外部环境波动作出灵敏反应,甚至迅速进行重新整合的总体能力。“平台型组织的本质在于提供必要的数字基础设施来连接不同类别的群体,并使其资源、运作惯例、结构的灵活调整和自由组合成为可能。”^[3]集用户基础、数据要素、算法技术的数字平台被用于企业经营、政府管理、社会治理等多种场景,在整个社会中发挥建构作用。

(一) 平台型企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4]平台型企业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主体。平台型企业的基本模型是双边或多边市场^[5],不同于线下企业的单边市场模式,平台模式提供了将不同类型用户进行连接的基础性产品,使参与主体借以提供互补产品、服务和技术。而基于数字化、连接性的先天优势和累积的经济实力,大型平台企业往往不限于对单个平台的运营,而是着力于复合型平台生态系统的打造。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即为典型代表:百度不再仅作为搜索引擎平台,而是布局了电子商务、数字支付、网络游戏、即时通信、输入法等多个领域;阿里巴巴也从一个电子商务平台发展成为覆盖社会全领域的超级网络平台;腾讯凭借QQ和微信两个社交平台的庞大用户规模和客户端的资源优势,辐射至网络媒体、互动娱乐、电子商务、无线和固网增值服务市场,形成庞大的平台生态圈。

平台型企业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字原住民”。平台模式在互联网企业的商业运营中最早出现并最为常见,为组织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市场力量。这种商业模式的出现和蓬勃发展实现了低交易成本的规模经济,达到潜在利润的指数型增长。需要强调的是,平台模式之所以能够带来这些显著效果,正是因为其以有限的成本聚集了无限的私人知识而带来增量收益。换言之,平台型企业能够创造价值的根本原因,在于去中心化的市场过程。

(二) 平台型政府

平台模式从商业领域扩展至政务领域,成为全球数字治理 2.0 时代的发展方向。“政府即平台”

(Government as a Platform,简称 GaaP)的平台型政府理念,在比较法上成为现代数字政府改革转型的重要支撑^[6],我国亦将平台型政府的推进视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动力。

具言之,当代政府对于数字时代的因应,是将自身从现实复制到互联网世界中并加以整合扩展,打造数字政府治理新形态,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是以数字平台聚合政府职能服务,即构建平台型政府。平台型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体现为对公共数据的归集能力、对数字资源的统筹管理能力,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支撑和安全保障能力^②。根据功能不同,其具体形态可分为两种:一是政府内部的数字平台即办公自动化系统,旨在以平台打破部门数据孤岛、整合运用各部门的信息资源,建立内部一体化的数字治理系统;二是政府对外的数字平台,即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小程序、应用软件等,旨在以平台扩大社会各主体参与数字治理,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质量及政社互动水平。鉴于后者更能体现政府与社会的交互,故而这类政务服务平台也是当下平台型政府建设的注意力所在。

从全球范围来看,无论是英美在过去 10 多年来的先行建设,还是我国在近年来的强力推进,平台型政府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值得警惕的是,政府的平台化思维有时易产生偏差,反而会加剧政府内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转型的障碍。

(三) 平台型企业和平台型政府的互动

平台型企业和平台型政府体现了“参与式互联网”的时代特征^[7],二者的合作共治是平台化社会转向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思维上,政务服务充分借鉴互联网的思维,将自身从一个“售货机界面”变为一个开放性平台,鼓励内外部力量参与其中,由多元主体进行合作并实现创新。该等平台的一体化治理系由政府主导,其他参与主体协助。在具体操作上,政府部门仍然掌控决策权力,企业和各社会组织则通过在决策前提供治理方案、在决策后承担任务执行的方式,承担需要数字技术支撑的政府行政事务,最终形成流水线式的治理任务工作机制^[8]。例如,甘肃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公共服务平台“陇明公”,即采用政府主导、企业投资、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将工资支付情况横向在政府部门和银行之间共享,实现农民工工资支付流程“数据一个库、监管一张网、管理一条线”。又如,特殊时期“政府+平台”的公共服务组织模式,使得政府能够以较低成本支

撑多种复杂公共服务的应急管理。

然而,现实中的平台型企业与平台型政府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动态性。一方面,二者之间具有传统政企关系中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固有紧张状态,制度环境变动对于企业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包容审慎、理性容错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是平台型企业勃兴最重要的制度环境,而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强监管态势,见证了平台型企业如何从高歌猛进转变为小心翼翼的状态。另一方面,平台型企业也逐渐发展出更多的话语空间,技术和经济实力增强,相较于政府的既有能力盲区,其具备一定的优势,加上政府对企业参与数字治理的协同需求,也使得二者具有互动的可能。只是在这种平台型企业和平台型政府的互动中,底层逻辑仍是政府在适应自身的身份角色变化,企业作出相应配合。政府作为企业平台的监管者和参与者,以及政务平台的开发者和所有者,在虚拟世界中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配置自身的权力及组织资源。

二、数字社会平台化的共性特征： 权力中心化

平台的发展突出反映了数字社会的再中心化机制,呈现出私权力中心化和公权力集中化的双重趋势。一方面,随着平台结构性垄断的形成、数据汇聚的加速和排他性滥用的盛行,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③成为具有准公权力的主体。另一方面,平台模式在冲击传统公共治理模式的同时,带来了政府监管中心化的回潮。经由数字平台模式,现代社会的政府与企业权力结构上呈现出新的共性特征——权力中心化。

(一) 私权力中心化

1. 垄断平台改变传统权力结构

私权力中心化是对互联网乌托邦的一种悖反。互联网自诞生之初,即秉承去中心化的设计哲学^[9],其以海量的信息共享和数据衍生创造了跨越时空限制的多中心、多宿主的网络结构,以分散的社群组织和匿名的行为模式淡化了单一的国家或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中心作用。“没有属性就是第一属性”^[10]的人在互联网中获得了超越性的自由,徜徉在“选择的共和国”。

然而,任何用于抵抗控制的技术都有可能成为实现控制的利器。互联网平台商业格局和治理机制的中心化,使经济权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建构。垄断

平台的迅速发展打破甚至颠覆了传统法律体系对“权责利”三者之间关系进行调整的既有范式。不同于以“国家—个人”二元主体划分为基础的传统公私法结构,随着虚拟性和扩张性的互联网技术赋权,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可能会膨胀为“私权力主体”^[11],互联网权力结构将由“私权利—公权力”的二元结构演变为“私权利—私权力—公权力”的三角结构^[12]。这种私权力可以对个体的自由权利作出限制。例如,大型电商平台亚马逊(Amazon)对于违规卖家的封号驱逐及无限期的平台内资产冻结是一种行政处罚式的制裁。在现实世界中,一个实体企业被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营业执照,需要以法律法规此等位阶的规范为依据在严格的执法程序中进行,并附以听证、复议、诉讼等保障救济措施。而在平台世界内,平台企业可以仅凭内部规约,实时强制屏蔽平台内商户的产品服务、中断商户的交易甚至关闭商户账号,宣判一个经营者的死亡;对于一般用户而言,平台也能通过禁言、删除信息、注销账号等方式移除个体及其行动轨迹。在此过程中,平台参与者往来来不及反应、找不到根据就已被施加处罚。此外,作为利益谋求者的平台有时也可能因为支持或包庇平台参与者的违规行为,而丧失合理的基本判断。大型检索对于商家购买搜索排名的支持即为明证。

在当下社会,平台化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私权力的中心化问题。理论界对平台相关法律现象的热烈讨论,实务界对平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强化监管,都反映出其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当平台权力膨胀至扭曲市场经济关系时,传统私法无法矫正和扭转这种不平等的法律关系,平台反而可能成为私权力主体的保护伞。在此格局之下,由公法强化平台义务,重新构建“权利—义务”平衡的法律关系,成为实在法的目标转向。

2. 垄断平台使主体发生客体化转换

19世纪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从身份到契约”的著名论断,揭示了社会分化和发展中“家族向个人”的微观单元转换和“家族向政治共同体”的宏观发展趋势。由“身份”到“契约”的递进蕴含着社会的功能分化、个体权利的抽象化等重要演化特征。以此为切入点来观察当下垄断平台的发展,可以发现,垄断平台呈现出“身份”和“契约”的双重变动,致使个人作为权利主体发生客体化转换。这种客体化转换有两种表现。

一是“身份”的湮没和回归。一方面,垄断平台

遵循互联网技术的一般逻辑,即去除个人身份、实现个人的抽象平等以满足平台规模扩张需求。在复杂多元的陌生人社会,组织的扩充往往需要更为包容的拟制。因而,平台对于一般用户并不设置进入条件,不论其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份如何,平台只着眼于可批量转换成其市场力量的用户“注意力”。另一方面,平台基于双边或多边的建制和个性化商业模式的倾向,又特别强调身份,其核心仍然在于扩展平台规模。不同于传统单边市场,平台的发展模式是双边甚至多边的,其对于不同对象往往采取非对称性的措施。例如电商平台一边连接商户,一边连接消费者,对于这两个不同身份的群体,平台在准入、行为管理等方面附以不同的要求。大数据采集处理技术使平台的个性化、定制化运营模式如鱼得水,凸显出对个人身份、习惯偏好甚至性格特点的立体捕捉,以此提高平台对用户的吸引力和锁定效应。“用户画像”“大数据杀熟”等现象的频繁出现即为突出的表现。

二是“契约”的关系性及其异化。在现代社会,大范围的社会合作凭借契约得以实现,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被视为现代私法的核心精神。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福利国家的转型,契约的关系性特征也愈发明显。关系契约理论认为,现实中对契约权利义务的动态判断,与其说来自当事人的意思或信赖或法律,毋宁说来自契约背后的社会关系和共同体规范^[13]。数字社会的平台组织形式包含着传统的契约结构和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以电商平台为例,理想情形应该是平台和平台内的商户以契约建构定期合作关系或有限度的管理关系,平台内的商户和消费者以买卖契约建构即时交易关系。然而,现实中的垄断平台却试图以契约建构相对方对自己的依赖或依附关系,而不是平等合作关系。一方面,一般商户为了维持自己在平台上的一亩三分地,需要遵守平台内部等级结构式的规定。天猫和京东、美团和饿了么等头部平台要求其商户“二选一”事件,揭示了“独家合作协议”的真实面貌是优势一方的强制,而不是平等双方的合作。另一方面,一般用户对垄断平台有较大的依赖性,似乎很难摆脱现有的垄断平台。经由平台的零成本准入,用户实质上是被吸引到一个边界模糊的大型生态系统中,继而,垄断平台通过阻碍数据的互操作性和一系列锁定策略防止用户“用脚投票”,并能获得额外的收益相关性。由此可见,用户对进入和留在平台中作出的“同意”(consent)选择,有时仅为形式而非实

质判断。

概言之,对“身份”的处理以及对“契约”的异化,体现出平台建立和维系大规模陌生人群抽象信任关系的独特机制。相较于传统社会的“家族”小规模自治单位,当下的垄断平台运用技术和经济实力达成更为宏大的结合,这种结合同时也是一种更危险的结合。一方面,平台体现出家长式的进攻态势。平台向用户提供其认为的个人喜爱或有利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替个人作决定或暗示诱导应如何选择。长此以往,个人可能失去自主选择与决定的能力与必要性,同时以付出隐私为代价。另一方面,平台并无家长式的实质关怀。无论垄断平台发展成怎样庞大的生态系统或基础设施提供者^[14],其本体即互联网企业规模化的目的在于整合虚拟世界的用户注意力,使之转换为抽象的市场力量。因而,我们很难指望互联网企业超越私利本能,充分关注现实世界中活生生个人的权利。由此看来,身份在平台中的湮没或回归,在体现人由主体向客体化的转变上殊途同归。

(二) 公权力再集中化

1. 行政监管权力集中

伴随着平台企业的私权力中心化问题,公权力的范围及分配也发生了调整,主要体现为国家权力向行政权力集中。随着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平台型企业的监管问题被置于体现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高度,而涉及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经济法问题和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等民事法问题,更多以政策规划和行政执法的方式解决,由此呈现出行政治理的再度繁荣。

一是在权力依据上,即时调整的政治决策优先于相对滞后的法律被贯彻落实。从对平台发展的包容审慎,到将平台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并提,具体政策的转向非常迅速。被提升至国家治理高度的平台治理以政治决策为依据,落实的是政治意图,充分体现了政治性^[15]。

二是在组织架构上,国家执法机构改革持续推进,不断集中强化针对平台问题的执法权力。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和商务部的反垄断执法权力合并归属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1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成立,行政升格为专门负责反垄断执法的机构。这两次组织架构的大调整实现了行政监管部门权力的整合扩展。

三是在权力运行上,涉及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行政执法强度和力度逐渐加大,司法则因其被动性属

性,加之平台新型案件的启动和证明要求条件高、审理难度大、办理周期长等特点,在平台治理中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诚然,在比较法的机构配置中,也多有行政执法部门承担平台的主要监管义务,但相应执法往往有着较为完善的制约机制,有助于实现执法与司法之间的配合协调。美国反垄断体系以《谢尔曼法》为核心,实施以司法主导的反垄断规制,即以分散的法院作为执行机关,由私人提起民事诉讼,法院最终进行认定。虽然美国设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反托拉斯司等机构加强执法力度,但反垄断执法行为主要围绕法院展开,法院审判能够主导反垄断实施的方向。欧盟实施以专门执法机构主导的反垄断规制,在司法审查方面,欧盟法院对反垄断处罚决定等享有很大的审查权,对于执法机构的罚款数额可以增减。上述法域都明确了司法作为最终的救济手段,专门机构的权力都将接受司法审查。在我国,相较于执法机关涉及平台监管案件的庞大体量,及其对中国知网、阿里巴巴、美团等平台巨头的高调处罚,司法机关的平台反垄断案件仍屈指可数并稍显落寞^④。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已通过制定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等方式加强对平台企业的司法规制^⑤,但其发展仍然滞后于积极的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具有规划性和主动出击性,强调政治和政策的执行力。司法则具有被动性,首先解决争议,并通过裁决争议实施法律,因而更强调个案正义中的法治,更重视裁决的中立性。当然,司法不可能远离政治,而是以司法方式贯彻政治意图,但它不过于关注瞬息万变的具体政策,而是更加关注稳定、长远的政治利益,以实现政治、法律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和连续。行政监管权过重,固然可以塑造执法权威、提高执法效率,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制约,也容易产生过度迎合政策要求而突破合法性要求的情况,扩张国家对社会的合理干预,在横向和纵向上出现并不均衡健康的权力配置。

2. 行政服务职能膨胀

行政服务职能是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平台型政府的建设目的也是更好地实现政府的服务职能。然而,对于商业平台生态系统的机械复制,可能使得政府职能在虚拟的互联网中边界模糊。随着政府平台生态系统的广泛设立和打造,平台可能演变为行政家长主义的温床。

一方面,行政服务的统合和扩展可以体现平台组织形式的优势。政府作为平台,可以将政府、社会与公众通过互联网形态点对点、面对面地连接起来。

而政务服务的开放平台一旦形成,它所覆盖的范围就不再仅仅局限于以行政审批为核心的服务,而是将延伸至各类社会公共事业的服务,甚至可以提供电子商务的个性化服务。这样可以使政府各部门、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条块分割的职能得以融通和集合,充分释放基层行政力量,有助于治理水平的提高,与高效便民的政府运行目标相契合。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例,其中的健康信息码、行程卡和各地风险等级查询等模块可以为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提供统一防控、整体治理的工具,在特殊时期有助于实现全社会高效有序的防治。

另一方面,平台型企业的垄断问题也提示了政府作为平台存在的危险。作为平台的搭建者,政府如果不自觉退居后台,往往会成为平台权力的中心。虽然政府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借助平台模式治理社会,这与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而借助平台模式运作市场有着很大区别,但其同样处于支配或优势地位,如果缺乏必要的约束,容易造成对个人权利的不当干预。具体说来,平台型政府行政服务职能的膨胀会带来以下不良后果。

从公民视角看,其为现实和虚拟两个政府所累,而在虚实转换之间,政府的某种违法行为易被转变或解释为一种值得辩护的行为,对个人某种权利的限制或剥夺易被转变为一种合法的国家干预。从政府视角看,政府作为平台带来的行政服务职能膨胀,同样也是一种“难以承受之重”。受制于行政资源和能力的有限性,政府无法在其包揽范围内对所有服务事项作出妥善照应。同时,政府作为监管者的角色定位,也需要对自身提供的平台服务作出相应的审核和监管,这进一步增加了平台运营的难度。这是政务平台扩展公共服务范围、统合公共服务渠道面临的现实瓶颈。例如,某地方政府为了改善房地产中介收取过高中介费的情况,亲自搭建二手房信息交易平台,但由于推广程度受限以及系统运行问题,该平台上线后并未激起二手房交易市场的“大水花”,上线5年间个人挂牌房源信息仅127条,而商业化的中介平台房源数量已达到26万条^⑥。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政府要介入二手房交易行业,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那么其作为监管机构的行为前提就是以身作则地保证房源信息真实,但这需要海量的系统维护工作和审核工作。从政府的现实情况来看,显然无法完成这样的工作。由此产生的行为结果不外乎两种:一是政府将这类质量不高的平台强制推行,进入平台的交易信息等获得政

府背书,其中内含着政府对市场干预失灵的风险;二是这类平台因缺乏实用性而被置于边缘的地位,从而造成资源浪费。

3. 行政责任分散移转

政府主导与互联网企业参与并举是平台型政府治理的应有之义。从信息技术的角度来看,政府是电子政务平台建设的发包方,它从运营者和使用者的角度提出项目的建设要求和具体的需求,但在平台建设或技术积累与升级上,政府并不具备优势。互联网企业则在日常运行商业平台和参与政府电子政务平台的建设过程中累积了丰富经验,在技术层面有着明显的优势^[16]。现有研究在平台企业对政府的技术制约问题上有较多论述,有学者对算法解释权进行原理反思^[17],也有学者剖析了算法自动化决策对行政正当程序的挑战,以及立法者应如何应对行政正当程序实现的制度障碍与技术障碍^[18],还有学者关注到政府算法黑箱问题是如何形成的^[19]。互联网平台企业可能会借“技术中立”强调自身与侵权事件中的责任无涉,同时,也可能通过对数据和复杂算法的掌握,使外界难以举出反证,从而摆脱自身的责任。这种借助平台模式而导致的私人利益俘获公共利益、资本规避公权力约束的风险已为国家所认识,平台企业对算法的不合理应用被明确反对。例如,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4条规定:“提供算法推荐服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遵守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遵循公正公平、公开透明、科学合理和诚实信用的原则。”^⑦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技术黑箱具有转移责任的特殊效用,政府在进行数字平台建设时,是否也会落入窠臼,将技术逻辑作为一种诿责的抗辩,将行政责任分散到平台连接的政府各部门,或转移至建设平台的企业责任或技术性问题?与平台型企业的口径相似,技术性问题这一理由似乎更为常见。在现实中,相关部门往往将出现的问题解释为系统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政府与企业合作建构平台生态系统,出发点是由政府积极履行整体规划等职责,借力企业的先进技术和成熟平台实现数字政府的跨越式发展。然而,借助技术问题或多元主体规避或分散转移行政责任的现象却对这一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

三、数字社会平台化的内在张力

平台化已辐射整个社会,成为建构数字生活世

界和数字政府的组织基础。前述数字化平台的样态特征反映了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与潜在风险。数字社会平台化内含着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封闭性权力与开放性平台、技术逻辑与合法性逻辑三组张力关系。

(一) 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的同源并行

数字社会对政府、垄断平台、个人三者之间权责利结构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关系的重新审视。这种关系调整并非仅基于外在的社会指标对不同法律领域的重新梳理,更需要从规范性的内部视角进行把握。

1. 不同法律范式对私人自主的理解

一般来说,私人自主的个人自由原则在民主社会不会发生改变,但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不同法律范式对它的理解会有变化。法律范式会随着社会流变而自觉发展,由自由主义法范式至现代福利国家实质法范式的转型可见一斑。自由主义形式法范式将私人自主理解为抽象的个人在具体生活条件中基于形式平等的自由,但形式自由并不等于实质自由,法律平等并不等于事实平等。在缺乏享有自由的条件时,该种形式自由并无实际价值。随着经济权力、物质财产和社会状况不平等的与日俱增,这种形式的平等逐渐转化为强者的偏好,形式的自由实际上是强者的自由。

福利国家的实质法范式试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定的改良,对私人自主给予事实保护。具言之,相较于自由主义法范式的经济人及平衡市场假设,福利国家的实质法范式已意识到现代社会的多功能系统分化、权钱分布不均等特征。相较于自由主义法范式对个人自由的消极划界保护——社会具有第二自然性,福利国家的实质法范式则认为,个人在社会中的行动受到系统自我导控逻辑的制约,并非消极自由意义上的自主——社会具有可控性,因而可以诉诸国家对社会的导控行动“驯服”系统运作的不确定状况,保障差异个体均具备行使自由所需的社会条件。由此,“国家权力”这一公法因素和社会正义的伦理视角被引入私法中,从而模糊了私法与公法的鲜明界限。被称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蓬勃发展,就是这样一种私法实质化过程的最佳展示。然而,私法的实质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私法的消亡过程。随着私法的不断实质化,私人自主最初独立于公共自主的特性可能无法在现实中找到根据^[20]。现代福利国家的窘境使国家与个体自主性发挥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矛盾,对私人自主的事实保

护反而限制了私人自主的正常发挥。如此看来,福利国家的实质法范式对自由主义法范式的矫正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以公共自主实现私人自主的尝试

福利社团模式是福利国家法范式的再调整,显示了以公共自主实现私人自主的尝试,即由区别于国家政府的社会另一行动领域,按照一定程序和组织形式,使其参与者能够自主处理自己的事务和冲突。参与者能力的提升源于其不再是个体身份,而是团结的团体成员。由此,私人自主可通过程序参与者的社会自主进行补充和强化。施密特认为,经由信任自由竞争经济自我导控能力的社会组织对国家的代理,可能达致私人自主的全盛时期。

然而,福利社团模式创建了以特定集体保护个体的渠道,也将另一种他治加以建制化。在传统工业社会,企业劳资协定、工资协议对社会主张的满足和政治立法通过的劳工法律别无二致,同样以规范化和行动指令为代价,这些规范化的作用可能是限制自由的常规化^[20]。在数字社会,以数字技术、平台组织形式、算法程序规则形成的平台企业可称作福利社团的完美模式。由于平台提供了连接用户的工具,在与监管者的斗争中,平台可以作为用户群体的集合而对监管者施加更大影响。比较法上,该种情形在对优步(uber)和脸书(facebook)的监管中反复出现^[21]。在我国,大型公共社交平台上对于部分社会事件的舆论爆点,亦能牵引官方对事件的关注和处理,个体声音在平台汇聚而变得难以忽略。然而,这种保护私人自主的路径仍是以一个公共自主对抗另一个公共自主,却忽略了私人自主本身。企业从传统形式发展到数字平台形式,其组织规模得以迅速扩张,但企业并未将其成员即用户视为独立的个体,而是将它们看作平台整体力量的一部分。平台化本身并不能带来个人自主性的提高,个人意志仍然要让位于一种并不取决于具体个人期待的团体决定。

以微博平台为例,个人发布的内容能够登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往往离不开平台本身的推波助澜;那些不符合平台要求的个人言论则很容易销声匿迹。微博设置了算法捕捉关键词和“微博监督员”人工管理等机制,旨在“强化网民监督,净化微博社区环境,有效处置微博上的违法有害信息”。如果说何为“违法”有着较为清晰的边界,但何为“有害”判断标准则比较模糊,完全由平台定夺。微博对有害信息的判断与处置有时可能是:“涉嫌捏造故事

博取热度同情进行非法诈骗,采取封号和拘留等处理。”封号是平台制裁用户的常见形式,拘留是国家制裁个人的典型形式。互联网平台的兴起使得国家和资本力量正式遭遇^[22],两种公共自主同源并行,其间交织的诸多行动可能使得私人自主被不断压缩。

(二)封闭性权力和开放性平台之间的张力

企业平台化的背后潜藏着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政府平台化转型问题的症结在于封闭的政治系统和开放的平台模式之间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平台的聚合、开放、共享特征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它必须建立广泛的连接,平台治理的目的是顺利实现该种连接。另一方面,政府的平台化仍然要遵循“以政府为中心”的封闭决策逻辑。在制度设计上,“平台型政府以各级政府为核心……在平台型政府下,数字政府领导数字平台和民众共同形成数字共治能力”^⑧。由此可见,当下对平台型政府的设计理念仍然是“政府领导平台”,而非“政府作为平台”。政府由于权力属性的封闭集中,基于确保公布数据信息的权威性、可控性及对自身管理安全性的追求,借由平台实现资源的整合统一,但在平台建设上对于数据开放内容和公众参与程度可能会有所保留。

充分开放的平台则以社会公众为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调和甚至消解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充分开放的平台模式下,海量数据开放和广泛的公众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让每个公民具备和政府“摆事实,讲道理”的条件,这对政府的封闭性权力以及追求管理安全的目标形成了一定的挑战。这也是政府很早开始打造数字政务平台,但多年来效果却不如预期的原因所在。在实践中,存在政务平台数量繁多但整体实用性不高的情况,这表明“政府作为平台”这一思维逻辑并未得到充分贯彻,现实情况更多是围绕“政府借用平台”的技术增量打转,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变成以数字平台建设覆盖度为表征,一些政府从“管理”向“服务”职能转型本身的问题则被转移或遮蔽了。由于受传统的管理者观念的限制和非竞争状态的影响,政府并没有足够的精力与动力像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互联网企业那样,熟练掌握和不断升级算法技术、高效运营数字平台,而是对依据政策建设平台有着更高的热情。

当前应该警惕的是,面对封闭权力和开放平台之间的张力关系,政府有可能借由平台模式的无限性,突破现代法治国要求的行政权有限性原则,忽视

行政资源的有限性现状,从而导致个别行政行为出现合法性问题。封闭性权力通过技术方式可以在平台中扩展既而再次封闭,扩大信息不对称,最后可能作出异化的决策。特别是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政府希望借助平台实现监管触手的延伸,但平台本身的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在技术、规则、程序等方面难以对权力扩张可能导致的权利克减问题作出妥善回应,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政府决策的准确性、及时性与合理性。

(三) 技术逻辑和合法性逻辑的张力

数字平台的发展始于企业的商业运营模式,政府治理的平台化思维借鉴了互联网企业的思维方式,遵循技术逻辑。技术逻辑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从技术工具论到技术建构论,从技术决定论到专家治国论,从信息科技发展带来的技术赋能到微观社会结构的精细化演进,技术逻辑在治理领域经历了循序渐进和逐层深入过程。当下,‘国家—社会’关系正朝着技术治理转型,治理中采取的‘技术性’方式强调了对权力和策略行为的工具化应用。”^[23]。然而,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技术逻辑和国家—社会治理的合法性逻辑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以技术逻辑主导的治理模式,容易导致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在法的社会理论的考察中,技术逻辑和合法性逻辑的张力问题,在本质上体现在技术理性对交往理性的取代^⑨。具体而言,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技术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交往方式。在复杂多元的大型社会,去主体化的交往关系可能会导致社会共识消解、价值参照体系混乱。正因为如此,构建交往理性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议题,其核心在于实现主体间理解的一致性。非正式的政治意见形成过程和正式的政治决策的形成过程,都基于交往理性对政治参与权的行使,在其形成的交往权力的引导与规范下,国家行为才能够获得合法性基础。在这种交往循环网络里,人民主权体现于“无主体”的“具有理性结构的协商和决策之中”^[20]。

在数字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技术理性再次成为优选项。技术理性具有工具化、自动化、效率化等主要特征,可以取代传统意义上维系交往关系的情感观念、道德信仰所需的交易成本,能够引入海量并正在不断自我增值的信息数据,建构大型并正在无限膨胀的社交网络。“在这个人和人无时无刻不‘被连接’的新时空中,过去较为稳定的社会认同正在遭遇去本质和去中心化的技术悖论。”“在互联网

网技术创造了虚拟身份的过程中,‘他者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4]公共领域事实上的非普遍准入、垄断和圈层化自我话语对社会整体的替代,以及非专业化传媒对公共议题的压缩或无效汇合等,造成一种多变、多元的时空割裂。在公共性的割裂中,个体性也并未实现。在缺乏理性对话和信任体系的环境中,主体更容易丧失真正的自我意识。

数字社会平台化建设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上述三组张力关系,那么这种平台化只是提供了一种虚拟的交往自由表象,而无法形成交往权力,不能对治理合法性的产生和巩固发挥积极的作用。离散化、无共识的生活世界也使得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集中控制成为可能。在平台化借助先进技术实现的更广大结合中,社会整合方式仍是传统形式,并未得到革新。凭借复杂工具掩盖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处理,可能会导致新的复杂问题,使社会整合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四、数字社会平台化的调试路径

数字社会平台化趋势体现在平台型企业的扩张、平台型政府的建设和二者的互动等方面。数字社会的生活深受平台的影响,数字技术所营造的共享、开放、自由表象遮蔽了权力集中化的回潮,其深层问题在于扩大的公共自主对私人自主的挤压,封闭权力和开放平台、技术逻辑和合法性逻辑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这些问题并非结构性的无解,我们可以采取积极措施化解平台化的潜在风险。当前我们可以社会治理为主导,助力市场治理,补缺政府治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试。

(一) 实现平台公共性

平台型企业的垄断问题 and 不正当竞争问题以及平台型政府的侵权问题,均源于数字平台搭建者同时又是平台主导者的权力中心化问题。平台的扩张属性意味着其天然地成为权力的矿藏,内含着权力异化的新型治理危机。平台化趋势实现的是公共化,即公共空间的扩大,这为权力提供了方便之门,一方面使得企业的内部权力具有了公共属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政府的行政权力进一步扩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过程可能伴随着公共性(publicity)的消解^⑩。公共空间的扩大并不等同于公共领域的活跃,在缺乏系统的公共性讨论和训练之下,不论是平台的搭建者还是参与者,都容易陷入“公私不分”的悖论中,最终导致自我意识、理性对话和共识认同的

多重缺失。也正因为如此,在数字社会实现了形式上的公共化之后,应将公共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更高追求。换言之,平台的重构应落脚于公共性的实现。这意味着“以平台搭建者为中心”这一行为逻辑将彻底改变。要实现真正的平台化,比较可行的策略是平台的搭建者退居后台,仅制定基本规则和提供基础服务,鼓励社会的其他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到平台之中并充分活跃。社会各部分通过互联网形态,点对点、面对面地进行连接和对话。由此,平台一方面实现去中心化的架构,一方面真正实现一体化的合作治理,积极回应社会功能的分化和复杂性的增长。

(二) 矫正技术治理逻辑的认识误区

作为推动治理现代化的工具,技术治理以信息量化和精细化管理等工作机制,提升了行政体系在部分领域的治理能力。然而,技术治理自身并不能突破行政机构的内在缺陷^[25]。当前技术治理的实践带有明显的顶层设计特点,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上,技术治理容易被用于加强对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的绩效控制。自上而下的电子政务平台建设考核和各类数字化指标评比可能增加的是无效负荷,反而耗费了基层的治理精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术治理逻辑下央地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国家和社会这一维度,技术理性的强化对交往理性的冲击甚至颠覆,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和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危机。概言之,技术治理本身并不自带现代化属性,反易陷入自我合法化的谬误。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在治理逻辑上进行调整。一是明确技术的工具定位而非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面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新形态,不断学习和厘清技术治理的运行机制,努力消除政府有效治理的盲区,以更好地应对现代治理日益加剧的复杂性问题。二是将技术理性与交往理性充分结合,并以交往理性为主导,充分发挥平台作为公共领域的再造功能,将各类观点、立场及利益自下而上地集中到决策和治理过程中,带动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治理技术的平衡与妥协,实现相对有效的治理目标。

(三) 以法律为整合媒介

现当代的社会理论认为,一个交往事件可以至少从一个角度出发来确认同一性。换言之,存在一个事物可作为一般交往媒介,对各领域进行社会性整合,这一事物就是法律^[20]。信息社会著名的“代码即网络空间的法律”^[26]论断强调人们必须理解造就网络空间的软件和硬件的规制机理,反过来说,

法律的重要作用在于将网络空间里具有规范内容的代码转译于现实社会,使其与生活世界中交往共同体的自我理解相联系。因此,数字社会平台化问题的破题关键在于如何架构法律。从比较法来看,我国的数字法治在具体规则和制度的设计层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多项举措为他国所学习,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在数字法治理论上已形成体系性、在整体上具有协调性。数字法治本身是一项融合律令、技术和理想在内的复杂事业。完善数字社会“国家—平台—个人”格局的规范构建,需要立足于以下四个重要支点。

1. 作为法律核心概念的权利

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对个人权利的处理。当前的数字平台建设着眼于政企关系策略,如合作策略或利益严重冲突时的对抗策略^[27]。但无论二者之间采取何种策略,均有可能使被动的社会个体利益遭受损害。平台模式将权责利的分配权力收归自身,强化个人对平台的依附性,形成一种对私权利的家长式入侵。在“平台本位”的倾向中,法律需要作为一块阻隔板守住私权利场域,严格厘定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界限并配以必要的救济机制。这样才能使政府的公权力不能随意限制或侵害公民的私权利,平台型企业的私权力不能随意限制或侵害平台成员的私权利,维护平台作为普通经营者时的私权利。以我国三大数字立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及《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例,前两部均为安全导向的管制性立法,在价值取向上并未充分支持数据传输便利化的原则,需要加强立法活动保障数字市场的便利性和流通性。“坊间热议的个人信息权益问题至少应包含五个维度。其一,以民法的人格权为核心内容的自由权,旨在维护私人自主,其中隐私权作为防御性权利特别引起关注;其二,个体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资格与权利,牵涉宪法实践;其三,在信息社会提供充分及时法律保障的相关权利,这涉及程序法的改革;其四,关于信息社会重大决策的民主参与权,这关涉公共自主,与宪法与行政法密切相关;其五,公民享有数字基础设施服务和科技进步所带来各项福祉的权利,即社会权,则覆盖了各种类型的社会法。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主要涉及这些权利中的第一个维度,而关于其他四个维度的讨论刚刚起步。”^[28]这更类似于政府与平台型企业的博弈结果,包含二者的利益诉求^①,将个人权利在实质上置于次位。《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规定了个人启动侵权诉讼的前置程序,即向“个人信息

处理者”(企业和政府两类信息权力者)请求行使具体权利,只有在其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义务或一定期限内不予处理或其提供的申请受理机制失效的情况下,个人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获得救济。由此可见,个人信息受到侵害时要想获得救济,在立法上即有严格限制;而在司法实务中,这一侵权救济也被法院谨慎对待,并不轻易受理^⑩。因此,在数字社会平台化建设中,要从强化私人自主和实质权利的取向出发,加强私权利保障型立法和相应救济机制的有效性,并推动公权力限权型立法,规范行政立法与执法,完善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2. 作为法律内生意义的稳定

成熟的法律至少表明在技术层面能够实现其稳定性的目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意义的自生成系统,有着对外部信息的过滤机制和内部沟通机制而形成自身的“时间节奏”。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内在在稳定意义和法律的复杂化约相辅相成。而科技革命下的现代数字社会往往采用加速立法的方式解决法律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问题,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需要^[29]。面对平台领域呈现的高度复杂的动态特征,这种快速立法往往缺乏一个理性化设定、内涵清晰的规制蓝图,只能采取“打补丁”的方式被动地填补法律制度的漏洞或空缺。这种做法可能使数字法治在全面推进的同时缺乏体系性,监管机构与形式较多,但各自监管目的具有相当差异性,监管顺序和层次不够清晰有序,在实践中有可能导致协调困难或前后矛盾的问题。换言之,在此等大规模的政府自我编码或企业参与编码的过程中,容易遭遇过度规制与规制不足的双重困境,不仅会违反比例原则,而且会导致“成本—收益”的失衡。随着对平台的认识、运用和规制不断进入新阶段,法律不仅需要顺应平台这种新型组织形式带来的变化,更应该以自身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来有效规范技术治理频繁变动带来的问题。对平台型企业的监管应尽量避免应激反应式地增设新规则的方式,而应将更多精力转向法律原理揭示、法范式适应性调整和规范适用层面的机制和技术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在技术的魔阵和多元的价值冲突中,凸显法律存在的意义和权威性,使技术在充分发挥效用的同时,也受到理性化、常态化的法律规制。

3. 作为法律认知机能的开放

在对法律演化史的考察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法律如何深深扎根于社会历史之中,如何向社会生活开放,如何在习惯、无意识的传统和社会共识中找

到演化的力量。以法律为媒介因应数字社会的平台化问题,核心在于明确平台型企业的运行、平台型政府的合法性证成,这离不开法律向社会生活的充分开放。法律推动平台自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推动社会自治。基于这种认知,平台化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推动数字权力由封闭向开放转变,实现由国家向社会下沉的“回归”。平台之内和之上的规范构建是一个非建制化和建制化相结合的过程,需要建立在运作封闭性基础上的认知开放性,即经由充分的交流沟通打破网络效应的壁垒^[30],尽快改变数字资源集中于一身的现状,促进主体层面的平台搭建者之间、平台经营者与用户之间以及不同用户之间的相互开放,推动在客体层面作为基础的平台和数据等具体要素的开放。只有这样,平台的正外部性才能在其参与者之间共享,而不是为平台搭建者或其他某个权力中心所独占。平台型政府的建设思路也应首先厘清政府在治理中的传统劣势问题,从“以政府为中心”的单向管理制度观念转向“以社会为中心”的共治制度观念。

4. 作为法律合法性构造的程序

法律演化成果经由程序性的内容达成稳定。规范法律的模糊性、解决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张力问题,可以在程序中获得选择并最终确认。

一是考虑监管规范自身的合法性。某个规范如果要成为合法之法,就必须遵循民主立法程序。以竞争政策为基础地位的现代竞争法体系,面临行政权大规模自我编程甚至平台自我编码等问题,对私人的惩戒权变相增加,但并不具有相关权能的充分正当性和合法性。没有人会允许平台仅通过“告知—同意”的简单程序就可以超过合理限度地处置自己的人身权利和基本自由。因此,对于涉及重要权益的制度设计,不论是政策命令还是平台内部规则,均应以“民主的立法程序”进行,并辅之以配套程序的救济机制。

二是考虑监管程序法的价值理性。监管程序法的问题在平台化社会也被特别关注。传统监管程序法的核心价值强调监管程序的透明度、无偏倚、参与度、合理性及有效救济保障,最后方能作出决策。但由于信息、数据等进行决策的技术理性和传统的价值理性不同,监管程序法的核心价值不断遭受挑战。如前所述,算法黑箱问题直接冲击了决策程序的透明度;而用算法进行决策的技术本身与传统说理论证的做法也大不相同,难免有所龃龉。因此,程序的核心是完善平台算法透明度等规则要求。例如,可

以将用户对算法推荐结果的知情和自主选择权作为对平台规则进行监管的重点,也可以重点推动“行政程序法”的研究和制定,对行政部门的执法程序进行约束,在法治框架中将公共权力的行使纳入法律控制系统。

三是重视司法裁判或审查。司法是衡平的重要运用,要积极推动私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制度在平台相关纠纷中的运用。对于尚处于不断发展演化中的数字平台而言,程序化的私人诉讼通过博弈和平衡可以提供较为确定的救济渠道。如前所述,个人信息侵权的相应救济机制亟待完善。

余 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防止和坚决反对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是市场和政府良性发展的关键。在21世纪的当下,平台经济的兴起让国家与资本力量正式遭遇,并将政企关系放在了全国性舞台上^[22]。数字平台基于其连接公共价值的优势,具有促成公共性实现的潜能,但也隐含着权力中心性和话语不平衡性的危险。

毋庸置疑,平台化转型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数字社会,我们更有必要正确认识平台的定位,明确去中心的公共领域是平台的理想模式,厘清多元主体共治与保障私人自主的平台发展的基本逻辑,充分认识到权力的下沉和开放是真正实现平台化的必由之路。同时,还要以法律作为媒介对技术进行转译,以法的正义的程序性论证矫治技术理性的认识误区,并从技术生成的权力手中“还法于民”。数治的底层逻辑还是法治。随着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向纵深推进,法治国原则可以使我们保持清醒、理性,保障这一进程的稳步推进。而法治的正当性基础来自人民性,后者可以为法治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进步动力。如近年大热的《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所揭示的,人类是有限的,数字化能使人类有限的数字实现自我增值,但并不能提供意义的无限。归根结底,人类的文明取决于人类自己的选择。

注释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五篇“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
②参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数字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浙政发[2022]20号)。
③下文以垄断平台为代表,系占据相关市场支配地位的互联网大型平台生态系统。
④少数典型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

于2014年宣判的第一起垄断案件,即被称为“3Q大战”的奇虎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以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宣判的京东诉阿里巴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
⑤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43572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7月2日。
⑥政府服务平台能取代房产中介吗?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9670942237932551&wfr=spider&for=pc,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日。
⑦参见《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网,https://www.cac.gov.cn/2022-01/04/c_1642894606364259.htm,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日。
⑧参见《数字政府建设:数据共享与数字共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xinwen/2022-07/29/content_5703413.htm,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11月2日。
⑨基于在人的交往中通过语言的共识形成的特殊规范,交往理性强调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内在于语言交往的整体理性要求。对于交往理性的论述,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高鸿钧:《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上)——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政法论坛》2008年第5期。
⑩阿伦特对“公共”一词的考察,首先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从宽泛的角度看,“公共性”可被理解为“参与”,即民众自愿“参与塑造公共空间”。参见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⑪例如政府以个人信息保护强化对平台型企业的管制,企业经由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保留进行规避。
⑫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22)浙0192民初4330号民事判决书;姚佳:《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的实现困境及其保护救济》,《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6期。

参考文献

- [1]常江,狄丰琳.数字新闻业的平台化:演进逻辑与价值反思[J].编辑之友,2022(10):22-30.
- [2]GUTCHESS J. The Management of Uncertainty in the Uncertainty of Manag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7(3):57-87.
- [3]孟庆国,鞠京芮.人工智能支撑的平台型政府:技术框架与实践路径[J].电子政务,2021(9):37-46.
- [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0.
- [5]ROCHET J, TRIOLE J.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3(4):990-1029.
- [6]O'REILLY T. "Government as a Platform", Innovations: Technology, Governance[J]. Globalization, 2011(1):13-40.
- [7]刘晗,叶开儒.平台视角中的社会信用治理及其法律规制[J].法学论坛,2020(2):62-73.
- [8]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AI参与中国疫情治理的实践:政府和社会的一体化合作治理[EB/OL].(2021-04-21)[2023-11-02].http://aiig.tsinghua.edu.cn/info/1025/1184.htm.
- [9]刘晗.平台权力的发生学:网络社会的再中心化机制[J].文化纵横,2021(1):31-39.
- [10]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

- 译林出版社,2000:312.
- [11]解志勇,修青华.互联网治理视域中的平台责任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5):102-106.
- [12]周辉.变革与选择:私权力视角下的网络治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2-24.
- [13]内田贵.契约的再生[M].胡宝海,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240.
- [14]邹青松.国家介入超级平台公司治理的法理基础及制度构建[J].法商研究,2024(1):107-123.
- [15]孔祥俊.反垄断司法的逻辑与经验[J].中国法律评论,2022(3):92-104.
- [16]吴青熹.平台型治理:“数字抗疫”中的政府治理变革[J].江苏社会科学,2022(6):90-99.
- [17]丁晓东.基于信任的自动化决策:算法解释权的原理反思与制度重构[J].中国法学,2022(1):99-118.
- [18]张凌寒.算法自动化决策与行政正当程序制度的冲突与调和[J].东方法学,2020(6):4-17.
- [19]张洪春,章知连.从算法黑箱到算法透明:政府算法治理的转轨逻辑与路径[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65-74.
- [20]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董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101-105.
- [21]COLLIER R B, DUBAL V B, CARTER C L. Regulating Disruption: The Politics of Uber in the United State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2018(4):3-5.
- [22]黄冬娅,杜楠楠.平台企业政府事务部门专门化与政企关系发展:基于国家制度环境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22(6):59-80.
- [23]张成岗,王宇航.社会治理的技术逻辑:源流、特征及趋向[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6):61-66.
- [24]吴志远.离散的认同:网络社会中现代认同重构的技术逻辑[J].国际新闻界,2018(11):112-134.
- [25]彭勃.技术治理的限度及其转型:治理现代化的视角[J].社会科学,2020(5):3-12.
- [26]MITCHELL W J. City of Bits: Space, Place, and the Infobahn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122.
- [27]孔祥俊.网络平台信息内容规制结构的公法反思[J].环球法律评论,2020(2):133-148.
- [28]鲁楠.信息社会政府论:演化与选择[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3(2):3-22.
- [29]鲁楠.科技革命与法律演化的两个面相[J].当代美国法律评论,2019(1):66-84.
- [30]王锡锌.数治与法治:数字行政的法治约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6):17-34.

The Forms, Tensions and Direction of Platformization in the Digital Society

Chen Xinyu Ruan Jiahe

Abstract: The typical forms of platformiz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are platform enterprises, platform governments and their conflict-cooperation interaction. Platformization highlights the decentra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society, presenting a dual trend of private power centralization and public power centralization. The platformization of the digital society embodies the tens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autonomy, closed power and open platforms, as well as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and legitimacy. The direction to resolve the platformization crisis lies in the realization of platform publicness, the correction of platform technology governance logic,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echnology through the medium of law, with the rights as the core concept of law, stability as the endogenous meaning of law, openness as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law and procedure as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legitimacy as the fulcrum, returning law to the people from the power generated by technology. The principle of the path lies in social governance leading, assisting market governance, and filling the gaps in government governance.

Key words: platform enterprise; platform government; platform-based society; legitimacy

责任编辑:一鸣

我国铁路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的法律构想

宋纪萍

摘要: 基础设施 REITs 作为创新融资模式的重要手段,具有降低负债水平、盘活存量资产的优势,可以有效缓解当前铁路行业面临的融资模式单一、负债规模大、资产流动性差的困境。在政策推动下,目前 REITs 试点工作稳步推进,但在立法层面尚未出台专门的 REITs 立法,主要依据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 REITs 进行调整。现有立法状况存在立法层级低、投资者利益保护制度不完备、税收优惠制度不匹配等问题。铁路基础设施积极尝试公募 REITs 融资的同时,还应积极防范相关法律风险。

关键词: 铁路基础设施;REITs;公募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076-06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以下简称 REITs)是实现不动产证券化的重要手段,是一种通过发行收益凭证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交由专门投资机构进行不动产投资经营管理,并将投资综合收益,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的信托基金^①。20世纪60年代,美国已经开始 REITs 立法实践。目前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的 REITs 市场及监管相对比较成熟,有着较高的市场接受程度、完备的专门立法、配套的税收优惠制度及与其发展规模相匹配的中介机构和专业人才库。我国对于 REITs 的实践和研究相对较晚,2007年相关部门开始探索 REITs 在国内的落地和应用,积极推行试点工作。我国基础设施首批公募 REITs 自2021年6月上市以来,已发行公募 REITs 共计24单,总发行规模为783.62亿元,资产类型主要包括园区、仓储物流、高速公路、生态环保、保障性租赁住房。REITs 作为一种再融资模式,在铁路项目融资适用性和融资质效上相较于传统债务性融资及社会资本融资更具优势,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大,将这一融资模式应用于铁路项目意义重大。在此大背景下,如何利用现有政策优势

积极推进 REITs 试点缓解铁路融资难题,同时又尽可能规避相关法律风险,成为铁路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从立法层面看,我国现有 REITs 立法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巨大空间。

一、我国铁路项目引进 REITs 融资模式的必要性

铁路作为我国重要的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然而,铁路投资额大、公益性强,高额投资难以在短期内带来显著收益,铁路企业的高负债已严重影响到铁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融资困境愈发凸显。基础设施 REITs 作为盘活存量资产的一种重要手段,可以为破解铁路行业当前的融资困境发挥重要作用。

1. 缓解铁路建设融资渠道单一问题

银行贷款和发行债券是当前铁路项目资金的重要来源,这些传统债务性融资大幅增加了铁路企业负债,长期的高负债率使得铁路企业再融资比较困

收稿日期:2024-06-03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米字形高铁项目融资 REITs 模式及立法完善建议”(2023BFX021)。

作者简介:宋纪萍,女,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河南郑州 450001)。

难,不利于铁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引入社会资本投资铁路项目是解决铁路建设资金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为此,我国近年来已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多项政策文件都提出要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铁路建设。但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社会资本参与铁路投资建设的项目仍然有限。因此,当前铁路项目仍以传统债务性融资为主。相对于这两种传统的融资方式,REITs 融资的适用性更强、规模更大,可以有效缓解铁路建设的资金问题。

2. 降低铁路行业的债务风险

“十三五”期间我国铁路建设高质量推进,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在 8000 亿元左右;“十四五”期间铁路建设投资仍将维持高位,2023 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为 7645 亿元。目前,我国铁路行业形成了万亿级别的巨大规模存量资产,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国铁集团总资产达 9.34 万亿元,总负债为 6.15 万亿元,资产负债率 65.85%。截至 2023 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为 15.9 万公里,其中高铁超过 4.5 万公里,距离 2035 年的建设目标仍有一定差距。我国铁路基础设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处于建设发展期,仍有大规模铁路建设项目需要投资。基础设施 REITs 作为一种直接融资的权益类金融工具,收益率较为稳定,市场流动性较强,投资收益有保障,是化解隐性债务、减轻地方债务风险的有效手段。地方政府在让渡基础设施项目收益权的同时获得新的资金注入,地方融资平台借助基础设施 REITs 能有效盘活基础设施项目存量资产,缓解融资平台再融资压力。

3. 盘活铁路基础设施的存量资产

铁路基础设施投资额大,动辄百亿甚至千亿元的投资,一般的社会资本很难有实力进入;铁路建设周期一般 4 年左右,建成通车后客流的培育往往还需一段时间,再加上铁路自身公益属性,短期内很难获得收益,严重影响了社会资本参与铁路建设投资的积极性。同时,铁路基础设施自身独立性差,一般需要成网运营才能取得经济效益,这进一步限制了社会资本参与铁路建设投资的积极性。社会资本参与铁路投资建设的退出机制尚不完善,使得社会资本参与铁路项目投资建设的积极性普遍不高。这些因素导致铁路资产流动性较差,形成大量存量资产及高额负债,不利于铁路企业的生产经营及再融资。

传统基础设施领域融资中,企业通过加大负债、提升自身杠杆率来承接新建项目,但高杠杆、高负债会增加企业财务与运营风险,限制了企业承接新建

项目的能力。基础设施 REITs 可以解决传统基建融资项目退出难等问题,盘活存量资产,将存量资产打包并成立 REITs 发售,能够在不增加债务的情况下收回前期投资,较快实现资金回流,通过提升资金的周转效率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同时,还可以降低企业杠杆率,优化财务报表,在整体上提升财务健康状况,助力新老基建开发,形成资金良性循环。

二、我国 REITs 的立法现状

由于 REITs 在我国落地较晚,且产品较为初级,目前能够适用的法律规定较少,主要依靠政策和试点推动。目前我国与 REITs 相关的法规包括三部分: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证券投资基金法》),二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的相关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三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台的业务细则。具体而言,主要内容如下。

1. 国家立法层面的一般规定

《证券法》对我国境内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做了一般规定,旨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规范证券投资基金活动,保护投资人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我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的规定。”从内容看,这两部法律作为上位法,并未对 REITs 做出具体规定,仅在适用原则上进行规范。

2.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2020 年 4 月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这是国内首个直接具体规范基础设施 REITs 的部门性规范性文件,其中指出了推进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项目要求及工作安排。相关单位应充分认识推进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的重要意义,加强合作,推动基础设施 REITs 在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业务,盘活存量资产,形成投资良性循环。REITs 试点应坚持六个基本原则,即“符合国家政策,聚焦优质资产”“遵循市场原则,坚持权益导向”“创新规范并举,提升运营能力”“规则先行,稳妥开展试点”“强化机构主体责任,推动归位尽责”“完善相关政策,

有效防控风险”。借鉴成熟国际经验,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可以在重点领域以个案方式先行开展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稳妥起步,及时总结试点经验,优化工作流程,适时稳步推广健全法律制度保障与相关配套政策,把握好基础资产质量,夯实业务基础,有效防范市场风险。借鉴境外成熟市场标准,系统构建基础设施 REITs 审核、监督、管理制度,推动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试点项目要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行业、优质项目,加强融资用途管理。试点初期依法依规设立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省级发展改革委出具专项意见,在此基础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符合条件的项目推荐至中国证监会,由中国证监会、沪深证券交易所依法依规,并遵循市场化原则,独立履行注册、审查程序,自主决策。中国证监会制定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相关规则。

2020年8月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共51条,主要对产品定义、参与主体资质与职责、产品注册、基金份额发售、投资运作、项目管理、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等进行规范。根据《指引》要求,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采用“公募基金+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的产品结构;强化基金管理人及托管人专业胜任要求;基础设施项目需满足权属清晰,现金流持续、稳定,投资回报良好,现金流由市场化运营产生,不依赖第三方非经常性收入等条件;基础设施基金在进行常规基金信息披露外,还需要重点披露基础设施项目及原始权益人等信息;证监会及相关派出机构具有监督和管理职责。

2022年1月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税收政策的公告》,明确该税收优惠专门为支持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以下简称基础设施 REITs)试点,适用范围为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有关规定组织开展的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项目。主要内容为:(1)设立基础设施 REITs 前,原始权益人向项目公司划转基础设施资产相应取得项目公司股权,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即项目公司取得基础设施资产的计税基础,以基础设施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原始权益人取得项目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以基础设施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原始权益人和项目公司不确认所得,不征收企业所得税。(2)基础设施 REITs 设立阶段,原始权益人向基础设施 REITs 转让项目公司股权实现的资产转让评估增值,当期可暂不缴纳企

业所得税,允许递延至基础设施 REITs 完成募资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缴纳。其中,对原始权益人按照战略配售要求自持的基础设施 REITs 份额对应的资产转让评估增值,允许递延至实际转让时缴纳企业所得税。(3)原始权益人通过二级市场认购(增持)该基础设施 REITs 份额,按照先进先出原则认定优先处置战略配售份额。(4)对基础设施 REITs 运营、分配等环节涉及的税收,按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2024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全面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项目常态化发行的通知》,标志着我国公募 REITs 项目从试点进入常态化发展时期。该通知进一步改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项目申报要求》,确保申报推荐有据可依、有章可循。该通知以构建常态化发行机制为目标,以市场化、法治化为遵循,以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为原则,全面改进申报推荐制度,进一步明确审核内容,优化政策空间,简化推荐程序,压实各方责任。与试点阶段政策相比,该通知进一步拓宽了行业范围。在能源基础设施领域,将储能设施项目及清洁低碳、灵活高效的燃煤发电项目纳入试点范围;在租赁住房领域,将市场化租赁住房项目纳入试点范围。同时,也将养老设施纳入试点领域。基于行业发展现状,在园区基础设施领域、文化旅游基础设施领域和消费基础设施领域,满足该通知相关要求的关联资产可纳入项目底层资产。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负责同志就《关于全面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项目常态化发行的通知》答记者问时表示,进一步聚焦重点,明确审核内容和把关标准,进一步简化程序,提高申报推荐效率,进一步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确保权责一致,进一步优化政策空间,激发市场活力^[1]。

3.行业规定

在前述法律和规范性文件指引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近3年发布了一系列行业规定,规定了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的各个操作流程。具体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2号——发售业务(试行)的通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试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

金登记结算业务指引(试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基金通平台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转让登记结算业务指引(试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通平台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转让登记结算业务指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1 号——审核关注事项(试行)(2023 年修订)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5 号——临时报告(试行)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4 号——保障性租赁住房(试行)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审核关注事项(试行)(2023 年修订)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办法(试行)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 3 号——新购入基础设施项目(试行)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 4 号——保障性租赁住房(试行)的通知》等。基金业协会 2021 年 2 月 8 日发布《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尽职调查工作指引(试行)》和《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运营操作指引(试行)》,专门规范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的尽职调查和运营操作等具体事宜。

三、现阶段 REITs 立法存在的不足

2020 年 4 月,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021 年 6 月 21 日,首批 9 个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项目挂牌上市。截至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向中国证监会推荐 67 个项目(含扩募项目),其中 44 个项目发行上市,共发售基金 1285 亿元,用于新增投资的净回收资金超过 510 亿元,可带动项目总投资超过 6400 亿元。据统计,上市基础设施 REITs 项目已累计向投资者分红超 130 亿元,2024 年上半年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上涨 8.65%^[1]。当前国内基础设施 REITs 还处于起步阶段,与此相关的法律规制还处于试点探索阶段。与欧美国家成熟的立法和监管经验相比,我国现阶段的 REITs 在立法方面存在以下不足。

1. 立法层级较低

我国目前尚未专门为 REITs 立法,现有规章散

见于《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原则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台的业务规则。两部上位法的规定较为笼统,部门规章多为试行阶段的政策性文件,内容有待完善。例如在其他专业配套方面,未涉及资产评估、会计核算等专门指引。虽然从短期来看,我国专门为 REITs 立法尚不具备条件,但从长远看,应针对 REITs 出台专门的法律,以便其宗旨、原则得以连贯体现,各项制度更为完备,条款内容更具体系性。从国外实践看,REITs 相对成熟的地区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对其进行引导和规制。

2. 投资者利益保护制度不完备

对我国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现行法律以及配套规则主要包括保护投资者的信息知情权、参与决策权、监督审查权以及资产收益权等四个方面^[2]。现有立法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还不完备。

一是信息披露制度存在明显不足。从投资者信息披露情况看,现有信息披露制度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基金管理人为经营管理基础资产而设立的子公司或聘请的外部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缺少相应规定;二是对专项计划管理人的信息披露义务没有明确规定;三是对原始权益人等主体的信息披露要求有待提高。”^[3]目前我国未确立 REITs 发行期间原始权益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主体地位。根据《指引》,原始权益人不是信息披露义务主体,其仅负有配合义务,向基金管理人保证信息的真实、准确及完整。从基金托管人的信息披露义务看,现行法律与《指引》中的相关规定之间存在冲突。根据《指引》第 37 条和第 44 条,基金托管人并不是信息披露义务主体,其仅负有监督义务,复核基金管理人所披露基金信息文件。而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 37 条,基金托管人被列入了信息披露义务主体,在发行与存续期间负有披露与基金托管业务相关事项的义务。可见,处于下位法的《指引》与位于上位法的《证券基金投资法》明显存在冲突。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冲突是当前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信息披露制度亟待解决与完善的关键问题之一^[2]。

二是现行法律对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投资者参与决策的规定不完备。例如《指引》规定,金额超过基金净资产 20%且低于基金净资产 50%的基础设施项目购入或出售、金额低于基金净资产 50%的基础设施基金扩募、基础设施基金成立后发生的金额

超过基金净资产 5%且低于基金净资产 20%的关联交易,除基金合同约定解聘外部管理机构的法定情形外,基金管理人解聘外部管理机构等事项应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因投资者比较分散,提案内容征集存在困难,不利于集中做出决策。目前的投票表决形式存在缺陷,投票方式不灵活,容易受到强势投资者的操控和影响。

3. REITs 产品税负过重

针对 REITs 的税收优惠政策是推动基础设施 REITs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与 REITs 市场比较完善的国家相比,目前我国 REITs 整体税负较高,其原因是没有专门针对 REITs 产品的税收制度和优惠政策^[4]。在 REITs 运营与分配阶段缺少税收优惠政策,在基金运营阶段与终止阶段的收益分配容易形成双重征税,导致产品税务成本增加,不利于 REITs 管理者与投资者进行决策^[5]。当前的土地增值税制度没有体现出来对 REITs 的税收支持。根据现有的土地增值税规定,不动产在设立时期的重组和退出阶段的处置都属于土地增值税应税事项,需在转让不动产时按其增值额的 30%—60% 超率累进缴税^[6]。这对于 REITs 产品而言相当于重复征税。

四、我国铁路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完善的法律思考

严格来讲,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的公开发行缺少法律基础,目前发行的产品是通过试点的方式以及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形式巧妙避开了法律障碍^[7]⁴⁵,不能满足基础设施 REITs 的发展需求。在我国公募 REITs 项目由试点进入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应与时俱进、未雨绸缪,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对 REITs 的引导与规制,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

1. 出台适合我国国情的专门法律

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专门立法。在总结目前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对基础设施 REITs 的立法进程,逐步拓宽 REITs 的适用范围,解决现有立法间的冲突。关于基础设施 REITs 的立法可以采取单行法的方式,我国在单行法立法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有许多成功案例,另外 REITs 包含的内容繁杂,所涉部门较多,采用单行法的立法方式不仅可以降低立法成本,也有助于增强实践中的可操作性^[7]⁴⁵。立法内容应涵盖 REITs 的法律形式、监管机制、发行上市、税收政

策等,要与现有金融法规相适应,避免产生冲突。虽然是专门立法,但要依托现有的金融领域法律框架,这种立法方式也是目前国际社会较多采用的方式。新加坡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在原有资产管理或信托业法律法规框架内,对 REITs 进行了单独立法。在 REITs 发展相对较早的澳大利亚和日本,采用的方式为依托现有投资法或信托法,将不动产和基础设施作为新增的投资标的种类,这就实现了在原有法律框架下基础设施 REITs 的合法化^[8]。单行法中的税收政策建议侧重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力求兼顾,避免重复征税造成 REITs 产品税负过重问题。

2. 完善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政策

专门出台相关立法完善现有规定,增强对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具体包括确立原始权益人在发行期间的信息披露义务,强化基金托管人的披露监督职能,增强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份额及决策参与权,优化资产受益分配。

一是在 REITs 专门立法中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目前关于基础设施 REITs 信息披露的制度安排与典型证券投资基金法律规范存在明显差异,在信息披露主体职责、信息披露内容质量、信息披露违规救济等方面的具体内容不足,不能满足基础设施 REITs 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无法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建议明晰信息披露主体职责配置,全面提升信息披露内容质量,健全信息披露违规救济体系^[9]。

二是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完善监管体制。可以就分红比例、资产构成、收入来源、业务限制、投资限制、持有人数量等方面进行具体的规定,从根本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例如,英国、德国、日本和新加坡明确规定了分红比例,要求将 REITs 收入的 90% 分配给股东,否则将无法享受税收优惠,或面临其他处罚。要强化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责任,系统制定基金管理人监管文件,选择与基金管理人自身管理水平相适应的管理规则。要限制利益关联人的权利,在重大权益事项决策时,尤其要关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受到发行人或大股东的侵害^[10]。加强对相关中介机构的监管,保证金融机构在发行 REITs 过程中尽职尽责,合理提示投资风险,及时完成相关信息披露。

3. 出台税收优惠配套措施

目前重复征税导致的税负过重是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亟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激发投资者对基础设施 REITs 产品的投资兴趣。我们可以参考和借鉴国际的通行做法,

给予 REITs 一定的税收优惠。例如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国家规定,按 90% 的比例给投资者分红后,REITs 可以享有税法赋予的税收优惠待遇。美国专门出台《不动产投资信托法》和《税收改革法》给予 REITs 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新加坡《房地产基金指引》和《证券和期货法》给予 REITs 项目公司免征企业所得税,只针对投资者获取的利润征收个人所得税,避免重复征税^{[7]32}。

我国应出台专门针对 REITs 的税收优惠政策,明确相应的税收原则,在 REITs 的设立、运营和退出阶段实施一揽子税收优惠政策。为增强原始权益人参与 REITs 的积极性,可以在运营中只在 REITs 和投资者之间征收一次所得税,避免双重征税,在退出阶段减免其运营阶段的印花税。可以出台一般优惠政策和特定优惠政策。对于分红的企业所得税、买卖底层资产和项目公司股权产生的增值税、增值税附加税等,由股东一次性缴纳所得税即可。针对困难地区、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地区和领域,可以在 REITs 的起步阶段给予更大力度的税收优惠。

结 语

铁路作为国家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动脉。目前铁路行业已形成大量存量资产,后续新增建设投资对资金的需求仍然较大。而铁路行业目前融资渠道较为单一,有限的资金供给难以支撑我国铁路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这种需求与供给的不匹配制约了我国铁路行业的发展。REITs 作为当前我国基础设施领域金融改革的重要手段,为铁路行业融资增添了新手段,为盘活铁路大量存

量资产提供了新途径。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家积极出台支持政策、推进 REITs 项目试点工作的同时,还应进一步推动 REITs 的相关立法工作,不断制定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与监管措施,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积极规避相关风险,助力铁路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

注释

①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公募 REITs 发展白皮书》,2017 年 6 月出版,详见 <https://www.gsm.pku.edu.cn/1.pdf>。

参考文献

-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负责同志就《关于全面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项目常态化发行的通知》答记者问[DB/OL].(2024-7-26)[2024-08-07].https://www.ndrc.gov.cn/xxgk/jd/jd/202407/t20240726_1392007.html.
- [2] 安婧婧,张琳,姚景深.碳中和目标下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研究[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39-47.
- [3] 汪世虎,马瑞乾.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信息披露制度研究[J].证券法苑,2021(1):73-94.
- [4] 洪艳蓉.基础设施 REITs 的法律解构与风险规制[J].证券法苑,2021(1):1-56.
- [5] 徐冬根,邵辉.论公募 REITs 所得税重复征税成因及其消除的制度设想[J].证券法苑,2021(1):248-265.
- [6] 肖晓萍.对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土地增值税收法律的探究[D].上海:上海财经大学,2022:38-47.
- [7] 石红帅.论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实施的法律路径[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23.
- [8] 中信建投证券课题组.基础设施 REITs 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借鉴[J].证券市场导报,2021(1):12-21.
- [9] 姚景深.我国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23:45-54.
- [10] 裴方园.公募 REITs 投资者保护法律问题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2:38.

Legal Conception of Public REITs for Railway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Song Jiping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innovative financing model, infrastructure REITs has the advantages of reducing debt level and revitalizing stock assets. They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railway industry, such as a single financing model, large debt scale, and poor asset liquidity. At present, the pilot work of REITs is advancing steadily under the promotion of policies, but there is no specific legislation on REITs at the legislative level. The adjustment of REITs is mainly based on departmental regulations and normative documents.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situation has problems such as low legislative hierarchy, incomplete investor protection system, and mismatched tax preferential system. While actively attempting public REITs financing for railway infrastructur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actively prevent related legal risks.

Key words: railway infrastructure; REITs; public fund raise

责任编辑:绿 叶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与行动策略

王 凯 马 华

摘 要: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不仅是传承与发扬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乡村发展这一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耦合的关键路径,更是破解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治理难题的内在要求。整体而言,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经历了一个“核心主体重释—基层组织互动—组织体系建构”的良性动态发展过程。然而,在实践中,仍存在整合结构单一、组织力度不强、动员范围有限以及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分散等具体问题。对此,须以实现农村基层组织增能为前提,以促进农村基层组织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为关键,以强化农民主体性为保障,以多元组织参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目标,持续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发展和互促共融。

关键词: 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振兴;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 D267.2;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082-08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亟须将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三农”工作的主体力量置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位置,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这不仅契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责任要求,也是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有力保障。为进一步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近年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农村基层组织的规范性文件。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1],为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振兴厘清了思路和目标。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农村组织建设质量”^[2],同时还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其他类农村基层组织的

统一领导,明确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其他类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3],并重申“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具体要求,为新时代改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提升乡村振兴成效指明了方向和路径。除了在顶层设计上不断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外,各地也纷纷进行了实践层面的积极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明确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的互动逻辑,积极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优势,已经成为破解乡村社会治理难题,提升乡村振兴实效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学界涌现了许多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收稿日期:2024-05-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振兴的创新机制研究”(22&ZD030)。

作者简介:王凯,女,政治学博士,山西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山西太原 030006)。马华,男,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太原 030006)。

设的研究,相关研究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农村基层组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独特优势与作用机制。其一,着眼于农村基层组织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指出农村基层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有研究指出,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农村各类基层组织都应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4];吸纳了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资源的农村基层组织^[5],不仅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6],也是形成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的重要基础^[7]。还有学者着重强调了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驱动作用:一方面,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载体与重要抓手^[8],占据了乡村振兴的主要组织场域^[9],具有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显著优势,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振兴的组织资源^[10];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在整合乡村要素和发挥农民合作功能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11],须将基层党组织建设嵌入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乡村振兴各个领域,重塑基层党组织与乡村社会之间“赋能—承接”的耦合关系^[12]。其二,聚焦原子化的农民个体,强调以农村基层组织重塑农民主体性。农民作为乡村振兴无可争辩的重要主体之一,以组织化的形式激发广大农民的参与积极性是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10]。然而,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部分乡村地区存在主体迷失与缺位、农民参与积极性与主动性难以适应新时代乡村发展要求等问题。对此,有研究指出,应发展各类农村基层组织,使之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从而为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提供相应渠道与途径^[13]。其三,立足乡村治理体系建构,强调农村基层组织是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键平台。相关研究认为,基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体制影响,乡村在面对外部整合机制的急剧变化时,如果缺乏相应的基层组织机制进行自我整合,容易陷入“治理真空”^[14]。鉴于乡村振兴是一项涉及地方政府、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集体性行动,有学者在案例的基础上认为,相较于政府或资本主导的乡村振兴模式,以村集体组织为主导的乡村发展模式更具韧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15]。

既往研究为本文议题的深入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但也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已有研究虽然突出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在推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但缺乏对于农村各类基层组织之间互动关系与协同作用的整体性视角和综合性分析。二是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农村

基层组织之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作用,而鲜少关注其具体实践机制。基于此,本文将立足乡村社会的实践场域,从各类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的互动逻辑出发,具体阐述农村基层组织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进路,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出今后推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的厘新策略。

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的逻辑理路

乡村振兴不仅涉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还包含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农村基层组织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是联系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因此,进一步厘清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的互动逻辑,分析农村基层组织的独特优势,对于破解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难题、创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振兴的实践形式、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构与发展,都至关重要。

1. 历史逻辑:传承与发扬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乡村发展的优良传统

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坚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农村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扎根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广泛团结农民群体进行土地革命,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发展、武装反抗斗争有机结合,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国家先后进行了土地革命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现代化逐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建立起“政社合一”的乡村治理体制,为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制度依据;改革开放以后,为进一步释放社会经济发展活力,党和国家以农民与土地关系改革为发端,逐步建立健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随着“政社合一”的乡村治理体制逐渐演变为“乡政村治”格局,在一段时间内农村基层组织功能有所弱化,但总体上仍保持着对乡村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进入新时代,面对日益凸显的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涉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等乡村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

强调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最终要靠农村基层党组织来落实,要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其他农村基层组织的独特优势。纵观百年来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实践历程,可以发现农村基层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因此,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振兴不仅是对我国乡村事业发展宝贵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这种优良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只有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独特优势发挥好,才能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2. 理论逻辑: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

探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不应忽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之间内在耦合的双向互动逻辑,二者是一种互融共促、互为支撑的关系。实质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既是基层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保持良性互动结构性关系的耦合调适过程^[16],也是农村基层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最后一公里”中扮演着农业发展推动者、农村建设落实者、农民利益代表者等多重角色,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和结构主体;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提升农村基层组织能力以及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提供了全新的时代背景和战略面向。相较于脱贫攻坚时期国家“统包式”的资金政策支持,实现乡村振兴更加强调地方政府自主性、村庄内生性和农民主体性,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对于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而言,这不仅是一场工作难度、强度极高的考验,也是一次锻炼本领的宝贵机会。因此,新时代充分发挥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的独特优势,不仅是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耦合的关键路径。

3. 现实逻辑:破解新时期乡村社会治理难题的内在要求

理论上的清醒源于对现实的正确判断与认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是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传统乡土社会相比,当前的乡村社会无论是从宏观结构形态还是从微观的个体逻辑来看,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面临着日趋严峻的困境与挑战。一

是公共价值“失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市场化发展,乡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在资本的裹挟下被不断异化,少数农民在价值追求和行动选择上也展现出更强的逐利属性,一些乡村地区面临邻里关系淡漠、社会交往缺失和情感纽带断裂等价值困境,渐趋弱化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互助协作意识严重影响乡村社会公共空间道德价值再生产、社会秩序维护等功能实现。二是权力结构失衡。自新农村建设以来,国家在向乡村社会输入大量资源的同时,乡村社会面临的治理事务也日益复杂繁多,既有自上而下的防火防汛、社保收缴、党建宣传等行政性事务,也有自下而上的农业生产、纠纷调节、文化活动等自治性事务,呈现出多元化、密集化、规范化等特点^[17]。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还是村社自治组织,都常忙于处理上级政府交付的“千头万绪”的治理事务,而难以有暇倾听和反馈基层群众的合理诉求,极大影响党群、干群关系以及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三是自治空间萎缩。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和社会保障市场经济推动人口高频、规模化流动。随着乡村中青年群体的“向城而工”“向城而居”,时空阻隔不可避免地导致外出务工和进城定居的村民与乡村自治空间不同程度的“脱嵌”。虽然日益普及的信息技术打破了物理空间对基层社会自治空间场域的限制和束缚,民众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App等数字化治理平台实现网络空间的“共同在场”,但民众尤其是村民自治素养与数字参与能力的相对不足亦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自身的治理自主性,“虚置”了自治权利^[18]。要摆脱上述治理困境,亟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能动作用。

二、从嵌入到协同:乡村振兴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逻辑

在基础薄弱、资源有限、优势不足的地区推进乡村振兴,其关键在于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形成组织合力,重塑乡村发展的内外部秩序,从而实现各类资源要素的联通共享。

1. 核心主体重释: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归位与增能

随着生产要素的日益集中,原本分散的农民逐渐走向组织化,乡村社会各类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等相继涌现。然而,受基层年轻干部队伍“断层”、基

层党员干部观念陈旧、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缺乏创新、农村宗族势力、市场化与多元化变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基层党组织出现“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严重影响基层党组织的力量整合。农村各种基层组织分立、自立的组织形态导致乡村经济社会纵向和横向资源承接的梗阻,制约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和持续推进。基层党组织核心主体重塑是实现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还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都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了党组织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基层党组织具备独特的组织优势,能够全面协调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的资源并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利于消弭乡村二元权力结构所产生的张力,畅通各类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联络渠道,形成乡村建设的合力,从而有效推动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首先,确立党组织核心领导地位是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的关键。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党组织以嵌入的方式搭建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有效动员,基层党组织建设始终是整合“离散的农民社会”^[19]的重要手段。确保党在乡村治理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内在要求。其次,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建设,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能力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保证。一方面,作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沿阵地,基层党组织要以引领乡村振兴为主要任务,增强自身的政治和组织能力建设,织密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把党的组织体系延伸到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等建设各环节、全过程,凝聚社会各方力量,锚定乡村发展的共同目标;另一方面,重视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赋能基层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模范带头作用。

2. 基层组织互动:多元整合协同推进乡村发展

乡村社会中的各类基层组织承担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功能,是推动乡村振兴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然而,在实践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以下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不同的农村基层组织分散地承担各自不同的功能,在宏观层面缺乏统一协调,存在功能重叠、重复以及效率不高等问题;二是各个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缺乏必要、稳定的沟通与协作机制,容易产生组织间张力和摩擦。面对流动性、异质性不断增强的社会现状,亟须以党的基层

组织为领导核心,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其他类农村基层组织如村民自治组织、村集体组织、乡贤理事会等组织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多元主体的力量整合和协同治理,为乡村振兴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提供有效支撑。其中,组织嵌入是基础,主体协同是关键。

第一,以产业振兴为目标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双向互动和赋能。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将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换为经济价值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总思路。面对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处于集体产权虚置甚至村集体经济组织“空转”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因地制宜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领导和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2]《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亦强调:“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村‘两委’班子成员应当交叉任职。”^[20]在党和国家政策文件指导下,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有效配置和优化组合自然、人力、技术、政治等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运行逻辑上来看,村党支部领办型合作社能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与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制度优势,以解决农户经营的公共性难题,并能通过再造集体加速农民的组织化进程^[21]。从组织再造角度来看,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一种“政经合一”的集体经济合作社,村党支部在激活乡村治理的同时还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化^[22];而且,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行动过程本身,有利于激发基层党员干部参与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意识,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激活基层党建活力^[23]。从治理效能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将自身的政治功能与村集体经济的经济功能相结合,有利于在整合乡村公共资源及集体资产的基础上调动广大农民的合作积极性,促进农民组织化,保障村集体权益;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统筹协调、引领经济发展等能力的不断增强,亦会反向激发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政党嵌入、多元参与、治理优化等组织间协同合作的认同,进而实现以组织间协同模式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的治理愿景^[24]。

第二,在坚持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统领其他类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基础上,发挥组织聚力的优势,让“人”这一最关键、最核心的要素发挥作用,为乡

乡村振兴“夯基赋能”,实现乡村人才振兴。人才作为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不仅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25]。目前,乡村人才振兴面临双重挑战:一是本地人才流失严重;二是乡村现有条件难以对外部人才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在当前农村人口向城市单向流动的背景下,须建立农村基层组织互动合作机制,拓宽外地人才引进和本地人才培养的双向渠道。首先,在联学、联建、联动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员“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着力推动基层党员干部深化、内化、转化党的创新理论的素养和能力,保证党和国家关于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的决策部署在基层能够“落地”。其次,以党的组织优势开辟各类农村基层组织的交互空间,创造人才流通的渠道。通过平台建设,促进相关人才信息在各个组织间互通有无,如发挥乡贤理事会的组织作用,拓宽人才引进的渠道。再次,要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涉农组织的优势,利用各类培训资源,针对其经营管理和技术需求开展精准培训,以点带面提升基层组织人才能力素质。最后,要重视组织协同效应,鼓励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佼佼者、领头人发挥“头雁”带动“群雁”的领航作用,优化农村人才发展的整体社会环境,树立重才爱才的良好氛围。

第三,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根和魂,乡村文化能够重塑乡村社会的伦理关系与价值认同,是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形成向心力的动力源泉。而有力的基层组织建设亦能激发农民的主体性与主体意识,促进基层群众主动融入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实践中,农民文化自信、文化认同的培育以及乡村文化的振兴都离不开有效的组织共生,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委员会、乡贤理事会等乡村社会多元组织整合在一起,形成共生单元的协同合作模式,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和共同体认同^[26]。要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价值取向,构建国家认同的“公共文化”与乡村内生文化的有效融合及互动共生^[27],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引领起最重要的作用,是保证乡村文化建设“不跑偏”“不走调”的关键力量。

第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生态振兴的耦合。乡村社区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其生态环境保护与包括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合作组织、乡贤理事会等组织在内的自组织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乡村生态振兴既是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更是提升农民生态福祉、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保障。无论是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共识,还是发展绿色生态经济产业链,抑或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都需要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嵌入乡村生态治理系统,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实现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和责任共担。在实践中,要扭转生态治理长期以地方政府为单一主体、农民参与积极性较低的被动局面,不仅要在低碳零碳技术上有所突破,还要建立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模式,形成良性互动的组织间合作机制和合作秩序^[28]。

3. 组织体系建构: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体系建构是实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保障。乡村治理既是农村基层组织功能发挥的主要场域,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尽管乡村治理的质量和水平与农村基层组织功能作用的发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9],但还须认识到,农村基层组织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实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农村基层组织治理体系,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至关重要。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面临深刻的变革与重组,不少农村地区村庄空心化、农户空巢化、农民老龄化、治理形式化等问题加剧。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成为重构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举措和必要路径。一是不断强化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能够充分调动党员、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随着治理单元的逐步下沉,建立“村(社区)党委(总支)—村(居)民小组党支部—党员(网格员)联系户”的网格党组织体系,将党小组设立在村民小组、自然村、网格片区等更小的微治理单元上,有利于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和其他类农村基层组织的独特优势。二是鼓励和支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广泛的社会参与渠道,有利于深入推进基层民主建设,重塑农民的社会公共生活,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乡村社会公共生活准则,强化乡村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只有充分尊重治理空间场域内民众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才能使乡村社会的发展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三是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创造了农村各类基层组织融入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途径和契机,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

乡村社会治理格局。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注重村(社)自治组织功能的提升以及各类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培育与扶植,如老年协会、志愿者协会、乡村艺术团等,形成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社)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为两翼,以各种内生性组织网络为补充的复合型乡村组织体系^[30]。这对于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确保乡村振兴机制融通与活力延续的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在“核心主体重释—基层组织互动—组织体系建构”的实践逻辑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既要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角色与功能,也要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农村基层组织嵌入机制,同时还需要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而这些都离不开各类农村基层组织功能作用的协同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引领、整合、组织与动员四种力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推动了乡村社会的渐进发展。但从整体性视角看,农村基层组织仍然存在组织结构单一、引领力不足,组织能力不强、辐射面有限,组织功能分散、组织间协同水平不高等现实问题。因此,当前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聚焦农村基层组织能力提升,以增能农村基层组织为前提、以促进农村基层组织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为关键、以强化农民主体性为保障、以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厚植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三、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推进乡村振兴的行动策略

乡村振兴的复杂性、整体性、广泛性决定了必须不断完善农村基层组织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提升组织间合作能力,以“合作型”乡村组织关系导向推动政策溢出绩效产出。

1. 引领维度:增能农村基层组织

核心主体重释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起始环节,也是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这一环节实现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两个引领”作用,即基层党组织对其他农村基层组织的方向性、战略性引领和农村基层组织对农民群体的公共生活引领。具言之,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建强乡村振兴“主心骨”。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发挥基层党组织优势,因地制宜

地创新和拓展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实现路径,如通过法定程序实现党组织书记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推进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从体制机制上确保村党组织对农村各个组织和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二是牢固树立“支部建在产业上,党建开拓富民路”的发展理念,进一步增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意识。为此,既要形成一体化从严管理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管理模式,组建合乎党员、群众心意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打造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坚强堡垒,也要建立健全村组干部保障激励机制,充分激发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还要加强乡村干部的常态化专业素养培训,将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纳入基层党组织全年培训计划,切实提高农村党员干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服务群众的本领。三是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体系架构,提升各类基层组织在乡村社会不同领域的引领力。为实现农村基层组织在乡村经济发展、社会服务、文化繁荣、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导向与带动作用,需要明确界定农村不同基层组织职责范围和任务内容,畅通组织内部、组织间的沟通和合作渠道,实现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和选拔具有创新和实践素养的、来自不同领域的组织领导者 and 骨干。

2. 组织维度:促进农村基层组织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

农村基层组织通过对乡村振兴的全方位嵌入以及基层组织的内外互动,实现了组织内在优势与乡村振兴多维需求的对接,从而统合了乡村振兴的发展合力。要从内生层面解决后乡土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的组织断裂、文化断裂、精英断裂等发展困境^[31],则亟须从组织维度促进农村基层组织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一是将各类农村基层组织嵌入推动乡村发展的产业链、文化链、人才链等各个环节,实现乡村组织振兴。以村集体经济为代表的农村基层组织通过强化自身在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价值拓展等产业链上的作用,融入并引领产业链发展,促进农业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价值链延伸;农村基层组织还应成为文化链的重要节点,保护与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而且,涉及农业农村农民不同方面的各类农村基层组织是人才施展本领的最佳平台,发挥好组织的平台效应,对于吸引并留住各类优秀人才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创新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方

式,综合运用多种治理方式,提升各类基层组织的组织能力。例如,数字技术拓宽了乡村治理的时空场域,为各类农村基层组织力量得以高效汇集与协同创造了新的契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着力点,以乡风民俗为抓手,以评促学、以学促建,开展多样化的文娱评比、巡演、理论宣讲等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不仅能够丰富乡村的公共文化生活,提升民众的精神志趣,还有助于培育农民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和乡村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激发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还要善于依托乡镇特色资源和产业,积极开辟内外部合作新模式,既能够承接、落实上级政府或外部企业对乡村的“反哺”资源,还能够通过内部完善的协作、沟通机制实现对各种资源的公正分配、合理利用。

3. 动员维度:强化农民主体性

增强自身动员力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必修课,其形成主要依赖群众认同、组织建设和使命号召。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实践中,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始终是保障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同样需要重视以群众认同为导向、以使命号召为指向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建设,正确把握绩效认同、价值认同和理论认同在乡村动员中的作用。从动员主体来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各类农村基层组织具有各自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权责范围,分工明确,差异共存,应保障它们在各自领域内具有充分的发言权和相对的独立性,并通过开展学习教育、规范组织生活、严肃组织纪律等方式,夯实各类农村基层组织的主体责任,强化身处不同组织中的基层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使之成为动员人民群众的榜样模范力量。从动员客体来看,农民作为乡村社会的主体力量,是农村基层组织动员的核心对象,在动员中,须通过强化“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其能动性。提升村一级的动员力,其关键在于发挥各类基层组织工作的灵活性与主动性,积极引入新型农民主体,通过在联系群众中采用理论动员、情感动员或物质激励动员等差异化的动员方式^[32],提高农村基层组织联系群众的紧密性、规范性和广泛性。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和农业农村的发展,应以更宽泛的、面向未来的视角重新审视“农民”这一概念,把愿意在乡村生活和创业的青年学子、热衷于乡村事业的各界社会人士、返乡回流人才、依靠村庄内部资源获得收入的本土农民等,都纳

入“新农人”的范畴,以组织吸纳的方式支持其以组织成员的身份在农村干事创业,为其提供相应的农村公共事务参与权利,使之成为农村特色小镇、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引智易俗的生力军。从动员介体来看,物质基础、制度保障、技术牵引等中介要素是实现动员主体与客体有效衔接的关键。因此,农村基层组织要充分依托地方性知识和现代化技术,搭建不同组织与群众之间多种形式的协商交流平台,畅通和丰富人民群众合理表达诉求和意见的渠道,激发农民的自我身份认同及其参与乡村振兴的主动性、积极性。

结 语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致力于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为顺应农民群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对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的有力回应,并在当前取得了较大成就。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建设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如何更好地把农村基层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通过合理嵌入的方式转化为乡村社会的发展动能,实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振兴的互促共融,对广大乡村地区实现全域、全员以及全方位振兴具有关键性作用。未来,还须在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方面,持续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为推进乡村振兴事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9.
- [2]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EB/OL]. (2019-01-10) [2024-05-10].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1/10/content_5356764.htm.
-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党建,2022(11):4-28.
- [4] 王文彬.自觉、规则与文化: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J].社会主义研究,2019(1):118-125.
- [5] 庄天慧,孙锦杨,杨浩.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及有机衔接路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12):113-117.
- [6] 张军.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J].中国农村经济,2018(1):2-10.
- [7] 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4):637-650.

- [8] 丁志刚,王杰.中国乡村治理70年: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J].中国农村观察,2019(4):18-34.
- [9] 温铁军,罗士轩,董筱丹,等.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的创新[J].中国软科学,2018(12):1-7.
- [10] 贺雪峰.乡村振兴与农村集体经济[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85-192.
- [11] 吴重庆,陈奕山.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民合作路径探索[J].山东社会科学,2018(5):19-27.
- [12] 刘双,余智勃.耦合视角下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共治的逻辑、张力和路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31-138.
- [13] 袁金辉,乔彦斌.自治到共治:中国乡村治理改革40年回顾与展望[J].行政论坛,2018(6):19-25.
- [14] 徐勇.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湖北省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J].河南社会科学,2006(5):8-11.
- [15] 唐任伍,郭文娟.乡村振兴演进韧性及其内在治理逻辑[J].改革,2018(8):64-72.
- [16] 吴高辉,汪文新.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与理论构建[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2):66-75.
- [17] 韩玉祥,石伟.村组共治: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选择[J].理论月刊,2022(12):44-54.
- [18] 陈桂生,吴合庆.数字赋能乡村空间治理: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解释[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140-149.
- [19] 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J].学术月刊,2007(8):13-20.
- [20]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EB/OL].(2019-09-01)[2024-05-10].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9/01/content_5426319.htm.
- [21] 张欢.新时代提升农民组织化路径:烟台再造集体例证[J].重庆社会科学,2020(6):38-50.
- [22] 陈义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社再组织化:以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例[J].求实,2020(6):68-81.
- [23] 陈义媛.以村集体经济发展激活基层党建:基于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案例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07-117.
- [24] 彭茜.双向激活:农村基层党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的互动逻辑:以山东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例[J].安徽乡村振兴研究,2022(4):37-47.
- [25] 易法敏,王修梅.数字时代农民工的城乡迁移[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32-44.
- [26] 王振杰.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的耦合:基于文化共生视角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59-67.
- [27] 漾正冈布,王振杰.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逻辑: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20-29.
- [28] 李华胤,王燕.“双碳”目标下乡村生态合作治理的机制与逻辑[J].现代经济探讨,2023(5):119-126.
- [29] 张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逻辑机理、价值表征和实践进路[J].云南社会科学,2020(2):17-21.
- [30] 文军,刘雨航.迈向新内生时代: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困境及其应对[J].贵州社会科学,2022(5):142-149.
- [31] 季乃礼,许晓.村级党建、社会整合与乡村振兴[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3):192-198.
- [32] 邓万春,黄璐璐.乡村振兴的动员机制与模式:整体党委动员与差别化动员[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38-48.

The Logical Path and Action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Wang Kai Ma Hu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reas is a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It is not only about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 of promoting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reas, but also a key path to achieve deep coupling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rea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also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solving the difficult problems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Overall,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a virtuous dynamic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e-interpretation of core subjects, interaction among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systems”. However, in practice, there are still specific problems such as a single integration structure, weak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limited mobilization scope, and dispersed functions of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this regard,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and mutual promo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we should take the empowerment of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s the premise,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the key, strengthen the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as the guarantee,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diverse organizations as the goal.

Key words: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翊明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

刘 辉

摘要:农村文化建设成效关系到乡村振兴、文化强国等战略目标的具体实现。优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关键。当前,农村公共文化绩效评估以效率导向、测量导向、专业化导向及问责导向为实践逻辑,存在产出与成果混淆、内容评估不足、专家话语依赖、评估成本高以及激励无效困境等问题。因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须在遵循评估目标的国家战略导向、绩效识别的内容导向、评估模式的公众导向以及评估结果运用的调适导向等基础上,不断进行路径优化。

关键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文化治理;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D422.6;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090-09

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既是实现乡村居民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更是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专列“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篇,并明确指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载体,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2021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完善乡村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网络和服务运行机制,鼓励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民群众性文化体育、节日民俗等活动”,“拓展乡村文化服务渠道,提供便利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要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机制”。在上述背景下,全面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基本形成,“96.8%的乡镇有图书馆、文化站,11.9%的乡镇有剧场、影剧院,41.3%的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全国农家书屋超过58.7万个,向广大农村地区配送图书超过11亿册^[1]。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优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强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统计公告制度,加强绩效考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有公众参与的公共文化设施使用效能考核评价制度。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及财政部下发的《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指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要“重点做好政治导向和服务绩效等方面的评

收稿日期:2024-06-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传统文化传承协同发展研究”(18BZZ107)。

作者简介:刘辉,男,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河南大学地方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开封475004)。

估”,要求“全面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发挥财政资金的最大效益”。2023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工程工作方案》强调,文体服务保障领域要“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评估标准体系”。概言之,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领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不仅是“落实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责任、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一个有效工具”,同时也是“公众表达利益和参与文化管理的重要途径和方法”^[2],直接关系到国家乡村振兴、文化强国等战略目标的具体实现。

目前,学术界围绕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所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义、主体、指标及方法等方面。具体而言,一是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意义的研究。相关研究从财政效率等方面肯定了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价值,指出不同评估对象的绩效存在差异^[3]。二是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主体的研究。相关研究普遍认为,要“构建包括政府机构、专家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在内的多元化评估主体”^[4],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以确保绩效评估的公正与客观,增强绩效评估结果的信服力^[5]。三是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指标的研究。相关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须从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设计绩效评估指标,并指出,投入指标包括财政投入、物力投入、人力投入等,产出指标包括文化设施人均拥有数量、公共文化活动策划次数以及图书馆流通人次等^[6]。此外,还有研究强调,公众满意度是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重要指标,应“突出需求导向、强化外部评价”,如此,才能保障居民文化权利实现,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问题^[7]。四是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方法的研究。相关研究强调,公共文化服务要以定量分析为主,可运用平衡计分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以及顾客满意度评价方法等进行评估。

上述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然而,已有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研究主要从“技术”角度切入,强调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意义、主体、指标和方法,缺乏基于国家战略考察的“治理”视角。二是与中央和地方政府持续加大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相比,学界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伴随着乡村振兴、文化强国等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国家在农村公共文化领域的投入还将持续增加。在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的新发展阶段,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

评估的重要性也将进一步凸显。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实践逻辑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重要性在于确保服务的质量,提升服务效能,并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当前,各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频次等虽有差异,但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中呈现着共同的实践逻辑。

1. 效率导向:基于“投入—产出”的价值考量

效率概念源于经济学,讲求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关系,以低投入、高产出为目标,具有明显的速度、经济的数量特征,力求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提供具有一定标准的产品或服务。效率包括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两种不同类型,前者是指生产和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平均成本^[8]³⁻⁵,后者是指“组织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满足利害关系人的不同偏好”^[8]³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效率导向强调对结果的评估,即在既定时间内,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到底形成了哪些产出,以及这些产出能否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

在实践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效率导向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在考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情况时,需将投入的资源与具体产出联系起来考量,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和制定相应的投入和产出指标。其中,投入指标主要是指资金投入指标,如:文化事业费及相关地方财政投入量,其他投入指标主要是指从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人员数量、机构数量等。产出指标主要包括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每万人占有的数量及面积、文化活动开展次数以及农家书屋每万人拥有的藏书量等。目前,相关研究基于“投入—产出”的考量,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进行绩效评估后所得出的结论均不乐观,如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仍处于负增长”^[9],财政资金“未得到有效使用,存在资源浪费的情况”^[10]等。其二,在考察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实际的产出效果时,以农民满意度为衡量标准,即通过衡量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和产出是否满意,评价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11]。具体而言,一是将农民满意度作为主要指标纳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产出指标范畴,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具体数据,进行评估。二是从满意度出发,通过实证调研,收集某一区域内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投

人和产出的满意度数据,进行评估。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实践中多将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与资源、公共文化服务人力资源、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及公共文化服务群众满意度等作为评价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的主要指标。相关评估得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供需脱节的结论。

毫无疑问,以效率为导向进行评估指标设定,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一个重要选择。通过考察一段时期内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与产出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质量及成效。但需要指出的是,效率并不是绩效评估的唯一价值,尤其是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对效率的过度或唯一追逐极易消解公平、民主、参与等其他重要价值。

2. 测量导向:基于量化的绩效识别

绩效测量是将预期目标量化并对其完成情况进行监测和报告的过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测量导向是指将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操作化为一系列可量化的指标,通过数据(值)反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情况。正是基于数据的客观性,测量导向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效率导向的重要支点。数据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最直观的呈现形式,相关指标一般涉及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及其活动的数量、完成率等,如“有线电视入户率、互联网入户率、村庄体育馆数量、老年人活动室数量、书报阅览室数量、自办文化设施数量、农村公益文化活动举办次数”^[12]等;在以县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作为评估对象考察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时,可量化的“图书馆借阅证数量、图书馆流通人次、讲座/展览/文化活动举办次数”^[13]成为识别上述机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的主要依据。同时,“地理空间可及性、时间充裕性、经济可及性”^[14]等基于既有理论的可操作化指标亦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重要测量维度,且这些测量维度还被进一步操作化为可量化的二级、三级指标。具体而言,地理空间可及性是指测量农民距离县城、乡镇及村庄公共文化场所的路程;时间充裕性是指测量农民投入在公共文化活动上的时长;经济可及性是指测量农民愿意花费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月均支出费用。通过上述可测量指标,可了解和把握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和利用情况。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收集各类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数据是基层文化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和难点工作,特别是在面对不同口径的评估要求时,不少基层文化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往往陷入“如何生产相关评估数据”的困惑。基层文化工作者反映,评估面向可测量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事项,虽然使基层文化机构的工作内容和目标变得更清晰,但也常常使其面临将主要精力被迫用于数据收集乃至“生产”的窘境。

测量导向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内容可量化为前提。在实践中,为了确保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一些重要但较难以测量的绩效评估目标往往会在评估中被有意或无意地放弃或忽视。在国家着力推进乡村振兴和文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是否继续将测量导向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主要指向,值得深思。

3. 专业化导向:评估组织与评估方法的选择

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政府正在逐渐转变以往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行为模式,不断寻求与市场或社会力量的合作。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中,各级政府(包括各级文化管理部门)或为表明自身的“科学态度”,或为实现绩效评估过程的透明化,或为提高绩效评估结果的可信度,积极寻找第三方评估机构等作为评估主体参与绩效评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专业化导向是指选用第三方评估机构等专业化力量,设计绩效评估指标,使用专业的绩效评估方法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进行绩效评估,并最终形成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清晰且专业化的评估报告。在实践中,各级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将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任务交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例如,2015年,长沙市在农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考核中引入社会评价机制,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测评公众满意度^[15];银川市自2018年6月至2019年3月,委托银川方达电子工程系统有限公司对全市图书馆、文化馆、乡镇文化站、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进行服务效能考核评估,此次考核评估涉及28个乡镇文化站、30个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95个农家书屋,每月现场评估达126次,在整个绩效评估期间,实地评估达1134次^[16]。

绩效评估专业化导向主要体现在评估组织的选取和评估方法的使用上。首先,具备专职性、专业性以及独立性等特点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是政府开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不二之选。一方面,专业型评估组织在“需求类型、需求特征以及需求缓急”等多个方面具备专业评估能力,可以凭借自身专业优势更为顺利地开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17];另一方面,第三方评估的主要特点是“评价

活动由与政府部门无隶属关系和利益关系的第三方主持和组织实施,评价的标准或内容也主要由主持方拟定”^[18],能“避免仅由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自身评定”^[19]所造成的局限。其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专业化导向还表现在评估方法的选用上。目前的评估方法多以定量分析为主,如主成分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这些绩效评估方法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或知识门槛,涉及多种方法和工具的应用,且每种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和操作步骤,并非任何组织或个人都能直接、有效地参与其中。“农民”或“农民文化组织”等对这些“高级的”专业方法所得出的评估结果很难具有发言权,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上述专业力量和专业方法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进行绩效评估的“工具人”。

4. 问责导向:压实责任的制度设计

问责制作为一种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责任追究制度”^[20],主要关注的是相关行政人员的过错或过失。相较而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问责导向则是基于绩效的绩效问责。所谓绩效问责是指在考察政府绩效水平的基础上启动问责程序的一种行政问责形式,体现了社会对政府绩效水平的一种基本期待以及政府对其行为效果所承担的责任”^[21]。绩效问责倾向于关注职能部门及其行政人员的成就和贡献,同时对未达到应有绩效水平的组织或人员进行追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问责导向主要是指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结果与相关干部政绩考核联系在一起,进行“奖优罚劣”(着重奖优)的过程。有学者认为建立这种基于奖惩的激励机制能够督促服务供给者的行动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目标等保持一致,“不奖励成功,就可能是在鼓励失败,鼓励失败的结果是产生荒谬的刺激,导致组织绩效每况愈下”^[22]。

这种将考核结果与奖惩挂钩的绩效评估问责导向具有激励与约束、引导与示范、竞争与发展等多方面的作用,是现代政府管理的重要方式。例如,2015年,广东省中山市较早地实施了“双纳入”“双考核”的绩效评价,即将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纳入镇和村(社区)“两委”的考核当中,以绩效考核评估提升服务水平与效能^[23]。同年,浙江省萧山区推出的《乡镇(街道)公共文化服务评估规范》为基层文化工作方向设定了“指南”,并将其作为一把可测量的“标尺”评估乡镇文化工作的好坏^[24]。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问责导向通过对

乡镇“文化基础设施投入、文化活动开展情况、乡风文明程度、群众文化满意率”等方面的评估,将评估结果纳入乡镇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年度绩效考核,对文化建设严重滞后、群众满意率低的乡镇实行“一票否决”。其目的在于督促各级各部门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管理者切实承担工作责任,保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的积极性,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然而,是否只有通过基于专业化测量呈现的效率指标,才能让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管理者真正负起责任?那些简化为标准化、可测量的文化实践,是否能真正调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的积极性?当文化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集中于可量化的、数据性指标任务的完成时,他们是否还有动力和能力去直接回应公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是服务于乡村振兴、文化强国等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还是致力于文化管理部门或各级政府即时目标的完成,抑或是仅限于可测量、能问责等工作考核的需要?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实践逻辑存在的问题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具有指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路向的重要作用,既引导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投入,也影响着相关主体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正是在此意义上,需要对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实践逻辑存在的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

1. 产出与成果混淆

“产出表示的是一个项目的实际操作过程的表现及其阶段性成果,而成果是项目最终产生的结果或者效果”^[25]³⁹,成果是各种产出的真实影响,如社会效应、长远影响、服务质量。产出背后蕴含的是效率逻辑,常用来呈现一段时间内政府的资金投入所获得的产品或服务的状况。例如,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中广为使用的基础设施面积或数量、举办文化活动的次数、人均拥有的书籍册数等指标,均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一种产出形式,这些产出并不直接构成收益,但并不意味着这些产出没有必要,因为其直接影响未来的效果值或期望值。

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过程中,常出现产出与成果混淆的情况,即在成果评估或效能评估

时,依旧依赖易于操作和量化的“产出型”指标,并因此导致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得出的结论不能充分反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真实问题以及产生的实际效应。产出与成果的混淆使当前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仍处于基于投入和产出的数字计算层面,这种效率导向强调资源投入与明确的、可量化的绩效目标相挂钩,且多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运作模式。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即如果把对效率的关注看得过于重要的话,那么人民主权的开放性就很可能遭到损害^[26]⁹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过程中存在的产出与成果混淆的问题常引发对公共价值的挤出效应,削弱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在塑造乡村社会公共价值方面的独特作用和重要性。

2. 内容评估不足

文化必须通过特定的载体得以实现,如图书馆、文化广场等是文化的物质载体,戏曲、电影、文艺会演等是文化的非物质载体^[27]。针对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广场、广播电视村村通等文化的物质载体,设立可测量的评估指标(如数量、占地面积、人均持有量),可量化的产出均显现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然而,“容易测量的元素极少是最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它们有时完全不重要”^[28]²³,而那些难以用定量方式衡量的内容却常被忽视。内容决定效果,内容选择是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前提,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进行绩效评估才是重中之重,但现实往往不是这样。过度强调量化,会使人聚焦于可测量的投入而非实际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以及实现了什么样的结果,长此以往,就会使人忽视那些具有长远价值和潜在益处的项目^[27]。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兼具战略目标、现实要求和即时任务等多重使命的前提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如果只测量简单易测的项目,那么被评估部门为了部门绩效的现实利益,就会将主要精力用于获得“好看”的数据抑或是“令人满意”的满意度,而涉及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质量、效能水平等隐性、难以量化的问题,就极易被选择性地忽视,至于对农民参与意识培养、农村文化队伍建设、乡村秩序构建等内在主体建设和内在价值塑造的关注,更是无从谈起。因此,一旦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评估不足或缺位,就会直接影响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生产和内容质量,使其陷入“重形式,少内容;重数量,轻质量;重供给,轻需求”的发展误区。

3. 专家话语依赖及评估成本高

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自身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进行绩效评估,则往往会存在内部“有心无力”、外部合理性不足等困境。因此,第三方评估机构凭借其专业化、独立性等优势逐渐进入政府的视野。基于专家话语的评估意见日益被奉为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必要依据。对专家话语的依赖反映了文化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把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仅视为“技术”性活动的认识倾向,也使那些非专家话语表达的意见因此受到“屏蔽”或无视。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对第三方评估机构以及专家话语的过度依赖,会“对冲”自身以往在鼓励公众意见表达、行动参与等方面的努力,也使公共文化服务实际执行主体陷入“失语”的尴尬境地。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对象的基层民众面对需要迈过专业门槛才有话语权的绩效评估事项,亦常常表现得茫然、不知所措,即便他们在评估的话语体系中被中心化,也都会感到隔膜。

此外,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中,由第三方评估机构所产生的高评估成本也不容忽视。这种高评估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显性成本表现为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任务交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完成所构成的财政支出。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政府为保证第三方评估机构顺利开展评估工作,背后所付出的隐性成本不容忽视,如花费在第三方评估机构招标、资格甄选方面的成本,当然此类成本大部分是可以预见和测算的,但还有一些隐性成本则并非如此。其中,最大的隐性成本是由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城市化”而导致其在深入农村开展评估时不得不付出的各种大量、不可避免的努力。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基于城市话语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缺乏对农村地区“风土人情”的了解,并因此导致其在农村开展评估时无法“落地”。在此情况下,上级政府转而更频繁地要求县、乡(镇)等基层政府和公共文化机构收集更多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数据,以配合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工作,与之相伴随的是,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持续不断地投入到数据的收集、组合和呈现中。在实践中,为配合上级政府或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绩效评估,乡(镇)、村等基层工作人员的时间被各种迎检评检任务所分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日常工作的开展。但“千篇一律”的评估指标以及由“加工式”的数据所形成的评估结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真实面

貌,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未来引导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动因,是值得存疑的。结合上述分析,不难判断,基于效率导向的隐性成本极易变为“沉没成本”。

4. 激励无效困境

现有研究多倡导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结果纳入县、乡(镇)等基层政府的工作考核,以期提升基层政府和工作人员开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为激发基层文化治理主体的积极性,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以奖代补”“奖优罚劣”“一票否决”等激励机制应运而生,然而,在实践中,这些激励机制作用的发挥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甚至产生激励无效的困境。

一是利益相关者的负面心理影响评估进程以及评估结果。由于乡(镇)、村等基层工作人员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要求、目的等缺乏正确、清晰的认识,容易产生怀疑、厌烦、回避及旁观等一系列负面态度。当利益相关者持“上边下来检查”的看法时,往往会担心评估会对自身不利,也会怀疑评估过程的客观与公正,还会担忧评估会影响自身(及所在组织)的名誉、在领导心中的印象、个人晋升以及经费划拨等。这种心理常常导致相关人员对评估采取旁观态度,形式上积极参与,实际上消极应对,使评估流于形式。二是用指标的方式落实绩效问责的工作方法具有误导性。问责的本意是人应当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但在实践中绩效问责逐渐演变为一种经由“标准化的测量”来检验成功与否的方法,并因此要求任何东西都要能被测算,因为测量成了奖惩的标准,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因完成可测量的任务而获得奖励,自然就会减少对那些无法测量任务的努力。这就使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上的责任问题被简化了,即其关注的重心成为追求效率和达到上级政府设定的“标准线”。正如新公共服务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对效率和结果的测量很重要,但是它们却不能涉及或包含我们要求公共行政官员的行为要负责、合乎道德并且符合民主原则和公共利益的期望”^[25]⁹⁷。如果“参与者对结果几乎没有控制力,测量结果就等于奖励运气。这意味着,人们会因为与其努力不相干的结果而受到奖励或惩罚。受到惩罚的人会正当地认为他们遭到了不公平对待”^[26]¹⁶⁷。三是评估指标不能真实反映实际绩效。如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指标测量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真正要测量东

西的合理替代指标,那么这种评估结果将有助于帮助个人或组织评估自身的绩效。然而,在实践中,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由于其目标的复杂性以及受到绩效评估方法、绩效评估指标等因素的限制,导致最后得出的评估数据本身难免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即在放大一些农村地区在硬件方面的需求的同时,遮蔽了广大农村地区在文化资源方面的优势,而且用指标的一致性替代了具有不同文化资源禀赋地区的农村及一线文化工作者的在地化努力。

三、优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路径分析

切实推进乡村振兴、文化强国等战略目标实现,须正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实践逻辑中存在的问题,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从目标设定等方面,持续优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

1. 目标设定:从效率导向到国家战略导向

目标是组织期望其未来能达到的一种状态。“如果一个组织没有明确的目标,该组织便不会取得高绩效。”^[29]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就是衡量服务结果是否达到设定目标的活动。进而言之,确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目标首先要明确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所要实现的国家战略要求。一方面,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面向农村地区提供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活动(产品),旨在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30];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现乡村振兴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正如有研究所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挥着“社会教育、政治动员、凝聚价值认同”^[31]等功能。因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要以上述目标为指归。

首先,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农民不仅是公共文化产品、服务和价值的需求者,也是公共文化产品、服务和价值的创造者。因此,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过程中,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农民的主体性特别是其作为文化创造者的角度,评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其次,明确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只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而非目标本身。绩效评估应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否推动国家战略目标实现作为评估的目标导向,关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效果及其可能产

生的后续影响。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价值实现的目标较为“无形”、难以测量,并不像企业产品那样可以直接用数量来衡量,所以目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主要关注投入、产出等显性指标,但显然这无法充分反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所要实现的国家战略目标。因此,应以国家战略为导向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目标进行新的指标设定,并重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体系。

2. 绩效识别:从测量导向到内容导向

“绩效指标是关于如何获得评估结果或者如何收集数据而对绩效维度进行操作化界定的一种说明”^[25]⁸⁶⁻⁸⁷,而绩效评估指标的选择和确定是整个评估过程中最为重要也最为困难的一项工作。当明确以国家战略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目标后,绩效评估指标选择的方向就亦随之明确,即须以“内容为王”,树立评估的内容导向。这就要求在绩效评估指标构建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建了多少数量的文化广场和农家书屋,送了多少场次的演出,开了多少场次的讲座,而且要以反映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为前提,尽可能地呈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协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治理等振兴乡村的具体实践。

一方面,构建内容导向的绩效评估指标要能够反映农民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场景。一些研究以某县县域内图书馆、文化馆、剧院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为评估对象,设置图书册数、活动次数、农民距离这些机构的路程等作为评估指标,期望以此反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真实效果。但问题在于,上述指标都属于表象性物理指标,不能直接与农民的参与性挂钩。因此,要了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效果,须将绩效评估指标主要落实在乡(镇)或村(包括自然村)的层面,力求呈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在一线运作的具体情况以及农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场景。

另一方面,绩效评估指标的选择要以“内容为王”,尽可能反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助力乡村振兴、文化强国等战略目标实现的具体成效,注重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乡村文化组织参与、乡村文化节庆活动、乡村文化资源发掘、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设计评估指标。具体而言,可以分别从农村中小学生对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知晓度、乡村文化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次数和类型、乡村文化人才培养情况、乡村文化节庆活动开展及其吸纳社会资金情况、

乡村文化资源发掘和转换、乡村赡养和离婚案件立案情况等方面重新思考评估指标的设计。这也就意味着,政府、评估机构以及公众都需重新认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在国家总体发展中的定位,正确把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意义和功能,即通过更为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指标设计引领各级政府、社会组织 and 农民参与和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不断强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职能作用。

3. 评估模式:从考察农民满意度到确认农民的全方位参与

当前,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模式并未有效地将农民纳入评估主体范畴,农民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中的主体地位还未真正形成。在很多情况下,上级部门根据自身需要确定评估标准,下级则紧跟标准完成可量化的考核内容,以致基层文化行政部门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很难有动力把农民文化参与、农民文化创造等放在重要位置。然而,“农村居民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对象,是服务链中的核心利益主体,享有必要的话语权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32]。在评估中,关注农民满意度情况,考察农民对服务内容喜不喜欢、不满意,在一定程度上畅通了农民表达意见和建议的发声渠道。但仅仅考察农民满意度并不等于实现了农民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中的主体性。因为“评估什么”“怎么评”“结果怎么样”等内容仍旧掌握在“是否满意”的实际提问者手中,评估的主体依旧是政府或第三方评估机构。确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农民(参与)导向,就要遵循乡村振兴“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原则。基于农民(参与)导向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能够增进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有利于强化农民的共同体认同。提倡农民参与实际上是向他们传递一种接纳异议、协同合作并对他人负有责任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公民常常拥有官员设计合理方案所需要的信息。而且,公民也渴望有参与的机会,并且他们会抵制自己未曾设计合理方案所需要的信息。有时,只有公民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28]¹²⁸

在一个开放性的评估系统中,政府、公众和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这三大主体必不可少,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而言,亦是如此。坚持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农民(参与)导向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让农民意识到在绩效评估过程中自身与政府、第三方评估机构是平等的关系,同时政府和第三方评估机构也要积极开展与农民的平等对话,并以制度的形式维护和保障这种平等的对话常态化。唯此,才能真正夯实农民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主体性地位。二是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中,要加强地方政府与在地乡村文化组织的合作,构建在地化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政社合作模式,并依托在地乡村文化组织将农民吸纳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过程中。三是利用“互联网+”平台收集公众(农民)意见,鼓励公众(农民)反馈问题,收集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相关的信息,如使用“文化码”模式搜集农民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评价和创意等方面的信息。

4. 评估结果运用:从问责导向到调适导向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结果的调适导向是指将评价结果定期运用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计划制定中,以便及时根据群众需求调整服务重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不仅是相关信息运用的终端,还是信息搜集新的起点,作用既在于及时发现问题,也在于不断优化方案,使绩效评估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必要的“摩擦力”变为重要的“助推力”。因此,将评估结果信息运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优化,既可以让公众和供给主体及时发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成效与不足,还有利于不断改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运作和服务效果,提高公众满意度。

坚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结果的调适导向,应着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及时公布评估结果,畅通公众获取评估结果以及提供意见、建议的渠道。长期以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一般都由政府主持,即使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评估,最终评估结果也只是在政府内部使用,不对外披露。如此一来,公众便缺少了获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信息及向相关职能部门提供建议的渠道,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民主性。而及时公布真实的评估结果,则有利于提升部门的信誉和公众的认同,因为及时公布评估结果这一行为本身是一种显性的社会展示,代表着政府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开放态度和持续努力,有助于社会力量和民众了解、监督和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实践。二是将评估结果切实应用于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措施优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结果的功能不仅在于反映过去农村公

共文化服务的情况,还在于发现问题、找准不足、引领发展、提升质量,并依此促进资源重整和流程优化,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持续升级。推动评估结果运用从问责导向转为调适导向,不仅有利于问题发现和服务措施完善,还有助于扭转供给主体被动应对评估的消极态度,引导他们主动正视不足,积极改进,从而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内生性发展。总之,需要明确的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既是一个服务过程的结束,更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

结 语

相较以往研究,本文基于“文化治理”的视角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进行研究,在研究选题、研究视角和研究观点等方面有所突破。展望未来,围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这一议题,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讨论,如在持续优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进程中,低成本、可操作的绩效评估体系如何建构;农民作为重要评估主体的地位在制度层面如何得到有效保障;如何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赋能服务供给的有效机制,等等。为不断提升农村文化建设成效,助力乡村振兴、文化强国等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还须进一步深化以“文化治理”视角为指引、面向农村、基于实践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研究。

参考文献

- [1] 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迈出大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EB/OL].(2019-08-07)[2024-07-22].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8/07/content_5419492.htm.
- [2] 李少惠,余君萍.公共治理视野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研究[J].图书与情报,2009(6):51-54.
- [3] 潘炜,傅才武.准公共文化领域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J].江汉论坛,2018(11):146-152.
- [4] 陈波,邱新秀.我国区域公共文化场馆绩效评价研究[J].艺术百家,2016(3):65-74.
- [5] 何阳,高小平.“双线”考评机制:技术赋能下基层政府绩效评估新途径[J].理论与改革,2020(6):106-118.
- [6] 张启春,范晓琳.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绩效的评价与实证[J].统计与决策,2017(17):72-75.
- [7] 荆晓燕.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路径研究[J].行政论坛,2013(4):17-20.
- [8] 卓越.公共部门绩效评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9] 李少惠,韩慧.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及收敛性分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6):54-63.

- [10] 姚林香, 欧阳建勇.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政策绩效的实证分析: 基于 DEA-Tobit 理论模型[J]. 财政研究, 2018(4): 86-97.
- [11] 彭益民.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3(6): 13-17.
- [12] 马学军. 乡村振兴进程中文化治理绩效差距的实证研究: 基于全国 60 个村莊的调查数据[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6): 45-51.
- [13] 吴江, 申丽娟, 魏勇. 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政策演进、效能评价与提升路径[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51-58.
- [14] 冯献, 李瑾.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 指标体系设计与评价应用[J]. 图书馆, 2020(11): 20-26.
- [15] 长沙市强力推进农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加快构建城乡一体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EB/OL]. (2015-03-31) [2024-07-22]. https://www.mct.gov.cn/whzx/bnsj/ggwhs/201503/t20150331_764837.htm.
- [16] 银川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第三方绩效评估总结工作报告[EB/OL]. (2019-09-16) [2024-07-22]. http://www.yinchuan.gov.cn/xxgk/bmxxgkml/swgj/xxgkml_2335/ggwh/201909/t20190916_1739138.html.
- [17] 任鹏飞.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第三方评估研究: 理论溯源、功能审视与实践反思[J]. 图书馆建设, 2018(11): 17-22.
- [18] 宋爱军, 张红瑞, 刘钢, 等. 完善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J]. 行政管理改革, 2012(3): 24-27.
- [19] 张楠.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缺失及其改进: 基于江苏乡镇文化站的考察[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 49-52.
- [20] 刘重春. 民主行政视野下的问责制[J]. 政治学研究, 2005(2): 117-121.
- [21] 徐元善, 楚德江. 绩效问责: 行政问责制的新发展[J]. 中国行政管理, 2007(11): 29-31.
- [22]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课题组. 关于政府机关工作效率标准的研究报告[J]. 中国行政管理, 2003(3): 8-16.
- [23] 广东中山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试点取得新成效[EB/OL]. (2015-10-26) [2024-07-22]. https://www.mct.gov.cn/whzx/qgwhxxlb/gd/201510/t20151026_790324.htm.
- [24] 浙江萧山发布全国首个镇级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标准[EB/OL]. (2015-11-18) [2024-07-22]. https://www.mct.gov.cn/whzx/qgwhxxlb/zj/201511/t20151118_786064.htm.
- [25] 波伊斯特. 公共与非盈利组织绩效考评: 方法与应用[M]. 肖鸣政,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26] 登哈特. 新公共服务: 服务, 而不是掌舵[M]. 丁煌,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27] 董帅兵, 邱星. 供给侧视角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振兴: 基于全国 31 省 267 个村莊的调查分析[J]. 图书馆学研究, 2021(2): 30-36.
- [28] 穆勒. 指标陷阱: 过度量化如何威胁当今的商业、社会和生活[M]. 闰佳, 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20.
- [29] 奥斯本, 普拉斯特里克. 摒弃官僚制: 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M]. 谭功荣, 刘霞,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42.
- [30] 李金龙, 刘巧兰. 话语赋权: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基本保障[J]. 图书馆建设, 2018(10): 23-31.
- [31] 巩村磊.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及其现实意义[J]. 理论学刊, 2014(1): 100-104.
- [32] 邵明华, 刘鹏.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供给: 价值意蕴、动力机制与路径创新[J]. 图书馆论坛, 2023(1): 40-48.

Practical Logic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Liu Hui

Abstract: The effect of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is related to the concrete realization of the strategic goals such as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power. Optimizing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s the key to strengthening th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the logic of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 rural public culture takes efficiency orientation, measurement orientation, specialization orient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orientation as its practical logic, and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confusion between output and results, insufficient content evaluation, dependence on expert discourse, high evaluation cost and ineffective incentive. Therefor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should be continuously optimized on the basis of following the national strategic orientation in the evaluation objectives, the content orientation in the performance identification, the public orientation in the evaluation mode and the adjustment orient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s.

Key words: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ultural govern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 翊 明

大语言模型的教育升维、教育降维与伦理干预

陈万球

摘要: 大语言模型开启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类知识处理的技术先锋,展现出接近通用的智能水准,其所具备的解决知识问题的能力,将会成为教育发展的工具性变量,教育时空重组将成为常态,教育范式将迎来深层变革。随着技术的迭代,ChatGPT 类产品将消解和重构师生的主体地位,人类也不得不重新审视“人工智能+教育”的本真和意义。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大模型语言生成工具模型势在必行。

关键词: 大语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升维;教育降维;伦理干预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099-09

2022年11月,由 Open AI 推出的大型自然语言处理应用 ChatGPT (Chat Generative Pre- Trained Transformer) 问世后,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界的“顶流”。在功能震惊世人的同时,亦引发学术界、教育界的深思:ChatGPT 究竟是“阿拉丁神灯”还是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些学者高呼:大语言模型使教育迎来了“新的春天”,“ChatGPT 如果使用得当,将是一种强大的教育工具”^[1];也有一些学者则坚称大语言模型“本质上就是高科技剽窃”和“逃避学习的一种方式”^[2]。面对大语言模型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速迭代,教育应当何去何从,已然成为亟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一、大语言模型的基本特质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图灵首次使用“机器思维”概念后,人类围绕着这一问题开启了漫长的探索。随着技术的迭代,在经历了 ChatGPT-2、ChatGPT-3、ChatGPT-3.5、ChatGPT-4 之后,正加速往 ChatGPT-5 发展,其功能不断完善与优化。ChatGPT 以海

量数据库和语料库为基础,以神经网络算法和深度学习为基本结构,采用“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的训练思路^[3],可以对用户输入的各种复杂问题予以回复,还能在与用户不断地对话和交谈中促进“自我”的学习和成长。此外,它还具有强大的文本生成、智能图像生成、编写代码、检查程序错误等功能,“堪称一场超语言、跨媒介、多模态内容生成革命和智能技术革命”^[4]。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高效的生成、周全的描述、流畅/专业的遣词造句和篇幅设计,让人们一旦开始使用,便很难再拒绝。2017 年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把“智能教育”列为重点任务之一。目前中国学生还没有全面接触大语言模型,但各种基于大语言模型开发的工具已悄然出现,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大模型(如 MOSS、文心一言、讯飞星火、豆包、腾讯元宝)也相继发布,中国学生全面拥有 ChatGPT 类通用语言生成工具近在咫尺。从新一代智能教育角度看,大语言模型具有以下基本特质。

1. 类人性

大语言模型能够自动学习和理解人类语言,并

收稿日期:2024-05-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科技领域道德问题研究”(22&ZD044)。

作者简介:陈万球,男,长沙理工大学科技哲学与科技伦理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 410004)。

可以根据用户的输入完成类似人类的文本回复,为用户提供自然流畅的交互体验。例如,经过迭代升级,ChatGPT-3.5以庞大的互联网海量数据为资源蓝本,已纳入了1750亿个训练参数,而最新的GPT-4训练参数已提高至100万亿,其文本生成及自然语言应用产生了惊人的表现,并赋予了人工智能模型具备与人类高度相似的特征、动机、意图或情感倾向。区别于传统智能聊天、智能对话助手以稳定和完备状态机械地完成指令,ChatGPT以其强大的语义优势,表现出强大的类人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类人化”的表达方式。大语言模型掌握了人类自然需要的句式结构规则,可以以自然语言对用户进行作答,实现持续性对话,能够主动与人“交流”,当对接受的指令产生疑惑时,会主动发问,并请用户给出更为具体的信息。二是“类人化”的情感共情。即通过上下文理解人类的情绪体验,以“同理心”感受人类的情感共情。大语言模型具有一定的情感诉求能力,能够在多轮对话中进行语义理解和推理,了解用户“心理”和“需求”,生成符合逻辑和用户需求的个性化、专业化“定制”内容。三是“类人化”的自主学习。作为大型语言模型,在深度神经网络架构和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技术的支撑下,大语言模型能够在无人介入的情况下,自动收集、整合互联网中的海量语库资料,实现“主动学习”——“像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学习”,并跨越时空界限流通至人机实时交互之中。

2. 强交互性

强交互性,即人机之间的信息强交互性。大语言模型与人交流互动,就是一个强大的信息沟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语言模型反复接受用户的信息输入,适时调整回应的数据信息,进而与人类展开深度对话。这就与传统的互联网平台产生了根本的差异:大语言模型能够模仿用户的语气,快速地进行代码编写、评价作业甚至创作诗词歌赋等,与用户形成了强交互性的对话。随着自然语言处理、多模态处理、深度学习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交互触觉界面、传感系统、虚拟仿真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支撑着大语言模型呈现出的强大交互能力。一是记忆功能强大。就底层逻辑而言,大语言模型背后有着海量的语料库的储备空间,不断吸纳人机互动过程中的语料作为自己“成长发展”的“营养”;还凭借思维链的技术支撑,将碎片化的信息重新整合梳理以形成不同风格、不同内容的文本。二是推理能力强大。大语言模型具有较强的上下文衔接能力,在与人交谈

时,掌握自然语言的句式模态,通过概率性分布建模预测,识别文字、语言间的隐形关系,从而生成符合用户用语习惯、语言风格的内容。三是学习能力强。大语言模型本质上是一种深度的、巨量的神经网络架构,凭借着数千亿级别的参数,并通过海量的数据信息进行预训练,在无人干涉的前提下自主学习互联网空间的知识点,将其应用于人机的实时对话中。

3. 生成性

大语言模型是一个全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生产工具,它通过新的机器学习算法实现了人工智能的创造性和生成性,开启了人脑之外的智慧。大语言模型以其超高的内容生成性,能够在数据基础上进行自主学习,并智能生成复杂的文字。这不仅将改写人类知识生产方式以及对知识的定义,也改变了知识生产主体、生产方式以及生产要素等方面的重要内容。人工智能彻底改变了知识生产周期以及知识生产方式,对知识生产及知识获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工智能已经引发了人们对新知识观的探讨。由于机器的参与,人类的知识不再只是人在实践中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成果,它还包括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的结果以及人借助技术从数据中获取的认知成果。

大语言模型是一种新型的智能搜索引擎系统+智能洗稿系统+智能文本生成系统。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最具影响力的产物,大语言模型将为内容生产和创作提供全新的模式,其未来发展的最直接的应用是成为互联网内容生产的主要方式。传统意义的内容生产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户生产内容”,一种是“专业生产内容”。不同于这两种模式分别以用户或专业人为主体生成内容,大语言模型主要利用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生成内容,是一种新型的内容生成形态。对比此三者,大语言模型将实现文本、音频、视频、图片等多元形式的知识融合创新,不仅有更丰富的内容形式、更稳定的品质保证、更高的产出效率,而且生产的成本更低。不难想象,大语言模型未来发展的最直接应用将成为互联网内容生产的主要方式。作为大语言模型的革新应用,大语言模型具备了文本生成、智能图像生成、编码代写、检查程序错误等强大功能,这样既延伸了用户的感知器官,也大大提升了人机交互的情景体验。可见,大语言模型所代表的人工智能,正在展现其几乎无所不知的知识掌握能力。

二、大语言模型的教育升维

大语言模型的问世标志着人工智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人工智能为教育擘画了怎样的蓝图”，“教育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将获得怎样的发展”，成为开放性议题。大语言模型促进了教育范式的变革，使教育升维成为可能。

1. 教育主体：从“经师”转向“人师”

大语言模型将使“经师”转向“人师”成为可能。在传统的教育教学中，教师是知识“拥有者”和“传播者”，现如今大语言模型颠覆了教师这一角色定位，如 ChatGPT 的知识量应该大于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当然也大于大部分的老师。未来 ChatGPT 会成为“百科全书”，它可以把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知识放在其语料库中随时调用。纵使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文理兼长的“经师”，其拥有的知识也无法与几乎拥有人类全部知识的 ChatGPT 相比。这就是个人知识与人类拥有全部知识之间的巨大鸿沟。教师只能以每秒 1—10 比特声波传递知识，穷其一生能掌握的知识根本无法与大语言模型相比。正因为如此，传统的“经师”在大语言模型面前，其“知识短板”非常明显。

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聊天机器人^[1]，大语言模型将以其机器学习和内容生成等强大功能助推教师能力延展。不过，从教书转向育人，是大语言模型加持下未来教师的主要职能。不是说未来的教师不需要传道授业解惑，而是会更加注重育人。“教育千减万减就是不能减少学校对立德树人的关注，不能减轻教育工作者对学生人格发展负有的应尽责任。未来教育可能不需要只会教书的老师，但始终呼唤懂得育人的大师。”^[5]

虽然有人预测教师会被人工智能替代，但教师在育人上的不可替代性已不言而喻。人工智能可以替代教师完成知识传授、课程成绩评估、题目生成等重复性、机械性工作，从而驱动教师从重复书本知识的机器般教学劳动的“经师”，转型为能熟练掌握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学手段及教学平台的“人师”^[6]。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将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个具有终极意义的哲学命题逐渐实现^[7]。对此，教师首先要强化身份和职业认同，主动担当育人使命，提升对教育实现“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独特价值的主观感知。教育的重心应由知识传授转向“以生为本”。大语言模型倒逼教师加强对学

生道德主体意识的培育，引导学生在合德合法基础上使用之。此外，教师需要打破“信息迷航”，提高信息甄别和处理能力，在碎片化的海量信息中向学生提供更多适应其发展需求的信息，驱动教师不断更新对教育教学的认知。

2. 教育客体：从深度学习到个性化学习的进阶

大语言模型在培养教育客体即学生方面，具有区别于智能机器的不同思维认知方式。大语言模型可以成为学生学习和发展的有力助手。大语言模型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学生：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和辅导；帮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提高学生在人工智能帮助下的学习能力；鼓励和方便学生进行跨学科学习；实现个性化学习路径；提高写作能力^[8]。实际上，在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等内在核心素养中，大语言模型起到关键作用。

第一，大语言模型促进学生深度学习，驱动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养成。深度学习是一种主动的、探究式的、理解性的学习方式，要求学习者进行理解性的学习、深层次的信息加工、批判性的高阶思维、主动的知识建构和知识转化、有效的知识迁移及真实问题的解决。不同于浅层学习强调外力驱动下采用强化记忆、机械式训练等消极被动的学习方式，深度学习更注重引导学生主动发现学习的意义感，以期在思维方式、人格境界、情感共鸣等方面产生实质性变化。在从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方式的支撑下，大语言模型具有强大的内容生成和“不断成长”的特性，将其运用在学生学习中，可以实现探究性学习、情景化学习等，增加学习的创造性。教师 Piercey 详细分享了其利用 ChatGPT 改变一名五年级学生创作故事的经历。他指出，ChatGPT 可以根据创作者想要添加任意元素的指令，不断创作出丰富的故事，这在增加教学趣味性的同时，还为学生提供了独特的范例^[9]。同时，大语言模型可以针对给定的材料给予不同角度、不同学科的解读，帮助学生学习认知的补充和思考，实现知识技能的迁移运用。此外，大语言模型具有广泛的知识体系。在与人工智能的互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从大语言模型处轻松获取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从而拓宽视野，提高跨学科思考和创新能力。通过创设不同的问题情境，制造认知冲突，驱动学生质疑、批判、反思能力的增强。

第二，大语言模型塑造个性化学习方式，提高学生自适应能力。大语言模型提供的对话式互动方式，天然适合一对一教学需求，其海量的知识储备和“耐心细致”的沟通方式，可以为学生提供“因材施教

教”的知识学习支持服务。例如,ChatGPT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特点,为他们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辅助工具,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提高学习效果,真正实现“一对一”的线上指导。大语言模型还可以创建自动化学习评估系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或问题情境中根据学生的认知变化做出即时反应,及时检测学生的学习进度和理解情况,为学生提供即时的学习反馈和建议,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基于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学习能力,大语言模型将会及时给出反馈,动态调整输出内容的难度,并有针对性地推送符合学生具体情况的学习资源,自主化适应学生学习。未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将会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原住民”,对此,大语言模型在教育中的应用将会加速推动“以学定教—因材施教—以评促教”的自适应教育生态圈的创建^[10]。

3.教育环体:从“一元”到“多元”学习空间的升级

在大语言模型为主导的智能学习空间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互行为大大增强,智能学习空间进一步升级。

第一,生成人、机、物三元融合的教育环境。“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11]人、机、物三元融合,以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核心,以构建和谐的人机关系为关键,强调物理空间、信息空间和社会空间三者的有机融合。大语言模型在超强算法算力的支持下,云集了包括人类科技文化成果在内的具有泛在性、联通性、多维交互性等特征的海量学习资源,由此也营造了一个开放、包容、自由的智慧学习环境。此外,大语言模型将打造虚实相融的新型立体教学场。借助模型创建、教学情景营造、图像音频生成等能力,大语言模型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提供了多重教育场景,尤其是推动虚拟教育场景成为教育教学活动开展的重要阵地。师生在虚实结合的教育场景中调用插转,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空间得以有效搭建,学习的情景体验感增强,教育也会更具趣味和实效。

第二,生成多元主体参与育人的教育格局。信息技术的发展构建起互联共通的网络学习空间,也促使学生个体、家庭、学校、社会等不同主体打破了各自所处的空间,产生相互交互,最终使不同的空间形成一个空间集群。基于万物互联的技术支撑,大语言模型的融入将使育人主体格局发生转变:“教师—学生—家长”的育人模式中还将纳入社会、管

理者、研究者等主体,形成新的育人格局。多元主体被纳入教育关系网络,紧紧围绕着学生成长发展的中心目标构建多主体的良性互动关系,教学诊断、自适应推送、个性化定制等功能使得各主体能有效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并开展实时有效的活动,为学生个性化成长发展提供智能支持。

第三,虚拟学习型组织入主校园。大语言模型在教育中的应用使得人文交互环境下的个性化学习得以实现,同时也促进人们利用网络学习空间不断推进交互学习。一方面,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线上线下智能学习空间融合实现教育教学活动同步或异步开展,师生对传统的固定的实体教学组织如班级、实验室、学校等依赖性下降。同时,更多的虚拟学习型组织如线上社群组织将逐渐成为主体形态。另一方面,大语言模型打破物理世界的交互壁垒,在算法算力作用下将吸引具有共同目标和愿景的个体,在虚拟网络环境下组建起共享学习资源、协同完成学习任务、分享学习经验等的学习团体。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实现沉浸式协作学习,同时自我效能感得以不断提升。

4.教育介体:从“对话”到“智能学习系统”的变轨

教育介体起着上承教育要求、下启受教育者、从中引渡教育内容的功能。教育介体是教育方法艺术、路径途径的一个综合系统。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日益成为教师与学生之间不可忽略的实践中介。从“对话”到“智能学习系统”,大语言模型的变轨一路前行。

科学的目的在于便利生活。一切教育技术的进步与运用归根到底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辅助教学,以达成培育人的目的。大语言模型不同于传统机器人之处在于,其不仅具有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具备理解和创作能力。大语言模型将会在教、学、管、考、测、评等多种复杂场景中大有作为。Skrabut提出了ChatGPT在教学中的80种可能应用方法,包括辅助备课、教学支持、评价材料创建等类别^[12]。

目前,人工智能产品已经灵活运用于教与学的过程中,并凭借不同的产品优势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辅导者、导师、评价者、调节者等。由美国孟菲斯大学主导的Auto Tutor扮演着辅导者的角色。Auto Tutor项目是典型的人工智能导学系统,其关注点在于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更为精细地辅助学习者,采取一对一辅导对话策略,为学习者在自然语言交谈中逐步生成更为准确的回答,以促进学习者对概念和原理形成深度理解。Auto Tutor还能通过对生生

理指标的检测分析学生的情感状态,并及时进行调整。在批判性思维、物理、信息技术等多领域,Auto Tutor 均已呈现出与人类教师相当的学习效果^[13],并且衍生出多个项目与产品^[14]。此外,智能导师系统可以模拟人类教师,实现一对一的智能化教学。

作为对话式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是聊天机器人、智能导学系统等智能教育的特殊表现形式,标志着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其凭借灵活的适应能力、及时的反馈能力、高效率的信息获取率等扮演着多样的角色。对教师和学生而言,大语言模型都将成为智能助学服务的“最佳选择”。在大语言模型的“刺激”下,各大厂商研发的大语言模型类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如谷歌推出的 Bard 就是基于大型语言模型推出的聊天机器人,微软基于 ChatGPT-4 开发出新一代搜索引擎 New Bing。在国内,复旦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发布的国内第一个对话式大型语言模型 MOSS,百度则基于飞桨深度学习平台开发了知识增强大模型文心一言,华为推出了多模态千亿级大模型产品“盘古 Chat”。可以推断,以 ChatGPT 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产品极大地推动了智能助学服务的变革,这将为实现高质量教育、促进教育向数字化转型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三、大语言模型的教育降维

毋庸置疑,作为异军突起的变革性科技力量,大语言模型具有巨大的教育潜力。然而,作为一种尚未成熟的技术,大语言模型虽然“天赋异禀”,但绝非完美无瑕,这使大语言模型介入教育场景的伦理降维成为可能。

1. 主体维度:技术依赖

当人工智能在众多领域的应用呈现超越态势时,技术的进路可能会偏离原有的轨道,甚至摆脱主体的控制,在为人类提供精准推荐信息的同时,人同样有可能被奴役而成为“单向度”的人,人的自迷和自我困厄现象将难以避免^[15]。由于人类大脑神经网络模型的“黑箱”性质,目前大语言模型要整合人类某个领域的知识并非易事^[16],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知。以人工智能侵占人类智能,人类思维的自主性会有丧失风险。如果过度依赖大语言模型等语言人工智能,则存在导致个体智慧退化的巨大风险。如果对人工智能没有进行合理使用和开发,将会导致过度依赖和主体性异化。

对大语言模型的依赖会消弭学生主体能动性,使其沦为智能技术的“持存物”。一方面,大语言模型在为学生“投喂”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也面临着学生对大语言模型的过度依赖,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学生自主探索与创新的能力。调查显示,美国大学生承认使用过 ChatGPT 完成家庭作业的高达 89%,利用 ChatGPT 写论文的学生超过了 50%^[17]。可见,ChatGPT 极易沦为学生写作或作弊的工具,其在带来学术诚信问题的同时,更令人们担心的是会导致学生智识上的惰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削弱和自主学习权利的“悬置”。为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已经对 ChatGPT 采取禁用或多重限制的措施^[18]。另一方面,基于算法推荐,呈现在学生面前的大多是自己感兴趣或给予较多关注的内容,而那些经过过滤、“多余的”“无关的”信息则被遮蔽。长此以往,“信息茧房”效应会使学生接触的知识域越来越狭窄,学习内容的全面性和多样性遭损,思维被算法限制。

大语言模型在教学中的应用,一定程度上使教师也面临着主体性式微的困顿。在智能社会中,人的情感、个性、价值意义等逐渐被消解,当授权大语言模型代替教师完成部分任务时,教师也面临着被抽象为数字和符号的风险。大语言模型的应用可能使教师过分注重技术理性,而忽视育人的教学本质。大语言模型能够按照教师指令快速生成相应的教学计划、课堂互动设置等,以此为依据进行教学,使得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和开展的活动变得绝对化和固定化,久而久之将导致教师对大语言模型的依赖。而缺乏思考和批判的应用生成结果将导致教师创新思维的止步,教学魅力也会黯然失色。

2. 关系维度:交往异化

大语言模型虽然赋予了师生便利和高效率,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师生交往关系异化的危机。

第一,教师权威弱化。在师生伦理关系中,教师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具有至高无上的伦理地位,“天地君亲师”诠释了传统社会教师的道德地位。大语言模型具有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和海量数据资源,不仅在学术写作、代码编写、文件处理等方面辅助学生,同时还能进行学习评估与测评等,甚至可以给出更加精准的回答。“有问题问老师”会逐渐变成“有问题问 ChatGPT”,甚至 ChatGPT 给出的答案可能比老师给出的更全面、更有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师的权威性会被新技术所消解。同时,大语言模型在教育中呈现的超越教师知识和能力之

势使得学生对教师权威产生疑惑,传统师生关系风险加剧。人工智能“机师”的出现,成为与“人师”并存的又一种新型教师(虚拟教师),导致教师的类型构成与队伍建设的格局发生彻底改变。

第二,师生关系疏离。大语言模型等新型人工智能在教育活动中打破时空局限的同时,也可能造成教育场域内人际关系的疏离。以“离场学习”代替“现场教学”,教学共同体出现裂解风险。教学的本质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构成的交互性活动。师生在遵循理性进行交往时,也极为重视情感交流,形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情感关系。而大语言模型为师生搭建了一个虚拟化、信息化的教育拟真生态环境,在实现教学活动同步或异步的同时,也使得师生置身于“在场”和“不在场”中,长此以往,师生交往情感被数字化遮蔽,取而代之的将是数字符号和程序化的教学活动。智能技术支配着教学活动,学生被物化为一组组数据,而教师则沦为教学机器的组成部分。“师徒如父子”的关系被数据算法解构,教育中的人文关怀也随之消弭及颓败。

第三,教育主体异位。在现代教育理念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实践关系,而课程、教材等教育教学活动及内容则成为共同作用的客体。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被人类赋予了成为取代或延伸人类能力的助手,因此引发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社会主体性的恐慌和担忧。一方面,大语言模型的优越表现使得教师日益逊色;另一方面,对学生学习的个性化追踪,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学生学习,将学生“降格”为一个节点、一个类似于“物”的对象^[19]。随着技术的迭代及其彰显的教育优势,大语言模型类产品将消解和重构师生的主体地位,人类也不得不重新审视“人工智能+教育”的本真和意义。

此外,人机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机器不仅可以成为“机师”,而且也可以成为了不起的“虚拟教师”,甚至成为卓越的“虚拟教育家”。这将彻底颠覆人与机器的关系。在工业革命时代,机器只是工具;而在智能革命时代,机器则是合作共生的伙伴,在教育领域里,是共学共教共育的伙伴。人机之间不再是“我与它”的关系,而是“我与你”的关系。大语言模型为此改变了教育中的师师关系、师生关系及其对话关系,人一机一人的三角关系将成为这一新型对话关系的新常态。

3. 介体维度:数据滥用

随着教育系统的信息化建设日趋完善,手机、

iPad、监控摄像等的广泛使用,AI 人脸识别系统、云端课堂、VR 在线互动虚拟仿真教学构建了虚实结合的智能学习空间,教育资源通过多媒体、传感器等传输到云端进行处理分析,实现了自动识别、定位、追踪、监管和信息的传递与交换。

大语言模型智能感知体系崛起,师生行为受到“第三只眼”监视,师生面临着数据安全、隐私泄露风险,其安全感无处存放。学校利用智慧教育数据形成“数字画像”,以此进行行为预测,会对学生形成“刻板印象”,干扰学生成长。同时,师生的个人信息会在某一服务器中得到长久保留,留下了个人信息泄露或者被盗取的“隐患”。

从技术本质看,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其生成的内容是海量数据和学习材料的重组,其生成内容只是与用户输入的资料在语义上有最大关联^[20]。据 Open AI 发布的官方数据,ChatGPT 建立的数据语料库仅包含至 2021 年的数据,还未接收到 2021 年之后的更新数据,因此其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并不一定能得到保证,数据使用和滥用也并没有设定明确的界限。在 ChatGPT 的《使用协议》中同用户约定,在一定情况下,用户可以享有由 ChatGPT 输出内容的所有权及其收益^[21]。换言之,人们有利用 ChatGPT 创作的次生作品谋利的机会,这存在学业诚信、学术剽窃的问题。

4. 价值维度:算法霸权

科学无国界,而技术是有国界的。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争先恐后占据科技发展新高地,以此把握先机、赢得主动。以算法、大数据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某些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推行政治霸权的工具。对于人而言,“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2]。从更广泛的教育意义上讲,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并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自研发以来就受到政治偏见的“熏陶”,接受着政治价值的“喂养”,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

大语言模型成为潜在的模型开发者精准引导和干预别国意识形态的技术载体。一方面,ChatGPT 使用的训练数据主要为英语语料,超过 70% 的用户在与其进行交流互动中要以英语进行,据此可以推算出用户的价值取向、政治立场等数据观测点,而通过数据分析联系思想与行动的某些关键,不仅可以向用户传输开发者所具有的价值取向、文化偏见,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对用户的思想意识产生精准引导和

干预。另一方面,大语言模型成为国家之间主流意识形态的交锋地,由于科技力量的差距造成某些国家意识形态被侵扰。如今,ChatGPT 主要是美国科研机构研发的,无论是数据代码还是算法运力,无不渗透着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借助技术优势蚕食使用者的价值观,无形中“引诱”使用者达成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以此干扰别国内政。未来,无法拒绝的 ChatGPT 应用也使得“国与国之间的价值冲突或将成为继商事竞争后的又一不可不虑的痛点”^[23]。

四、大语言模型的伦理干预

智能时代的到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然而技术“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元素,它起的作用的好坏,取决于社会集团对其利用的好坏”^[24]。面对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的强势来袭,只有把人的本质力量转化为伦理能量,才能实现教育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同频共振。

1. 顶层设计:制定并完善伦理规范,推动科技向上向善

大语言模型构建了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可以实现教育需求的有效配置和个性化需要,同时也为社会多方参与教育互动提供了可能。针对大语言模型在教育应用中会带来上述伦理问题,需要树立“伦理先行”意识,对 ChatGPT 类产品和教育系统中的多方参与者做出伦理规约,真正推进技术生态与教育生态的共生共存。

第一,对于政府而言,要制定大语言模型及其类产品的应用指南和方案,促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ChatGPT 之父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对其可能出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深表忧虑,并积极呼吁制定相关规则^[25]。2023年4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我国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监管的号角已经吹响。要加强对大模型的监管,坚持包容审慎原则。目前大语言模型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乃至整个教育系统中均已占据“一席之地”,需要采取分级、分类、分领域的标准,明晰大语言模型对于不同使用主体在不同应用场景中的规范,对收集、存储、使用、加工等数据处理的各环节进行风险评估,落实对数据的安全保护工作。更为关键的是,要加强对企业及社会各界关于大语言模型的研发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我国在数学技术领域的比较优势,增强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研发,牢牢掌握

在国际社会中的数字主权。

第二,对于研发人员和企业而言,在大语言模型的研发和训练过程中要注重增强其价值导向。数据保护和预防大数据犯罪都需要从技术上加以防控,而技术的发展需要理想观念、道德准则等伦理思想的支撑和道德规范。大语言模型具有何种倾向性、携带何种意识形态、携带何种错误信息或可能引发哪些法律、道德问题^[26],受制其背后“无形的手”。科研人员要增强对大语言模型推送信息的审核力度,及时对数据收集和算法逻辑中存在的偏差进行纠正,及时化解算法乱象、意识形态入侵、算法权力等问题,确保大语言模型始终遵循教育伦理规范、向好向善发展。

第三,对于教育系统而言,学校采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时,教学过程最重要的决策者并不是在教学现场,而是不在场的软件设计者、开发者。教师往往会沦为软件决策的解释者和执行者^[27]。因此,在充分发挥大语言模型技术优势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通过保证“喂养者”“营养源”“喂养行为”遵循科学方法,坚持正确价值导向,时刻引导大语言模型与教育教学同向而行。

2. 人文关怀:注重情感互动,构建新型师生关系

育人是教育的本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追求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建立在人工智能技术之上的教育的最好状态,是呈现更多的人的主动性和生长性,并能够将人工智能所提供的可能性充分变为现实。”^[28]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教育产品的运用并非为了超越人的存在,其最终落脚点在于更好服务教育以实现育人目标。

第一,以爱为纽带,增进师生情感的沟通。“在高度智能化的环境中,学生极易被技术误导,情感是构建人生的基础性素质。”^[29] 尽管大语言模型可以实现与人的对话,可以给予测试者心情不好时的“安慰”,但是这种情感互动却是“程序化”的,是生硬冰冷的,“缺少人文主义的核心,遗失了作为个体的激情、痛苦、渴望、经验、想象力、洞察力、焦虑、喜悦”^[30]。这就决定了大语言模型无法取代教师对学生情感发展和健全人格养成的地位和作用,虚拟教学场景也无法取代具有丰富育人内涵和特有的互动模式的学校教育。人的生存工具性素养如读写算能力、知识应用能力和文案编辑能力等,都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尽情发挥,而批判反思能力、创新创造能力、团队写作能力等是技术不可取代的。因此在智能教育中,教师应通过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营造尊

师重教的氛围,培育人的主体性素养。唯其如此,才能实现技术与心灵成长的契合。

第二,加强与学生的互动,注重真实情感的生发和表达。教育的终点不是将人设计为“成熟”的产品,而是培养成独立思考的鲜活生命^[31]。而鲜活生命的培养,需要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在教学内容方面,教师要注重价值观的塑造,引导学生树立人生信念和意志品质。在教学形式方面,要充分发挥大语言模型的技术优势,丰富和拓展多元的教学实践形式,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学习体验,增强课堂趣味性。在教学评价方面,通过数据的分析,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针对性强、精准度高、动态化的评价,并给予及时、个性化的反馈,确保在教学过程中始终扮演好学生精神发展的引路人,营造民主平等、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关系。

3. 技术融合:提升数字素养,实现人机协同增智

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是一种高级形式,其本质在于人机互动与适应。大语言模型的出现标志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学习和执行创造性任务、与人工智能共同协作,将会成为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32]。智能时代,机器的自主性日益增强,人机之间建立了强适应交互关系^[33],人机协同成为人机关系的核心和突破口。若要实现人与机器和谐共生,建立人类与大语言模型良好的“沟通”秩序,进一步提升师生数字素养,是回应“在大语言模型的加持下,教育‘何去何从’”这一议题的核心和突破口。

第一,教师要具备数字素养。教师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迎接新兴技术的到来。不仅要在认知层面了解大语言模型“为何”,还要在教学实践层面明确大语言模型“何为”,将其转化为自身机体功能的延伸,使其在情景化教学、探究性学习、学情分析与诊断、作业布置等多重教学情景中发挥技术优势。教师要提升数字胜任力。2022年教育部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标准中指出,加强数字素养是对数字化环境的全面理解和应用能力,包括数字技能、信息素养、创新思维、数字人文等多个方面,这表明教师不仅要具备能操作计算机、熟练使用智能教学应用的数字技能,还要具备对信息资源的检索、获取、筛选、管理和评价的能力。此外,教师要增强主体意识,明晰在人机协同关系中的角色定位,清醒认知ChatGPT类产品的功能界限。

第二,学生需提升数字信息素养。学生要树立数据伦理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利用数字信息资源辅

助自我学习、个人能力提升的同时,遵守使用规范,保护好隐私与安全,警惕学术不端行为。要增强个人的自觉性和主体性,提升信息甄别和掌握知识的能力。目前,大语言模型为完成指令仍会出现“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现象,其给出回答的准确性尚不能保证,加之意识形态问题的渗透,学生必须提升对虚假信息的甄别力、对问题答复的反思力、对价值选择的判断力。

结 语

教育是立国之本,也是实现民族振兴的基石,不仅关乎着人的全面发展,更承载着民族的未来。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获得了巨大动力。“它延伸了人的物理空间、扩大了自由视阈、增强了活动能力,为人类提供了驾驭社会生产力和处理生产关系的新方式。”^[34]然而,风险与机遇并存,在科学浪潮的席卷下,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与其质疑徘徊,不如主动作为,让技术为人服务。大语言模型以其强大的功能快速在教育领域中“安营扎寨”,直指教育痛点,对现有的教育范式产生颠覆性影响。“控制论之父”维纳有言:“我们是如此彻底地改造了我们的环境,以至于我们现在必须改造自己,才能在这个新环境中生存下去。”^[35]因此,人类必须提升自身的适应能力,主动拥抱大语言模型。当然,前提是要始终保持主体意识的觉醒,充满创新创造活力。唯其如此,人类才能不被技术洪流淹没,才能从容且自信地应对智能技术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的中国教育数据集和经过意识形态评估、由国家监控的教育领域大模型工具,势在必行。可以预见,中国教育领域大模型建设将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推进的关键性战略。

参考文献

- [1] RUDOLPH J, TAN S, TAN S. ChatGPT: Bullshit Spewer or The End of Traditional Assessm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J]. *Journal of Appli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23(1):1-22.
- [2] Noam Chomsky on ChatGPT: It's "Basically High-Tech Plagiarism" and "a Way of Avoiding Learning"[EB/OL]. (2024-02-10)[2023-02-15]. <https://www.openculture.com/2023/02/noam-chomsky-on-chatgpt.html>.
- [3] OUYANG L, WU J, JIANG X, et al. Training Language Models to Follow Instructions with Human Feedback[J]. *ArXiv Preprint*. 2022(02155).
- [4] 叶鹰,朱秀珠,魏雪迎,等.从ChatGPT爆发到GPT技术革命的启示[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3(6):33-37.
- [5] 陈玉琨.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7):103-116.

- [6]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286.
- [7]王天恩.ChatGPT的特性、教育意义及其问题应对[J].思想理论教育,2023(4):19-25.
- [8]蒋里.AI驱动教育改革:ChatGPT/GPT的影响及展望[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7):143-150.
- [9]ChatGPT, Chatbot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EB/OL].(2023-12-17)[2024-02-01].<https://ditchthattextbook.com/ai/>.
- [10]顾小清,李世瑾.人工智能促进未来教育发展:本质内涵与应然路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9):1-9.
- [11]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5-29(2).
- [12]SKRABUT S. 80 Ways to Use ChatGPT in the Classroom: Using AI to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M].Independently published, 2023:102.
- [13]GRAESSER A C. Conversations with AutoTutor help students lear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2016(1):124-132.
- [14]NYE B D, GRAESSER, A C, HU X. AutoTutor and family: A review of 17 years of natural language tutor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2014(4):427-469.
- [15]吴海江,武亚运.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基于马克思人学理论的考察[J].学术界,2019(3):75-81.
- [16]WOLFRAM S. What Is ChatGPT Doing, and Why Does It Work? [EB/OL].(2023-02-14)[2024-03-05].<https://writings.stephenwolfram.com/2023/02/what-is-chatgpt-doing-and-why-does-it-work/>.
- [17]TANGERMANN V. 89 Perc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dmit to Using Chatgpt for Homework, Study Claims[EB/OL].(2023-01-31)[2024-02-05].<https://futurism.com/the-byte/students-admit-chatgpt-homework>.
- [18]POGUE D. AI Experts on Whether You Should Be“Terrified”of ChatGPT [EB/OL].(2023-01-22)[2024-02-06].<https://www.cbsnews.com/news/ai-experts-on-chatgpt-artificial-intelligence-writing-program/>.
- [19]BILLS S, CAMMARATA N, MOSSING D, et al. Language Models Can Explain Neurons in Language Models[EB/OL].(2023-05-09)[2024-02-05].<https://openai.com/research/language-models-can-explain-neurons-in-language-models>.
- [20]Ion VACIU on LinkedIn:“The hidden danger of ChatGPT and Generative AI”[EB/OL].(2022-12-08)[2024-02-04].<https://venturebeat.com/ai/the-hidden-danger-of-chatgpt-and-generative-ai-the-ai-beat/>.
- [21]OpenAI. Terms of use[EB/OL].(2023-03-14)[2024-01-09].<https://openai.com/policies/terms-of-use>.
-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 [23]邹开亮,刘祖兵.ChatGPT的伦理风险与中国因应制度安排[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74-84.
- [24]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陈允明,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9.
- [25]FUNG B. Mr. ChatGPT Goes to Washington: OpenAI CEO Sam Altman Testifies Before Congress on AI Risks. [EB/OL].(2023-05-16)[2024-02-03].<https://edition.cnn.com/2023/05/16/tech/sam-altman-openai-congress/index.html>.
- [26]HUNTER T. Why You Shouldn't Tell ChatGPT Your Secrets[EB/OL].(2023-04-27)[2024-02-03].<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3/04/27/chatgpt-messages-privacy/>.
- [27]张志祯,张玲玲,米天伊,等.大型语言模型会催生学校结构性变革吗?——基于 ChatGPT 的前瞻性分析[J].中国远程教育,2023(4):32-41.
- [28]李政涛,罗艺.智能时代的生命进化及其教育[J].教育研究,2019(11):39-58.
- [29]刘铁芳.教育的生活意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96.
- [30]BROOKS D. In the Age of A.I., Major in Being Human[EB/OL].(2023-02-02)[2024-02-05].<https://www.nytimes.com/2023/02/02/opinion/ai-human-education.html>.
- [31]高瑞琴.教化的终点:“成为你自己”:尼采哲学对现代教育的启示[J].北京社会科学,2016(11):42-49.
- [32]冯雨英.ChatGPT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价值、潜在伦理风险与治理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3(4):26-32.
- [33]陈万球.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方式变革图式[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36-43.
- [34]陈万球,欧彦宏.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概念[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1):33-40.
- [35]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M].陈步,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1.

Educational Dimension Enhancement, Educational Dimension Reduction, and Ethical Intervention of the Big Language Model

Chen Wanqiu

Abstract: The big language model has ushered in the era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technological pioneers of human knowledge processing, represented by ChatGPT, have demonstrated a level of intelligence close to the universal. Their ability to solve knowledge problems will become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i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time and space will become the norm. The educational paradigm will undergo profound changes. With the iteration of technology, products like ChatGPT will dissolve and reconstruct the subject posi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human beings will have to re-examine the ess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duc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develop a large model language generation tool model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large language model; generative AI; education upgrading; education dimension reduction; ethical intervention

责任编辑:思 齐

范仲淹经学核心思想探析

姜广辉 唐陈鹏

摘要: 范仲淹是宋代士人中集经术、事功、道德、文章于一身的“第一人”。由于范仲淹的人品、事业在当时太过辉煌,导致其在经学上的建树被道德功名掩盖,故而长期不为学界所关注。近年来,学者们对范仲淹经学的研究已经有所推进,但大多是从易学、春秋学等单一经学学科对其经学思想进行探索与阐释。若从整体的层面对范仲淹的经学进行深入分析,则可发现其经学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必顺民”的民本思想,包括养民、利民、爱民等具体内容;二是“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将《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理论作为主导“庆历新政”的哲学思想;三是“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进则忧国忧民,退则乐天乐道。

关键词: 范仲淹;经学;民本;改革;忧乐

中图分类号: B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108-09

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典范人物,范仲淹(989—1052)的人品、事业可谓卓绝一时。南宋儒者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1]朱熹也认为范仲淹乃“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2]¹⁰⁴⁸,并称赞其“心量之广大高明,可为百世之师表”^[3]。宋代以还,历代儒者对范仲淹的道德、功业无不推崇有加,相关研究业已硕果累累。但实际上,范仲淹在经学方面亦颇有建树,其文集中至今仍存有《易义》《四德说》等经学专论以及大量讨论经学义理的诗文,涉及易学、春秋学、礼学、四书学等多个经学学科。自汉代以降,学者喜欢“以经术缘饰吏治”^①,依托对经传的讲解,来劝谏君主。而宋仁宗则是历史上通过经筵讲席学习经典时间最长的皇帝,由此养成朝臣通过解经谏上的风气。范仲淹经学思想的形成与这一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到范仲淹的经学,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②。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从易学、春秋学等单一经学学科对范仲淹的经学思想进行探索与阐释,而较少从整体的层面分析范

仲淹经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创新之处。通过全面阅读范仲淹的经学论著,可以发现一些颇具价值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其中,这些无疑就是范仲淹经学思想的核心与精华所在。因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范仲淹经学的核心思想做一尝试性的抉发。

一、“政必顺民”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孔子大力提倡“仁”学,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4]⁵³³⁶,将“爱民”作为对统治者的基本要求。孟子在继承孔子等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得其民斯得天下”^[5]⁵⁹¹⁸“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⁶⁰³⁷等熠熠生辉的思想命题,极大地丰富了“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荀子亦指出“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6]²⁷¹,并两次引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6]^{152-153,544}的道理,以说明百姓才是决定国家兴衰的本源性因素。孔、孟、荀等

收稿日期:2024-05-08

作者简介:姜广辉,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 410082)。唐陈鹏,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湖南长沙 410082)。

先秦大儒对“民本”思想的诠释与推重,既形塑了儒家“经世致用、传道济民”的基本品格,又让“民本”思想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精神标识。另外,《尚书·五子之歌》也表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③,不仅阐明了国之根本在于“民”,而且还强调“民”对维系国家安宁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这对后世“民本”思想的发展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范仲淹两岁失怙,出身孤寒,对底层民众生活之困顿有切身的体会,至其出仕为官,仍不忘其本心。如范仲淹在《让观察使第三表》中便曾自述:“臣出处穷困,忧思深远,民之疾苦,物之情伪,臣粗知之。”^{[2]360}同时,范仲淹自少时即“游心儒术,决知圣道之可行”^{[2]377},并对以“尊民重民”为鲜明特点的“孟轲之志”^{[2]13}尤为尊崇。因此,在范仲淹的经学思想中,“民本”思想始终占据着最核心的位置。从范仲淹的《四民诗》^{[2]26}来看,其眼中的“民”并非只限定于从事种植或养殖业的农民,而是囊括了士、农、工、商四个类别,可以说是代表着除了统治者之外的广泛的人民群众。

纵观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实以“政必顺民”为核心宗旨:

政必顺民,荡荡洽大同之化;礼皆从俗,熙熙无不获之人……以为肆予一人之意,则国必颠危;伸尔万邦之怀,则人将鼓舞。于是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彼患穷夭,我则修富寿之方。夫如是则爱将众同,乐与人共,德泽决于民庶,仁声播于雅颂。^{[2]23}

范仲淹所说的“政必顺民”,指的是一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必须顺从民意。这明显是对《管子·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④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不过,范仲淹将之凝结为“政必顺民”四字,表达更为醒豁。范仲淹认为,君王治理国家只有以“顺民心”为宗旨,才能鼓舞万民,铸就治熙和乐的社会;若以“肆予一人”“朕即国家”的理念为追求,弄得民不聊生,则国家社稷必将有“颠危”之险。这里所隐含的意思是,天下不应以皇帝一人为主体,皇帝也不可唯我独尊、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役使人民,而应以人民大众为主体。“政必顺民”的关键在一个“顺”字,执政者是虚己顺从民心,还是将民众变成“顺民”,顺从自己,一字理解不同,意义大变,其结局亦悬隔万里。范仲淹接着阐述道,顺从民意,就是要对人民群众的好恶有明晰的认识,并以此来察验朝政的得失。具体说来,即人民有疾苦,必为之

除去;人民可能遭罹灾害,必为之提前预防;人民惧怕繁杂苛细的法令,就应当简政便民;人民面临穷困早夭的艰难处境,就得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让民众过上富足长寿的生活。总之,统治者应当“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2]24},一切政策的兴废与调整,皆以百姓的实际需要为准。如此,政令所出,皆顺“民心”,天下共享其乐,百姓同受其惠。

当然,范仲淹“政必顺民”的主张并非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实际内容。

1.“政必顺民”的基础是“养民”

基于少年时期的坎坷经历,范仲淹对人民群众的生存境况格外重视,屡屡劝谏统治者应当全力“养民”,即为人民群众提供能满足基本生活的各方面条件。《尚书·大禹谟》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7]范仲淹对此诠释道:“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2]481-482}范仲淹认为,圣人之德最关键的呈现在于推行“善政”,而推行“善政”的紧要处即在于“养民”。又《周易·系辞》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8]179}范仲淹顺此阐述说:“是以天地养万物,故其道不穷;圣人养万民,故其位不倾。”^{[2]217}这是将“养民”视为圣人得位、国家得安的根本保证。

所以,范仲淹在《阅古堂诗》中写道:“耕夫与樵子,饱暖相讴吟。王道自此始,然后张熏琴。”^{[2]60}所谓“王道自此始”,明显是对《孟子·梁惠王》中的“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5]5798}一句的化用。以此可知,“养民”在范仲淹眼中实具有“王道之始”的重要意义。

2.“政必顺民”的关键是“利民”

为了更好地阐发其“利民”的主张,范仲淹将《周易》的“损益”之道创造性地诠释成“损上(君)益下(民)”之道。如范仲淹的《易义·损》说:

《损》,山泽通气,艮为山,兑为泽。其润上行,取下资上之时也……然则下者上之本,本固则邦宁。今务于取下,乃伤其本矣,危之道也。损之有时,民犹说(悦)也,兑为说(悦);损之无时,泽将竭焉,兑为泽。故曰“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2]123}

损卦䷨,其卦名的取象是从湖底挖土往山上堆,即“取下资上”,范仲淹将其引申为剥民以奉君。依此,范仲淹表示,民虽处下,而实为邦本,故不可过度取民之财。如果一味地损民以利君,必然会使民力困竭,这无疑是毁国之根基、陷国于险境,所导致的

将是《国语·周语》中所言的“川竭山必崩”^⑤的后果。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范仲淹在诠释“益”卦时郑重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益》,刚来而助柔,损有余而补不足……自上惠下之时也。天道下济,品物咸亨;圣人下济,万国咸宁。《益》之为道大矣哉!然则益上曰《损》,损上曰《益》者,何也?夫益上则损下,损下则伤其本也,是故谓之《损》。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固其本也,是故谓之《益》。本斯固矣,干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长矣。下之益上,则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则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2]123-124

益卦䷗,震下巽上,上卦尚余二阳,下卦仅有一阳,所以范仲淹说“刚来而助柔,损有余而补不足”,益卦所喻示的正是这“自上惠下”之时的情境。君王居上,富有四海;民众居下,所拥或未及一室。损君上以益下民,则君上损耗无几,而下民得惠实多,此即“圣人下济,万国咸宁”。范仲淹接着分析说,损卦因其损下益上、损民利君有伤“邦本”而得名“损”,益卦因其损上益下、损君利民巩固“邦本”而得名“益”。换言之,是“损民”还是“益民”,构成了损、益二卦的命名标准。况且,损君利民本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其利而利之”,是可以持续不竭的。至此,我们便可以明白,大“益”之道的核心要义就在于损上益下、损君利民。万民皆得其利,国便可得其安,这对于统治者来说,难道不是“无往不利”吗?

而在《易义·兑》中,范仲淹进一步强调道,只有做到推恩敷惠、一心“利民”,才能让君民上下和谐欣悦,进而助推“王道之治”大得亨通:

《兑》,泽重润而上下皆说(悦),君子推恩敷惠之时也。夫说(悦)万物者,莫说(悦)乎泽。今复重之,民说(悦)而无疆者也。劝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敷惠,则“顺乎天,应乎人”,而王道亨。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劳;威以犯难,民重其死。[2]128

兑卦䷹,上下皆兑,犹两泽相连,寓意万物受到湖水滋养而和悦。范仲淹将其施于人事,诠释为君民“上下皆悦”。所以,此卦在其眼中所喻示的便是“君子推恩敷惠之时”的情境。《周易·说卦》云:“说(悦)万物者莫说(悦)乎泽。”^{[8]197}兑卦两泽相重,交相浸润,这意味着民众此时能够遍受执政者政策之恩惠,其内心自然会生出无限喜悦。范仲淹循

此而指出,执政者必须学会推恩敷惠以利民,才能顺天应人,敦劝天下百姓,造就王道盛世^⑥。如果统治者不仅不“利民”,反而还以苛政威权强加于民,让民众无法安身立命的话,那么民众只会想着如何惜力保命,而绝不会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效劳,此即范仲淹所警诫的“威以先民,民重其劳;威以犯难,民重其死”。

3.“政必顺民”的根本是“爱民”

范仲淹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爱民”思想,认为统治者必须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去爱护百姓:

爱民则因其根本,为体则厚其养育……谓民之爱也,莫先乎四体;谓国之保也,莫大乎群黎……今我后化洽风行,道光天启。每视民而如子,复使臣而以礼。故能以六合而为家,齐万物于一体。[2]425-426

范仲淹强调,只有以仁爱之心对待人民群众,给予其真切的关爱与保护,统治者才能缔造“六合为家”“万物一体”的丰功伟业,而国家也能由此长期保持繁荣、安定与统一。在《尧舜率天下以仁赋》中,范仲淹更是以尧、舜之治为例,将这个道理讲得非常明白:“穆穆虞舜,巍巍帝尧。伊二圣之仁化,致四海之富饶。协和万邦,盖安人而为理;肆觐群后,但复礼以居朝。当其如天者尧,继尧者舜,守位而时既相接,行仁而性亦相近。”^{[2]424}尧、舜畅行仁义、爱护百姓,方令四海和平富饶、人民和睦安康。而未能像尧、舜一样胸怀“爱民”之心的统治者,必然无法将“政必顺民”的施政宗旨长久地付诸实践。如此,自然也就无法追三代之高、成就“王道之治”了。

二、“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

宋末元初的大儒牟献曾称誉范仲淹“博通六经,尤长于《易》”^⑦,观诸范仲淹现存的经学论著,亦以易学为最多。可见,易学在范仲淹的经学思想中实具有柱础般的地位。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本来就是一部言“变”之书。如《周易·系辞》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8]187}这是说,《周易》这部书不可须臾远离,天地万物始终在流转变迁,不可执求于常规,只有变化才是永恒。《周易·系辞》还指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8]180}。此语揭示了天道、人道的一个

重要原理。就天地之道而言,万事万物发展到极端(尽头)时,会发生新的变化,只有变化才是长久之道。就人道而言,遇到困穷时,就要学会改变,改变了就能通达,通达了才能长久。这是《周易》指导人们认识世界的至理名言。可见,在易学的视域中,变化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通过深入分析范仲淹的易学论著,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易学诠释始终笃守着《周易·系辞》所揭示的“变易”宗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其独具特色的易学思想体系。如在《四民诗·士》中,范仲淹曾指出:“阴阳有变化,其神固不测。”^{[2]26}而在《穷神知化赋》中,范仲淹又阐述说:

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变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无穷……大《易》格言,先圣微旨。神则不知不识,化则无终无始。在乎穷之于此,得之于彼……稽恶盈而是则,将应变以何疑?^{[2]433}

范仲淹认为,“变化”是世界存在的方式,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人既然生存于这充满变化的世界,就应该主动地通其变化、成其变化。“稽恶盈而是则,将应变以何疑”中的“恶盈”二字取自《周易·谦》卦象传“人道恶盈而好谦”^{[8]60}。为人之道,厌恶自大盈满,自大盈满就不会有进步。因此要想不断进步,就要不断变化提升自己。在《易兼三材赋》中,范仲淹强调道,“唯变所适”是治《易》用《易》的基本原则:

昔者有圣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观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卦于彼。将以尽变化云为之义,将以存浩静精微之理……观其象则区以别矣,思其道则变而通之。上以统百王之业,下以断万物之疑。变动不居,适内外而无滞;广大悉备,包上下而弗遗。至矣哉!无幽不通,唯变所适。^{[2]437-438}

在范仲淹看来,《周易》一书涵括了天地间万事万物运行变化的规律,可以上统“百王之业”、下断“万物之疑”,可谓是“广大悉备,包上下而弗遗”。所以圣人通过“仰观俯察”创作《周易》,其目的就是让人们树立变化、变通的世界观,能认识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而有所作为。易道从根本上来讲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只有遵循“唯变所适”的基本原则,人们才有机会达致“无幽不通”的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在范仲淹现存的涉《易》文献中,对“唯变所适”原则的探讨是数见不鲜的。如在《天道益谦赋》中,范仲淹总结说:“盛衰之应也,惟

变所适”^{[2]446};而在《铸剑戟为农器赋》中,他又提出:“露颖者惟变所适,馀刃者复归于无。”^{[2]427-428}在推崇《周易》“唯变所适”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范仲淹还创造性地将《周易》的“穷变通久”之道,由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诠释成专门针对政治、社会改革的指导思想。这既是范仲淹易学的创新之处,也是其现存文献中讨论最多的议题之一。如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四月写给皇太后刘氏与宋仁宗的《奏上时务书》中,范仲淹便依托《周易》的“穷变通久”之道,试图劝谏统治者发起“文风改革”运动:

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是故观虞、夏之书,足以明帝王之道;览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亦此之谓也。伏望圣慈,与大臣议文章之道,师虞、夏之风。况我圣朝千载而会,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2]172-173}

范仲淹指出,每一时代之文风皆与此一时代之世风相呼应,因而每一时代之世风是敦厚还是浇薄,便会立即体现在文风上。这样,阅读虞、夏两代之书,便足以明悉圣帝明王的治国理政之道;而观览南朝宋、齐、梁、陈之文章,亦足以知晓衰败淫靡之风的危害。因此,圣人治理天下,往往十分注重对文风的规训与引导,文采过度则以朴实救之,朴实过度则以文采救之。在“文弊”或“质弊”产生之时,如果不以圣帝明王为典范,及时地采取“文质相救”的办法进行补救与调整,任由其不断发展下去,就会因文风之“弊”引发世风之“弊”,最终积重难返、难以自救,以致天下大乱、兵祸绵延。北宋建立之后,国家重归一统。但自真宗朝开始,由杨亿所引领的“西昆体”盛行天下,士大夫纷纷以“六朝之细”为尚,“专事藻饰,破碎大雅”^{[2]158},诚可谓是“文弊”甚矣。所以,范仲淹在给统治者的上书中特意援引《周易》的“穷变通久”之道作为理论根据,呼吁朝廷应当在“文弊”未至不可救药之前赶紧进行“文风改革”,引导士大夫“兴复古道”,从尚“六朝之细”到师“虞、夏之风”,这样才有可能救“斯文之薄”,培植出追迹“三代”的敦厚世风。

当然,随着范仲淹对北宋政治、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不断深入,他敏锐地意识到,要化解当时的社会困

境,仅仅通过改革文风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持变通之数于天下”^{[2]268},方能成就“当世之务”。也就是说,范仲淹逐渐确信,只有发起全方位的政治改革运动,才可以让北宋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从而彻底摆脱积贫积弱的危险处境。又如,在天圣五年冒哀上呈宰执的《上执政书》中,范仲淹心急如焚地说道:

某窃览前书,见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汉之衰,奸雄竞起,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兴也,如周汉焉,其衰也,亦周汉焉……然否极者泰,泰极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惟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岂徒然哉?^{[2]183}

正如周、汉、李唐有其兴亦有其衰一样,天下事物总是否极而泰、泰极又否,呈现出盛衰循环的规律。范仲淹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圣人早就通过解《易》,提出了“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穷变通久”的关键处在于“变”,只有主动打破陈规,因势而动,顺时而“变”,才有可能跳出盛极必衰的“历史周期率”,进而成就长久之业。若不知顺应其“变”,使得朝政走向败坏穷极,又怎能实现长久不衰?由是,范仲淹强调道,“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是圣人在创作、诠释《周易》的过程中为在上位者提供的治理天下的要旨,这岂会是徒然无效的呢!

《周易》的革鼎两卦是专讲“变革”的卦。《周易·杂卦》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8]202}尤其是《革》之《彖》还旗帜鲜明地讴歌了“汤武革命”^{[8]124}。因而在《易义》中,范仲淹通过对革鼎两卦的诠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其“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如在《易义·革》中,范仲淹指出:

《革》,火水相薄,变在其中,圣人行权革易之时也……天下无道,圣人革之以反常之权。然而反常之权,天下何由而从之?以其内文明而外说(悦)也……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乱,以天下之说(悦)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无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听矣,其汤武之作耶!^{[2]125}

革卦☱☲,离下兑上,离为火,兑为泽,泽下有火,是极度反常之事,必不可长久,说明变革将至,故而范仲淹认为此卦喻示“圣人行权革易之时”。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极度反常之事莫过于“天下无道”,

圣人于此时不会拘守成规,而是灵活地顺应时势变化发起革命。那么,为什么人们愿意跟着圣人进行革命呢?范仲淹解释道,革卦内离外兑,离为丽,象征文明,兑为说(悦),表示喜悦,这说明圣人乃是凭借其内在的美德而使人民向而往之,故而愿意跟随他进行革命。而对于圣人能革命成功的缘由,范仲淹也作了细致的分析,总结为以“文明”革其“昏乱”,以“天下之说(悦)”革其“四海之怨”,以“至仁”革其“不仁”,以“有道”革其“无道”。一言以蔽之,以“德政”革其“暴政”,故能“顺乎天而应乎人”^{[8]124},成就伟业,取得成功。范仲淹的论述,既指明了汤、武发动“革命”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抢夺大宝之位,而是在反常之世修仁德、行仁政,“天下归心”的自然结果,又阐明了在天下无道、弊政丛生的情况下,圣人领导革命以“德政”更替“暴政”的举措是完全正当与合法的。再看《易义·鼎》:

《鼎》,以木顺火,鼎始用焉,圣人开基立器之时也。夫天下无道,圣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兴,制作兴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鼎为义,表时之新也。汤武正位,然后改正朔、变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务,其此之时欤?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圣人之新,为天下也。^{[2]125-126}

鼎作为礼器,是至高权力的象征。因此新铸鼎器,乃是新生政权建立的宣示。所以,范仲淹认为此卦喻示“圣人开基立器之时”。革卦表示变革的过程,鼎卦则说明变革已成,新的法度与秩序陆续建立,即“汤武正位,然后改正朔、变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务”。至此,范仲淹特意强调“圣人之新,为天下也”,圣人革旧创新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天下百姓——这既是圣人发动革命的初衷,也是其革命得以成功的根本保证。

综合范仲淹对革、鼎二卦的诠释,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观点:在朝政走向穷极、天下陷入无道之时,只有以至仁之心推行改革或发动革命,才能解除困境,重新走向长久之治。这样,当范仲淹置身于北宋仁宗朝“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2]474}的内忧外患之中,其所念念不忘的解决之策便是通过改革弊政来重新实现长治久安。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宋仁宗开天章阁,“召对赐坐”^⑧,范仲淹终于迎来了将自身的改革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在“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开篇即指出:

臣闻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何哉?纲纪浸隳,制度日削,恩赏不节,赋敛无度,人情惨怨,天祸暴起。惟尧舜能通其变,使民不倦。《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穷塞,则思变通之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2]473}

范仲淹认为,任何朝代,当其政令制度沿袭日久时,必然会因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而逐渐生出弊端。弊端日积月累,就会造成“人情惨怨,天祸暴起”的危险后果。因此,统治者应该要像尧舜一样善于改革陈旧的器用制度,才能使百姓进取不懈^[9]。接着,范仲淹直引《周易》的“穷变通久”之道来说明凡事穷塞就必然需要变革、只有变革才能通畅长久的道理,为“庆历新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据此可见,《周易》的“穷变通久”之道始终是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及其改革实践的根柢与灵魂。

三、“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

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因其《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169}的名言而妇孺皆知。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便已经对“忧乐”问题有所论述。如孔子曾感叹:“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4]5383}让“忧乐”不只是作为一种情感而存在,而与道德修养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了“忧乐”思想,如其指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5819}将与天下百姓同“忧乐”确立为统治者“王天下”的必备条件,体现出鲜明的天下情怀与“为民”倾向。除此之外,孟子还提出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5]6010}等重要命题,为“忧乐”思想注入了忧患意识的鲜活元素。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正是在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

范仲淹的忧乐思想既以“先忧后乐”为宗旨,这便意味着在其思想体系中“忧”相对于“乐”来说更具优位性,“忧”所承载的意义也更为深沉。范仲淹忧乐思想中的“忧”,首先是忧国忧民之“忧”,表现出范仲淹强烈的家国情怀。范仲淹少怀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

天下”^[10]。这份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让范仲淹在身居州县小官时即不顾安危荣辱,屡屡向当权者上书直陈朝政得失,以求改革弊政,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如在《奏上时务中》中,范仲淹说道:“直言之士,千古谓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谓之佞。今臣勉思药石,切犯雷霆,不遵易进之途,而居难立之地者,欲倾臣节,以报国恩。”^{[2]172}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又坦言:“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2]182-183}入京身居谏任之后,范仲淹更是“说言直节,奋不顾己”^[11],遭逢三黜,亦毫不畏缩。如其落职饶州则表示:“智者千虑而有失,愚臣一心而岂周……然而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2]343}转任润州又自陈心志云:“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2]344}在给友人的信中,范仲淹亦说:

某念入朝以来,思报人主,言事太急,贬放非一。然仆观《大过》之象,患守常经。九四以阳处阴,越位救时,则王室有栋隆之吉。九三以阳处阳,固位安时,则天下有栋挠之凶。非如艮止之时,思不出位者也。^{[2]629}

大过卦䷛,下巽上兑,卦中四阳过强,二阴过弱,乃“大为过甚”之象。此时须阴阳互济,才能保持平衡与和谐,万不可各自固守“常经”。如大过卦九四以阳处阴,以刚济柔,故其爻辞曰“栋隆,吉”^{[8]84}。范仲淹指出,这是因为九四敢于突破常规、“越位救时”,所以王室才有“栋隆之吉”。而大过卦九三本在下卦之极,又以阳居阳,刚亢过甚,故其爻辞云“栋桡,凶”^{[8]84}。范仲淹认为,这是因为九三“固位安时”,所以天下才有“栋挠之凶”。至此,范仲淹强调调道,在朝政有失的“大过”之时,作为儒士应当心忧天下,积极“越位救时”,而不能像艮止之时一样,只是沉默不语、安守本位而已。也正是在这种赤诚报国、不惜“越位救时”的家国情怀的支撑下,范仲淹之后西守边陲则击退强敌、定倾扶危,跻身执政则思固国本、推行新政,直至临终之时,仍念念不忘“以竭遗忠”^{[2]378}。

范仲淹忧乐思想中的“忧”,同时也是“生于忧患”之“忧”,反映出范仲淹深沉的忧患意识。如《易义·家人》云:“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后孝悌大兴焉……然则正家者,贵闲其初也。”^{[2]122}家人卦䷤,主要阐发“治家”之道,范仲淹创造性地将“正家”与“孝悌大兴(修身)”“成国”“天下”连通起来,使其

与《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相契无间。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谈到“正家”的措施时,范仲淹特别强调“贵闲其初也”。“闲”,防闲也^[12]。这是说初九是家人卦之始,亦即“治家”之始,此时最应该防恶于初,亦即“防恶于未萌”。

在《易义·遯》中,范仲淹又阐述道:“阴进阳退,二阴进之于内,四阳退之于外。柔佞入而刚正出,君子遯去之时也……君子知吉之先,辨祸之萌,思远其时也,可不遯乎?故《遯》之为义尚乎远也。是以最在内者,有‘遯尾’之危;最在外者,有肥遯之利。”^{[2]121} 遯卦䷠,从卦象上看,是二阴进之于内(内卦),而四阳退之于外(外卦),有“柔佞入而刚正出”的意味,故而范仲淹认为此卦所象征的是“君子遯去之时”。在这样的情境下,君子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于灾祸萌生之初便须立即辨察,及时隐匿而去,方能避祸得吉。所以,遯卦以应时远遁为尚。例如,遯卦之初六居于最内,在祸乱发生时来不及遁去,其爻辞遂警诫有“遯尾”之危;而遯卦之上九高翔远引,全身而退,其爻辞则大言有“肥遯”之利。这里所反映的是一种不与奸佞为伍、明哲保身的思想。

另外,在论解震卦时,范仲淹还指出:“《震》,雷相从而兴,震动万物,内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惧之时也。万物震,其道通焉;君子震,其德崇焉。君子之惧于心也,思虑必慎其始,则百志弗违于道;惧于身也,进退不履于违,则百行弗罹于祸。”^{[2]126} 震卦䷲,上下卦皆为震,有“天雷滚滚”之象,故范仲淹认为此卦“威动万物”,所喻示的是“君子心身戒惧之时”的情境。迅雷震慑万物,使之警惧而不敢妄行,万物因而得其亨通;君子若惶恐震惧,必不敢胡作非为,故其道德品质也会因此而日臻完美。由此,范仲淹强调,如果君子身心内外能时时保持恐惧修省的状态,那么他自然会养成慎始惧初、遵行法度的优良品性,这样他的思想心志便不会违背正道,他的言行举止也不会招来祸患。

在范仲淹看来,人们无论身处何种情境,只有常怀忧患之心、思虑必慎其始,才能做到应时而动,完成“正其家”“成其国”直至“天下定”^①的儒者事业。所以,在《与九国博》一信中,范仲淹告诫说:“《易》所谓‘忧悔吝者存乎介’是也。虽纤微,亦能使人忧悔。”^{[2]597} 信中所引《易》文出自《周易·系辞》,其意是说忧念“悔”“吝”之象在于预防纤介小疵。范仲淹借此而引申说,即便是小疵小失,也能让人忧惧悔恨,因而在平日安居之时,亦须时刻保持忧患意

识,以防备小失酿成大祸。这一道理既适用于修身,亦可推之于治国。如天圣三年四月,其时品阶低微的范仲淹看到宋廷因太平日久而即将陷入“人不知战,国不虑危”的危险情形,便不由得忧心忡忡地向统治者上书力谏:

圣人之为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唐明皇之时,太平日久,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大寇犯关,势如瓦解,此失武之备也……圣人当福而知祸,在治而防乱。故善安身者,在康宁之时,不谓终无疾病,于是有节宣方药之备焉;善安国者,当太平之时,不谓终无危乱,于是有教化经略之备焉。^{[2]173}

范仲淹指出,圣人治理天下,都是文教与武备两者并重、相济而行,从不偏废一方,因为这两者都是天下的根本。历史上,唐玄宗李隆基早年虽开辟盛世,但中年以后因贪享太平而忽略了加强武备,以致安史之乱爆发,朝中无可可用之兵,唐朝遂由此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于是,范仲淹向统治者劝诫道,圣人在安定祥和之时,便开始着手防备祸患,在灾乱没有产生以前,就已经做好了平定灾乱的预案;善于养生的人,在健康安宁的时候,不会认为永无疾病,而是随时备好药品、以防不测;而善于治国的人,在太平无事之时,不认为会永无危乱,而是时时勤政化民、防灾备患。其言下之意,便是希望统治者不可端居太平、无所作为,而是要吸取历史教训,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勤政治国,强兵备战,以防不虞之灾。另在《润州谢上表》中,范仲淹还说:

臣按大《易》之义,《坤》者,柔顺之卦,臣之象也,而有履霜坚冰之防,以其阴不可长也。《丰》者,光大之卦,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见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臣考兹前训,虑于未萌。当危言危行之秋,有寢昌寢微之说。谓大臣久次,在进退而得宜;谓王者万几,必躬亲而无倦。^{[2]344}

坤卦䷁,六爻皆阴,是纯柔之卦,为臣之象,但其初爻“履霜,坚冰至”说明了阴气积渐而至坚冰的道理。坤卦《文言传》依此爻义而发挥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8]33} 这是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大恶并非一朝一夕铸成的,而是由于君父不曾早日辨别的缘故。又丰卦䷶,下离上震,“明以动”,为“光大之卦”,是君王之象,但其爻辞中却有“日中见斗”之戒,即日正中天之时发生日全食,表明君上的光芒

遭到遮蔽。借助对这两卦的诠释,范仲淹劝谏君王,统率百官要时刻防微杜渐,使之进退得宜,避免因臣下邪心积渐而让自身遭受咎害;治国理政更须日日精勤,即使事务繁多也要躬亲无倦,以免因懈怠或君权旁落而让国家产生祸乱。一言以蔽之,只有时时“虑于未萌”,才能“多弭未然之患”^{[2]377}。

当然,范仲淹忧乐思想中的“乐”也并非只是感官之乐,而是蕴含着“道义之乐”。其实,范仲淹《谢转礼部侍郎表》中的“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2]374}一句,便可作为其忧乐思想的注脚来理解。在宋代,范仲淹大概是最早对“孔颜乐处”这一命题进行讨论的思想家。如早在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时年26岁的范仲淹尚在睢阳书院苦读,就曾写下“瓢思颜子心还乐”^{[2]62}的诗句,表露出践行“孔颜乐处”的心志。“孔颜乐处”的核心意旨在于君子“固穷而乐道”。如范仲淹《易义·困》说:“困于险而不改其说(悦)……其惟君子乎,能固穷而乐道哉!”^{[2]125}这是说,在困穷、危难之时还能始终坚守道义、修美己德并且不改其乐的人,大概只有君子吧!范仲淹此言一方面是在阐释易理,另一方面也是在自述其人生信念。如其因危言鲠论而致满朝见怒,却依旧不动于心,只是“惟责己乐道”,并说“君子皆有通塞,孔孟不能逃,况吾辈耶”^{[2]638};又如其虽“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2]181},但常年被贬谪于外,不得行其道,则始终自励云:“惟君子为能乐道,正在此日矣。”^{[2]641}

总之,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经过时间的淬炼,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所共同崇仰的精神丰碑,时刻感召着无数仁人志士胸怀家国、心忧天下。

结 语

毛泽东曾指出,范仲淹一方面与诸葛亮一样,是具备经世大才的“办事之人”,另一方面则和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一般,是精研六经的“传教之人”^⑩,其一身而兼能臣、名儒等多重身份。长期以来,对于范仲淹的道德功业、“能臣”形象,“无论士大夫争为传述,即妇人女子具能言之”^{[2]1171};而对于范仲淹的经术文章、“名儒”身份,学者们“真能知者盖寡”^{[2]1449}。通过上文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范仲淹在“创通经义”方面确有不俗成绩——他通过诠释《周易》等经著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了先儒的一些重要思想,这些思想不仅贯穿于范仲淹的经学论著之中,同时也构成了其经学的核心思想,并主

要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必顺民”的民本思想;二是“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三是“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

作为宋代士人中集经术、事功、道德、文章于一身的第一人^⑪,范仲淹经学的核心思想蕴含着其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深刻思考与人生智慧,既紧贴经学文本,又坚实立足于北宋仁宗朝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并且始终以复行“王道”为宗旨,不管是对当时的现实政治,还是对“宋学”的兴起,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此言乃是对司马迁观点的归纳,参见司马迁论公孙弘语:“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950页。②关于范仲淹易学思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姚瀛艇、李保林:《范仲淹的〈易〉论》,《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第62—68页;张善文:《衍易理以成章——论范仲淹赋作中的易学内涵》,《洁净精微之玄思——周易学说启示录》,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9—160页;杨亚利:《“庆历易学”发微》,《周易研究》2004年第4期,第71—80页;杨亚利:《范仲淹〈易〉论对〈易传〉奠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发扬光大》,《理论学刊》2008年第7期,第65—68页;刘越峰:《范仲淹的解〈易〉特点及其对学术风气的影响》,《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第64—67页;范丽琴:《范仲淹〈易义〉解〈易〉的方法和宗旨》,《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90—95页;朱汉民:《范仲淹易学的宋学精神——从玄学易理到宋学易理的转型》,《哲学与文化》2017年第3期,第81—93页;等等。关于范仲淹春秋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罗炳良:《范仲淹与北宋〈春秋〉学》,《东岳论丛》2009年第8期,第143—149页;侯步云:《范仲淹〈春秋〉学考略》,《兰台世界》2011年第7期,第76—77页。关于范仲淹中庸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张培高:《范仲淹的〈中庸〉诠释及其影响》,《哲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53—60页。其余涉及范仲淹经学研究的成果尚有不少,限于篇幅,不一一述及。③从专门之学《尚书》而言,南宋至清代学者如吴棫、朱熹、梅鹗、阎若璩等人考证,今传《尚书》中有二十五篇伪《古文尚书》(如《五子之歌》《大禹谟》等篇)为魏晋人所伪造,但其文多有独一无二的格言警句,提炼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尚书》研究者认为,伪《古文尚书》也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利用了若干先秦时期的思想资料,因而伪《古文尚书》的一些名言警句仍然被作为先儒思想加以引用。范仲淹时代,《尚书》辨伪活动尚未开始。故其所引伪《古文尚书》之文(如下文所论及的《大禹谟》一篇),笔者只作为中华思想资源处理,不刻意区别其真伪。此处所引文本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30页。④《管子·牧民》阐述了管子的“四顺”思想,其文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旧题为管仲:《管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页。⑤此为《国语·周语》所载伯阳父论周亡之辞。其原文为:“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

民乱之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27页。⑥范仲淹一直期望实现“王道之治”，如其在《上执政书》强调“儒者之学，非王道不谈”。范能潜编集，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⑦牟献：《牟氏陵阳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6页。而且，《宋史·范仲淹传》亦指出范仲淹“长于《易》”。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67页。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三年九月丁卯”条载：“上既擢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上再赐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丁卯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31页。⑨《家人卦》之《彖传》云：“正家而天下定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2页。⑩毛泽东曾指出：“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毛泽东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选（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零年十一月）》，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3页。⑪此处有参考陈植锷之观点。陈植锷在《北宋文化史述论》一书中指出，范仲

淹是北宋著名人物中第一个成为综合型人才的儒士，其知识结构包括儒学、文才、吏才、德行等多个方面。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4—25页。

参考文献

- [1] 吕中. 宋大事记讲义[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89.
- [2] 范仲淹. 范仲淹全集[M]. 范能潜, 编集. 薛正兴, 校点.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 [3] 朱熹. 答周益公[M]//朱子全书:第21册. 朱杰人, 严佐之, 刘永翔, 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689.
- [4] 论语注疏[M]//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 阮元, 校刻.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5] 孟子注疏[M]//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 阮元, 校刻.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6]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7] 尚书正义[M]//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 阮元, 校刻.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283.
- [8] 周易正义[M]//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 阮元, 校刻.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9] 黄寿祺, 张善文. 周易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736, 739.
- [10]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333.
- [11] 李之亮.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49.
- [12] 许慎. 说文解字注[M]. 段玉裁,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589.

The Core Thoughts in Fan Zhongyan's Confucian Classic Studies

Jiang Guanghui Tang Chenpeng

Abstract: Fan Zhongyan was the first scholar of the Song Dynasty who was excellent in classics, merit, morals, and writing. Because Fan Zhongyan was too brilliant in his personality and career at that time, his achievements in Confucian classics covered up, so he was not studied by scholars for a long time.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Fan Zhongyan's Confucian classics, but most of them have explored and explained his Confucian classics thoughts from the single discipline of Confucian classics, such as the studies in terms of *The Changes*,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Making an in-depth analysis of Fan Zhongyan's Confucian classics thought, it can be found that his core thoughts mainly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of "Zheng Bi Shun Min", including the content of supporting the people, benefiting the people, loving the people, etc.; Second, the reform thought of "Qiong Bian Tong Jiu", which takes the theory of "In difficulty, you will change; change, you will smooth away difficulties; smoothing away difficulties, you will develop smoothly" in *Zhou Yi* as the leading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Qingli Reform"; The third is the thought of "Xian You Hou Le", when you are in the government, you are worried about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and when you are not in the government, you are happy with the Heaven and with the Way.

Key words: Fan Zhongyan; Confucian classic studies; people-centered theory; reform; worries and happiness

责任编辑: 涵 含

文化安全主体的现实境遇及其当代变革

易华勇 韩璞庚

摘要: 主体逻辑旨在从主体的内在尺度出发把握对象性关系,同时运用过程具有明显的指向性与规范性。因此,主体逻辑能适应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的规范导向而成为重要的建构原则。准确把握文化安全主体的现实境遇,需要进一步探究文化安全主体的存在形式,即在文化层面规定个人安全认同、明确社会安全结构和勘定国家安全边界,此三者共同构成文化安全主体,并协同指向文化扬弃实践和安全机制规范。同时,还需厘清文化安全主体由于历史局限而存在的现实问题,即形而上的怠倦形态与无规则的失序样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指引下,文化安全主体的存在方式需要实现从孤立性伸张到交互性的变革;不同层次的主体由孤立向联结的跃迁能够有效规避历史局限,推动实现文化本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交互性主体在发展中更符合文化安全体系建构的客观规律,能让文化安全主体在冗杂的场域中回归本真的现实轨范。

关键词: 文化安全;主体;境遇;变革

中图分类号: A8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117-08

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重大又现实的组成部分,意指保护本国文化形态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与侵犯。目前来看,学界通常从文化内部发展的客体视域来展开对文化安全的研究,成果多数聚焦于文化自身的发展脉络与客观状况。但是安全作为文化安全的应然状态,其真正的存在意义却在于主体场域中所表达出的对象化、实践化的行动结果。与此同时,只有主体形成对文化的常态化、理性化掌控,才能确保文化安全的根本实现。因此,文化安全应当以主体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结合安全的语境揭示出主体与客体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彰显出文化安全主体应有的存在形式和价值属性。文化安全主体的历史本质具有规定性和标志性。规定性是指文化安全主体的实质力量被对象化后所呈现出来的存在和诉求,并且作为客体文化的镜像而显现,具体解构为个人安全认同、社会安全结构和国

家安全边界三个层次;标志性则是指文化安全主体应有的职责功能和价值追求,主导协同走向文化扬弃实践和安全机制规范。由于主体的多维性与环境的复杂性,在文化安全的建设过程中容易出现一定的现实束缚,其主体演绎出形态怠倦与样态失序的历史局限。

为更好地担负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当代文化安全主体应当实现从孤立性的伸张到交互性的变革。这种变革既要有观念上的交织,又要有实践上的互动。内在关系的交互意味着文化安全主体之间产生接合的雏形,能够在联结中清晰、准确地把握主体真正的责任内涵和逻辑空间,克服主体的怠倦与失序,以回应新的时代特征与安全需求。通过引导文化安全在主体维度的跃迁,能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达成主体祛蔽的伸张与超越的建构,让文化安全在冗杂的场域中回归合理稳

收稿日期: 2024-04-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国家文化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研究”(23BKS126)。

作者简介: 易华勇,男,法学博士,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副教授,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江苏南京 211189)。韩璞庚,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44)。

定的主体轨范;也能适应文化安全体系中主体行动是把握本真状态应然手段的客观规律,探赜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方法论和前进方向。

一、文化安全主体的存在形式

文化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是文化安全的出场逻辑。从主体维度出发,文化安全的历史本质是文化扬弃实践与规范安全机制的演绎过程。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其存在形式解构为文化层面的个人安全认同、社会安全结构与国家安全边界,并显现出文化安全主体的具体特征。文化认同、文化结构和文化边界是文化安全中不同类别主体的实质力量被对象化后所展现出来的存在方式和价值诉求,通过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次的主体呈现来共同维护文化安全。一是个人主体的认知产生安全意识从而激起人类对文化内涵与价值意义的省思,个人的自我意识外化形成文化归属感并开始规定文化安全认同;二是为适应多元化的现实要求,社会主体维护文化环境并明确文化安全结构,不断地审视文化发展的动态环境和价值规律;三是国家主体在安全架构中勘定文化安全边界,从而科学应对入侵的文化观念与文化思潮。在主体性的分工发挥下,个人、社会和国家共同自发性进行文化扬弃和规范安全机制,合力维持文化安全体系的功能与秩序。

1. 规定文化安全认同的个人主体认知意识

大历史观视域下,作为历史性存在的文化与文化安全都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认知。依据认知理论及其发展趋势,文化认知是在批判传统认知范式基础上对认知活动的重新界定^[1]。文化本身作为客观存在的观念集合既是人类理解和获取的意义体验,又是追问和反思的实践载体,根植于具体现实的历史,并且决定着特定时代的精神风貌,因此文化在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就已经产生。但个人文化安全意识的显现,相对于文化发展而言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在人类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个人的安全意识受到生产力的制约,只是在宗亲纽带的联系中偶然出现立场对立与斗争冲突,这种现象是极其罕见的。因为原始状态下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的人性原则隐匿了个人更高层面的文化安全意识。在早期曲折发展的文化进程中基本没有显现出个人的文化安全意识,这种历史现象和规律放在整个人类的社会历史视野中也是如此。所以文化安全是文明时代的特定产物,是伴随资本全球化激活主权主义和

民族主义而出现的现代性问题。相对应的意识形态问题也并不是哈耶克概括的所谓“自发自由”^[2]。随着个人文化认知能力的提升和安全意识的外化,个人主体对客体文化逐渐地产生理性的认知与情感,人类经过对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的省思形成阶段性的文化安全认同,并且成为个人主体内在把握文化安全的表现方式。文化安全认同在规范中挖掘出个人主体的自我驱动能力和对文化的把控手段,带来的强烈归属感与认同感是文化安全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文化安全认同的存在方式和境界追求还从个人认知和行为上支撑着文化安全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本体基础。

实践观视域下的文化安全认同从人的内在尺度出发来把握文化安全的原则,是通过个人主体的认知能力维护文化安全实践的重要方法论。文化安全认同是以个人主体作为出发点的,是主体在规范思维的驱动下通过反思到再反思对客体文化发展的认可状态。文化安全认同包含了情感认同和理性认同。情感认同和理性认同是阐发文化安全个人主体本质的切入点,同时也是文化扬弃实践的精神基础。情感认同是人们对某种对象所产生的诸如肯定、接受、满意、认可等积极的主观情绪,是提升主流文化安全认同的心理根基,使得个人对主流文化发自肺腑地赞同,并深化为自己的信念与信仰。情感认同是文化安全认同体系中的终端环节,其一经形成,主流文化就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精神支撑,更加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和免疫力,能够有效抵御非主流文化的侵蚀^[3]。而理性认同是通过演绎、分析和归纳等手段对既定的文化达成共识,是运用思维和智慧对既定文化进行接受和学习,并且对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进行不断深刻地省思。当情感与理性层面的文化安全认同作为体系中个人主体的方法论而存在时,这种归纳已然尝试超越文化归属感的原始动机,为进一步地将文化安全置于社会和国家的视域之中提供了前提条件。

2. 明确文化安全结构的社会主体维护

任何一种文化体系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文化安全在社会中的发展也是如此。随着现代文明的诞生和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冲突,社会层面的文化安全确定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初步形成了由社会属性支撑的动态文化安全环境。社会主体选择性地凝聚个人主体的文化安全共识,自发地在动态环境中编制安全的文化安全结构。社会群体的主体性是在

个人主体基础上实现的本质超越,现实的变化要求社会不断审视文化发展的动态环境和价值规律。正如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安全基于中国特色文化安全道路的目标要求,其实现路径在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这种进程既遵循文化建设客观规律,又独具本土特色,其关键在于社会主体对文化安全的明确定位与理性把握。因为当文化安全仅仅关联个人时,囿于个体差异和交流障碍,会存在着主体性遮蔽和对象性扭曲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本质是由个人主体层面的文化安全缺乏组织结构引导与梳理造成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文化安全从个人到社会的应用场景发生转向进而形成结构有一个相应的节点,这个节点立足于主体性在社会层面实现突破,而突破的关键点又在于社会主体开始从群体角度关联生产力决定的文化关系,着力关注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建筑,进而积极寻求文化的同一性,并且开始自发性地维护文化安全的社会环境。

由社会主体维护的安全结构是文化安全核心的内部屏障,决定着整个社会文化安全氛围的形成和走向。在现实中,仅仅个人主体一味地对文化进行伸张和防范,会割裂主客体之间的整体性联系,也会极大地降低文化安全建设的效能和价值。社会主体起到的作用在于通过明确文化安全结构来保持文化安全的场域性和连续性。一方面,在文化扬弃的基础上形成文化的安全场域;另一方面,通过引导和梳理来保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谐共生,有机地确保文化价值规律的连续性。社会主体的功能旨在将个人主体的文化安全诉求有机地编织成稳定结构。因为一旦结构不成形,会割裂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联系,从而使两者产生对立,进而会极大地降低民族精神的独立性。与之相伴,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也会逐渐流失。因为传统与现代之间一旦产生断裂和机械对立,就会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即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彻底清除传统,这种状态走向极端就是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二是为保护文化传统而拒斥现代文化,即在传统典籍或遗迹中抱残守缺,这种状态走向极端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4]。就社会层面文化安全的结构成型而言,社会主体的文化扬弃能超越性地对文化价值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从结构层面保护着文化安全建设不被边缘化和空洞化。此时社会主体的引导与组织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3. 勘定文化安全边界的主体政治架构

文化安全的国家属性决定了文化安全必定存在着安全边界。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有着广泛而又深刻的联系,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与隔阂。一旦文化交流与碰撞导致不同国家之间出现理念冲突与价值矛盾,就会产生本土文化流失、文化异质入侵、文化中心主义加固和文化例外等文化安全困境。在文化安全视域中,国家主体的诉求是保持政治生活的稳定与文化安全机制的规范,这就要求文化的安全发展必须与特定的政治框架相适应。这种必然性的嵌合为文化安全边界的勘定提供了充分前提,同时安全边界的显现也标志着文化安全体系的成熟。伴随着个人安全认同和社会安全结构的同步发展,国家主体通过外部防范与内部规范逐步勘定文化安全边界。从本质上看,文化安全边界是文化安全体系中最外部的屏障,国家主体经过历史的积淀演绎着文化分离—融合—分离的动态趋势,演变着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分界线,确立起文化安全国家主体的根基与范式。长此以往,为适应整个世界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现代性的发展,文化安全边界会被纳入富有生命力的弹性地带,推动国家安全机制的规范不断发生着显著变化。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延续力,支撑起了世界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巩固了中国的文化边界,但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文化场域的复杂度。当代中国开放包容的文化体系由于与外界不断地交流,文化观念日益多样、思想体系日渐复杂、价值取向日趋多元,文化安全边界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勘定中国的文化安全边界旨在科学应对入侵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思潮,协助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标识和精神家园。同时,文化安全是涉及国家文化认同与主权、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意识形态稳定和综合国力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主要关涉主权国家整体文化体系的运行和发展安全,特别是本土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文化产业以及公共文化实践等能否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或内部力量的侵蚀、操控和破坏,以及文化领域的立法权、管理权是否完整且不易撼动,进而有效维护国家的合法性、统一性和连续性^[5]。从文化安全的机制机理来看,勘定文化安全边界是整个体系至关重要的环节。对于当代文化安全的国家主体性而言,防范不足与规范不充分会导致国家文化生态更加复杂、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极大下降以及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失去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一旦处于防范形态的文化边界失效,安全架构会随之缺失甚至完全从内部瓦解,文化的“失语”或“无语”问题、文艺中泛娱乐化与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6]很有可能接踵而来。

二、文化安全主体面临的现实问题

主体作为哲学概念,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文化安全主体也是如此。主体视域为文化安全建设提供了全新的哲学反思维度,既能对当代的文化安全发展逻辑给出哲学解释和认识,也能给未来文化安全道路的建设提供方法论和指明方向。文化安全建设具有建构式与导向性并重的本质特征,同时置于现实而又冗杂的问题域之中,因此其主体的存在方式与功能稳定显得极其重要。随着社会历史的境迁,当代文化安全建设的战略价值和深层动机已经发生了改变,文化安全主体形式与内容中孤立的弊端随之开始凸显。一定的历史局限造成了主体之间的割裂,形而上的怠倦形态与无规则的失序样态开始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现代文明中,文化安全主体的现状已经开始无法适应与所涉及对象之间的应然关系:要么不顾文化安全的具体特点抽象地思考对象,背离规律地自由活动;要么脱离文化安全的对象化实质进行实践,用违反联系与发展的基本原则来对待文化。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文化安全主体往往因刻意追求价值的机械性而抑制思想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而传统性的共识往往又会阻碍文化安全与时俱进的理论诉求,导致主体呈现出形而上的怠倦形态;另一方面,文化安全主体职责功能的单一性破坏文化安全整体的流动度、通畅度和有序度,标签化的立场容易形成文化安全发展滞后的实践藩篱,造成主体出现无规则的失序样态。

1. 形而上的怠倦形态

主体对价值追求的机械性限制文化安全思想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突破,呈现出形而上的怠倦形态,并形成当代文化安全主体的现实问题之一。主体形而上的怠倦形态是指由于在价值追求机械性的历史背景下,被孤立的主体受制于传统落后的安全共识中,并且拘泥于相对安全的纯粹语境下。反映到现实中,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缺乏意味着主体单纯地追求安全形式而疏忽文化本身应有的时代进阶,忽视了文化安全与时俱进的理论诉求,而

文化省思理应实现文化本身的时代进阶。观念体系一旦遭遇桎梏,文化安全主体的存在方式就会陷入既被动又形而上的慵懒沼泽,从而不顾文化的具体特点而纯粹抽象地思考对象,在文化内部背离规律地自由活动。个人文化安全认同、社会文化安全结构和国家文化安全边界虽然具有相应的理论维度,但并不是纯粹的形而上理念,而是植根于文化安全体系历史变迁的深层理论建构,因此应当通过规定、明确与勘定的主体作用来展现真实的主体存在方式,进而规律性地指向现实中的文化扬弃实践和安全机制规范。

第一,文化安全主体的否定性匮乏,容易形成本末倒置的价值悬设。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进行的并屈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7]。怠倦形态下的文化安全主体也是如此。由于时代节奏的加快,当代的文化否定很容易停留在形式上和表面上,从而出现墨守成规或随波逐流的现象。例如,批量提出“有效维护文化安全”“重视文化安全”“正确认识文化安全”等标语口号,对文化入侵形式上的口诛笔伐等。这些现象从根本上来说都缺乏植根于现实的力度和扎根于文化的深度。目前来看,表层意识、简单形式和机械主义极有可能使个人、社会和国家主体成为推动文化安全发展出现危机的重要因素。因为一旦立足现实不够、深入文化不足,个人安全意识的蔓延、社会安全结构的引导和国家安全边界的活跃极容易在盲目中屈从,主体否定性的匮乏就会导致规定、明确与勘定的主体作用难以发挥,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文化安全的时代发展停滞不前。

第二,文化安全主体的批判性弱化,在抵制文化异质入侵时难以理性地把控批判的张力。对文化安全而言,文化批判的真正意旨在于用真理性和科学性形成文化安全的域阔,尊崇本心的同时剔除外来文化中的文化异质,在适应当今世界文化交流的基础上达到真正批驳意义上的主体性释放。其中,学术性批判、道德性批判和政治性批判要形成有机统一的文化批判整体。而怠倦形态下的主体批判不仅会丧失对文化本身所拥有的独立分析和判断能力,不注重文化批判既要自我革新又要汲取吸纳,同时还会割裂文化批判的功能性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功能性结构被瓦解,个人批判的浅尝辄止、社会

批判的方枘圆凿和国家批判的孤立无援就会构成文化批判的被动样态。另外,极度抽象化的主体存在方式不仅会脱离文化本身的具体特点,甚至可能会僭越现实的安全范围。在现实中,对文化怠倦的批判态度会带来严峻的形势,容易造成批判得不够彻底或者违背规律盲目批判的弊端。

第三,文化安全主体的超越性受阻,文化安全与时俱进的理论诉求容易被轻视。对文化安全而言,安全必然占据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但过度地、单一地强调安全也会制约主体对于文化本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压抑主体真正意义上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把握和传承“轴心时代”儒、道、佛的核心内容,完成对先秦诸子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等思想体系精髓的思辨性扬弃,与当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同时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性超越。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超越应当建立在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相统一的基础之上。而现实中的主体在超越层面很难突破机械性的价值追求,并相对受制于传统落后的安全共识中。超越性一旦长期被压制,怠倦形态的主体就会拘泥于相对安全的语境下,其缺乏超越性的建构则无法适应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应然关系,与此同时,文化也很难实现本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 无规则的失序样态

主体的运行一旦出现秩序混乱,就难以发挥合力形成流畅的体系,就会形成文化安全主体的无规则的失序样态。当文化安全主体职责功能的单一性破坏了文化安全整体的流动度、通畅度和有序度时,其标签化的立场会直接形成文化安全发展滞后的实践藩篱。反映到现实中,主体就容易脱离文化安全的对象化实质进行实践,同时违反联系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对待文化,进而影响文化安全的实践过程。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文化安全实践秩序的紊乱,造成当代文化安全的诸多矛盾与困境。文化安全归根结底要诉诸实践,但当代的文化安全在实践中面临着文化意识与文化形态、文化贸易与文化交流、社会思潮与文化交锋等诸多挑战,实践的场域也极度复杂。因此,失序的样态会导致当代文化安全主体在实践过程中乏力,主体对于职责功能中的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抽象与现实难以厘清定位,同时相互之间缺乏普遍的联系。

西方文化霸权的扩张对我国文化安全带来了一

定的挑战,这也暴露出文化安全主体的失序。从本质上看,西方霸权文化的扩张在一定范围内是由国家安全边界防范不足和文化赅续乏力引起的,也是个人文化安全意识薄弱的后果。用系统的眼光来看,这种现象暴露出文化安全主体认知性、防卫性和发扬性的匮乏,归根结底就是主体在适应当前文化环境实践中缺乏交织与互动。

文化安全主体在实践中必须贯彻主体之间相互联系与发展的原则,因此交织和互动是打破实践单一化、机械化桎梏的关键。因为文化安全的主体性意味着主体对文化的认知和再认知,既包括主体对处在无意识的自在状态的文化的主动意识和省思,又包括主体对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本真状态的内在把握^[8]。这种极具思辨性的文化扬弃实践极易很容易出现主体职责界定模糊、功能定位混乱等问题,从而导致主体失序样态的出现。没有联系就没有秩序,当秩序的丢失隔断了文化安全主体之间的联系与发展时,标签化的职责单一就会引发主体在实践中缺乏清晰的立场和明确的定位,这时文化思维的现实性力量就会被腐蚀,长久下去必然会破坏文化安全实践的整体进程,影响文化安全在实践过程中的流动度、通畅度和有序度。

三、文化安全主体的当代变革

人们实践活动的成败,一定意义上取决于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认识并解释世界,首先要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9]。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文化安全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否定自身的时代因素和现实力量,同时新的时代特征也必然会赋予其新的时代要求。维护国家安全只能在塑造国家安全中得到维护,维护不是消极意义上的国家文化安全防护,而是积极意义上的国家文化安全的系统性塑造与建构^[10]。国家文化安全的系统性塑造与建构,更加强调主体之间的联结与互动,更加要求主体从根本上适应主体行动是把握本真状态的应然手段的客观规律。这些条件与目标赋予当代文化安全主体新的时代要求与发展方向。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此背景下,掌握文化主动、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意义更加深刻,并且主体亟须根植于文化安全体系历史变迁的深层建构。与此同时,国家文化安全体系从内在机理与外部氛围都发生了重大变革,现实中主体之间迫切需要建立交互

性来实现联系的紧密应对和转型。因此,当代文化安全主体的存在方式应当发生从孤立性的伸张到交互性的变革;与之相应,文化安全主体也要重新确立起与时俱进的现实轨道。

1. 彰显交互性主体的合理性与时代价值

彰显文化安全交互性主体的合理性与时代价值首先需要阐释交互性主体。这不仅需要深度结合交互性的理论语境,而且要与当代文化安全的现实观照相呼应。从理论层面看,交互性主体指的是文化安全主体之间产生接合,个人安全认同、社会安全结构和国家安全边界形成有机的联结,同时动态地在发展中联系并在联系中发展,达成突破主体怠倦形态的实际转向。从实践层面看,交互性主体的存在形式表现在三种文化安全主体之间的观念交织与实践互动,并且在交互中拥有强劲的内驱力、修复力和作用力,能够在联结中清晰、准确地把握主体真正的责任内涵和逻辑空间,进而克服实践中的失序样态。规定个人安全认同、明确社会安全结构与勘定国家安全边界的主体作用要在交互中完全发挥出来。个人安全认同要从个人认知和行为上提升境界追求,将文化安全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的本体基础夯实到社会安全结构和国家安全边界当中;社会安全结构在维护文化安全社会环境的同时,积极完善引导个人安全认同与建设国家安全边界的组织协调;国家安全边界在适应特定政治框架的基础上,不仅要运用权威力和强制力规范社会安全结构的编织,而且要潜移默化地带动文化共情和文化共鸣,从顶层设计层面实现个人安全认同的科学化、理性化。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既涉及理念层面的文化安全认知,又关乎现实层面的文化安全状态。因此,考察文化安全体系中交互性主体的合理性,必须要深入论证其理念的适用性和现实的实用性。对于理念层面而言,交互性主体关系着对客体文化守正创新的主体认知思维,决定着中国本土文化的理论自觉以及在国际上的文化话语创新。对于现实层面而言,交互性主体涵盖着维持文化形态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与侵犯的秩序,确保文化的繁荣发展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客观状态。目前文化安全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极其重大,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交互性主体来积极回应文化安全可能或已经出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第一,从文化安全的认识论出发,文化安全体系中交互性主体存在的合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交互性主体更合乎文化安全中主客体的对立统一规

律。文化安全建设的应然状态要求主客体文化之间的真实关系是在相互对立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贯通,最后达到自觉和合理的统一。如果只强调主客体对立而看不到非理性的积极作用,就会漠视人类对生存的领会,陷入固化的同一性思维中;而如果只强调主客体的统一而看不到两者的对立,就会脱离现实,陷入理想的乌托邦^[11]。交互性主体与文化之间的多元对立不仅能够促进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释放,有利于实现客体文化本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客体文化对主体的反作用更加趋向于有利的方面。理念上一旦克服了认知障碍,主体职责的清晰定位与秩序的稳定和谐就会更加纯粹地统一到当代文化安全理论构建与实践发展之中,进而推动文化安全体系建设向前发展。二是交互性主体更能同时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表达文化安全诉求,更能准确地把握文化体系中科学和价值两个最基本的维度。交互性主体对文化客观性的协作能动把握,从整体上掌控着对文化认知的再认知、对文化反思的再反思和对文化实践的再实践。个人安全认同、社会安全结构和国家安全边界在交互性的引领下发挥着协同的文化安全作用,并在重视现实维度和超越维度的基础上形成辩证统一的整体,从源头上有效消弭文化安全主体的不充分性;与此同时,交互性主体对文化价值的审视维度更加宽泛,能更加坚守对文化道义的境界追求,更加有力地凝聚起在文化安全前提下应有的文化良知。

第二,从文化安全的实践论出发,文化安全体系中交互性主体存在的合理性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交互性主体能通过主体之间的激励与监督推动文化安全的科学实践进程,能通过协同筑基、组织与防范建立文化安全的实践范式,有效规避历史局限造成的主体“怠倦与失序”。二是交互性主体的主动联结有利于实现文化本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升华文化主动性来适应文化安全体系中主体行动是把握本真状态的应然手段的客观规律。三是交互性主体顺应不同层次的主体由孤立向联结的跃迁是历史必然性的选择,实践的真实互动意味着文化安全主体之间接合雏形的产生,能够在联结中清晰、准确地把握主体真正的责任内涵和逻辑空间,进而用来检验安全机制中认知、情感与行动的存在方式和境界追求。四是交互性主体能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在秉持开放包容和坚持守正创新中提供文化发展所需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

交互性主体的时代价值集中体现在立足理论与

实践的双重维度,积极回应文化安全新的时代特征与安全需求。文化发展和文化安全建设最终的目的都是思想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此而言,主体行动是把握文化安全本真状态的应然手段,旨在维持国家文化形态的稳定,进而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主体本身并不完全是手段,其也是文化安全的最终目的。为顺应时代的发展,适应环境的变化,克服文化安全主体的怠倦与失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因为国家文化安全需要系统性地塑造与建构,而在文化安全体系的塑造与建构中交互性主体能够不断激活文化安全建设的时代基因,为突破旧的框架和内容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力。对文化安全建设的战略方针而言,交互性主体同样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指导意义。交互性主体作用在文化安全中所呈现的是能动性主体与客观文化之间的互动共同体,这个体系不是一个僵化的固态模式,而是一个充满能量、永不休止地从伸张到超越、从否定到再否定、从反思到再反思的动态过程。在实施时代性、大众性、科学性的文化安全战略中,观念的交织和实践的互动能够更加确保文化安全主体的科学性与灵活性。因此,交互性主体不仅能发挥最大程度的主观能动性,探赜出文化安全的重要方法论和前进方向,而且能提供有效的逻辑思维与行动进路,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提供国家文化安全规范有序建设的现实前提。

2. 确立文化安全主体的现实轨范

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动态持久的安全状态,“是一个系统性、宏观性的概念,它是一个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动态过程”^[12],需要持续稳定地保护本国文化形态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与侵犯,或使其处于不受威胁和侵犯的状态。在引导文化安全主体迈向交互性的同时,还应当规范其运行的现实轨道,建立起与主体相适应的现实轨范。在悠久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国形成了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拥有独特的文化理念体系和道德规范标准,具有标识性的文化基础为文化安全主体的现实轨范打造出一定的根基。在此基础上,新时代中国文化安全建设在重视主体性的同时,还应当把握中国文化本身的根源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准确地定位交互性主体,扎根中国的本土文化土壤,培育出文化安全体系中真正意义上的警惕性、优越性和反思性。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本身具有显著的能动作用,其对个人、社会、国家的不同主体的反作用决定了文化安全建设

的复杂性,这就要求必须建立起植根于具体现实和历史传统的现实轨范,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文化风险隐患。历史和经验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引导文化安全在主体维度达成跃迁并完成适应当代要求的变革,即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通过交互性达成主体伸张的祛蔽与超越的建构,同时让文化安全主体在冗杂的场域中回归合理稳定的现实轨范。

战略价值与深层动机深刻影响着新时代文化安全建设的道路和方向。战略价值要为文化安全体系提供强大的内驱力,从而有条不紊地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而深层动机则要保障文化有序地传承和发扬、文化深层次的自我修复以及中华文明在现代的延伸与发展。为了与战略价值以及深层动机相适应,文化安全主体建立合理稳定现实轨范的重点应当在于“合理”与“稳定”。“合理”的关键由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来决定:一方面,要在我国的政治框架内保障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奠定文化根基;另一方面,要坚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保持战略定力和坚定意志,在国家文化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主动权。“稳定”的重点在于防范化解文化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保护我国的文化形态不受侵犯与威胁。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特别是面对外部讹诈、遏制、封锁与极端施压,文化安全建设在现实轨范中要坚持国家利益为重、国内政治安全优先,在稳定中展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安全的文化环境中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具体应当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文化安全主体的现实轨范应当明确时代的政治任务。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文化自信自强理论与实践的逻辑基础。交互性主体在观念交织与实践互动中坚持求真务实的文化创新精神,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营养,得到用之不竭的理论智慧和实践力量。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方向。文化自信自强是文化安全建设由实践探索上升到认识规律再回归实践的必由之路。只有文化安全主体准确把握了新的时代内涵,激活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从根本上保障实现全面的文化自信自强,才能使文化要素免于被威胁、侵蚀和破坏,为建立起规范的文化

安全机制奠定基础。

第二,文化安全主体的现实轨范应当开辟文化否定与文化批判的新境界。在主体实践中要避免两种极端:一是盲目排外,以保护本民族文化为由拒绝正常的文化交流;二是盲目媚外,这有丧失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安全的危险,甚至有意无意地沦为西方反华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帮凶^[4]。当文化安全主体在交互性的作用下形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时,就能摒弃职责与体系的不充分性和不确定性,哲学范畴也就转化为方法论和实践路径。在这一范围内,个人安全认同、社会安全结构与国家安全边界只有在科学理性地文化否定、文化批判与文化超越的基础上协同合作,才能共同维持文化安全的稳定性与有序性,进而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安全大格局大气象。

第三,文化安全主体的现实轨范要全面适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要求。从同祖同源与文化同源、同心同向与文化共生、同频共振与文化共鸣层面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13]。文化安全主体要在安全的体系中让文化真正成为引领人民观察时代、把握时代、领航时代的价值观,时刻关注主流意识形态的最新动向;同时,要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更长远的眼光中把握文化安全的建设规律和正确走向,让文化安全实践能够全面系统地解决文化发展的现实性问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推动国家文化安全体系与能力

现代化,积极发挥中国特色文化安全聚民心、稳意识、引进步、展形象的功能性作用。

参考文献

- [1]管云波.文化认知视域下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研究[J].中州学刊,2023(8):83-89.
- [2]侯惠勤.论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控[J].阅江学刊,2022(5):26-40.
- [3]唐爱军.论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6):125-135.
- [4]常晋芳.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主要矛盾和重大关系[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23-32.
- [5]孙英春.逆全球化趋向下的文化安全与文化治理[J].浙江学刊,2021(5):32-40.
- [6]王永贵,徐凯翔.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特点及未来趋势[J].阅江学刊,2022(3):6-18.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25.
- [8]韩沁钊.文化自为对文化自信的主体化建构[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2):167-176.
- [9]韩庆祥.哲学视域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理论话语权[J].阅江学刊,2022(2):5-14.
- [10]胡惠林.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塑造国家文化安全新格局:马克思主义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化[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0):29-42.
- [11]王晓升,任豆.论物化批判的四重路径: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实践运用分析[J].求是学刊,2022(3):50-60.
- [12]易华勇,邓伯军.新时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策论[J].江海学刊,2020(1):246-253.
- [13]刘洋.中国民间故事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21-29.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ntemporary Revolution of Cultural Security Subject

Yi Huayong Han Pugeng

Abstract: The subject logic aims to grasp the object relationship from the internal scale of the subjec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has obvious directivity and normativeness.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struction principle that the subject logic can adapt to the normative ori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system. Accurately grasp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subject of cultural security", and expound the existence form of the "subject of cultural security" from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that is, stipulating personal security identity, clarifying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security, and survey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boundary at the cultural level, the three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subject of cultural security" and synergistically point to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abandonment and the norms of security mechanism. At the same time, it needs to clarify the practical problems formed by the "subject of cultural security" due to historical limitations, that is, the metaphysical form of lethargy and the irregular disordered stat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 of building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existence of the "subject of cultural security" need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solation to interaction: for one respect, the transition of subjects at different levels from isolation to connection can effectively avoid historical limitations and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tself; For another respec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active subjects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objective law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ecurity system, which can make the "cultural security subject" return to the true reality in the redundant field.

Key words: cultural security; subject; circumstances; revolution

责任编辑:思 齐

论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符号化及文化意义

李鹏 周忠元

摘要: 嵇康名士形象的多方位立体解读与构建,主要完成于刘宋时期。陈寿《三国志》对嵇康记载简略,刘宋时期是嵇康事迹、传记撰写最为丰富的重要阶段。在刘宋时期,嵇康的形象更加固定,呈现出文化符号的特征。他们以绘画方式将嵇康名士形象可视化,以文学描写将其固定化,以“嵇生琴”等文学意象加以强化。相较于两晋士人对嵇康艺术的、审美的、毫无功利的、纯粹的欣赏与赞美,刘宋士人对嵇康的接受与理解则有其深切的政治动因。刘宋士人对嵇康的追念既是对现实的对抗,又是情感上获得共鸣与自我宽解、心灵寄托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嵇康的立体多重艺术形象及文化符号意义,影响深远。

关键词: 刘宋士人;嵇康形象;文化符号

中图分类号: K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125-08

魏晋时期,嵇康以风度、才学、德操等赢得无数拥趸,又因身为曹氏皇帝姻亲且拒与司马氏合作而罹受杀身之祸,令人扼腕叹息。他在世时即被视为偶像,临刑之日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请以为师,后世更有无数文人倾慕、仿效他的名士之风,并使其成为文学、艺术等创作中的重要题材。于是历代士人的嵇康情结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情结滥觞于两晋,又赓续于刘宋。而因时代之变局以及个人之际遇,刘宋士人在对嵇康的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中寻求超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从而成为嵇康接受史上的关键一环。

一、刘宋士人对嵇康名士形象的梳理

关于嵇康之事迹,陈寿《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传》即有载,云其:“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1]605}而据裴松之注所引文献,可知刘宋时期还可见《嵇氏谱》《魏晋

世语》,嵇喜《嵇康传》《嵇康别传》,虞预《晋书》,孙盛《魏氏春秋》《晋阳秋》等。可知此时是嵇康事迹、传记撰写最为丰富的重要时期。刘宋代晋而立,时人距嵇康所在时代未远,所睹文献自然可观,可惜如今多有散佚。所幸还有《世说新语》大量收集关于嵇康以及其追慕者言行的事迹,而为房玄龄等编纂《晋书》所借鉴。而依《世说新语》这本书的编纂背景及特点,可知刘宋士人对嵇康名士形象的梳理。

《世说新语》正文涉及嵇康的事迹共有30余条,其中“德行”“雅量”“赏誉”“容止”“栖逸”“简傲”各2条,“言语”“品藻”各3条,“文学”6条,“政事”“伤逝”“贤媛”“巧艺”“任诞”“排调”各1条。这些记载,囊括了嵇康的各个方面,涉及他的外貌容止、道德修养、文学成就、交游状况等,可以说是嵇康一生的人生线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光辉伟岸的名士形象。例如他以特秀之姿容、潇洒之风度赢得众人倾慕。《世说新语·容止》里说嵇康其人曰:“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

收稿日期:2024-03-15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创新团队项目“传统文艺精神蕴藉数字化实现路径研究”(2021RW023)。

作者简介:李鹏,男,临沂大学沂蒙学者、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团队研究员,临沂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山东临沂 276005)。周忠元,男,临沂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山东临沂 276005)。

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2]609}如此风度，自然拥趸无数，甚至好友之妻也被其折服：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2]679-670}

嵇康的人格魅力如此！嵇喜曾赞曰：“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1]605}豪迈随性、怡然自若的性格，让其能外物不挂于怀，喜怒不形于色。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不禁感叹：“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2]18}所以即使面对生死，嵇康亦不忧不惧，只叹惜《广陵散》即将成为人间绝响：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2]344}

魏晋士人，兼擅多才，嵇康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汉晋间史传考之，当时士大夫最常习之艺术至少有音乐，书法及围棋三者。”^[3]如嵇喜称嵇康擅长弹琴、写诗等。在嵇康看来，音乐和文学无疑是其排遣内心苦闷的重要方式，其《琴赋》称：“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4]140}嵇康书法成就亦十分突出。张怀瓘《书议》曾列善草书者八人，嵇康排第二^[5]，足见其对嵇康书法艺术的认同。

嵇康博览该通、学识渊博，既有艺术的修养，又有理论上的高度，如其《养生论》《琴赋》《声无哀乐论》，亦是文借人显、人凭文贵，其中观点时时被人征引，其人也公认为当世名家：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2]195}

或问顾长康：“君《箏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2]275}

许玄度言：“《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刘尹其人；‘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简文其人。”^{[2]480}

嵇康以其家世、才情、情操赢得世人尊敬。其忠孝两全，不以名利萦怀，任性自然。其访山游水、弹琴咏诗，与众好友徜徉于竹林之间，不忧不惧。所以“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2]652}。可以说，在《世说新语》一书的记载中，嵇康成为一个诗意的栖居的神仙般人物，这对同样追求理想人生的中国传统士人来讲，必然有着别样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东晋时期，嵇康更是受到了王导、谢安的高度赞扬。而他的一些行为更是成为士人行为的准则，如《世说新语·品藻》载：“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曰：‘先辈初不臧贬七贤。’”^{[2]537}不臧贬七贤，既是对竹林七贤不言自明的推崇，也是对他们德行雅量的效仿。又如《世说新语·德行》中记载，殷荆州被桓素击败后，咨议罗企生拒绝谢罪求生，其在刑场言：“昔晋文王杀嵇康，而嵇绍为晋忠臣。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而“桓亦如言宥之”^{[2]47-48}。这是借嵇康事以全孝道。对此余嘉锡先生评曰：“在有晋士大夫间，不愧朝阳之鸣凤。而临终不免逊词乞怜者，徒以有老母故也。忠孝之道，于斯两全。”^{[2]48}有意思的是，余嘉锡先生亦曾以“人中卧龙”评价嵇康，认为其因忠于魏室而死非其罪，是竹林七贤中品性最优之人。罗企生之忠孝似之，故亦得极高评价。而嵇康在时人心中之地位自可知矣！

《世说新语》的编纂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6]44}由此可知此应为刘宋时期在文化方面的一件盛事。一般而言，无论是记言还是记事，编者的思想倾向、认知态度等，皆可通过其编辑思想、编辑体例以及对事例的选择与评价体现出来。这个传统在历代史书中均有明显的传承脉络，在《世说新语》一书中亦得到很好的反映。从体例上看，其立类标目“归根结底还是由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学术风气和士人精神所决定的”^[7]。如其上中下3卷共分36门的分类和设置与人物品评之风关系密切；再就具体门类来看，其上卷首列4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乃是孔门四科，这与刘宋时期儒学的复兴不无关系。加之中卷9门如“方正”“雅量”“识鉴”“品藻”“规箴”，下卷23门如“容止”“自新”“贤媛”“任诞”“简傲”等列目编辑文献的方式，明显反映出编者的褒贬评判之意。而从《世说新语》对嵇康事迹的收录来看，

上卷占12条,中卷占7条;下卷中其事例也主要集中在“容止”“贤媛”“伤逝”“栖逸”等褒扬之意明显的门类中,共计7条。余下“任诞”“简傲”“排调”等共计4条,其中只有“简傲”中1条系嵇康所为,即其慢待钟会一事。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2]767}

其实表现出的也是嵇康的招祸之由。然而率性之行为如阮籍之清白眼,也颇合当时名士的做派。所以,嵇康在《世说新语》中的形象是非常正面的,为名士风范的理想代表。可以说,《世说新语》的编纂使得嵇康的形象在刘宋时期更加鲜明生动。

从《世说新语》一书中,我们也可看到士人的嵇康情结自晋代而来良已有之。对此徐公持先生曾指出:“嵇康天才卓出,‘风姿清秀,高爽任真’,又独立特行,其风采魅力,实汉末以来诸名士所难伦比。加之其悲剧结局,更增添人们无限景仰同情,遂成为诸多士子包括闺阁中人的偶像式人物。”“到了两晋之后,虽然叙说、题咏嵇康者代不乏人,但因‘本朝’事件已经变为历史事件,政治忌避又已完全不存在,所以‘嵇康情结’反而逐渐冷却淡薄,再无两晋人士所表现出的那种激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嵇康情结’实为两晋时期特殊文化心理现象。”^[8]徐先生对于嵇康魅力的总结笔者深表赞同。而无论是言语交际还是诗文创作,确实是交流各方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一项社会活动,自然受社会政治语境的影响。所以,嵇康的行为,在追求名士风度的两晋时期,也的确更能引起其拥趸共鸣。加之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对嵇康的同情也有了西晋时期司马氏“诛夷名族”的一种反拨。从这个角度来讲,两晋时期对嵇康的追慕的确是有特殊的文化心理背景。但是也正由于两晋士人的推动,嵇康便具有了符号化意义。这是刘宋士人对嵇康名士形象梳理的初衷。正是由此开始,历代士人接受的也不仅仅是竹林名士嵇康,更是在体验一种人格、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同时,他们是在接受嵇康形象的基础上进行自我体认与解读,进而在与嵇康的同情共振中实现个体精神上的超越。于是历代士人在各自的历史长河中,通过不同的艺术呈现方式,不断地给自己的认知增加新的内涵,从而让嵇康形象更具文化符号意义。

二、刘宋士人对嵇康文学创作的接受

嵇康人格的魅力,也促进了士人对其文学创作的追捧。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魏氏春秋》称:“康所著诸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1]606}足见其创作深入人心。而又据《魏书·邴原传》注所引《冀州记》等文献考证以及嵇康文学传播史的梳理,可知其诗文“至迟到西晋时期已经结集,书名《嵇康集》”^[9]。东晋王导对嵇康《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文亦极为激赏。又如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其十五):“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4]24}诗境悠远旷放,飘然自得中极富诗情画意的浪漫和自洽。尤其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两句被广为传颂,乃至成为对嵇康本人极为经典的形象写照,令人叹服。于是这些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具有了跨越时空的经典价值,足以垂范后昆。

刘宋时期,嵇康的著述亦为文人广泛接受,尤其是其经典名篇的创作主题、文章构思、遣词用语、艺术手法等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人创作。如其《圣贤高士传赞》,嵇喜称嵇康:“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1]605}嵇康赞颂隐逸之士等,所以“浔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曾经为其作注,原因是他认为嵇康《高士传》“得出处之美”^{[10]2280},从而能够在这些人物身上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刘义庆《世说新语》亦有关于其记载:“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2]542}嵇康《圣贤高士传赞》之《司马相如》和《井丹》两篇分别有“长卿慢世,越礼自放”^{[4]666}和“井丹高洁,不慕荣贵。抗节五王,不交非类”^{[4]672}之评语。对此刘孝标注称二王所激赏之人物及赞语出自嵇康《高士传》。而袁粲,史称其:“清整有风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以自况。”^{[10]2230}其文从构思到主旨表达,与嵇康《圣贤高士传赞》写法相仿。就嵇康《圣贤高士传赞》的写法来讲,其继承史传手法,又往往借用寓言叙事。对此刘知几称:“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辞。至若神有混沌,编诸首录。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11]刘知几从史传叙事的角度批评嵇康《高士传》的所谓引书之误。但从文学

作品创作的角度来讲,其作为艺术手法似并无不当之处。就具体创作模式而言,嵇康《圣贤高士传赞》先介绍人物出处,再选取典型事迹,最后对人物总结评价。再看《妙德先生传》,其开头称:“有妙德先生,陈国人也。气志渊虚,姿神清映,性孝履顺,栖冲业简,有舜之遗风。”入篇便介绍人物,描写其性格特点等。然后以“狂泉”的寓言来进一步表现其不为人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无奈,这与嵇康亦可同频共振。至于其自称“性疏懒,无所营尚”^{[10]2230},与嵇康自称“性复疏懒”本无二致。文章最后点明他为何要改名,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品性追求的一种总结。其他作品,如袁淑有《真隐传》,主题亦类《圣贤高士传赞》。又如嵇康有《琴赞》称:“穆穆重华,记以五弦。”^{[4]561}谢惠连《琴赞》亦云:“重华载挥,以养民心。”^{[12]333}而颜延之《五君咏》称“吐论知凝神”应意指嵇康《养生论》,反映出与“清虚静泰,少私寡欲”^{[4]255}的人生境界的共鸣。至于嵇康诗歌中表现出的服食养性、寻仙访药等主题或者意象,在刘宋作家如谢灵运、鲍照等作品中亦不乏其例。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对此,我们可从刘宋时期王氏家族重要代表人物王微的创作来进一步分析嵇康创作对刘宋时期文人创作的影响。王微《与江湛书》等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了对嵇康的模仿:此文的创作缘由和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非常相似,都是拒绝被举荐为官。时任吏部尚书的江湛拟举荐王微为吏部郎,于是王微写信固辞。而就这篇文章的结构、主旨来看,也有很多参照《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地方。就文体而言,此两篇都为书信体。从结构上看,嵇文第一段首先点名写信的缘由:“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4]195}并称:“吾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4]195-196}也就是说嵇康认为山涛并不了解自己,所以写信告知他不要在升官之后做出有愧朋友之事。王微《与江湛书》也是开篇点题:“弟心病乱度,非但蹇蹇而已,此处朝野所共知。殆会忽扣华门,闾里咸以为祥怪,君多识前世之载籍,天值何其易倾,弟受海内骇笑,不过如燕石秃鹜邪?未知君何以自解于良史邪?”也是指责江湛根本不了解他,罔顾朝野共知的事实。而且也是在这一段中,王微称:“何为劫勒通家疾病人,尘秽难堪之选,将以靖国,不亦益器乎。”^{[12]174}指责江湛硬要举荐世交中的病人,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也有埋怨

对方拖自己下水的意思。嵇文在第二段主要列举事例阐明“循性而动,各附所安”^{[4]196}的道理,并指出自己个性疏懒,志不在仕途。之后第三段举阮籍的例子,并详细分析了自己不能为官的“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4]197},指出这些缺点都会使自己在官场上处于危险的境地。接着进一步表明,真正的知己是不会勉强自己的朋友做他不愿意的事情:“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4]198}最后一段则谈自己的打算,希望能过平淡的生活,培养好自己的孩子,自此傲啸山林,并与山涛从此绝交。王微《与江湛书》的构思方式与嵇文大致相当,他在这篇文章中,如嵇康一样也提到自己的本性不适合当官,很容易败坏朝廷的事情。也谈到自己的家人,希望能更多地陪伴他们。在谈到朋友之间的关系时指人的交往贵在心相知,而不是因为利益。最后也表明对江湛的态度:“生平之意,自于此都尽。”虽然作者说“非敢叨拟中散”^{[12]175},但此文事实上就是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翻版。又如《与从弟僧绰书》和《报何偃书》。《与从弟僧绰书》的写作不是为了绝交,而是在解释别人对他文章的误解。中心意思还是在表明自己本没有出仕的打算,更不在意自己的职位,并再次表明对江湛的埋怨。因为王微对江湛的责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担心也被他责怪的何偃而忙写信解释这件事情,于是才有了《报何偃书》,主要解释世人对他的一些不实的认识。信开头称:“卿昔称吾于义兴,吾常谓之见知,然复自怪鄙野,不参风流,未有一介熟悉于事,何用独识之也。近日何见绰送卿书,虽知如戏,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论。”^{[12]176}论朋友相知与不相知和嵇文的开篇何其相似!可以说,这几篇作品都表现出对《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的模仿。以王微的家世和影响,必然对嵇康在刘宋士人心目中的形象构建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艺术固化与符号化

应该说,刘宋时期《世说新语》的编纂对嵇康形象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其编纂者刘义庆和他所汇聚的众多文人,如张畅、何晏、鲍照、袁淑、萧思话、盛弘之、何晏、何长瑜、陆展等,皆一时才

俊。他们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刘宋士人对嵇康的态度,以及对嵇康形象的认知。于是无论是其为人风神,还是作文之雅趣,都成为时人效仿的对象。而这种情感,在文学艺术的多个门类中都有着突出表现。于是,在刘宋士人对嵇康的倾慕中,嵇康的形象也更加固定,从而具有了文化符号的特征。

首先,绘画与嵇康名士形象的可视化。嵇康形象在魏晋之时便已经常出现在绘画之中。东晋时期的顾恺之曾以嵇康的四言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为画,并称“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据《历代名画记》所载,他还有《七贤》《嵇轻车诗》等作品。至于晋宋时期的其他画家,戴逵有《白画嵇阮像》《嵇阮十九首诗图》,宗炳则有《嵇中散图》等。刘宋时期山水画的兴起也与玄学的影响有莫大的关系。张彦远称:“宗炳王微皆拟迹巢由,放情林壑,与琴酒而俱适,纵烟霞而独往。”^[13]其与嵇康何等相类?可知他们的情感与人生追求,不仅通过他们的生活态度,更通过他们的绘画表达出来。而出土的砖画可以印证晋宋乃至南朝士人对嵇康的态度。1960年发现的南京西善桥南朝墓,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帝陵或高级贵族墓。其出土的关于竹林七贤等人物的砖画被认为是南朝时期的作品^①。其中“嵇康左首绘银杏一株,与画上其它树木均作同根双枝形。嵇康头梳双髻,与王戎、刘灵^②三人均露髻无巾饰,双手弹琴,赤足坐于豹皮褥上”。“壁画人物的形象处理得很好,恰如其份地把八个人的独特性格,用他们最典型的表现刻划出来,神情生动。”^[14]从壁画呈现来看,其在描绘嵇康时能敏锐地抓住“嵇康弹琴”这一形象特征,充分表现出后人对于嵇康生平特点的认知。再就壁画上人物的排序来看,嵇康处于画作的中心位置,可见其地位。又根据专家的考证,竹林七贤之所以能够作为墓葬中的壁画,应该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对于竹林七贤的推崇有关。而出土的墓室砖画与顾恺之、宗炳等名士所绘嵇康画像相得益彰,这些足以说明当时人们对嵇康等人崇拜的程度。

其次,文学描写与嵇康名士形象的固化。刘宋士人对嵇康的倾慕也通过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加强其名士形象固化。“寻其轨迹,大致经历了由亲闻亲见到传之众口、最后形诸文字的过程,且经历了从零星言动的记录到系统传记撰作的转变。”^[15]就刘宋文学创作而言,《世说新语》等对嵇康逸闻趣事的记载无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具体的文学创作而言,还体现在对嵇康名士人格形象、典

故传说的刻画描写上。如傅亮《演慎论》称:“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绝羈独放,五难之根既拔,立生之道无累,人患殆乎尽矣。”^[10]¹³³⁹其中“抗心希古”出自嵇康《幽愤诗》,用以表达对嵇康秉持高尚情操的肯定。刘宋士人不仅以嵇康自比,还用以誉人。王僧达《祭颜光禄文》称颜延之:“栖志云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气高叔夜。严方仲举,逸翮独翔,孤凤绝侣,流连酒德。啸歌琴绪,游颺移年,契阔燕处。”^[12]¹⁸³文中的饮酒、弹琴、啸歌等,都是嵇康等人做派。其讲颜延之风神气度可比肩嵇康,甚至过之,对颜延之有过誉之嫌。却也表明刘宋时期嵇康仍然是当时士人的重要偶像,他们在作品中对嵇康加以讴歌赞叹,并以其作为人物品评的重要标杆。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宋文人的笔下,嵇康还有神仙化的一面。神仙化的嵇康自晋宋以来渊源已久。这与嵇康在创作中反映出的思想追求有关,如其《与山巨源绝交书》称:“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4]¹⁹⁸所以其诗作中也有“思欲登仙,以济不朽”^[4]¹⁴、“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授我神药,自生羽翼”^[4]⁸⁴等描写。鲍照《过铜山掘黄精诗》亦有“宝饵缓童年,命药驻衰历”之语。又《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采药游山泽以及寻仙访药等事,虽多有浮夸之言,但也可知嵇康在当时人眼中,其风神志趣犹如神仙般的存在。后来顾恺之在《嵇康赞》中讲道:南海太守鲍靓是个有道之人,东海的徐宁师事之。徐宁半夜听到琴声,便去询问鲍靓。鲍靓说是嵇康在弹琴,还说嵇康实际上并没有死,而是“尸解”了。所谓“尸解”,是道教中的一种成仙方式,即求道者遗弃形体而羽化飞升。在志怪小说中,亦颇多与嵇康相关的神怪传闻,如《异苑》《幽冥录》^③等:

晋嵇中散常于夜中灯火下弹琴。有一人入室,初来时面甚小,斯须渐大,遂长丈余,颜色甚黑,单衣草带。嵇熟视良久,乃吹火灭曰:“耻与魑魅争光。”^[16]⁶⁴⁴

少尝昼寝,梦人身长丈余,自称黄帝伶人,骸骨在公舍东三里林中,为人发露,乞为葬埋,当厚相报。康至其处,果有白骨,胫长三尺。遂收葬之。其夜,复梦长人来,授以《广陵散》曲。及觉,抚琴而作,其声正妙,都不遗忘。^[16]⁶⁵⁹

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尝夜在月中坐,临风抚奏。忽有一人,形器甚伟,着械,有惨色。至其中庭称善,便与共语。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卿下手极快,但于古法未合。”因授以《广陵

散》。贺因得之,于今不绝。〔16〕⁷³⁴

就南朝志怪小说而言,如干宝《搜神记》称:“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17〕可知时人是相信鬼神存在的。对此鲁迅先生在论及此时志怪小说时曾言:“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6〕²⁸可知刘宋士人对嵇康的神仙化也有比较高的认同。究其原因,有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也与嵇康本人的言行,以及其死后人们对他的同情有关。神仙化的嵇康,是士人在惋惜嵇康命运时所做的精神补偿。如颜延之《五君咏》之《嵇中散》:“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迥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铍,龙性谁能驯。”〔18〕在此诗中,颜延之称嵇康天生就具有得道成仙的禀性,自然能独秀于众人之上。他遗弃形体而羽化飞升,精神宁静专一。他身在世俗却与众人俗见不同。他的性格与鸾、龙相似,即使时常受到摧残,但本性却难以驯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颜延之对嵇康的高度评价与认同。

最后,文学意象对嵇康名士形象的强化。例如,嵇康与琴有不解之缘。嵇喜称嵇康:“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19〕而其作品中琴更是占有重要一席。如“琴诗自乐,远游可珍”〔4〕³¹、“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4〕¹⁰⁶等表明琴深入其生活之中。而《琴赋》则为赋琴之佳作,影响颇巨。至于嵇康临终抚琴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为历代文人所歌咏,乃至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由此,琴作为一个重要的伴生文化符号便和嵇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范晔临终自为诗中曰:“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10〕¹⁸²⁷范晔在宋文帝时期因刘义康事被收入狱,在这首诗里,他表示自己要像嵇康那样不惧生死,泰然处之。“嵇生琴”由此成为文学意象被固定下来。江淹《恨赋》更是把嵇康临终弹琴的形象写得格外的动人:“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昀。”〔20〕江淹自称“仆本恨人”,可知此文自抒怀抱之意。在这篇作品中,江淹分别列举秦始皇、赵王迁、李陵、王昭君、冯衍、嵇康等历史人物的哀伤愁怨。明人王世贞说:“每叹嵇生琴夏侯色,令千古他人览之,犹为不堪,况其身乎!”〔21〕嵇生琴与嵇康抚琴形象置于广袤的历史时空之中,

更糅进天人感应的情景,增加观者的情感共鸣。在文学创作中,嵇康的酒、竹林、龙凤等,都彰显着其魏晋风流的人格魅力和自拔于尘俗的无上丰神,从而让嵇康名士形象的文化符号意义更加彰显。

四、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文化符号意义

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定型与符号化在嵇康接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时士人对嵇康的倾慕不仅表现在对晋代名士风尚的倾慕和模仿上,也体现在嵇康名士形象的进一步固化上。刘宋代晋,门第、阶层等依然存在巨大的鸿沟,士人的思想观念仍有其固有的惯性,行为举止上有颇多模仿晋代名士之处,所以他们往往也表现出晋代名士风流的余绪。例如魏晋时期世风放诞,士人以嘲谑为戏。但往往表现出真名士的放浪形骸之表,对此葛洪称:“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侔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擗蒲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离绮繡纨绔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骏野。”〔22〕刘宋时期士族名士往往也有其“任诞”与“排调”。史书载何尚之与颜延之都身形短小,二人“问路人云:‘吾二人谁似猴?’路人指尚之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23〕。无论是嘲谑他人还是自嘲,其表现类于魏晋名士的那种放达心态。所以作为名士的嵇康,不仅是两晋士人的精神偶像,在刘宋时期亦受到士人的倾慕。这种倾慕,表现在刘宋嵇康情结与晋代士人名人做派的一脉相承上。两晋时期,嵇康的高士形象最先构建完成。而从《世说新语》《晋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嵇康的一些言行,如服食养生、隐逸寻仙、谈玄说理、任侠好义,以及嵇康的琴、嵇康的疏懒,乃至嵇康与朋友的绝交等,都被赋予了符号化的特征甚至是专属性的意味。刘宋士人就是在对这些文化符号的评鉴、效仿中,表达对嵇康的敬意以及对晋代名士的追慕,并以此自高于世。如王微,史称其“少好学,无不通览,善属文,能书画,兼解音律、医方、阴阳术数”〔10〕¹⁶⁶⁴,可谓如嵇康一样的全才。更重要的是他虽然“生自华宗”,但“栖志贞深”“身安隐素”“足以贲兹丘园,惇是薄俗”〔12〕⁴⁵。而王微对何偃的评价亦是“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10〕¹⁶⁶⁹。其他如临刑前故作轻松的范晔等人,亦表明此风影响之所在。而刘宋时人对嵇康的倾慕

与模仿,即使未得其神,也故学其行,从而使得嵇康的文化符号意义更加明显。

刘宋士人对嵇康的接受与理解有深切的政治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对嵇康的评价,更进一步深化了嵇康作为文化符号的价值。两晋士人对嵇康的欣赏,用的是一种艺术的、审美的眼光,甚至是一种毫无功利的、纯粹的对美好事物的赞美。他们对嵇康行藏与风神举止的接受,重在务虚而不以事务为怀,这是属于他们名士风流做派的重要表现。嵇康故作放达背后的俗尘之念,在东晋人悠游的山水之游中被自动消解掉了。而在刘宋时期,在欣赏嵇康人格美的同时,也倾注了相应的政治情怀。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也是一封政治宣言。如其“非汤、武而薄周、孔”^{[4]198}等于彻底与司马氏决裂,表明对魏氏政权的拥戴之意。刘宋政权由“老军卒”篡夺而来,其必然会引发权力格局与政治秩序的巨大变化,并进一步影响士人的言行。如傅亮“见世路屯险”而作《演慎论》,其文称:“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绝羈独放,五难之根既拔,立生之道无累,人患殆乎尽矣。徒以忽防于钟、吕,肆言于禹、汤,祸机发于豪端,逸翻铄于垂举。观夫贻书良友,则匹厚味于甘鸩,其惧患也,若无辔而乘奔,其慎祸也,犹履冰而临。”^{[12]251}这篇文章的写作缘由是傅亮感叹于仕途的艰险。他认为嵇康在避免人生的各种祸患方面已经做得很完美了,但就是对钟会、吕巽等人疏于防范,最后反受其累。其后列举庄周、晏婴、张临等人的例子:“故漆园外楚,忌在龟牺,商洛遐遁,畏此驷马。平仲辞邑,殷鉴于崔、庆,张临挹满,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览兹二途,则贤鄙之分既明,全丧之实又显。非知之难,慎之惟难,慎也者,言行之枢管乎。”^{[12]251}这其实是傅亮对刘宋政治的借喻。而其后的创作都有这种忧惧状态,如因为少帝失德,心中忧惧不安,而创作《感物赋》以寄意。据《宋书》,其在谋废少帝逢迎宋文帝时于道路赋诗三首,其中便表现出后悔惧怕之意。皇权的巩固,使得哪怕是王、谢这样的门阀世族也对时政开始变得审慎。王微《与从弟僧绰书》一文便表现了政治变局对他心理的影响。其称:“吾虽无人鉴,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语,前言何尝不以止足为贵。且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何为一旦落寞至此,当局苦迷,将不然邪!”^{[12]175}所谓“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语出有本。宋文帝诛杀徐羨之等人,定平谢晦,王昙首和王华出力很多,故要封赏王昙首等,但王昙首却坚持不受封赏,仍为侍中。因为怕权力过重遭忌而步

入徐羨之等后尘,王弘又上表推荐刘义康入朝执政,替代自己担任司徒。但刘义康却担心王弘、王昙首兄弟二人在朝中彼此响应,会削弱自己的权力,于是心中有所不满。觉察此事的王昙首劝说王弘把府中的一半士兵分给刘义康,以赢得其好感。可知在权力的对撞中,他们已经没有对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的辉煌自觉,更多了一份谨小慎微。而王微之所以写这封信给王僧绰,也是看到宋文帝年老,皇室权力争夺越来越激烈,处在朝廷中会有危险。事实也证明,举荐他的江湛最终在与太子刘劭的斗争中被害。观王微“三书”,其政治态度表现得虽然不像嵇文那么强烈,但字里行间也表现出时政的影响。但其不关政治对抗,只求保全其身,足见王微是真谨慎者。而王氏家族的另一人物王徽所作《野鸞赋》称:“尔乃湛淡扬澜,俯仰威畴,心矜远野,意惕近洲。”^{[12]173}其中“意惕近洲”语与前面俯仰自得之意志相对,颇含深意,正是这种谨慎心态的反映。

刘宋士人对嵇康的追念既是对现实的对抗,又是情感上获得共鸣与自我宽解的需要。无论是傅亮的忧惧还是王微的谨慎,他们都在内心构建着契合己身的嵇康形象。又如颜延之,《宋书》本传称其见到刘湛、殷景仁把持大权常常愤愤不平,言辞激烈而得罪了刘湛,因此被外派到永嘉做太守。颜延之非常怨愤,于是作《五君咏》。其在歌咏嵇康时说:“鸾翮有时铄,龙性谁能驯。”表达自己的不屈之意。而颜延之对嵇康羽化升仙的结局的认识,既表现出他对嵇康的同情,又给落魄失意的自己寻求了精神慰藉之所。元嘉时期的另外一个大诗人谢灵运也有对嵇康的吟咏。时谢灵运被诬图谋不轨,有反叛之意。谢灵运上书辩解,宋文帝明知他是被冤枉的但仍将其调任临川内史。谢灵运在调任途中写下《道路忆山中》,在这首诗中谢灵运回忆了隐居时放浪任诞、无拘无束的生活:“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颇与嵇康相类。称自己惬意于山水之间是他本性使然,不关外物。后作者以“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殷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24]671}做结,更是表明与嵇康相似的情感排遣行为。此诚如宋代刘坦之评云:“盖以今昔虽殊,而情不异也。”^{[24]672}《广陵散》虽然在嵇康之后无闻于世,然却以所奏之曲比之,故谢灵运以嵇康自况之意不言自明。明人张溥常将谢灵运与嵇康对比,称:“予所惜者,涕泣非徐广,隐遁非陶潜,而徘徊去就,自残形骸,孙登所谓抱叹于嵇生也。”^{[25]218}孙登曾称嵇康才能虽高,但保生之道不足,处于晋宋更替时的谢灵运颇类之。

张溥又称：“康乐死于玩世，怜之者犹比于孔北海，嵇中散。”^[25]²⁵¹其言可谓得之。

综上，刘宋时期在嵇康接受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创作等都处于转型时期，而无论是对嵇康史料的收集，还是时人对嵇康的仰慕与模仿，乃至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刻画，都表明延续于晋代的嵇康情结并没有淡薄。刘宋士人学习嵇康，或故作放达，或愤世嫉俗，或于山泽之游中悦志，或在琴诗酒赋中怡情，他们在欣赏嵇康的旷达风流时也倾注了更多的俗尘之念，并在对其悲剧命运的感喟中体悟世路的艰险。他们少了几分东晋时唯美的诗意栖居，却多了一分深沉的入世情怀，从而反映出刘宋士人心态以及南朝人文精神的嬗变。他们接受嵇康，虽然也褒贬不一，有时也仅仅得其形似，但无疑也强化了嵇康的文化符号价值，从而为自己找寻到了一份心灵的寄托。

注释

①对于南京西善桥官山“竹林七贤”壁画墓的时代，1960年罗宗真原发报告《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认为是晋、宋之际，后其于1994年出版的《六朝考古》认为是刘宋时期，2004年出版的《六朝考古》又改为梁陈时期。其他学者也有不同看法，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认为是东晋时期；日本学者町田章《南齐帝陵考》认为是刘宋时期；韦正《南京西善桥官山“竹林七贤”壁画墓的时代》认为是刘宋中后期；赵俊杰、崔雅博《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墓的年代与等级——以南京石子冈M5与西善桥官山墓为中心》认为是南齐晚期；王志高《简议西善桥“竹林七贤”砖印壁画时代及墓主身份》认为是齐以后；宋伯胤《竹林七贤壁画散考》则认为是梁以后。综上所述，其时间在南朝时期应当为确论。
②“刘灵”即“刘伶”。③《异苑》为南朝宋刘敬叔编著。《四库提要》称：“其书皆言神怪之事，卷数与《隋书·经籍志》所载相合。”“与《博物志》《述异记》全出后人补缀者不同。且其词旨简澹，无小说家

猥琐之习，断非六朝以后所能作。”《隋书·经籍志》亦载：“《幽明录》二十卷。”结合《世说新语》的编纂，故此书一般归于刘义庆名下。

参考文献

-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95-296.
- [4]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5]张彦远.法书要录[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8:123.
-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7]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41.
- [8]徐公持.理极滞其必宣:论两晋人士的嵇康情结[J].文学遗产,1998(4):36-45.
- [9]崔富章.嵇康的生平事迹及《嵇康集》的传播源流[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4):9-16.
- [10]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1]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81.
- [12]严可均.全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3]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586.
- [14]罗宗真.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J].文物,1960(Z1):37-42.
- [15]熊明.琴与嵇康文学形象的生成[J].贵州社会科学,2021(7):101-110.
- [16]上海古籍出版社.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17]李剑国.搜神记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9:17.
- [18]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7:1235.
- [19]熊明.汉魏六朝杂传集: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7:856.
- [20]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9.
- [21]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M].北京:中华书局,2006:1080.
- [22]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1:601.
- [23]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785.
- [24]黄节.黄节注汉魏六朝诗六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25]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On the symbolization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Ji Kang's Image in the Liu-Song Period

Li Peng Zhou Zhongyuan

Abstract: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Ji Kang as a famous scholar was mainly completed in the Liu-Song Period. Chen Shou's *Annals of The Three Kingdoms* briefly recorded Ji Kang, and Liu-Song Period was the most important stage in the writing of Ji Kang's deeds. In the Liu-Song Period, Ji Kang's image was more fixed,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symbols. They visualized the image of Ji Kang by painting, immobilized it by literary description, and strengthened it by literary symbols such as "Ji Shengqin". Compared with the artistic, aesthetic, utilitarian and pure appreciation and praise of Ji Kang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Dynasties, Liu-Song scholar's accepta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Ji Kang had its deep political motivation. Their remembrance of Ji Kang not only reflected the confrontation with the reality, but also the need to obtain emotional resonance, self-relief and spiritual sustenance, thus completing Ji Kang's three-dimensional multiple artistic images and cultural symbols, which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Keywords: Liu-Song scholars; Ji Kang's image; cultural symbols

责任编辑:王轲 长亭

邢侗与山左书法话语的建构和传播

刘中兴 林苑茹

摘要:晚明时期,区域间的文化认同感和竞争意识日益增强。为振兴山左书法,构建山左书法话语,以邢侗为代表的山左文人精英依托以“二王”为主的地域文化资源,积极进行书法复古实践,弘扬复古书风,加剧了晚明书法地域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记述和传承地方文脉的文化自觉意识引导下,邢侗亦积极参与地方性文化活动,为捍卫山左地域文化传统打造话语平台,促进了以复古和崇尚魏晋为核心的山左书学主张的传播。

关键词:邢侗;山左书法;建构;传播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133-08

邢侗(1551—1612),字子愿,号知吾,别号来禽、啖面生、济源山主,晚号方山道民,山东济南府临邑县人。邢侗擅长书法,饮誉万历书坛,与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并称“晚明四大家”,更与董其昌并称“北邢南董”。晚明时期,邢侗所在的山左地区受到鲁西运河的辐射影响,具有来自南方为主的多种外来的文化特征与社会因素。伴随着区域间的文化认同感和竞争意识的增强,书法地域多元化的特征日益凸显,呈现出以吴门为中心逐渐向周边区域延伸的发展态势。邢侗利用这些变化,在提高其个人声望的同时,借由自身的文化资本,以“二王”等地域文化资源为依托,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为捍卫山左地域文化传统打造话语平台,促进了以复古和崇尚魏晋为核心的山左书学主张的传播。

一、相竞又相融:文士交游与晚明书法地域化

晚明时期,虽然商业活动使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更为密切,但并未削弱各地区的区域特色^[1]。

就书法而言,其往往因地域、师承等原因而形成各种流派,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其中,明代的书法地域流派又尤以苏南为重,明中叶后相继崛起的吴门、松江二书派成为明代书法地域多元化的集中反映。

明朝中叶,活跃于苏州地区的吴门书派走向繁盛。祝允明、文征明、王宠、陈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被誉为“吴门四家”。王世贞在其《艺苑卮言》中多次提及吴门书法的兴盛:“我明书法,国初尚亦有人以胜国之习,颇工临池故耳,嗣后雷同,影响未见轶尘,吴中一振,腕指神助,鸾虬奋武,为世珍美,而它方遂绝响矣。”^{[2]7031}又有“吾吴中自希哲、征仲后,不啻家临池而人染练,法书之迹,衣被遍天下而无敢抗衡”^{[2]7051}。但至嘉靖后期,吴门书派因为在取法上多以文氏书法为圭臬,陈陈相因,日渐式微。事实上,早在王世贞发出“天下法书归吾吴”^{[2]7046}的自豪感叹的同时,就已有来自松江、休宁、岭南等周边地区的挑战,其中以松江书派的挑战最为激烈。

松江书派,亦称云间书派、华亭书派。吴门书坛鼎盛之时,松江书家陆深(1477—1544)秉持着强烈的地域乡土观念,曾云“国初书学,吾松尝甲天

收稿日期:2024-05-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美术史学史研究”(19ZD19)。

作者简介:刘中兴,男,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9)。林苑茹,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社会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湖北武汉 430079)。

下”^[3],提出“吾松”的地域书学概念,对松江地区优良的书学传统引以为傲。此时的陆深就已具有建立书派的前瞻性,大致勾勒出松江书法的早期雏形。此后面对吴门书坛的鼎盛,松江书家便一致将陆深作为典范,以与吴门书派分庭抗礼。松江书派的核心人物董其昌更是明确提出“吾松”意识,树立松江书法的大旗:

吾松书,自陆机、陆云创于右军之前以后,遂不复继响。二沈及张南安、陆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传世,为吴中文、祝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时之际,然欲突过二沈未能也,以空疏无实际故。余书则并去诸君子而自快,不欲争也,以待知书者品之。^[4]

国朝书法,当以吾松沈氏则为正,始至陆文裕,正书学颜尚书,行书学李北海,几无遗憾,足为正宗,非文待诏所及也。^[5]

董其昌将松江书法家追溯到西晋时的陆机,为松江书派彰显正宗,贬低吴门,这种共同意识体现了明代松江地区与吴中地区的地域书风之争。时人李银台便已注意到松江与吴门的派别之争,“苏人好立门户,才隔府便指作别派”,“无怪苏人,彼各有师承,或钟、王、欧、虞等,必宗一家,所执皆古法,所以今人不能屈”^[6]。虽时人将松江书家和吴门书家均称为吴人或苏人,却存在明显的流派之分。

在吴门书派的式微与云间书派的勃兴之间,徽州书坛也曾一度崛起。王世贞曾对徽州书坛不屑一顾:“歙之地,亦有习者。既贻讥大雅,终非可久。”^[7]由于徽州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学艺术日益繁荣,徽州籍书家群体不断蓬勃壮大,至晚明时已形成一定的影响。以詹景凤为代表的徽州休宁地区的文人极力宣扬徽州文化,并意欲与吴门一争高下,对王世贞推崇吴门、讥评徽人的言论进行批驳,批评吴门书派:“近日海内论书但说文、祝,不复知有魏晋,政与论学,但说程、朱,不复遑问邹鲁一尔,此其故。何哉?吴俗善自标致,相为引重,又地当东南都会,声易于传闻也。常人向声,疑目言耳,遂乃因陋乘便,逐流弃源。”^[8]¹⁰³

詹景凤认为吴门书家善于标榜,加之苏州地理位置优越,使吴门书坛声名远播,时人易被名声的假象所蒙蔽,人云亦云,由此吴门书法声誉渐隆。为彰显徽州书法,詹景凤更是推出徽州人朱熹:

尝见朱子竿牖数张,盖法鲁公《争坐》书,无论字体,即行边添注亦复宛然,此之好古而信,后世希见。

若今日吴中祝希哲、文征仲所缔造,求跻朱先生闾室,尚须乞元常灵丹五粒,令世上复活二十余年,临池水重黑时,倘可议也。然而两君名竟重于当世,则以国朝书学无人。^[8]¹⁰¹

除此之外,岭南书家也呈现出异军突起的态势,如陈献章及其弟子湛若水、屈大均、陈恭尹等人,成就卓著。同时,在万历年间北方书法进入了活跃期,邢侗主张捍卫山左地域书法文化传统,倡导以“齐风”为概念的新的书法风尚并进而打造北方新的书法话语中心^[9]。随后,米万钟也迅速在北方崛起,被时人称为“南董北米”。实际上不管是邢侗还是米万钟,他们的崛起,都一改明朝前中期北方书坛沉寂的局面。

此时,不仅地域文化竞争日益剧烈,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王弇州先生来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大约各称其伎,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奕、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槊、歌吹之属无不备。”^[10]各地区间的书法交流等活动,不少是借由文人结社、雅集品鉴等艺术活动而完成的。“明人重声气,喜结文社。”^[11]雅集结社是文人士大夫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明代士人因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等组成各种团体会社,数量众多,分布范围广。据郭绍虞先生统计,有明一代文人社团有一百七十余家,何宗美先生进一步考证总数超过三百家^①。书家大多是文人,结社和雅集活动不仅有助于书法创作,还促进了文人间的书法交流与探讨。“近有云间六、七君子,心古人之心,学古人之学,纠集同好,约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课,仿梁园、邺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规。”^[12]文士以诗书为媒,吟咏酬唱。此外,书家在雅集、品鉴活动中提升自身眼界并互相切磋学习。明代书画家张应文曾记载隆庆四年(1570年)吴中四大姓作清玩会,“余往观焉,一出文王方鼎颜真卿裴将军诗,一出秦蟠螭小玺、顾恺之女史箴、祖母绿一枚、淳化阁帖”^[13]。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邢侗与董其昌于舟中雅集唱和,品评法书名迹,来自南北的两位书法家互相探讨自身的书法观念与书学主张,体现了南北书风的交流与融合。

除结社和雅集外,书家的刻帖活动也促进了各地区书法艺术的发展。如无锡人华夏刻有《真赏斋帖》,被誉为“明法帖第一”^[14]²²⁰。此后又有文征明刻《停云馆帖》、邢侗刻《来禽馆帖》以及董其昌刻《戏鸿堂帖》等不胜枚举。私家刻帖的兴盛,既弘扬

了书家的个性风格,又为地域书风奠定了基础。邢侗请董其昌、王稚登等苏南名流为《来禽馆真迹》撰写题跋,还极大地促进了南北书法的交流与融合。

二、复古又尚晋:邢侗与山左书学思想

三吴地区作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书家辈出,书法活动频繁,成为书法艺术的中心地,甚至引领全国的书法创作取向与书法鉴藏趣味。邢侗虽然自幼深受齐鲁文化的熏染,但随着其仕宦生涯的发展,特别是在巡按三吴期间,浸润江南风气,感受到江南丰厚的文化积淀,与众多南方文人雅士雅集酬唱,也深刻地意识到南北文化差异:“江南之致,韶秀而藹靡;中原之风,雄劲而扶疏。”^{[15]442}邢侗对北方的不足也有清晰的认识:“北士深沉,往往病声俊而厌清谭。”“若夫饰椎文陋,倡雅成趣,则北士须之更棘矣。”^{[15]438-439}此外,邢侗任直隶苏松巡按御史期间,与众多南方书家的交游不仅影响了邢侗的书法创作取向,也使邢侗意识到“北人书多怒强气,南人书多挛缩气”^{[15]662}。此时江南吴门书派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在文征明去世后其后继者皆“文氏一笔书”^[16],难掩衰颓之势。邢侗也因此发出“吴门今乃寥寥矣”^[17]之叹。在吴门衰落时,江左地区的文人精英们,也致力于打造地域文化传统。

万历十四年,邢侗致仕归隐,在广泛的社交网络中,得以获观大量法书碑帖,极大地拓展了书法视野。同时亦专注于书法实践活动,书法素养和功底日益深厚,“笔力矫健,圆而能转,时亦有得”^[18],逐渐领悟到书法创作的内涵。加之众多复古派文人的影响,邢侗在赋闲乡居后便进一步提出了崇尚晋法的复古书学思想:

甚矣!书之难言也。降自史颀、次及三代,旨见迭出,用意玄微,笔法深奥,顾非后人所敢仰测而臆度者也。迨乎汉兴,典籍毕出,然见行于世者则后汉蔡中郎。邕得授嵩山八角垂芒之秘,故有古隶今隶之别,遂为书家鼻祖。晋自渡江以来则右将军王羲之,穷微入妙,卓然为千古书家之冠,后此虽有佳者,终不及也。隋唐五代几乎扫地矣。宋兴诸君子不能无辽璞之叹,下此吾不欲观之矣。^②

邢侗认识到以右军为法方为正道,此后便以毕生精力临摹“二王”笔法,“于右军书坐卧几三十年,始克入化”^{[19]2}。万历二十八年,邢侗致信好友李三才:“不肖留意此道四十年,自谓能窥典午门

风。”^{[15]701}标志着邢侗以“崇王”为中心的复古传统和取法魏晋的书学思想的成熟。“研精二王笔法,恒仿佛《十七帖》意,即其卷素所书,亦多述王帖,可谓极意临摹者矣。”^[20]同时邢侗亦致力于构建以“复古”为旗帜、崇尚魏晋的山左书法话语,捍卫山左地域书法文化传统,提升山左的文化地位。邢侗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突破吴门书法的框架:

文征仲差可比肩。祝京兆资才迈世,第颓然自放不无野狐。王贡士宠秀发天成,清池惠风,加以数年,未见其止。周天球秃颖取老,堂堂正正,所乏佳趣。王百穀道微不凡,未合古法。纵横前代得笔得韵,吾闻其语,未见其人。^{[15]659}

又认为:“书法我朝祝京兆放而不情,文待诏秀而不局,皆非晋书也。”^{[15]701}对于逐渐崛起的松江书派的核心人物董其昌,邢侗认为其书法也是“小下晋人一等”^{[15]665}。可见邢侗对其他书家的批评和挑战,皆是试图获得书法话语权的一种文化策略。

邢侗书法尤重右军,为重振晋法,他将恢复山左书法传统的策略点放在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时代。那个时代不仅是书法脉络的源头,还是山左乃至整个北方书法大放异彩的时代。邢侗对王羲之极为推崇,曾作《王羲之像赞》:“身儿亭亭,玄灵引气。恬淡精华,尺宅可治。法海四达,筋骨血脉。落落玉虚,千年友魄。童子服伏,丹楼侠日。道士仙人,忽入我室。遗像在图,徘徊瞻伫。染迹犹龙,永无涅滓。”^{[15]670}文中除描述王羲之书艺外,也体现了书法人格化的倾向,促进世人对王羲之的推崇以及对书法的再接受。邢侗曾对好友葛昕说道:“觚翰之长,群归江左;碑版之富,亦首金阊。”^{[15]447}

同时,邢侗通过私家刻帖树立复古尚晋的旗帜,以重建山左书法。万历二十八年,由邢侗主持刊刻的《来禽馆帖》历时十四年之久终于完成,其中主要收录“二王”法帖,在选刻对象以及编排方式上体现出明显的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邢侗个人形象的物化体现。《来禽馆帖》中以《十七帖》和《澄清堂帖》最为世所重。张伯英曾评论道:“《来禽馆帖》中重摹《澄清堂帖》数十则,及唐模《十七帖》二种最著。《澄清》视《戏鸿堂》本尤精湛。”“子愿深于书,选帖具有精识,摹勒亦出江南良工,以故迥异俗本。”^{[21]101-102}刻帖成为名品不易,明人赵宦光认为:“名帖易存,名石难得。非出于书家手勤,非名帖也;非出于精工手刻,非名石也。”^{[14]242}《十七帖》选帖精良,摹刻精湛,其摹石由邢侗亲自“悬

椎丝发惟愜”^{[15]664}，由吴门刻帖名家精心打造，因而邢侗认为其《十七帖》“竟树寰中赤帜”^{[15]725}，“后百余年当以十千享之。余非过作狡狴言，物固自有直”^{[15]664}。邢侗对刻帖的极高要求，从客观上起到了醇化“二王”书法的作用。

在刻帖的过程中，法书碑帖的选择、摹勒、刊刻到成帖作序等一系列环节中，均能见到地域性的甚至是全国性的文人精英参与的痕迹，这不仅是邢侗建构、展示其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还是其建构群体共识、增强群体认同感的重要手段。邢侗在《来禽馆帖》刊刻过程中邀请文人好友撰写序跋和评论，将其私家刻帖进一步公众化。张伯英曾具体阐释了私家刻帖的社会功能：“名贤遗墨传世无多，真且精者尤希见，非大力不能得，非鉴古有真识，所得亦不能尽善。藏者珍秘，非尽人所能获观，纵偶一得见，亦同过眼烟云。惟寿之贞珉不啻化身千亿，不胫而行于四方，人人得赏玩临仿，足慰好古之心，弥学者之缺憾，刻者亦借此以传不朽，洵一举而数善备。”^{[21]50}《来禽馆帖》刻成后通过名人雅士的推重和标举而声名远扬，凸显了邢侗的文化声望，成为一种可依托的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对邢侗在地方社会获得文化话语权大有裨益。

邢侗还与姻亲王象乾、葛昕等山左文人共同致力于山左书法传统的重塑和建构，试图改变“今世贤大夫往往谓中原一片地风，烈勋名胜而不屑于雕虫之技”^{[15]437}的看法。新城王氏家族王象乾主持刊刻的《忠勤堂碑版集古法书》、德平葛氏家族葛昕主持刊刻的《平昌葛端肃公家乘集古法书》，均有邢侗参与，由吴门刻帖名家吴氏父子在万历二十八年前后摹刻完成。《忠勤堂碑版集古法书》收录的法帖以晋唐书家为主，包括钟繇、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等人，如邢侗所言：“夫自魏而隋，若岁成以积闰。繇唐溯魏，犹正嫡以承祧，自余窃病其未驯，抑亦舍旃而不录。”^{[15]446}王象乾通过集古刻帖欲达到“宗之旧拓《圣教序》，而佐以《兴福》”^[22]之愿景，同时亦“恒欲揖永和之高步，复淳化之大雅”^{[15]446}，皈依晋法，彰显复古。邢侗将此法帖与江左刻帖相比较：“吴下号名文翰渊藪，令此等役付之则皮肤勾当足矣。安能次骨，谈何容易乎？”^{[15]735}此帖虽不能与精美优良的江左刻帖相媲美，却显示出邢侗等人的地域竞争意识。《平昌葛端肃公家乘集古法书》主要包括魏晋至隋末的古代碑刻，隋以后一概不选，正如邢侗在序跋中言道：“汉魏乃冠之钟傅，晋则断自王右军，萃六朝以溯隋

季。唐则多其付授，宋亦辑其偏长，下迨胡元，不乖余系一人。”^{[15]446}此帖刻成后，邢侗对葛昕言道：“从此平昌以幼明大矣，幼明用中原帜矣！”^{[15]447}其实早在正德、嘉靖年间，山左著名书家郭谏就已经有意识地收录大量“二王”等晋唐名贤法帖，“然论身后之遗，当于二王争流亦所得多矣，书散在天下者漫不可纪，类成帖如《四体千文》《同升歌》《叙古千文八分书》《集二王并晋唐名贤法帖》《草诀草韵》”^[23]。另外，郭谏作为嘉隆名臣葛守礼之师，对葛守礼影响颇大，此后葛守礼之孙葛昕在万历年间主持刊刻《平昌葛端肃公家乘集古法书》，可以说是山左书法人文传统的延续。

由于集古刻帖中的碑文用字来自书法经典，因而该刻帖活动可以说是对书法经典的翻刻，加之从形制上看集古刻帖并非丰碑大碣，其样式与一般传统简册无甚差别，易于把玩、传播，正如邢侗所言：“单碑介立，则腾播滞远；乐石杂陈，则简册斯便。”^{[15]445}因此能够“遂令般鬲之乡碑板走天下，若宝《淳化》《太清》然”^{[15]631}。又因为“北方学者多暗晦，寡交游，著述也不传于天下”^[24]，结社活动相对较少，邢侗等山左文人便巧妙利用北方的宗族优势构建山左地域书法文化。明朝陈子龙曾指出南北宗族的差异：“北方旷野，常百里民聚族于一村，非其同姓，即其亲戚，故相结易亲，相助必力。江南之民，散居于野，或一村不及数家，而比邻乃不相识。”^[25]邢侗等山左文人将宗族活动与集古刻帖相结合，“采名贤之妙迹，用光吾祖之彝章”^{[15]446}，以血缘、地缘、趣缘为媒介塑造地域书法，亦借助文化世家的声望与权力，广泛传播山左文人以晋法为宗的书学思想并将其转化为地域文化资源。除刻帖活动以外，邢侗还热衷于编纂地方志，撰写书院碑文和名宦碑记，为山左地方历史名迹题记，积极为捍卫山左地域文化传统打造话语平台。同时随着邢侗书名驰誉中外，在其广泛社交与应酬时，擅于将其复古又尚晋的书学思想糅合在书作之中，使其得以随书作而流传于文人圈中，扩大其影响力。

三、古风追随：邢侗与山左书学群体

邢侗高举崇尚魏晋和复古的旗帜，试图振兴山左书法，打破北方书坛沉寂的状态：

明盛以来，觚翰之长群归江左，碑版之富亦首金闾，似泛支流未穷本始。夫伯喈陈留占籍，孟皇安定为乡，茂先著于范阳，肩吾奋于新野，

柳谏生于京兆,萧郎望于兰陵。钟傅王羲,琅琊颖水,举世所知,已唯是介。碣丰螭瑰,篇伟制播,传北地滲漉。我人偶睹黄河一曲,文豹一斑,而谓昆仑为南发之源,泽雾非西钟之秀,斯则不达之甚也。〔15〕447

邢侗认为古代书法名家如蔡邕、钟繇、王羲之等人皆出自北方,北方才是书法的发源地。而明代以来,江左书法却独领风骚,北方书坛趋于沉寂,这正是“泛支流未穷本始”〔15〕447。因而邢侗在北方极力宣扬复古,一心崇尚以“二王”一脉为代表的晋人书风,试图为山左乃至北方地区争得书法话语权,形成与江南书法相抗衡的新局面。在邢侗复古书学思想的影响下,山左地区出现一批复古书风的追随者。

邢慈静(1573—1640),邢侗胞妹,“天资颖慧,博学善属文,诗有清致,画宗李卫管道昇,俱称绝品,与兄子愿齐名。海内一时士绅见片纸只字珙璧珍之矣”〔26〕。邢慈静从兄学习书法,受邢侗的指点颇多,“邢太仆有妹曰慈静,孀居,娴吟咏,尤工于书。余友龚廉仲廷煌自历下归,贻余慈静所临《兰亭序》石刻,用笔秀逸,盖得乃兄指授之益,巾幅能摹《褉帖》,自宋宪圣吴后后此其仅见者”〔27〕。不仅如此,邢慈静“书法酷似其兄”〔28〕,清峻秀拔,端庄朴茂,深得右军之神韵。明代末期著名书法家刘重庆曾评论道:“夫人褉帖,自是夫人帖,然而笔法婉劲。晋体独存,余不知于右军当年面目何似,然而视褉帖传世千百矣,后有真赏,或者其首肯于此言。”〔19〕10可见邢慈静对王羲之的书法艺术用力至深。邢慈静不仅有“善仿兄书”〔29〕7397之名,事实上,邢慈静书法足以比肩其兄。清代著名文人王士禛就认为“来禽夫子本神清,香茗才华未让兄”〔30〕。清代书家张照对邢慈静的推崇可谓是无以复加,“前明书家,愚以子愿先生为第一,其笔快也;而慈静夫人又快于乃兄一倍,敢不宝诸”〔31〕。

邢慈静为弘扬其兄邢侗的复古书风,不遗余力地收集邢侗书札墨迹,将其刻入《之室集帖》中,并在帖尾记述道:“生平笃嗜先太仆兄笔迹,至今病重尚勤寤寐,检笥得此,遂拭目双钩,命镌工刻之,匪曰不朽名书,聊借以便规昉云。慈静。”〔19〕10可见邢慈静不仅珍爱其兄书札,并且希望邢侗书法能够播誉流远,赓续其追奉魏晋的复古书风。除此之外,《之室集帖》中还收录邢慈静亲手临摹的《芝兰室兰亭序》,苍劲有力,拙而不华。

除邢慈静外,邢侗子孙大多亦继承其书法,弘扬复古书风。如邢侗之子邢王称“号玉衡,子愿仲子,

以名诸生食饩于庠。善属文,尤工书法,海内称‘小邢’”〔32〕173。又邢侗之孙邢命石,“太仆书名大,来禽集亦传。文孙能接武,绘事复争妍”〔33〕。

山左书家群体不仅具有家族性的特点,同时在邢侗等人复古书风的熏染之下,山左地区出现一个活跃的女性书家群体。除邢慈静外,胶州姜淑斋、高密单某妾等人也以善书著称。据王士禛记载:“胶州宋方伯子妇姜,字淑斋,自号广平内史,善临《十七帖》,笔力矫劲,不类女子。又高密单某妾,学右军楷书,似《黄庭》、《遗教》二经。二人皆韶黻女子也。”〔34〕胶州姜淑斋,号广平内史,是清代著名女书家,“家世善书,氏自少喜临二王帖”,并且“工抚晋人书,京师士大夫得纨素便面,多珍秘焉”〔35〕。京师朱彝尊也曾题姜淑斋诗卷云:“三真六草写朝云。”“仿佛卫夫人。问何似、当年右军。”〔36〕亦是指其书法以右军书法为取法对象。

新城王氏家族特别重视子弟的书法教育,因而擅书者众多,如王象乾、王象春、王象咸、王与玟、王士禄、王士禛等人皆有书名。王象乾、王洽等人也与邢侗共同标举魏晋,师法“二王”。其中,邢侗与王象乾志趣相投,皆好书法、文学,交流频繁,此后两家更是结为姻亲,关系更为紧密。王氏家族收藏邢侗墨迹甚多,王象乾侄孙王士禛曾言:“余家与临邑邢太仆子愿侗为婚姻,故先祖方伯赠侍郎公得其手迹为多,乱后,尽化劫灰矣。惟《兰亭序》、《白鸚鵡赋》(王摩诘)二卷仅存。”〔37〕3930又淄博王培荀云:

临邑邢太仆子愿侗,工书,与华亭董宗伯齐名。太仆与新城王大司马象乾为戚谊,王氏所得先生手迹尤多。其诗文集甚富,偶然涉笔,风趣如晋人,惜为书名所掩。尝见所书《白鸚鵡赋》,即渔洋得售为其祖方伯公所赐者。〔38〕8

王氏子弟也积极进行复古书法实践活动,自幼追慕“二王”,秉持复古尚晋的书法观。最为著名的是王士禛,在其著作《书则》中对魏晋书法极为推崇,他强调道:

书法至魏晋尽善与美矣,其迹特以风度相高。唐人祖袭以法胜也,而怒张挺勃之气已露。宋人求诸精神,以己意为书,其弊亦极焉。陵夷至元,古风荡然。明人好尚不同,要去古远矣。呜呼!时代所限,风气之沿不能无背驰。夫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乌能列坐兰亭,从群贤亲挹右军之指腕?③

不仅如此,王士禛又将其崇尚复古、追奉魏晋的精神体现在书法实践上。好友宋荦就曾评价其“书

法高秀似晋人”^{[37]5120}。同时,王士禛还乐此不疲地对所见魏晋名帖进行著录或题跋,传扬魏晋书法。在其著作《池北偶谈》中详细记录王羲之书作之递藏、刊刻之事,又抄录众多名人题跋。对于书坛前辈邢侗,王士禛极为尊崇,作有《过邢子愿先生墓》一诗,缅怀这位杰出的书法家:“秋晚犁丘道,西风黄叶深。婆娑叹宫柳,惆怅少来禽。一代风流绝,孤坟牧豎侵。通家怀旧客,重操雍门琴。”^{[37]834}

山东掖城人刘重庆也对邢侗书风极为赞赏。刘重庆(1579—1632年),字幼孙,号耳枝,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刘重庆工书,王培荀曾评价其“贵为公辅,以书法名当世”^{[38]63}。“东莱刘耳枝工书,能自成家者也。”^[39]刘重庆与邢侗交往密切,对其书法更是极为推崇:“子愿先生,文迫汉魏,一字不轻下;书追钟王,一波不苟作。然其文,古博雄深,少窥其藩;而其书,则挺秀圆浑,多尊其似。虽海外犹争购之矣,其法凡三变,其拟议二王,标韵诸米者,其池水未墨时也。晚造玄微,特精章草,拟议之极,变化出焉。”^{[40]143-144}受邢侗书风的熏染,刘重庆也善于仿“二王”草书,其行草书传“二王”之风而自成面目,开合有度,个性鲜明,颇受后世赞誉。

王洽善书,也与邢侗交往密切。王洽字涵仲,山东临邑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仪表颀伟,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其廉能为一方最”^{[29]6624}。王洽政绩卓越,官至兵部尚书。不仅如此,其著述颇丰,有多卷《奏疏》《吾鼎斋尺牍》《瑞露馆文集》等等。王洽对邢侗书法极为推重:“窃尝妄评先生书法,晚末数载中,超神入化,墨沈淋漓,满楮生动,殆如飞鸿饮涧,夭矫千寻,蜃阁翔空,灵幻莫测。而一种韵致,则又若京洛少年,鲜衣怒马,手接飞鸢,白纈舞女,袅弱娇凝,含情颦笑。人巧天工,可谓各臻其至,亦各极其趣者也。”^{[19]4-5}在邢侗逝世后,王洽“遽首倡风雅,及铅藻之未谢而聿新之”,不遗余力收集邢侗手札墨迹,刻成《来禽馆真迹》,以“令后之学者知所宗溯,不啻如兰亭之于定武”^{[40]151}。据王洽好友张延登跋曰:“余同年友王涵仲哀邢子愿先生行草杂笔,厘为四卷,命吴郡吴生士端双钩上石,命曰《来禽真迹》。”“此书俊美圆逸,天骨遒发,迥出临晋之外,辛苦成此快举,有功书道非浅。”^{[41]566-567}万历四十二年,王洽着手刻印《来禽馆真迹》,因邢侗书迹“不脛而驰四裔。然真贋并行”^{[40]136}、“尤为海内所珍”^{[40]141}、“得之者不以饱蠹鱼即亦斗粟易去耳”^{[40]136},王洽收集得艰辛,很多只能“挟槩就摹,摹已还之”^{[40]137},这正说明

社会对邢侗书作的接受度以及欢迎程度。《来禽馆真迹》刻成后,王洽遍邀名公硕望为之题跋吟咏,对于此事,尤侗曾言:“邢太仆书名重一时,王吏部洽刻其来禽馆帖,董宗伯为跋,雅推服之。”^[42]董其昌在《邢子愿法帖序》中云:

今王司封结集其书,刻成五卷见寄,且所取惟晚年行押尺牍不矜庄而自合者,充为其眼。

子愿书名满海内,非授梨致石之难,惟是自谓大好者,若水乳和合,莫为拈出耳。得司封此举,如子愿复生,俾余闻《广陵》旧曲,真翰墨中一段奇事,亦非直翰墨林中一段奇事也。嗟叹不足,书此以附不朽。^[43]

关于邢侗书作相关题跋的累积,客观上可被认为是诸书家对邢侗崇尚复古书风的“反复认定”,其中作为物质载体的《来禽馆真迹》可反映出众多文人精英对邢侗山左书学思想的整体性认同。显然,以王洽为代表的山左书家在同邢侗的密切交往中,经历了聆听宣介、切磋交流、请求馈赠、临摹仿效、撰写题跋、宣扬推广等一系列增进群体认同的阶段。除王洽外,邢侗弟子张忻及其叔父张孔印也曾搜集邢侗书法摹刻成帖。张忻刻《来禽真迹》一卷,其叔父张孔印于天启三年(1623年)刻成《来禽馆法书》八卷,并在其后跋曰:“子愿先生书出晋入唐,余家山房摹勒诸体差备。此卷小行草,大都尺蹄,语精谨合度,中有急就数行,尤擅幼安堂室,至于精神骨力,则由镌法领之而出,善坐卧者其自得之。天启癸亥重九张孔印谨跋。”^{[41]572}今原石已佚,仅有拓本传世。又有冯起震之子冯可宾,刊刻《邢来禽先生法帖》,据李日华《跋邢来禽先生法帖》云:“此刻大都与冯青方先生往来游戏翰墨之语,气酣神肆。”“楨卿使君携以入茗,而刻石署中。正如璧社之珠,泳波而达震泽,照耀南天,光景煜煜。其裨益我南土不浅。”^[44]邢侗复古书风的追随者众多,位于济南西的东昌府是邢侗书风的主要沾溉区域,此地人文荟萃,士多才俊,文风为诸邑之冠,并且东昌府位于运河之畔,交通发达,有助于邢侗书风的传扬。如出生于东昌府的清初第一状元傅以渐,便是邢侗书风的追随者之一。傅以渐官至武英殿大学生兼兵部尚书,他在书法方面以邢侗为取法对象,其“书法瘦硬,秀骨天成,仿佛邢太仆”^[45]。邢侗的追随者或直接问学于他,或将其作为取法对象,或将邢侗书作拓本作为临摹范本,皆可反映出彼时的许多文人士大夫对邢侗书学思想的认可程度,邢侗书法思想的影响范围呈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

邢侗逝世后,邢慈静、王洽等人为对其书法成就予以楹联与宣介,不遗余力地收集邢侗四散之作,保存其间的“真精之品”,以弘扬邢侗复古的书学思想,并且经过收集、宣扬,将邢侗的书学思想转化为山左书家群体中的一些普遍共识。毫无疑问,在山左文人精英的历史性介入之下,邢侗的书学思想和书史形象皆被显著放大,遂使得更多人士知晓甚或认同邢侗其人其书。这些山左文人士大夫对邢侗的推举,除了自身热衷书法,对邢侗书学理念的认可之外,更重要的考虑还包括在地域本位思潮的影响下,对本地的知名书家予以必要的推重,并且力所能及地恢复山左地区的文脉与文化氛围。

余 论

邢侗的一生,有着多重社会身份,其仕途短暂却建立起广泛的社交网络,涵盖社会各个阶层,包含官僚、文人士大夫、书画收藏家、商贾等。通过建构以自身为核心的社交网络,邢侗在提升个人声望的同时,也致力于振兴山左书法,打造山左书法话语。在书法创作主体、消费者以及书法市场环境的多元互动下,晚明书法交易日益活跃。伴随着文化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书法的社交功能也日益凸显。邢侗以书法为媒介,在社会空间的不同场域中频繁地与诸多文人雅士展开广泛的艺术文化交游活动,在享受逸乐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文人士大夫雅文化社交群落。随着邢侗书法涵养的不断提升,尤其是经历了南北之间书法的交融以及山左复古文艺思潮的浸润后,邢侗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恢复“二王”传统、彰显魏晋的书学思想。致仕乡居后的邢侗,一方面将书斋来禽馆作为文化创作空间,挥墨临池不辍,精研“二王”笔法;另一方面通过文人雅集、书法求赠、藏品互鉴、碑帖刊刻等方式努力经营、维系人际网络,并借由此进而提高自身声望,积累文化资本。正是在晚明崇尚复古的背景下,邢侗不断发挥自身的文化影响力,依托以“二王”为首的地域文化资源,追求浑厚雅正的“齐风”,与乡邦文人共同致力于山左书法传统的建构,逐步强化地域文化认同感。由此,书法的社交网络功能与群体身份话语功能便得以凸显。

优游于地方社会的邢侗,在传承地方文脉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引领下,凭借其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所居的权势网络环境,试图在强势的江左书法外构建山左书法话语,传承“二王”书法谱系。邢

侗在万历书坛就享有盛誉,“与华亭董其昌分长大江南北”^[32]¹⁸⁷,并称“北邢南董”。《明史·文苑传》将邢侗附载于《董其昌传》之后,可见将邢侗与董其昌并列已成为时人的共识。然而,关于邢、董并名也存在分歧。黄克缙在《数马集》中云:“今世书家,类称邢董。然董仅工方寸行书,其余诸体,不能及也。”^[46]黄克缙认为邢侗各体兼善,然董其昌“仅工方寸行书”,在这点上董其昌不能与邢侗相提并论。在邢侗之后,北方米万钟、王铎、傅山等人雄踞书坛,进而增强了“南”与“北”之间的张力和紧张感,基于此,倪后瞻深有感触:“画家有南北派,书家不然,然在今日,则诚有南北之异。”^[47]代际风移,剧烈的社会变迁,晚明至清初的文人士大夫热切追求真实的自我,崇尚奇趣、奇意的艺术观念风靡一时,愈来愈多的晚明书家强调书法中的“奇”的特质,新的书法范式和个性张扬的书风进而逐渐形成。与其相伴而生的是书法经典权威的式微,晚明书家开始关注“二王”谱系以外的书法资源,在此历史情境下,邢侗的文化声望逐渐下降,在书坛的光芒也趋于暗淡。

晚明时期出现的社会新动态,为邢侗等文人精英以书法为媒介建构社交网络,建立、积累以及运用文化资本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万历年间,在吴门书坛式微的背景下,邢侗崛起于北方,以图像和话语为中心对书法经典积极传承和弘扬,捍卫山左地域书法文化传统,加剧了晚明书法地域多元化的发展进程。邢侗所倡导的复古书法理论和实践对北方书法的发展起到重要统领和表率作用。之后,以傅山为代表的北方书家逐渐超越传统的限制,对以“二王”为中心的古代经典权威进行创造性的诠释,浪漫主义书风大行其道。明清鼎革,受文化风气转变的影响,追本溯源、回归原典成为清初书法家的主流思想,傅山成为清初碑学书法萌芽期的中坚人物。他倡导回归古法,以北方为中心积极开展访碑活动,为重新审视中国古代书法提供新的范式。

注释

①有关明人结社情况详见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18—532页;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②邢侗著:《论书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③据王士禛《书则》墨迹本录。

参考文献

- [1]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3.
[2]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M].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 1976.
- [3] 陆深. 俨山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554.
- [4] 董其昌. 画禅室随笔[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46-47.
- [5] 汪珂玉. 珊瑚网[M]//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987.
- [6] 孙毓. 书画跋 三吴楷法十册[M]//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263.
- [7] 王世贞. 艺苑卮言[M]//崔尔平.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183.
- [8] 詹景凤. 詹氏性理小辨[M]//故宫珍本丛刊:第346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9] 孟庆星. 万历书坛:邢侗个案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8.
- [10] 许乘尧. 欽事闲谭[M].合肥:黄山书社,2001:413.
- [11] 谢章铤. 课余续录[M].福州:赌棋山庄刻本,1878(清光绪四年):31.
- [12] 李圣华. 晚明诗歌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6.
- [13] 张应文. 清秘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27.
- [14] 容庚. 丛帖目[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5] 邢侗. 来禽馆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6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 [16] 莫是龙. 评书[M]//崔尔平.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213.
- [17] 宫晓卫. 修广利. 邢侗集[M].济南:齐鲁书社,2017:767.
- [18] 祝嘉. 祝嘉书学论著全集:书学史[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21:190.
- [19] 邢氏家乘[M].临邑:刻本,1912.
- [20] 周之士. 游鹤堂墨藪[M].齐兴:游鹤堂刻本,1573—1620(明万历年间):29.
- [21] 张伯英. 张伯英碑帖论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 [22] 张明. 王士禛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536.
- [23] 葛守礼. 葛端肃公文集[M].临邑:赵贤刻本,1582(明万历十年):5.
- [24] 王源. 居业堂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4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0.
- [25] 上海文献丛书编委会. 陈子龙文集: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199.
- [26] 王永积. 崇祯武定州志[M]//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明代孤本方志选.北京:线装书局,2000:335.
- [27] 叶廷琯. 鸥波渔话[M]//续修四库全书:第11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79.
- [28]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M]//周骏富.明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1991:787.
- [29] 张廷玉.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30] 王士禛. 渔洋山人精华录[M]//四库禁毁书丛刊:第5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74.
- [31] 临邑县体育文化委员会,政协临邑县文史委员会. 邢氏兄妹:邢侗、邢慈静[M].临邑:内部资料,2001:253.
- [32] 沈淮. 道光临邑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 山东府县志辑:1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33] 方文. 蠡山集 再续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第7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680.
- [34] 王士禛. 池北偶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2:283.
- [35] 张同声. 道光重修胶州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 山东府县志辑:39.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331.
- [36] 屈兴国,袁李来. 朱彝尊词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56.
- [37] 袁世硕. 王士禛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7.
- [38] 王培荀. 乡园忆旧录[M].济南:齐鲁书社,1993.
- [39] 柴小梵. 梵天庐丛录:2[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733.
- [40] 刘文海. 来禽馆真迹[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 [41] 谭平国. 邢侗年谱[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8.
- [42] 尤侗. 良斋杂说[M]//续修四库全书:第11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71.
- [43] 董其昌. 容台集[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164-165.
- [44] 李日华. 恬致堂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第6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44.
- [45] 李放. 皇清书史[M]//金毓黻.辽海丛书:第5辑.沈阳:辽沈书社,1985:1650.
- [46] 黄克缙. 数马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8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334.
- [47] 倪后瞻. 倪氏杂著笔法[M]//崔尔平.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423.

Xing Dong and Construction and Spread of Shanzuo Calligraphy Discourse

Liu Zhongxing Lin Yuanru

Abstract: The sense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competition among regions increasingly enhanc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n order to revitalize Shanzuo calligraphy and construct its discourse, the literati elites there represented by Xing Dong, relying on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dominated by “Two Wangs”, actively carried out ancient practice and promoted the antique calligraphy style,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regional calligraphy diversification at that time. Guided by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recording and inheriting local contexts, Xing Dong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local cultural activities. He built a discourse platform to defend the regional cultural tradition of Shanzuo, and promoted the spread of Shanzuo calligraphy with the core of reviving and advocating the ancient style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Key words: Xing Dong; Shanzuo calligraphy; construction; spread

责任编辑:王轲 长亭

宫观官制度与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

张振谦

摘要: 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制度。南宋时期的宫观官制度既是反道学的工具,又为理学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当时理学家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大多数士人拥有领任宫观官归乡里居的经历,这无疑促进了地域文学的发展。宫观官制度为建州地域文人聚合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促进了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的形成、发展和延续。冲佑观是建州地区唯一设置宫观官的道观,道教名山武夷山是理学重心南移的中转站和朱子理学诞生、发展、成熟的大本营。刘子翬生命的最后 17 年 5 次奉祠,闲居建州崇安,读书创作和讲学授徒成为他最重要的两日常精神活动。朱熹一生长期领任宫观官,共计 20 余年。宫观官制度为朱熹的理学杰出地位与文学创作成就的取得提供了经济支撑和时间保障,他奉祠期间营建和书写的武夷精舍可视为二者发生联系的重要现实空间和精神圣地。南宋末期,奉祠归里的真德秀延续了建州的理学传统。

关键词: 宫观官制度;建州理学文人群体;冲佑观;刘子翬;朱熹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141-10

宫观官制度为宋代特有的一种制度,是朝廷优待士人的政治政策和尊崇道教的宗教政策相结合的产物。宫观官又称祠官,分为宫观(副)使、判官、提举(点)、主管(管勾)、都监等类别,领任宫观官也称奉祠,一般允许任便居住。因最初规定年高硕望的重臣兼领神祠(宫观)而获取俸禄,狭义的宫观官制度又称祠禄制度^①。《宋史·职官志·宫观》载:“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时朝廷方经理时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废职,欲悉罢之,乃使任宫观,以食其禄。”^[1]⁴⁰⁸⁰⁻⁴⁰⁸¹宋代宫观官始于真宗时期,设置初衷是“佚老优贤”,最初员数极少,王安石变法后,宫观官的员数大量增加,充任宫观官成为贬谪臣僚的辅助手段。南宋时期宫观官继续冗滥,成为很多士人抹不去的身份角色。朱熹曾言:“自王介甫更新法,虑天下士大夫议论不合,欲一切弹击罢黜,又恐骇物论,于是创为宫观祠禄,以待新法异议之人。然亦难得,惟监司郡守以上,眷礼优渥者方得

之。自郡守以下,则尽送部中与监当差遣。后来渐轻,今则又轻,皆可以得之矣。”^[2]宫观官制度既是南宋反道学的工具,又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对当时理学家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已有学者从祠禄制度视角研究了以方信孺、刘克庄为核心的闽东莆田地区诗人群体^②,本文则以刘子翬、朱熹为核心的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宫观官身份在其交游活动、群体心态、诗文创作及理学传播等方面的深刻影响,揭示宫观官制度在学术思想发展、地域文化建构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宫观官: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重要的身份标识

建州位居福建北部,古称建安,宋孝宗继位后,改为建宁府,下辖七县。《宋史·地理志·福建路》

收稿日期:2024-06-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宫观官制度与文学研究”(17BZW097)。

作者简介:张振谦,男,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632)。

载：“建宁府，上，本建州，建安郡。旧军事，端拱元年，升为建宁军节度；绍兴三十二年，以孝宗旧邸，升府。……县七：建安、浦城、嘉禾（本建阳县……景定元年改今名）、松溪、崇安、政和、瓯宁。”^{[1]2208}宋代建州地区文化氛围浓厚，南宋胡寅《武夷桂籍记》云：“建州七县每应书者率四千而赢。崇安固里弦闻诵、家诗户书之邑也。”^[3]

建州自然山水以武夷山最负盛名。武夷山是道教第十六洞天，《云笈七签·洞天福地》载：“第十六武夷山洞，周回一百二十里，名曰真升化玄天，在建州建阳县，真人刘少公治之。”^[4]武夷山的命名源于仙人武夷君，据传汉武帝曾派人在此设坛奉祀武夷君。“武夷”二字最早出自《史记·封禅书》中的“武夷君用干鱼”^[5]，陆游《游武夷山》诗云：“少读封禅书，始知武夷君。”^{[6]910}朱熹《武夷图序》亦云：“武夷君之名，著自汉世，祀以干鱼，不知果何神也。今有山名武夷，相传即神所宅。”^{[7]3716}武夷山道教文化至唐宋进入繁盛时期。武夷山历史上的第一座道观是冲佑观，又称武夷宫，其前身是唐天宝年间所建的“天宝殿”。五代闽王王审知将其修整，改名武夷观。南唐元宗李璟之弟李良佐入山访道，居留于此，保大二年（944年），“敕建州武夷山升真元化洞天，武夷观可改赐‘会仙’为额”^{[8]67}。咸平二年（999年），宋真宗御书“冲佑”赐予会仙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真宗赐额“冲佑诏广观”。绍圣二年（1095年），因祷雨灵验，宋哲宗敕封武夷君为显道真人，并将“会仙观”改名为“冲佑观”。南宋时期，冲佑观成为武夷山最大的道观，也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宫观。刘子翬《修武夷冲佑观疏》云：“惟武夷之名山，有冲佑之秘宇。自昔秦汉而上，显著灵踪；由我祖宗以来，益严祀典。实四境瞻依之地，罄群心归恳之诚。流泽所加，无感不应。”^{[9]219}

武夷山冲佑观自熙宁三年（1070年）开始设置宫观官，是建州地区唯一设置这一职位的道观^③。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许多文人士大夫都曾领任冲佑观宫观官。清代董天工《武夷山志·序》云：“与文公前后主管冲佑观者共二十有四人，皆当时名儒，是终守之世者名贤之行藏出处皆名山所托重者也。”^{[8]10}该书卷16“武夷冲佑观主管”部分具体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其中理学家占据多数，除了“东南三贤”朱熹、张栻、吕祖谦外，还有刘子翬、叶适、彭龟年、魏了翁、林大中、曹彦约、黄度、陈舜申、傅自得、黄干、刘光祖、蔡幼学、张忠恕、刘崇之等。武夷山作为理学南传的第一站，声名远播，被后世誉为

“道南理窟”。“二程”的得意门徒、建阳人游酢和南剑州（今属福建）人杨时晚年均选择武夷山为终老之地，他们在此读书著文，传播学术，可视南宋建州理学的源头。程颢在洛阳送别杨时南归福建时说：“吾道南矣！”^{[1]12741}建炎二年（1128年），杨时“连章丐外，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1]12742}。杨时等人传道东南，既是理学重心由北向南逐渐迁移的过程，也是理学从河南洛学向福建闽学转化的过程。

武夷山不仅是道教名山，也是理学名山。南宋有不少理学家领任宫观官而退居武夷山附近，我们依据奉祠时间或生活时代顺序择要梳理如下。绍兴五年（1135年），建州崇安人胡安国提举江州太平观，归居故里，创立“武夷学派”，清人黄宗羲《宋元学案》卷34《武夷学案》记录有其谱系传承。胡安国之子胡寅于建炎三年（1129年）和绍兴八年（1138年）两次主管江州太平观，奉祠里居。绍兴十年（1140年），朱熹之父朱松因不附秦桧和议而被弹劾，他自请宫观官南归，主管台州崇道观。朱松《谢宫观启》云：“得郡自试，蒙恩不赀，乃犹沥恳而有言，亟获奉祠而自屏。扪心知幸，衔施不忘。”^[10]朱熹《皇考左承议郎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朱公行状》记载：“（绍兴）十年春，遂使言者论公独以怀异自贤，阳为辞逊为罪，而出之外郡。……公固不能复为之屈，遂自请为祠官，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讨寻旧学为事，手抄口诵，不懈益虔。”^{[7]4535-4536}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再次请祠期间，卒于建安。

朱熹的宫观官生涯始于29岁差监潭州南岳庙。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十一月，朱熹以养亲为由请祠，其《申建宁府状》云：“泉州同安县主簿，到任四年，省罢归乡。偶以亲老食贫，不能待次，遂乞岳庙差遣。”^{[7]1144}十二月，朱熹获准监南岳庙。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朱熹秩满再请。六月，高宗内禅，孝宗即位，朱熹复监南岳庙。乾道元年（1165年），吏部侍郎陈俊卿推荐朱熹入朝，因其与主和派议论不合，再监南岳庙^{[11]341-344}。

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连上4道《辞免改官宫观状》，“（五月）己未，以迪功郎朱熹屡诏不起，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1]655}。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主管武夷山冲佑观：“（淳熙）二年，上欲奖用廉退，以励风俗，龚茂良行丞相事以熹名进，除秘书郎，力辞，且以手书遗茂良，言一时权幸。

群小乘间谗毁,乃因熹再辞,即从其请,主管武夷山冲佑观。”^{[1]12753}淳熙五年(1178年)十月,朱熹上《乞宫观札子》与《乞宫观状》再请祠。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乞宫观札子》云:“熹辄有诚恳,上渎钧听:熹昨蒙圣恩,差权发遣南康军事,已于去年三月三十日到任。累以疾病陈乞祠禄,未蒙敷奏施行。今来在任已满十月,非久当书一考,实缘衰病愈侵,心力凋耗,加以脚气痰饮发作无时,难以勉强在职。欲望朝廷特赐敷奏,改授祠庙差遣一次,使得杜门窃食,休养残废,庶几不至即日颠殒,不胜幸甚!”^{[7]1155}两个月后,朱熹又上《乞宫观状》与《乞宫观札子》,终于获准继续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宋史·朱熹传》载:“(淳熙)十年,诏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观,既而连奉云台、鸿庆之祠者五年。”^{[1]12756}淳熙十二年(1185年),朱熹秩满上《乞宫观札子》于朝再次请祠:“熹伏自顷岁罢官浙东,圣恩畀以祠禄,至今考满,家贫累重,未能忘禄,欲望特赐敷奏,更与再任一次。”^{[7]1170}四月,差主管华州云台观^{[11]804}。次年,朱熹主管南京鸿庆宫。淳熙十四年(1187年),周必大拜相,次年,朱熹除兵部郎官。然而,未及一年,他就以疾请祠,其《与周丞相书》云:“熹之衰病,首尾七年,去冬一二阴邪厄恶之证虽已罢去,然腹心之患甫益坚牢,攻击万方,略无动意。……欲望丞相始终哀怜,少假钧陶之力,使得复供鸿庆守祧之役,则生托荣名,死题墓道,无复有遗恨。”^{[7]1372}七月,朱熹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他于是年作《戊申封事》云:

臣赋性拙直,不能随世俯仰,故自早年即自揣度决是不堪从宦。所以一向窃食祠禄,前后九任,岂不知有致身之义,亦非恬无济物之心,宁为退藏,盖以避祸。中间稍蒙任使,果然自速颠跻,七年之间,措身无所。今者一出,又致纷纭。幸赖圣明保全终始,增其禄秩,使足以免于饥寒,进其官资,使足以延于嗣息,此皆已非臣平生志望所及。天地之恩,不啻厚矣。^{[7]809}

朱熹认为自己由于性格原因选择奉祠退居以避祸,自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至淳熙十五年(1188年)先后9次领任宫观官,三次主管监潭州南岳庙,两次主管台州崇道观,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华州云台观、南京鸿庆宫、西京嵩山崇福宫各一任,长达18年。

淳熙十六年(1189年),光宗即位,改元绍熙,丞相留正举荐朱熹任江东转运使。然而,朱熹对仕宦并无从长计议,其《与留丞相札子》云:“熹虽出,终

不能久,近则半年,远则周岁,决须再有祈恳,复劳区处,不若及今便与祠禄之为便耳。”^{[7]1389-1390}果然,仅仅过了一年,他便因儿子朱塾去世再次乞祠,“时史浩入见,请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熹再辞,诏:‘论撰之职,以宠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辞。漳州经界竟报罢,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静江府,辞,主管南京鸿庆宫”^{[1]12763}。绍熙四年(1193年),朱熹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次年,宁宗立,朱熹“仍乞追还新旧职名,诏依旧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1]12767}。陈傅良此时所上《缴奏朱熹宫观状》云:“臣窃以为朱熹者,三朝故老,难进易退,二十余年,多任祠禄,今也欣慕圣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贺,以为得人。则进退之间,岂宜容易?未审何故,遂听退闲?”^[12]庆元元年(1195年),刘德秀、沈继祖先后向宋宁宗奏请禁止“伪学”,指斥朱熹道学为伪学,将宰相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和朱熹等59人列入“伪学党人籍”。次年十二月,朱熹遭党禁之祸,罢宫观祠禄,归居考亭,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宫观官生涯。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致仕,次年卒于家中。

南宋建州文人群体中还有不少人不仅在理学上接踵朱熹,而且长期领任宫观官。崇安人刘珙(1132—1185),字平父,号七者翁,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以祖母卓氏在堂,3次上书乞祠,得监潭州南岳庙,在武夷山筑“七者之寮”,常与朱熹、胡宪诸贤唱和,并将其父刘子翬的诗文汇编整理成《屏山集》20卷传世。建阳人游九言(1142—1206),字诚之,号默斋,庆元二年(1196年),以不便养亲丐祠里居。长乐(今属福建)人黄干(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23岁前往崇安师从朱熹,后为其婿,嘉定十一年(1218年),以衰病辞官,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专事讲学。《宋史·黄干传》载:“(黄)干遂归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亹亹不倦,借邻寺以处之,朝夕往来,质疑请益如熹时。俄命知潮州,辞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宫,逾月遂乞致仕,诏许之,特授承议郎。”^{[1]12782}建安人袁枢(1131—1205),字机仲,绍熙元年(1190年)提举太平兴国宫返归故乡,庆元元年(1195年),再次提举太平兴国宫,此后闲居家乡10年,直至去世。《宋史·袁枢传》载:“寻为台臣劾罢,提举太平兴国宫。自是三奉祠,力上请制,比之疏傅、陶令。开禧元年,卒,年七十五。”^{[1]11936}蔡幼学(1154—1217),字行之,温州(今属浙江)人,历任

泉州、建宁和福州知府。庆元二年(1196年),时任福建提举常平的蔡幼学多次向奉祠闲居建阳的朱熹求问为政之道,由于当时朝廷禁用“伪学”之党,他因此被诬为“早为伪学,巧取伦魁,持节闽部,全不事事”^[13]而被弹劾罢官,领任宫观官而客居建州长达8年之久。《宋史·蔡幼学传》载:“时韩侂胄方用事,指正人为‘伪学’,异论者立黜。幼学遂力求外补,特除提举福建常平。……时朱熹居建阳,幼学每事咨访,遂为御史刘德秀劾罢,奉祠者凡八年。”^[1]¹²⁸⁹⁷⁻¹²⁸⁹⁸建阳人刘崇之(1154—1210),字智夫,嘉泰元年(1201年)和嘉定二年(1209年),两次请求奉祠,分别主管华州云台观和武夷山冲佑观,晚年奉祠家居,时长共计6年。

南宋时期围绕武夷山形成的建州文人群体,其成员多为理学家,是南宋理学诗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学诗人政治上力主抗金,反对和议退让、苟且偷安,成为一股对朝政有很强冲击力的政治力量。由于与秦桧、韩侂胄等奸相奉行的求和投降政策相悖,他们往往被朝廷以领任宫观官的名义排挤出朝,里居建州。建州因此成为南宋士人闲居之地的代称,正如陆游于淳熙六年(1179年)作于建安的《送钱仲耕修撰》诗中所云:“殷勤为报中朝旧,睡足平生是建州。”^[6]⁸⁵⁹在奉祠期间,他们以理学来传承文脉,以爱国为精神契合点,以武夷山水为歌咏对象,在武夷山一带形成了具有较大影响的建州文人群体。武夷山既是杨时、游酢、胡安国等福建籍大儒促使理学重心南移的中转站,也是朱子理学诞生、发展、成熟的大本营。

二、刘子翬领任宫观官时期的创作与讲学

南宋初期,最早领任宫观官而归居建州的是著名理学诗人刘子翬。刘子翬是朱熹的理学老师,在文学上颇有造诣,现存诗歌660余首。钱钟书曾说:“假如一位道学家的诗集里,‘讲义语录’的比例还不大,肯容许些‘闲言语’,他就算得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例如朱熹。刘子翬却是诗人里的一位道学家,并非只在道学家里充个诗人。”^[14]

刘子翬(1101—1147),字彦冲,自号病翁,世称屏山先生,建州崇安人。其父刘鞫在靖康之难时任京城四壁守御使,誓不仕金,自缢殉节。刘子翬归里守制期满,南宋朝廷任命其为兴化军(今福建莆田)通判。绍兴元年(1131年),其妻陆氏病逝,次年,兴

化任满后,他因病请祠,以右宣教郎的名义主管冲佑观,隐居崇安屏山之下。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7载:“绍兴二年八月……右宣义郎通判兴化军刘子翬主管建州武夷山冲佑观。子翬,鞫少子,有学行。以毁瘠,不堪吏责,弃官去,读书武夷山中。”^[15]刘子翬在兴化军通判任上政绩突出,本可连任,但因父亲罹难,哀伤过度而致疾,不得不通过奉祠度过人生的最后17年。《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11《刘子翬病翁先生》载:

倅兴化军,秩满,以最闻。诏还莅故官。先生始以哀毁致疾,自以不堪吏责,遂丐祠主管武夷冲佑观以归,十有七年,四为崇道祠官。^[16]《宋史·刘子翬传》也载:

子翬始执丧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责,辞归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1]¹²⁸⁷¹

相对于短短3年的仕宦生涯,归隐屏山的这17年可谓刘子翬生命历程中时段最长、分量最重的时期。刘子翬主管冲佑观任满后,又连续4次领任台州崇道观宫观官。朱熹《屏山先生刘公墓表》云:“如是者十有七年,四为崇道祠官,累阶右承议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绍兴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卒。”^[7]⁴²¹³刘子翬接到宫观官任命后,写有诗篇表达当时的感受。首次领任宫观官时,刘子翬作七言绝句《得冲佑命》云:“几年归梦水云间,猿鹤重寻已厚颜。惭愧君恩犹窃禄,官衙新带武夷山。”^[17]²¹⁴¹⁵从中可见他重回故乡时那种喜悦且略带愧疚的心情。此后刘子翬主管台州崇道观,又作《得天台命二首》诗云:

奉祠得请向天台,清梦先寻紫翠堆。借问刘晨今在否,云间应见耳孙来。

暖风环佩满芳洲,贝阙珠宫忆旧游。此日刘郎心似水,桃花空绕暮溪流。^[17]²¹⁴²⁹

他在诗中巧用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的典故,言说自己再次领任宫观官的平静心态。随着国势的日益衰微和自己年龄的增长,诗人远大的政治抱负已消磨殆尽,正如其《转秩奉祠蒙朝佐子静庆以四六戏裁长句为谢》所云:“一岭无情阻面谈,鸣翰忽堕得双函。抽黄对白虽云妙,刻朽嘘枯祇益惭。小转只缘官带右,雄飞无复梦图南。借留赖有天台侣,老矣真成七不堪。”^[17]²¹⁴⁵⁰他在这里借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七不堪”来陈述自己不能出仕的原因。

刘子翬领任宫观官期间,读书创作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朱熹《屏山先生刘公墓表》

云：“先生始以衰毁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复堪吏责，遂丐闲局，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以归。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园林水石之胜，于是俯仰其间，尽弃人间事。自号病翁，独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无一言。意有所得，则笔之于书，或咏歌焉以自适。”^[7]⁴²¹²

刘子翬接到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之命后，作《归田》诗云：

声色家有阱，轩裳仕之囚。冥行不知迷，今将返吾辀。爱慕洗余习，清虚乐孤游。亭亭隐仙岩，迎人入双眸。稻色黄莽莽，溪光碧油油。佳树残照满，高穹乱云流。乍参樵牧群，辞气不婉柔。性有书史癖，时逢甲兵休。斯怀傥遂全，曩志不必酬。^[17]²¹³⁵⁹

诗中表达了作者对奉祠后闲云野鹤式生活的想象与向往。“时逢甲兵休”即其《送张当世序》所云：“（绍兴二年）壬子春，灵旗大伐，冲逐荡拓，寇乃平。”^[9]¹⁵²归隐之后，他在多篇作品中表露心无旁骛地读书治学，如“老矣惟书爱未消，喜闻新塾出尘嚣”（《题吴若愚一经堂》），“病间欲疏酒，老便惟读书”（《致中晚集》），“只应心醉六经醇，自是陶陶晋魏人”（《致中诗戏论诗棋酒辄次原韵》）等。

刘子翬人生的最后 17 年闲居崇安，诗歌中更多地书写山林田园、寄赠友朋，透露出他对时局的灰心，表现出隐者的姿态。如其《屏迹》诗云：“屏迹山樊避世喧，晚风落日静柴门。寒泉绕竹通幽圃，小径穿田入别村。散策微吟霜叶脱，钩帘宴坐碧云翻。闲中兴味知何晚，绝口名途不更言。”^[17]²¹⁴²⁴其《桃源》诗云：“桃花深处蜜蜂喧，山近前峰鸡犬村。若有胡麻泛流水，武夷转作武陵源。”^[17]²¹⁴⁵⁸他将武夷山当做桃花源，游览风景秀丽的武夷山成为其晚年生活中放松、愉悦心情的重要方式。刘子翬《病中追赋武夷》诗云：“建水日夜浅，清滩自迢迢。渔舸愕已无，忽点净练遥。老身寄其上，兀若栖危苕。松风知我狂，随舷助倾摇。探幽神益新，得快意自消。长林翠洞口，微云粉山腰。那知碧虚远，一苇卧可超。不须换吾骸，吾慵登岩堯。病中追余观，所得绝富饶。”^[17]²¹⁸³⁹其《绝句》中也有类似表达：“喜闻归骑已扬镳，载酒相迎不惮遥。我是武夷东道主，便同蜡屐上岩堯。”^[17]²¹⁴²⁵

刘子翬这一时期所作诗篇大部分充满着田家浓郁的生活气息，表现出对和平宁静田园生活的留恋与喜爱之情，如“长空淡淡如云扫，暮过田家风物好。耕犁倚户寂无人，饥牛卧啮墙根草”（《田家》）。

处于人生晚年的刘子翬在诗中反复表明自己的退隐之乐与恬淡自得的平和心态，如“野墅惊秋晚，残年匆匆过。海潮通井浅，林日到窗多。酒尽邻翁饷，诗成稚子哦。人生行乐耳，轩冕奈余何”（《野墅》），“人间过眼事如许，何用封侯羨萑羹”（《次韵六四叔村居即事十二绝》其十），“宦游若胜归田乐，肯把轩裳换一犁”（《筑室》）。

刘子翬虽然归隐山林，但由于担任官观官而领取朝廷俸禄，内心深处仍始终牵挂着国家朝堂。其《负暄》诗云：

宵寒卧增裯，昼寒起增衣。何如负暄乐，高堂日晖晖。引光扉尽辟，追影榻屡移。妙趣久乃酣，瞑目潜自知。初如拥红炉，冻粟消顽肌。渐如饮醇醪，暖力中融怡。欠伸百骸舒，爬搔随意为。稍回骄佚气，顿改酸寒姿。薰然沐慈仁，天恩岂余私。愿披横空云，四海同熙熙。矫首望扶桑，倾心效园葵。^[17]²¹³⁵⁶

此诗的诗题出自《列子·杨朱》：“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缊屨，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絮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负暄”作为向君王敬献忠心的典实，在这首诗中用来言说诗人自己因身体衰病而处境窘迫的时候，得到了官观官制度的帮助和救济，改变了寒酸的生活状态，拥有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他的内心因此充满了暖意和感恩，并在结句发出杜甫“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式的忠诚报恩的肺腑之言。

刘子翬领任官观官期间，讲学授徒是其最重要的日常活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56 载：“子翬既奉祠，尽弃人事，独居一室，意有所得则笔之于书，四方学者多从之。”^[18]由于身体疾病所限，不能直接为朝廷效力却获得祠禄，他内心十分愧疚，“未能医国惭君赐，旧书且读蝇头字”（《鹅峰居士以地黄遗病翁，因为作引》），于是，他将精力倾注在广收门徒、兴办地方教育上。

刘子翬回乡后，即着手扩修祖上留传的刘氏家塾，次年建成。明人黄仲昭编纂的《八闽通志》卷 73 记载，刘氏家塾中有六经堂，家园有早赋堂、悠然堂、横秋阁、凉阴轩、山馆、万石亭、意远亭、怀新亭、百花台、醅醪洞、海棠洲、莲池、橘林、桂岩、宴坐岩、醒心泉、南溪，凡 17 景。刘子翬各赋诗纪胜，并且延请当地知名学者刘勉之、胡宪为塾师，在此开坛讲学，广招弟子，传道乡里。六经堂是生徒受学之处，刘子翬

《示六经堂学者》云：“此堂何有，维经与史。隐索周施，于兹备矣。诵书琅琅，其神乃扬。杂虑横心，圣言则忘。讲书默默，精义乃得。”^{[9]208}南宋初期，建州生徒在六经堂学成而科举及第者不在少数。刘子翬《寄如愚、珙二首》曾云：“射殿遥闻驻六飞，天颜咫尺引儒衣。吾家亦有庐传喜，叔侄联名赐第归。”“雁塔蟾宫尽假途，要须行实副名誉。六经堂上归来日，饱读平生未见书。”^{[17]21442}除刘氏叔侄外，朱熹、刘珙、魏掞之、方士繇、黄铢、黄子衡、詹体仁、魏元履、李从礼、刘懋、欧阳光祖等人均从学于此。其中，朱熹最为著名。

绍兴十三年(1143年)，因遭秦桧之党弹劾而奉祠归闽的朱松去世，曾托孤于闲居建州崇安的好友刘子翬、胡宪和刘勉之三人。朱熹《屏山先生刘公墓表》云：

盖先人疾病时，尝顾语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熹饮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则奉以告于三君子而禀学焉。^{[7]4211}

刘子翬、胡宪和刘勉之皆因反对秦桧和议而归隐武夷地区，被称为“武夷三先生”。朱熹遵从其父遗命，投奔刘子翬，刘氏待其如子侄，为其取字“元晦”，与刘勉之、胡宪一起教授他修习理学。此后，年方14岁的朱熹就在此生活、学习。胡宪(1084—1162)，字原仲，自幼从乡贤胡安国学，人称籍溪先生，曾任建州教授、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辞官，主管台州崇道观而归里。刘勉之(1089—1149)，字致中，号草堂，世称白水先生，自绍兴三年(1133年)开始，他在建阳近郊构建萧屯别墅，“及至家，即邑近郊结草为堂，读书其中，力耕自给，澹然无求于世。与胡宪、刘子翬相往来，日以讲论切磋为事。绍兴间……勉之知不与桧合，即谢病归。杜门十余年，学者踵之，随其材品，为说圣贤教学之门及前言往行之懿”^{[1]13463}。

绍兴十七年(1147年)，刘子翬卧病不起，朱熹侍奉左右。刘子翬去世前夕，曾作诗《病中赏梅赠元晦老友》云：“梅边无与谈，赖有之子至。荒寒一点香，足以酬天地。天地亦无心，受之自人意。韬白任新知，风味要如此。”^{[17]21389}从中可见他对刚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的朱熹寄予厚望，希望他此后为官、为人均要保持梅之高洁品格。

刘子翬去世15年后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朱熹在《伏读二刘公瑞岩留题感事兴怀至于陨涕追次元韵偶成二篇》其二云：

投绶归来卧赤城，家山无处不修行。寒岩解榻梦应好，绝壁题诗语太清。陈迹一朝成寂寞，灵台千古自虚明。传来旧业荒芜尽，惭愧秋原宿草生。(自注：右怀病翁先生作。翁领崇道祠官，故有“赤城”之句。)^{[7]169-170}

诗题中的“二刘公”指刘子羽、刘子翬兄弟。该诗为追怀刘子翬而作。因刘子翬四度主管台州崇道观，崇道观在台州天台县赤城山，故有首句之说。由此可见朱熹与二刘之间的密切关系。

刘子翬自绍兴二年(1132年)领任宫观官归隐屏山后，积极扩修刘氏家塾，与胡宪、刘勉之等人讲学论道、诗酒酬唱，为南宋初期建州学术的兴盛和文人群体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淳祐二年(1242年)，宋理宗为褒扬刘子翬的教育功绩，敕建屏山书院，门额为门人朱熹手书^[19]。刘子翬死后，朱熹视其为风骨楷模与精神标杆，在《书屏山先生文集后》云：“窃以为先生文辞之伟，固足以惊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学，静退之风，形于文墨，有足以发蒙蔽而销鄙吝之萌者，尤览者所宜尽心也。”^{[7]3863}巧合的是，朱熹一生也长期奉祠，闲居武夷山，弘扬理学、传道有声。

三、朱熹奉祠期间对武夷精舍的营建、书写及其影响

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幼时随父朱松辗转寓居多处，绍兴十年(1140年)，迁居建州建安环溪精舍。三年后父卒，被托孤于刘氏兄弟，遂与母移居崇安，受学于“武夷三先生”。刘子羽为其筑室“紫阳楼”，朱熹在此定居40年。淳熙十年(1183)后，朱熹常住崇安武夷精舍，绍熙五年(1194)搬至建阳考亭，度过晚年。朱熹享年71岁，19岁中举，仕于外者9年，立于朝者仅46日，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建州武夷山的山野之间，与友人寄情山水，著书立说，讲学传道，过着闲适自得的生活。在这期间，朱熹请祠极为频繁，长期领任宫观官。

朱熹20余年的奉祠经历对其人生思想、讲学论道、交游酬唱、文学创作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答韩尚书书》中自言：

熹狷介之性，矫揉万方而终不能回，迂疏之学，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笃，以此自知决不能与时

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来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愿欲者,不过修身守道,以终余年,因其暇日,讽诵遗经,参考旧闻,以求圣贤立言本义之所在,既以自乐,间亦笔之于书,以与学者共之,且以待后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实无毫发余念也。〔7〕¹²⁹¹

朱熹归居建州期间,共创建了4所书院,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书堂、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其中,武夷精舍使用时间最长、招收生徒最多,对朱子理学体系建构的作用最为关键,对它的营建和书写为我们管窥朱熹与宫观官制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

武夷精舍正式营建始于淳熙十年(1183年)正月,时任浙东常平茶盐使的朱熹因弹劾贪官——台州知府唐仲友而得罪左相王淮,被污蔑和排斥,责授主管台州崇道观,辞官归里。朱熹奉祠回乡后,便亲自筹划、营建武夷精舍。建宁知府韩元吉《武夷精舍记》中对此有明确记载:

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则游焉。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词哦而歌之,得酒啸咏,留必数日。盖山中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余每愧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既辞使节于江东,遂赋祠官之禄,则又曰吾今营其地,果尽有山中之乐矣。盖其游益数,而于其溪之五折负大石屏,规之以为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诛锄茅草,仅得数亩,面势幽清,奇石佳木,拱揖映带,若阴相而遗我者。使弟子辈具畚鍤,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画其处,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讲书肄业,琴歌酒赋莫不在是。〔20〕

此记作于淳熙十年(1183年)八月,主要讲述武夷山的地理环境及武夷精舍的布局,同时肯定朱熹效仿孔子言行,揭示武夷精舍“学行其乡,善其徒”的创办目的。其实,朱熹营建武夷精舍的想法可追溯至乾道五年(1169年),当时他为母亲祝氏丁忧而家居,其作于淳熙十年的《行视武夷精舍》诗句“胡然闭千载?逮此开一旦”后自注:“峰下小山重复,中有平地数十丈,乔木长藤,茂林修竹交相蔽隐。旧无人迹,乾道己丑,予舟过而乐之。及今始能卜筑,以酬曩志。”〔7〕⁶⁵⁹

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领任武夷山冲佑观宫观官期间,与妹夫刘彦集、隐士刘甫等人共游武夷山时作《游武夷以“相期拾瑶草”分韵赋诗得“瑶”

字》:“秋声入庭户,残暑不敢骄。起趁汗漫期,两袂天风飘。眷焉此家山,名号列九霄。相与一来集,旷然心朗寥。栖息共云屋,追寻唤渔舸。一水屡萦回,千峰郁岩峩。苍然大隐屏,林端耸孤标。下有云一壑,仙人久相招。授我黄素书,赠我英琼瑶。茅茨几时见,自此遗纷嚣。”〔7〕³⁴⁴“相期拾瑶草”出自杜甫《赠李白》中的诗句“亦有梁宋游,相期拾瑶草”,李、杜相遇,因不得意遂生求仙之念。朱熹借此表达自己的出世之思,从该诗后半部分来看,朱熹营建武夷精舍之思已越发浓厚和清晰。

武夷精舍大约一半的建筑是以道教宫观为基址的。朱熹在创建时,在石门西边建有专供道士居住的“寒栖馆”。“石门之西少南,又为屋以居道流,取道书《真诰》中语命之曰‘寒栖之馆’。”〔7〕⁶⁶¹《真诰》卷六载:“太虚真人曰:饭凡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一学道者。寒栖山林者,益当以为意。”〔21〕朱熹《寒栖馆》诗云:“竹间彼何人?抱甕靡遗力。遥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7〕⁶⁶³诗中塑造了此时朱熹安于拙朴生活的自我形象,“抱甕”语出《庄子·天地》,后形容保持本心,安于拙陋的纯朴生活。除寒栖馆外,武夷精舍还有仁智堂、隐求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晚对亭和铁笛亭等,这些构成了武夷山享誉盛名的建筑群。这些建筑的布局安排如下:武夷精舍坐落在五曲溪畔,隐屏峰两峰相抱之中。精舍主房为仁智堂,堂左边为朱熹的卧室——隐求室,寓示隐退山林、求真返朴之意,右边是止宿寮,用来接待朋友。隐屏峰左麓有石门坞,内建一排房屋,为弟子们的宿舍,取《学记》“相观而善之谓摩”之义而名之观善斋。在观善斋前,晚对亭和铁笛亭对称而立。

武夷精舍落成之后,朱熹作有《武夷精舍杂咏》12首诗,分别对精舍、仁智堂、隐求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钓矶、茶灶、渔艇进行吟咏,表现了诗人隐居求志的高怀与雅趣。如其一《精舍》云:“琴书四十年,几做山中客。一日茅栋成,居然我泉石。”〔7〕⁶⁶²诗中表达了诗人自14岁定居崇安至今整整40年与武夷山结下的不解之缘。朱熹《行视武夷精舍》诗云:“暂游意已惬,独往身犹绊。珍重舍瑟人,重来足幽伴。”自注:“已约初夏与同志皆往游集。”〔7〕⁶⁶⁰他在武夷精舍建成的短短数月内创作了大量作品,用来介绍其建筑分布、名称来源及功能用途等信息,由此阐释和赋予武夷精舍的价值和意义,表明自己的生活心态,构建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武夷精舍的建造为仕途失

意的朱熹提供了寄托身心的私人空间和怡情养性的精神家园。在这一独特空间中,他既可以著书立说、教学育人,又能够栖息心灵、陶冶自我,还可以寄情山水、体悟天道。

淳熙十年(1183年)四月十六日,武夷精舍正式竣工,朱熹即移居于此,其《武夷精舍杂咏》序云:“经始于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来居之。四方士友来者亦甚众,莫不叹其佳胜,而恨它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7]662}此后,四方名流纷纷亲至其地或遥以诗文相贺。先是建州理学家蔡元定(字季通)、吴楫(字公济)来到武夷精舍,后至武夷山冲佑观岁寒轩聚会唱酬。朱熹有《次公济精舍韵》《奉同公济诸兄自精舍来集冲佑之岁寒轩因邀诸羽客同饮,公济有诗赠守元章师因次其韵》诗唱和。长期师事朱熹的方士繇和史学家袁枢均作有《武夷精舍十咏》。已经致仕归居莆田故里的陈俊卿寄题武夷精舍诗来,朱熹有《伏蒙致政少传相公宠赐寄题武夷精舍诗一首,拜受捧读,不胜仰叹,无以自见,区区感幸之诚,辄继高韵,缮写拜呈,冒渎威尊下情恐悚之至》诗和之。丘密也对朱熹《武夷精舍杂咏》组诗进行了追和,他读罢朱熹《精舍》后,产生跟随朱熹逍遥其中之念,其《和朱子武夷杂咏十首·精舍》诗云:“我读精舍篇,梦作山中客。从公夜不眠,寒灯歌白石。”^{[17]28934}

陆游、杨万里等文坛巨擘也均有对武夷精舍的题诗。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发现了武夷精舍之于朱熹的重要意义,对他能够在其中安心读书治学予以肯定。陆游《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五首其一云:“先生结屋绿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不用采芝惊世俗,恐人谤道是神仙。”^{[6]1201}袁枢《武夷精舍十咏·仁智堂》亦云:“此身本无累,动静随所寓。结庐在岩谷,自适山水趣。”^{[17]27718}他们以这一建筑空间为触发点,在融入自身经历与感受的同时,强化了朱熹当时的思想和心态,体现了理学家安贫乐道的崇高精神境界,赋予了武夷精舍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南宋文士吟咏武夷精舍的一系列作品中,逐渐塑造了领任宫观官时期的朱熹形象。袁枢《武夷精舍十咏·隐屏精舍》云:“有怀武夷仙,相期苍翠间。”^{[17]27719}杨万里《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十二咏·精舍》云:“忆我南溪北,千岩万壑亭。妒渠紫阳叟,谗杀一峰青。”^{[22]1464}吕天泽《题武夷》诗云:“书林追慕紫阳翁,出入尝沾教雨中。缅仰高山难企及,大开茅塞迳能通。”^{[17]31292}陈宓《闰月五日题

武夷》三首其一云:“武夷精舍果何如,名字流传动八区。大隐山前溪五曲,一间茅屋与谁居。”^{[17]34043}白玉蟾《题精舍》云:“到此黄昏飒飒风,岩头只见药炉空。不堪花落烟飞处,又听寒猿哭晦翁。”^{[17]37593}

朱熹《武夷精舍杂咏》组诗的最后一首是《渔艇》:“出载长烟重,归装片月轻。千岩猿鹤友,愁绝棹歌声。”^{[7]664}渔艇是连接武夷精舍与外界的交通工具,杨万里《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十二咏·渔艇》诗云:“精舍何曾远?只在九曲北。渔艇若不来,弱水万里隔。”^{[22]1466}朱熹以武夷精舍象征归隐、轻松纯洁,以外界隐喻出仕、负重迷茫,在他的心中,这两个空间正是出处、仕隐的代表,正如丘密追和此诗所云:“世路风波恶,扁舟去住轻。中流发清唱,千古有遗声。”^{[17]28935}朱熹援引孔稚珪《北山移文》对假隐的嘲讽,以往返武夷山九曲溪途中清新自然的棹歌来消弭胸中的愁情。

淳熙十一年(1184年)二月,朱熹携友人学子游武夷山九曲溪,作千古名篇《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组诗(后来简称《武夷棹歌》或《九曲棹歌》)。这是歌咏武夷山水的经典之作,也是解读朱子义理的重要材料,兼具游乐诗和说理诗双重文本^④。朱熹门人及友人大量和作与仿作,在当时和后世广为流传。时任建宁知府的韩元吉最早唱和该组诗,今仅存1首《次棹歌韵》。南宋文人和韵之作还有白玉蟾《武夷九曲棹歌》10首、方岳《又和晦翁棹歌》10首、欧阳光祖《和朱元晦九曲棹歌》2首、留元刚《武夷九曲棹歌》7首。和作之外,《武夷棹歌》在宋代的仿作也颇多,如白玉蟾《九曲棹歌》、蒲寿晟《重游武夷偶成棹歌一首》等。其中成就较高的是绍熙三年(1192年)辛弃疾路经崇安至武夷精舍与朱熹相会时所赋的《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其九云:“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23]辛弃疾将曾担任侍讲的朱熹称为“帝王师”,昔日的“帝王师”现在却领任宫观官,只能吟诗垂钓、餐霞饮露,他期望有朝一日“西伯”前来将其诚邀归朝。

武夷精舍也是朱熹最终完成《四书章句集注》并以它为教材实行教育实践的著名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熹在武夷精舍广收门徒,培养了大批学生,逐渐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派。武夷精舍也因此成为理学教育的中心,蔡元定、刘燾、黄干、詹体仁、游九言、李方子、方士繇、陈

淳、蔡沈、窦从周、张巽、李閔祖等人,都曾就学于武夷精舍。当时或稍后,建州当地为数不少的理学家纷纷仿效朱熹,相继在武夷山中、九曲溪旁构筑读书讲学之室,如游九言的“水云寮”、刘燊的“云庄山房”、蔡沈的“南山书院”等,武夷山遂成为当时传播理学思想的重要阵地名噪一时。南宋理学家张栻曾云“当今道在武夷”^{[1]12053}。由于武夷精舍之于朱熹的重要意义,它被塑造成为一个现实中可以触及而又与理想家园相符的精神圣地。

淳熙十四年(1187年),朱熹提举南京鸿庆宫,其《拜鸿庆宫有感》诗云:“旧京原庙久烟尘,白发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门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7]679}南京(今河南商丘)鸿庆宫内有宋神宗御容绘像,但此时这里已沦陷为金国的统治区,宋人无法前往,朱熹晚年奉祠期间仍然挂念着沦陷的中原故土。正如清人王懋竑所言:“先生守南康,使浙东,始有以身殉国之意,及是知道之难行,退而奉祠,杜门不出,海内学者尊信益众。然忧世之意未尝忘也。”^[24]

回顾朱熹的一生,宫观官制度为他提供了物质生活基础和充裕的时间,使他能够长期在武夷山自由生活、交游唱和、专心讲学和创作。尤其是淳熙十年(1183年)至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在武夷精舍的8年,其学术思想和生活心态均臻于成熟。他通过对武夷山水的描绘来展现闲适的心态,创作了800余首诗,占其诗歌总数的半数以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宫观官制度为朱熹理学杰出地位的奠定与文学创作成就的取得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撑和制度保障,他奉祠期间营建和书写的武夷精舍可以视为其理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发生联系的重要现实空间和精神家园。

余 论

朱熹逝世10年后的嘉定二年(1209年),朝廷加封其谥号为“文”,称“朱文公”,并将其领任宫观官闲居建州期间完成的学术著作立于学馆,成为官方法定的读本。宋宁宗“嘉定更化”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有利于理学的复苏,为理学的自由发展赢得了—个宽松的环境。理宗即位后,崇信程朱理学,并请朱熹再传弟子、建州浦城人真德秀兼经筵侍讲。真德秀对南宋后期理学的传承和发扬贡献甚大。《宋史·真德秀传》云:“自侂胄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德秀晚出,独

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1]12964}宝庆元年(1225年),真德秀因得罪权相史弥远,被提举玉隆万寿宫,落职闲居。其《辞免除职宫观状》云:“今月初三日,恭准省札,勘会已降指挥,真某除职,与宫观。九月二日三省同奉圣旨,除焕章阁待制、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任便居住,札送某者。”^[25]他奉祠退归故里,一边步趋朱熹,阐发正心诚意的理学义理,一边读书创作。清人真采所编《真西山年谱》记载:“公既归浦城,以田易梦笔山地数亩,构堂于山之麓,日与门人刘克庄、汤汉、徐华老辈修《读书记》。”^[26]此事应发生于宝庆二年(1226年)至绍定元年(1228年)刘克庄知建阳县期间,他创立文公祠,主祀朱熹,这是朱熹享有专祠奉祀的开端。刘克庄后来在其《通两浙运使朱都承》中回忆说:“昔过考亭故居,尝登武夷精舍,徘徊如至阙里,梦寐想见文公。岂知高山仰止之邦,乃为有锦使制之地。”^[27]从中可见真德秀及其生徒刘克庄等人在建州的生活状态和行为轨迹。

综上所述,宫观官制度为建州地域文人聚合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促进了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的形成、发展和延续。这一文人群体的大多数成员里籍建州,他们交游、创作、传播理学的地理空间主要是武夷山及其周围地区。冲佑观是建州地区唯一设置宫观官的道教官观,刘子翬、朱熹等人主管武夷山冲佑观的经历,在其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中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记。作为宫观官的刘子翬和朱熹,在建州理学文人群体的离合聚散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们在宫观官制度庇护之下开展了大量的文学学术活动,从中可以管窥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文人心态。

注释

①关于该制度的研究,可参阅以下成果:梁天锡《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台北:学生书店,1978年;金圆《宋代祠禄官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白文固《宋代祠禄制度再探》,《中学月刊》1989年第6期;刘文刚《论宋代的宫观官制》,《宋代文化研究》第七辑,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汪圣铎《关于宋代祠禄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张振谦《北宋宫观官制度流变考述》,《北方论丛》2010年第4期。②侯体健:《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③熙宁三年(1070年),宋神宗“诏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自今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灵仙观置管干或提举、提点官。”见《宋史》卷17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80—4081页。④具体论述详见王利民:《从〈武夷棹歌〉论

朱熹诗歌的双重文本》,《东方丛刊》199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 [1]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3076.
- [3]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90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86.
- [4] 张君房.云笈七签[M].李永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614.
-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86.
- [6]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7] 朱熹.朱熹文集编年评注[M].郭齐,尹波,编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
- [8] 董天工.武夷山志[M]//藏外道书:第33册.成都:巴蜀书社,1994.
- [9]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93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0]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88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06.
- [11]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2]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67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97-298.
- [13] 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5039.
- [14] 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2.
- [15]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756.
- [16] 朱熹,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2033.
- [17]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8]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96.
- [19] 危继良.屏山志略:附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34.
- [20]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16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26-227.
- [21] 陶弘景.真诰[M].赵益,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100.
- [22] 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3] 辛更儒.辛弃疾集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74.
- [24] 王懋竑.朱子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1.
- [25]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12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430.
- [26] 真采.真西山年谱[M]//吴洪泽,尹波.宋人年谱丛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7495.
- [27] 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1:7635.

The Palace Official System and Literati Group of Neo-Confucianism in Jian Zhou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Zhenqian

Abstract: The palace official system was unique to the Song Dynasty. The palace official system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not only a tool for anti-Daoism, but also provide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which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academic thought and literary cre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at that time. Most scholar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d the experience of leading palace officials to live in their hometown, which undoubted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literature. The palace official system provided the opportunity and condition for the convergence of literati in Jian Zhou, an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tinu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literati group in Jian Zhou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ongyou Temple was the only temple with a palace official in Jianzhou area. Wu Yi Mountain, a famous Taoist mountain, was the transfer station for the southward movement of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base camp for the birth,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Zhu Xi Neo-Confucianism. In the last 17 years of his life, Liu Zihui attended temple five times and lived idle in Chong An, Jian Zhou.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lecturing were two of his most important daily spiritual activities. Zhu Xi led the palace official for a long time in his life, totaling more than 20 years. The palace official system provided economic support and time guarantee for Zhu Xi's outstanding position in Neo-Confucianism and literary creation achievements. The Wu Yi Jing House built and written by Zhu Xi during his temple period can b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realistic space and spiritual holy place where the two were related. At the en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en Dexiu back hometown continued the tradition in Jianzhou region.

Key words: palace official system; Jian Zhou literati group of Neo-Confucianism; Chongyou Temple; Liu Zihui; Zhu Xi

责任编辑:采薇

“王荆公体”特征新论

李唐

摘要:王安石晚期作品特别是绝句,在艺术表现和审美风格上最为成熟,以其独特的艺术风貌被称为“王荆公体”。这些作品奠定了宋调的基本特征,又与苏、黄诗有着不同的风貌。当苏、黄等人正将宋调特征推向极致的时候,王诗晚期绝句却在呈现宋调特征的同时表现出向唐诗复归的倾向。“王荆公体”的独特风貌主要表现为精丽圆熟、生新工巧的语言特征,秀丽密集、轻灵明快的意象特征,清新淡远、空灵明净的意境特征,含蓄蕴藉、深婉曲折的风格特征。

关键词:“王荆公体”;唐音;宋调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151-09

“王荆公体”历来被认为是王安石诗歌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分,但学界对其界定、特征、成就多有争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北宋诗体划分为“王荆公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邵康节体”^{[1]690},但在论及宋诗的发展、流变时,并未涉及“王荆公体”的艺术风貌、流变及在宋诗发展中的作用。从文本内容看,“王荆公体”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唐音讲求风神情韵、兴象玲珑的美学标准,但缺少唐音那种意境浑融壮大的风格特征,而更多带有讲求技巧、规则、学问的“宋人习气”,在向唐音的复归中体现出鲜明的宋调特征。本文拟就“王荆公体”的界定、特征、成就做进一步分析,希望能对其总体特征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深化对“王荆公体”思想文化内涵和艺术技法的开掘,为解读“王荆公体”诗歌作品提供一些参照。

一、“王荆公体”再界定

据《王安石全集》,王安石的诗歌现存 1652 首,其中古体诗 452 首,近体诗 1176 首,而近体诗中绝

句就有 604 首,约有 200 首左右作于罢相前,400 多首作于罢相后,它们的风格亦有明显不同。叶梦得《石林诗话》指出:“荆工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才’之类,皆直道胸中事。”^{[1]419}。宋人称赞王安石诗歌,更多地指向其晚期具有“深婉不迫之趣”的绝句。例如,黄庭坚认为“荆公暮年作小诗(指绝句),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齿颊间”^[2];叶梦得认为“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3]241};《漫叟诗话》指出“荆公定林后诗精深华妙,非少作之比”^{[4]222};许颢认为“荆公钟山诗,超然迈伦,能追李、杜、陶、谢”^{[1]383};陈师道认为“公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3]244}。但也有人对王安石晚期绝句学唐音的效果持有异议,徐俯认为“荆公诗多学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5]293},李东阳认为“王介甫点景处,自谓得意,然不脱宋人习气”^[6]。事实上,“王

收稿日期:2024-04-2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北宋中期诗坛研究”(2016C022)。

作者简介:李唐,女,文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荆公体”兼有唐音和宋调两种特色,是二者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王安石以人力的匠心而臻于唐人和谐优美的境地,成就了“王荆公体”既生新工巧又深婉含蓄的独特风格。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彻底告别政治舞台,退居金陵。这是他人生道路由“绚烂之极”到“归于平淡”的转折点。他的诗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也以其政治生涯的终结为标志,发生了新的变化。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尤其是绝句,摆脱了之前作品中通常具有的那种功利色彩,变为雅丽精绝、深婉清新、浑然天成的风格。笔者以为,严羽所说“王荆公体”,主要就是指王安石晚年时期绝句的这种风格。如《乌石》:“乌石冈边缭绕山,柴荆细路水云间。吹花嚼蕊长来往,只有春风似我闲。”^①《山前》:“山前溪水涨潺潺,山后云埋不见山。不趁雨来耕水际,即穿云去卧山间。”又如《题舫子》:“爱此江边好,留连至日斜。眠分黄犊草,坐占白鸥沙。”《钟山即事》:“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些诗句的确如叶梦得《石林诗话》中所说“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3]241},笔法圆熟含蓄,不见使气用力的痕迹,有晚唐风致;但诗中那种精致劲拔的精神状态,又使它们呈现出与晚唐绝句不同的气象。

尽管王安石晚年力图以寄情山水田园,来清除变法失败残留于内心的阴影,实现精神上的超脱和心理上的平衡,但作为一位资深的政治家,他在多年执政生涯中所养成的积极进取、求为世用的深层意识不会马上消失,其产生的巨大惯性使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无法真正忘却朝中大事。此种心态反映在其诗作中,就是“悲壮即寓闲淡之中”^[7]。如他的《杂咏六首》其六:“百年礼乐逢休运,千里江山极盛游。那似鲍照空写恨,不为王粲只消忧。”那种惘惘不甘之情弥漫于字里行间。又如《春日即事》:“池北池南春水生,桃花深处好闲行。细思扰扰梦中事,何用悠悠身后名。”细细品味可以发现,诗人醉心自然、体悟山水只是其消解心灵痛苦的无奈选择。但梦中纷繁的内心困扰和现实的种种困境,都让诗人无法真正解脱。荆公就是这样带着那颗悲怆冷寂的心,置身于钟山旖旎的春光中,完成那一首首看似闲适实则隐藏着英雄失意的悲伤苦闷的诗篇。

王荆公晚年这种以闲淡面目示人的绝句,隐含着深深的苦闷与怅惘之情,是形成“王荆公体”特有的深婉之风的主要原因。这是其晚年生活表面的闲适姿态和内心的痛苦失意在绝句中浑然一体而表现

出的风格,这种风格一方面具有宋诗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回归唐诗的趋势。其语言运用、意象经营、意境创造在北宋诗坛都呈现出鲜明的特性。

二、精丽圆熟、生新工巧的语言特征

面对风情摇曳、意境浑成的唐诗,宋诗能够以全新的面貌和独特的风格与之并驾齐驱,诗人在语言艺术上的创新与超越功不可没。缪钺认为:“唐诗技术,已甚精美。宋人则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盖唐人尚天人相半,在有意无意之间,宋人则纯出于有意,欲以人巧夺天工矣。”^[8]宋诗继浑然天成的唐诗艺术后,能够独辟蹊径,以富有个性化的风采与唐诗双峰并峙,是诗人不断在语言艺术上“以人巧夺天工”的创新与超越的结果。曾季狸《艇斋诗话》云:“荆公诗及四六,法度甚严。”^{[5]310}叶梦得《石林诗话》云:“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于对偶。”^{[4]277}这些评价都是对王安石晚年诗艺研磨功夫的肯定,其晚期绝句之所以雅丽精绝,与语言方面的“人巧”密不可分。

王安石的晚期绝句首先受到晚唐诗人的影响。在盛唐诗人手中已定型并相当成熟的五七言绝句,多用偶俪句子,对仗精工,表现出精丽、圆熟的特点。荆公晚期绝句学习晚唐又能有所超越,频繁使用偶句俪词,对诗句工致性有较高要求。在文本形式上,王安石的七言绝句“似是作律诗未就,化为截句”^{[9]126}。的确,从五七言律诗的格律规则看,绝句似乎就是将律诗一分为二,因此,绝句也有“律截”之称。在诗歌史上,绝句的成熟要早于律诗。王安石对此完全明了,并不是把没完成的律诗作为绝句,而是在刻意求工。他的一些绝句中也出现有盛唐时期那种二三句不粘的句式,如《送僧游天台》:“天台一万八千丈,岁晏老僧携锡归。前程好景解吟否,密雪乱云絨翠微。”又如《对棋呈道原》:“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明朝投局亦未晚,从此亦不复吟诗。”

元人杨载在《诗家法数》中指出:

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有实接,有虚接。承接之间,开与合相关,正与反相依,顺与逆相应,一呼一吸,宫商自谐。大抵起承二句固难,然不过平铺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1]732}

杨载认为,写好绝句,第三句的“转”至关重要,只有“转”的成功,才能使全诗在整体上气脉贯注、一气呵成。在七绝的第三、第四句讲究对仗,要同时兼顾好对仗工稳与流转变化两个方面。“荆公体”中的对仗大部分选择在第三、第四句进行,而且处理得自然而然,丝毫看不出刻意的痕迹。如《南浦》:“南浦东冈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诗中用“鸭绿”代水,用“鹅黄”代柳,形成“鸭”与“鹅”、“黄”与“绿”的妙对,被黄庭坚赞为“精绝”。《石林诗话》所云:“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于对偶。尝云:‘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若参以异代语,便不相类。’”^{[4]277}其中又以“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为例,指出此是“汉人语对汉人语”,还以“周颙宅在阿兰若,娄约身随窣堵坡”为例,指出此是梵语相对,并说明“此法惟公用之不觉拘窘卑凡”^{[4]277}。可见王安石晚年绝句在晚唐绝句精于偶句风气的影响下,变唐诗的浑然天成成为精致求工,因此成就了“王荆公体”精丽圆熟的风格特征。

王安石的晚期绝句虽取径晚唐一路,但又不为其所囿。胡应麟在《诗薮》中评价说:“介甫五七言绝,当代共推,特以工致胜耳,于唐自远。”^[10]此话虽有重唐轻王的味道,但也确实指出了王安石绝句与晚唐绝句的相异之处。而这种相异之处正是王安石晚期绝句中的“宋人习气”——在圆熟中带有劲拔拗峭,是“王荆公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实际上,这也与王安石接受杜甫绝句“变格”的影响有关。他学习杜甫绝句字句之雕琢锤炼、句法之错综变化、章法之曲折盘桓,得拗健之体势,使“王荆公体”不同于唐音,而有宋调生新、劲健的特色,因而显得面目一新。

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指出:“唐人诗好用名词,宋人诗好用动词。”杜诗作为盛唐变体,也十分重视动词的锤炼,可谓开唐宋人善用动词之先河。王安石在动词选用上的精心布局及其呈现出的艺术效果,正是宋代诗人善用动词的证明。

一是多用动词赋予静态事物以动感的情趣,而有宋调劲拔拗峭的特点。如《北山》:“北山输绿涨横波,直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这是一首描写隐居环境的诗,人们过多注意了后两句表现出的安然闲适之态,而对第一句所用动词“输”的精彩之处注意不够。诗中“输”这个动作的发出者是“北山”,动作的对象是“绿”,“输”字的巧妙运用使“北山”化静为动,将钟山的蓬勃生

机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二是动词的选择贴切、生动,使用方式灵活多样。王荆公突破了五言绝句句眼在第三字,七言绝句句眼在第五字的传统,句眼位置灵活多变。在王安石的七绝中,有的句眼在第三字,如“北山输绿涨横波”的“输”字;有的句眼在第四字,如“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的“绿”字;也有的句眼在第五字,如“啄教零乱点苍苔”(《次韵杏花三首》其一)之“点”字;还有的句眼在第七字,如“午窗残梦鸟相呼”(《悟真院》)之“呼”字。荆公五绝在动词的使用上也有类似的特点。其中有第一字为句眼的,如“染云为柳叶,剪水作梨花”(《染云》)之“染”字和“剪”字;有第二字为句眼的,如“眠分黄犊草,坐占白鸥沙”(《题舫子》)之“分”字和“占”字。动词的妙用大大增强了诗语的表现力,是“王荆公体”工巧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唐诗善于用一系列静态名词形成诗歌意境和构建诗歌画面,宋诗则妙用动态词语使整首诗活起来,尽显灵动活泼。“王荆公体”炉火纯青的动词运用技巧所产生的鲜活、灵动之美自寓其中。

三是拟人化手法的巧妙运用。这也是形成“王荆公体”生新劲健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如“野水纵横漱屋除,午窗残梦鸟相呼”(《悟真院》)中“漱”和“呼”两个动词,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一幅充满生命活力的生动画面:清溪从庭院潺潺流过,涤荡着阶除上的尘埃,美丽的鸟儿鸣声悠扬,结伴飞翔。从这些诗句中,诗人通过相关动词的巧妙运用,将本无情感的自然物人格化、人性化,使之产生人的情思意绪,构成鲜活、灵动的诗境。这种由相关动词形成的拟人化手法,在黄庭坚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除拗体似杜而外,以物为人一体最可法”^[11]是宋人吴沆对山谷诗中拟人手法运用的准确评价。在唐音到宋调的嬗变过程中,王安石在拟人化手法的继承上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四是创造性地学习、运用杜甫绝句造意生新的表现手法。造意生新是杜甫绝句区别于盛唐绝句的重要表现手法,王安石学习、继承杜诗绝句中的这种手法,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他往往以递进的方式进行造意的翻新,达到“出奇”的效果,有效强化了诗歌的生新之感。如《道旁大松人取为明》:“虬甲龙髯不可攀,亭亭千丈荫南山。应嗟无地逃斤斧,岂愿争明爇火间。”这里第一层意思写松树为了躲避被焚的下场,而隐身于南山之中;第二层意思写松树即便隐身南山,也仍然没有逃脱被砍伐的命运;第

三层意思写被砍伐为薪的松树不愿与蜡烛争明于瞬息之间。诗歌的意脉可谓层层递进、翻空出奇。荆公在绝句造意上求新求变的艺术追求,在那些改造前人诗意而为自己诗材的创作实践中表现得更加充分。杨万里《诚斋诗话》云:“陆龟蒙云:‘殷勤与解丁香结,从放繁枝散诞香。’介甫云:‘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头自在春。’作者不及述者。”^{[5]163}这些翻新前人诗句成功的例子,充分体现了“王荆公体”造意求工致、求生新的特点。

综上所述,“王荆公体”在语言上求工致、求生新、求深远、求曲折,呈现出自由而又不离规矩的风貌,进入了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艺术境界。黄庭坚评价“王荆公体”的“雅丽精绝、脱去流俗”就是指这种高度纯熟的语言技巧。

三、秀丽密集、轻灵明快的意象特征

王安石晚期绝句审美意象的特征及经营方式,是“王荆公体”形成含蓄深婉之风格,创造平淡简远之境的前提条件,也是其唐诗风韵的最重要因素。自然意象是构成“王荆公体”独特意象群的重要元素,与前几个时期多社会意象不同,王安石晚期绝句中出现率最高的是自然意象。那天边的一轮皎洁明月,那满山遍野的绚烂春花,那充满生机的林中池塘,那翠绿欲滴的依依柳枝,还有婉转鸣叫的黄鹂……凡此种种,给人们带来一种清新、自由、明快之感,令人产生一种安宁、静谧、闲适之美。王安石前几个时期诗作中虽然也有自然意象,但数量较少,并且大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如陪辽使北返至边塞时所写的《出塞》:“涿州沙上饮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塞雨巧催燕泪落,蒙蒙吹湿汉衣冠。”诗中展现出一片荒凉凄苦的景色,为了营造凄凉、哀伤的氛围,诗人虽然也使用了“风”“雨”等自然意象,但其着重表达的情感意绪还是对国事的忧虑。

在荆公晚期绝句的自然意象系统中,“水”“云”“山”这些无生命的意象出现的频率最高,而且早期那种浓重的情绪痕迹已经明显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淡泊、空灵和内敛的心态,表现出典型的隐者的精神世界。如《赠僧》:“纷纷扰扰十年间,世事何尝不强颜。亦欲心如秋水静,应须身似岭云闲。”此诗首两句通过回顾10年来喧嚣纷扰的生活和身处世事中强颜欢笑的日常,揭示了社会、人情的复杂叵测,以及自己隐藏内心真实情感而周旋其中的疲惫和无奈。接着,诗人用“秋水”和“岭云”两个自然意象,

将现实世界与理想生活进行对照,表达了对心灵安宁的向往。秋水明澈、寂静,象征着心灵的平和、安详;岭云缥缈、自由,象征着生活的闲适、悠然。诗人希望自己的心灵能够像秋水一样宁静、平和,自己的生活能够像岭云一样随性、安闲,渴望身心都能够达到闲适、自由的状态。这反映了王安石对于个人内心境界和人生意义的考量与追求。

“花”是“王荆公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植物意象。花开花落恰似人由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因此“花”的意象传达出了一种真切、深刻、完整的生命意识。花开也无声,花落也无声,就像生命,最终都将归于沉寂。诗人以“花”的意象为载体,对生命进行禅理观照,也是其闲淡心境的外化。如《杂咏四首》(其四):“桃李白城坞,饷田三月时。柴荆常自闲,花发少人知。”此诗前两句以“桃李”与“饷田”两种自然景象,简单地勾勒出山村的三月风光。意象虽然简单,但“桃李”之繁茂与“饷田”之忙碌,自然而然地展现出大好春色的勃勃生机。后两句则是描写在这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中,诗人自己所处的寂静空灵、超脱世事之外的境界。这里也只用了“柴荆”与“花”两种极平常的意象,“柴荆”代表了自己置于世外的身份与处境,“花”则以画龙点睛之笔营造了这种寂静空灵的氛围。在前两句“繁”与“忙”的映衬之下,这种寂静空灵的禅境就更显突出。诗人心绪中的几许超脱、几许孤高、几许落寞,都随着这些简单的文字缓缓流出,大自然与人的心灵契合也就淡淡生发开去。

“鱼”和“鸟”是“王荆公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动物意象。鱼畅游于江河,鸟翱翔于蓝天,它们所象征的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正是诗人孜孜以求的。在对它们的描写、体悟和观照中,诗人仿佛也融进它们自由、美好的生命律动中。如《钟山即事》,此诗写在寂静空灵的境界中,诗人的心灵与大自然的契合。以“绕竹流”写无声的涧水,以“弄春柔”写竹西的花草,化静为动,以动衬静,显现出春光的轻柔淡雅而富于生机;身置“茅檐”之下,当然是超脱世事喧扰的村野生活的写照,而对大好春光“对坐终日”,更可见无尽的闲淡机趣。最后一句以“鸟”静栖于林的意象,把这一切笼罩在万籁俱寂的氛围中,尽显生命闲适、自由的乐趣。此句反用王籍《入若耶溪》中“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诗句,实际上是以翻案手法,调动进层联想的艺术机制,进一步渲染烘托安闲、幽静、恬淡的氛围,淡淡地流露出诗人对安闲静谧、自由生活的向往之情。

“绿”是“王荆公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色彩意象。如《送和文至龙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荒烟凉雨助人悲，泪染衣巾不自知。除却东风沙际绿，一如看汝过江时。”从熙宁九年（1076年）罢相归金陵至作此诗时，诗人与长女已分别7载有余，此番又与弟别于江边，同样的冷雨凄迷，同样的别情悲凉。再次经历这种场面，诗人不禁触景伤怀，更加思念远方的女儿。此处借助“绿”的意象，进一步突出了物是人非的感伤意绪，除了春风吹绿了沙滩这一点与7年前有所不同外，其他一切都与当年送女儿出嫁时一样使人伤感。而今风物依旧，亲人却天南地北，一个“绿”字，引出无限的伤怀和感慨。又如《出郊》：“川原一片绿交加，深树冥冥不见花。风日有情无处着，初回光景到桑麻。”此诗写初夏农村绿意盎然、郁郁葱葱的景色。开头着力描写远望之景，平川辽阔，万物生机勃勃。“绿交加”三个字，传神地表现出层层叠叠的翠绿植物茁壮茂盛、彼此掩映的画面。这里“绿”的意象，形象地表现出色彩的浓度和深度。树丛和庄稼的重重绿叶挡住了阳光，周围一片幽冥晦暗，任何鲜花都看不到了。在一片绿荫的掩映中，我们领悟到诗人大有作为后的无聊，喧闹之后的冷清，以及纷扰之后的沉寂。

此外，与“绿”颜色相近的其他色彩意象，如“青”“碧”“翠”等的使用也相对较为频繁，作为绿色衬景的“草”“柳”“苔”等意象也不断出现。如《书湖阴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此诗中，眼前一片绿油油的农田犹如母亲臂弯中的孩子，被清澈的溪水温情环绕着；不远处青翠欲滴的山色仿佛一位性急的旅人，脚步匆匆直奔庭院而来。这里的“绿”色写出了农田的勃勃生机，“青”色写出了山势若奔的兴奋和热烈，二者使“护”“绕”“排”“送”等拟人化动作描写更加生动传神，“一水”“两山”也被转化为富于生命和情感的亲切形象。因此，在“王荆公体”的色彩意象群中，“绿”始终是作为色彩主调而存在的，“绿”色不仅象征生命的活力，而且给人带来恬淡之美、闲适之趣。

“松”“荷”“梅”“竹”等意象是王安石人格理想的具象化表现。意象本是一种内心观照，是诗人心灵投射、染化外物，与外物契合的结果，因此，它也自然地浸透着诗人的心灵信息。“松”“荷”“梅”“竹”这些象征高洁品格的意象，在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们在荆公晚期绝句中经常出现。王安石以咏梅为主题的绝句有10多首，

约占其全部咏花诗的1/3。这些绝句中充满了诗人对梅花的喜爱、赞赏之情，并以此作为自身高洁、不屈人格的象征物。诗人将梅花置于寒冬凛冽、严酷的生存环境下，书写梅花的高洁品格、鲜艳的色彩、沁人心脾的香气，以及凌寒盛放的不屈精神。如王安石的那首著名的五言绝句《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此诗在咏物中寄怀言志，“梅”的意象寄予了诗人身处逆境中的昂扬斗志和凛然风骨，也委婉地表现出诗人抑郁不平的心境。可以说，荆公晚期绝句中的自然意象群全面地再现了他的复杂心境和感受，将闲淡与悲壮交织在一起。如前所述《道旁大松人取为明》，此诗所写“大松”伟岸高洁，其对于“荫南山”之大任尚且不屑为之，更何况与灯烛争辉之类的琐事呢！这里的“大松”意象实为诗人个性和罢相后心态的自况，暗喻自己无意于世事，且以与“小人”政坛争“利”为耻，表现了荆公清高倔强、孤傲挺拔的人生态度。此外，“荷”与“竹”的意象也都形象地呈现了作者的同样心境，如《荷花》：“亭亭风露拥川坻，天放娇娆岂自知。一舸超然他日事，故应将尔当西施。”《咏竹》：“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

王安石晚期绝句中的多种意象往往以平行式为主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所谓平行式，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意象的平行并置。荆公晚期绝句中，有前后句的意象平行并置，如“蒲叶清浅水，杏花和暖风”（《蒲叶》），此二句中“清”与“和”二字是形容词活用做动词，使“荷叶”与“杏花”的意象呈现出灵动的生机，表现出节候转换所带来的变化；也有同一诗句中的意象平行并置，如“桑条索漠柳花开”（《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二）在同一句中出现两个植物意象，即“桑条”和“柳花”。此外，王安石晚期绝句中还运用了“向心式”的意象组合方式。如前所述绝句《梅花》诗，其四句都是围绕中心意象“梅”来展开，分别写梅花生长环境的严酷、梅花不畏严寒的品格、梅花雪样洁白的身姿、梅花盛放带来的暗香，呈现出一种向心结构。

与“平行式”和“向心式”两种意象组合方式相呼应，“王荆公体”的意象密度较大，往往以堆叠的形式出现，这一点颇似晚唐绝句。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商山早行》）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些意象以堆叠的形式置于两句诗中，省略了表达彼此之间逻辑关系的关联词，4个名词性意象组成4个水墨画般的精美画面，共

同构成了一幅静谧安然的商山晨景图。荆公诗句“小桥风露扁舟月”(《随意》)也巧妙地运用了意象堆叠的表现手法。此句由“小桥”“风”“露”“扁舟”“月”5个意象结构而成,且其间并无任何关联词语限定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把描绘功能化为情味功能,给人以无尽的体悟空间。

后人常有将王安石晚期绝句与晚唐诗相提并论者。如曾季狸称:“绝句之妙,唐则杜牧之,本朝则荆公,此二人而已。”^{[5]293}赵与时也注意到王安石绝句的独特风格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12]。而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盛唐诗的美学标准做了精准且形象的概括:“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相,言有尽而意无穷。”^{[1]688}王荆公晚期绝句与唐诗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严羽所谓“兴趣”的核心,便是盛唐诗意象经营的艺术技巧。晚唐时期的绝句中,更有了以密集的意象排列而形成“兴趣”的倾向。王安石晚期绝句中的意象运用鲜明地体现出唐诗的风韵。清人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对王安石的诗歌做了高度评价:“读临川诗,常令人寻绎于语言之外,当其绝诣,实可兴可观,不惟于古人无愧而已,特推为宋诗第一。”^[13]意象的密集化以及以并置为主的多种意象组合方式不仅是“王荆公体”含蓄蕴藉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而且是王安石晚期绝句被视为回归唐音的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王安石晚期绝句与晚唐绝句的许多作品,著名的如杜牧的《山行》、温庭筠的《瑶瑟怨》、李商隐的《天涯》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四、清新淡远、空灵明净的意境特征

王安石晚年隐退于政治之外,深受禅宗思维方式的启迪,其罢相前各阶段诗歌中普遍带有的那种功利色彩已然褪去,而表现出对闲适淡泊生活境界的渴望与追求,从而以自然而又精工的笔触,形成“王荆公体”独有的空灵明净、清新淡远的艺术境界。

一是以恬淡心境入诗,而成清新淡远之境。为了表现退出仕途后闲适自得的心情,王安石晚期绝句中经常选择由青山、碧水、红花、翠叶、绿草、春风等意象,通过其匠心独运,营造出与此种心境浑然一体的恬淡闲适的审美意境。如《竹里》:“竹里编茅倚石根,竹茎疏处见前村。闲眠尽日无人到,自有春

风为扫门。”此诗描绘了隐于茂密竹林中的茅屋村舍的静谧安详。翠竹林中,茅草小屋背靠石壁而立,于竹茎掩映处依稀可见远方的村庄。在这翠色欲滴的竹林小屋里,即使整日闲眠,也无人打扰,只有袅袅春风,悄悄吹过庭前,似有意默默为主人带走庭院中的杂尘。诗中景物皆为日常之景,却有着令人向往的魅力,其妙处在于诗人不是在模山范水,而是在以景寓意,将自己恬淡的心境、闲适的情趣与笔下的景物相融合。诗人笔下的客观景物已成为其心灵意绪的载体,是其心象化了的艺术境界,此处,自然景物被塑造成宁静、安然的诗境,诗人徜徉其中,没有世俗功利的取舍,只有沉浸其中的审美体验,所以才能创造出这样清新淡远的意境。黄庭坚之甥徐俯说:“荆公绝句妙天下。”^{[5]293}一个“妙”字,准确地道出了王安石晚期绝句深厚的艺术造诣。

除此之外,王安石晚期绝句中有颇多作品带着画意,在画面中完成意境的创造。如《江宁夹口三首》其三:“落帆江口月黄昏,小店无灯欲闭门。侧出岸沙枫半死,系船应有去年痕。”诗人途经江宁夹口,在饱览风光的同时,心头不由泛起千丝愁绪。前二句写景,首句突出了一个静字,描绘出一幅静寂的秋夜孤舟图:秋天的黄昏,一条孤零零的行船在江口停泊,舱里孤灯荧荧,窗外夜色茫茫,在朦胧的月光下,一切都披上了一层迷茫的轻纱;第二句由静转动,小店关门的啾呀声打破了江边的沉寂,使诗人的目光转向岸上;第三句仍是写景,映入诗人眼帘的是寂寞小店边的一棵倾斜的、半枯的枫树。随着视线的延伸,由客舟、孤帆、江水、月色、无灯小店、侧倾枯树,构成了一幅江口黄昏的画面,自然渗透出一种静谧闲淡而又带有落寞伤感的情调;第四句笔锋一转写出诗人的感慨,像画外音一样,表达了诗人在闲淡之中,体悟到韶光易逝的心境,使人回味无穷。如上所述,王安石晚期的写景绝句,往往能给人以历历如绘的感觉,诗情与画意相生而出,写出了虚静状态下的感觉和意态,意境的创造也在诗情与画意的交融中完成。

二是以禅佛哲理入诗,而成空灵明净之境。熙宁变法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他无奈隐居钟山。由于自身政治理想的破灭,以及由此而来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加之个人的诸多因素,禅宗遂成为他心灵的重要避难所,禅宗观念也对他晚年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常以禅宗思想进行自我反省,并在其中寻求自我安慰和解脱,在这个过程中创作了大量的具有禅宗色彩的绝句。王

安石晚期带有禅宗色彩的绝句,可以说是这位政界元宿从侧身嗷嗷寰尘到退居落落大化的人生投影,也是他虽未弃儒而近释,以获得灵魂拯救的心路历程的写照。这些带有禅宗色彩的绝句在艺术表现上颇具共同性,其中诗人的感情多表现为平静恬淡,诗歌节奏舒缓、从容,整体色调疏淡、清空,意象构成也多选取那些被传统赋予了超然、淡泊之趣的自然物,如空谷、野寺、浮云、寒松等,而不采用疾风、骤雨、阳光、骏马等象征不甘、进取、热烈的意象。

王安石晚年这些带有禅宗色彩的绝句中,诗人在对自然界审美客体进行观照和体悟时,所流露出的闲适心境中多少都会有一丝禅意。在意境的创造上,诗人多以远离城市喧嚣且少有人迹的宁静、虚空之所为背景,即其所说的“地偏人罕至,心远境常寂”(《次韵约之谢惠诗》)。在这类诗中,诗人所选择的意象已不再是自然物象本身,而是被其心灵化的禅宗理念的承载物。诗人笔下的山光水色、自然万物都渗透着旷远、灵动、幽静,创造出一种空灵明净的诗境。如《两山间》:“山花如水净,山鸟与云闲。我欲抛山去,山仍劝我还。”诗人以其平淡而又工巧的诗句,来表达深奥的佛理。在诗人笔下,山水、花鸟、云等自然意象也蕴含着禅宗空净、无为等哲学理念。诗人以这种看似不经意的“平常心”去看待悠远虚静的钟山的一切,自然界的山、水、花、鸟、云也在这种“平常心”的体悟下,展现出一种飘然自由、静谧澄澈之美。诗人通过这些常见的意象为读者营造了一种超然世外、物我两忘的空灵明净之境。

王安石晚期部分带有禅宗色彩的绝句往往表达自己对无拘无束、宠辱两忘的理想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从文本表面看,这些诗并没有直接使用禅语,但经过诗人的匠心独运,它们已成为抽象的禅宗哲学理念与具体的现实意象水乳交融的产物。诗人从诗歌所呈现出的自然美景以及自己对日常生活中禅理、禅意的体认出发,以禅入诗,化于无形。如《即事二首》:“云从山中起,却入钟山去。借问山中人,云今在何处?”“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无心无处觅,莫觅无心处。”这两首绝句通过一问一答的生动形式,营造出一个悠悠云来、飘飘云去、青山寂寥、来去无迹的空灵境界,以此突出“无心”和“偶然”的重要,体现出禅宗哲学随缘任运、无心而无往的处事理念与人生态度。

王安石晚年参禅礼佛的人生经历,使其对个体生命有限性与宇宙自然无限性的关系有了全新的感

悟,深刻认识到实现心灵净化、生命自由的根本途径是将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无限的宇宙自然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是刻意为之或汲汲于求而来的,而是在不经意中自然而然达到的一种状态。这种超然于物外的闲适,亦即禅宗适意自然、随运任缘人生哲学的诗意表达。在这种诗意表达过程中,诗人所体悟到的禅理、禅意已与现实中自由飘荡于空中的“钟山之云”水乳交融,这种空灵虚静的审美意象给人以悠然自得、亲切如面的感觉。其他如《岭云》《卧闻》等,也均以禅趣入诗,表现出一中超凡脱俗的空灵明净之境。

五、含蓄蕴藉、深婉曲折的风格特征

王安石罢相后的诗歌古体减少,近体增多,近体中又以绝句最多。荆公这一时期诗歌中,反映社会现实政治和咏史怀古之作减少,描写风景的内容增多;直截刻露的抒情和议论减少,深婉含蓄的表达方式增多,从而形成一种含蓄蕴藉、深婉曲折的艺术风格。

王安石晚期绝句含蓄蕴藉、深婉曲折的艺术风格,首先是伴随着题材取向的变化而来的。在王安石罢相前几个时期的诗风发展变化中,无论是质朴劲拔、一吐为快,还是思理深刻、富于韵味,抑或是沉郁凝重、工琢老练,诗歌题材基本上两类:第一类是表达政见、阐述治国方略或反映朝野大事的诗,这类诗的内容决定了其表现手法的显直,不复含蓄;第二类是咏史怀古诗,这类诗是王安石艺术水准较高的作品,见解深刻,思理精警,发前人所未发。这些作品虽然理趣丰满、富于韵味,但毕竟是以议论入诗,是主观感悟的外露,这种风格也是北宋诗坛上的普遍现象。到了晚年,在典型的“王荆公体”中,这两类题材大为减少,其受佛老思想影响,创作了大量描写山光水色和抒发个人恬淡心情的诗歌。当然,晚年的王安石并非完全与政治隔绝,他那些寓悲壮于闲淡之中的作品,就是其仍不能彻底忘怀世事的有力见证。但无论是哪种题材,在表达上都减少了早期的发舒外露,而变为含蓄蕴藉、深婉曲折。

王安石晚期的一些写景绝句,原本是想在对自然的充分关注中寻求恬淡与宁静,但因壮志未酬,内心的苦闷与惆怅,却借着与之相反的旷达而婉转深曲地渗透出来。如《怀旧》:“吹破春冰水放光,山花涧草百般香。身闲处处看行乐,何事低回两鬓霜。”诗的前三句描写春光美景和悠闲的心情,末句用

“何事”突然一转,抖出“两鬓霜”的形态,表面上是写留恋行乐,不应很快老去,但却曲折地表达了在无所作为中老去的人生苦闷,这使诗人刚刚放松心情又被“怀旧”弄得沉甸甸的。又如《钟山晚步》:“小雨轻风落楝花,细红如雪点平沙。槿篱竹屋江村路,时见宣城卖酒家。”诗的四句全为景语,描绘了一幅没有尘世纷争、充满宁静与和谐的江南水乡风景画,这是诗人内心向往的流露。同时,这又是以景写人,景中见人,在这一派闲适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小雨轻风中,踏着平沙落花,蹒跚行进在江村路上,孤寂而欲饮酒消忧的诗人的身影,体味到他那淡淡的落寞与惆怅。再如《午睡》:“檐日阴阴转,床风细细吹。倏然残午梦,何许一黄鹂。”诗中由日、风、黄鹂所烘托出的午睡情景,已把闲静情趣表现到极致。但背后的寂寞和孤独也暗暗透出;对“午梦”,他虽未像杜甫、陆游那样写出所梦之事,但让人深思的是,如果现实的闲静比梦境更好,他就不至于那样留恋“午梦”,以致对惊醒“午梦”的黄鹂那样不耐烦了。又如《北望》:“欲望淮南更白头,杖藜萧飒倚沧洲。可怜新月为谁好,无数晚山相对愁。”诗人深含的悲凉心情曲折地融会在写景之中。前二句写景中之人,后二句写人所见之景,由老翁、沧洲、新月、晚山构成一幅老翁北望图。老翁就是王安石自己,“白头”“杖藜”是他的形象,“倚沧洲”是他的处境。“新月”引不起他的愉悦,“晚山”也带着愁情。他在无所作为的隐居生活中老去的悲凉心境,隐含在对景物的感受当中,没有实指,而且对于景物的感受也以委婉之语出之,同样显得含蓄蕴藉、委婉曲折。

除写景诗外,王安石晚期绝句中还有大量的咏物诗,诗人借所咏之物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悲壮”之情,从而形成其含蓄蕴藉、委婉曲折的风格。朱光潜认为: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诗经》的比兴手法,《楚辞》的“香草美人”手法,自其产生之时起,就对当世及后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古代诗歌隐晦曲折、委婉含蓄的情感表达方式由来已久。阮籍《咏怀诗》多不可解处,颜延之说他“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百世之下,难以情测”。这评语可以应用到许多咏史诗和咏物诗。陶潜《咏荆轲》、杜甫《登慈恩寺塔》之类作品各有寓意。我们如果丢开它们的寓意,它们自然也还是好诗,但是终不免没有把它们了解透彻。诗人表情非直抒胸臆,而以隐语出之,大半有不肯说或不能说的苦处。^[14]

诚如朱光潜所说,中国古代诗人好用隐语写诗,尤其是写一些他们不愿明说或不方便说的心事,诗之趣味在隐约其词中达到暗示的作用,从而形成含蓄蕴藉的风格。王安石晚期绝句也常常在咏物诗中寄予“悲壮”之情。张白山在《王安石晚期诗歌评价问题》一文对王安石晚期绝句风格的认识非常到位:

王安石不仅喜欢描写山水田园,而且喜欢歌咏寒梅、秋荷、古松、修竹,但不为歌咏而歌咏。他在更多场合是借这些东西来写自己。他写过《孤桐》,讲的是孤桐凌霄而不屈;写过《古松》,讲的是古松高入青冥不附林,等等。这些全是托物寄兴之作。^[15]

“王荆公体”中的一些咏物绝句,非常善于使用比喻手法来书写自己的寄托。他经常拿一种植物做比,从中提取与自己某方面相契合的特征来歌颂,从而使这种植物成为自己的化身,具有他自己的形象,并借此抒发感情。如前面提到的《道旁大松人取为明》,蔡正孙《诗林广记》载:“荆公自注云:‘诗言松意尚不愿采于匠石,充栋梁之用,况肯区区于燭火争明于顷刻间耶?’”^[16]李壁删去“荆公自注”四字,称“公诗言松意”云云。诗人自比为广荫千丈的大松,原欲幽居南山,却无端遭祸,被人砍伐——他根本无意为世所用,栋梁尚且不为,何况与烛火争辉!罢相后,诗人面对新法尽废、怨谤交加的现实,苦闷之余,愤而作诗表明心迹——暗示自己无意与小人争位、争利,“大松”正是诗人个性的写照,表现了他清高倔强、不肯屈就的生命态度。荆公还认为“大松”在品格和生存境遇两个层面上与自己颇为类似,于是明为咏树,实为咏怀。荆公晚年以此为创作主旨的咏树木绝句,如《五柳》《蒋山手种松》等,无不表现了他那高洁坚毅的品质和倔强不屈的个性,同时也流露出他内心深处为世不容、有志难骋的悲凉之感。

王安石还经常通过隐喻、借喻等方式使意象重复出现,并以这种意象来寄托自己的某种想法或代表抽象的理念。如《石竹花二首》(其二):“春归幽谷始成丛,地面芬敷浅浅红。车马不临谁见赏,可怜亦解度春风。”诗中“石竹花”这一意象多次出现,它在幽谷中成丛开放,点缀大地而无人欣赏,只能在春风中沉寂,诗人以此喻指怀才不遇之士。诗人通过春末的石竹花传达出对自己晚年悲凉境遇的不甘,他世界观中的儒家济世思想和进取精神,入仕多年所养成的关注现实政治,锐意改革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以及倔强执着的性格,都使他难以真正忘怀现实政治、淡漠国事,很难把他长期为之奋斗的变法事业从内心世界洗去。又如前引《梅花》一诗,实际也是在以梅喻人。诗人借物咏怀,赞美梅花的倔强风骨,诗中每一句书写梅花意象的一个侧面,充分表达自己对孤高品格的崇尚。再如《北陂杏花》,也是将杏花意象的多重侧面组合起来形成象征。这首绝句借咏花以明志,诗人宁愿为追求理想而牺牲生命,也不愿碌碌无为而苟活,杏花意象是诗人自身生命态度的最好诠释。熙宁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在他的心灵深处,还是认为自己能够为变法大业奋斗,为王朝效力而不枉此生。即便梦想成空,沦落至此,也要好过毫无建树,终为尘土的庸碌人生。此诗可以看做王安石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和定位,陈衍说此诗“末二语恰是自己身份”^[9]¹²³,可谓一语中的。王安石晚期绝句的含蓄蕴藉、深婉曲折,闲中蕴含激荡,淡中充满悲壮,具有宋调以理节情而产生的美感,其实质是一种平淡而山高水深,绚烂之极而归于素朴的极高境界。

在中国诗歌史上,王安石诗歌是由唐音到宋调嬗变过程中的枢纽,并在一定程度成就了宋诗面目。王安石罢相隐居后所创作的绝句融工巧生新与平淡深婉为一炉的风格,既受杜甫及晚唐绝句影响,又自成宋调面目,诗歌艺术最为成熟。“王荆公体”以人力的匠心而达到了唐音和谐优美的境地,以其精丽圆熟、生新工巧的语言,秀丽密集、轻灵明快的意象,清新淡远、空灵明净的意境,含蓄蕴藉、深婉曲折的风格,而兼具唐音和宋调两种特色,形成了“王荆公

体”独特的风格特征。

注释

①文中所引王安石诗句均出自《王安石全集》,秦兵、巩军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不再一一出注。

参考文献

- [1]何文焕.历代诗话: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34.
- [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4]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3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5]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6]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96.
- [7]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宋诗钞[M].北京:中华书局,1995:564.
- [8]缪钺.论宋诗[M]//宋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序.
- [9]蔡义江,李梦生.宋诗菁华录译注:第2卷[M].南昌:江西古籍出版社,1999.
- [10]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5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5627.
- [11]吴文治.宋诗话全编:第4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346.
- [12]吴文治.宋诗话全编:第7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7672.
- [13]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18.
- [14]朱光潜.诗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38.
- [15]张白山.宋诗散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92.
- [16]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224.

The New Study on “Wang Jingong Style” Characteristics

Li Tang

Abstract: Wang Anshi's late works, especially quatrains, presented the most mature feature in term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aesthetic style. Those works with the unique artistic style, were known as “Wang Jingong Style”. They not only establish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ong Diao, but also differed in style from the poetry of Su Shi and Huang Tingjian. While Su and Huang were push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ng Diao to the extreme, Wang's late quatrains showed a tendency to return to the style of Tang poetry while still displa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ng Diao.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Wang Jingong Style” we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ways: exquisite and mature, ingenious and lively language features; beautiful and dense, light and nimble imagery features; fresh and distant, ethereal and clear artistic conception features; reserved and subtle, deep and convoluted style features.

Key words: “Wang Jingong Style”; Tang rhyme; Song Diao

责任编辑:采薇

导航作为平台媒介的三重逻辑分析

秦红雨

摘要:作为一种定向和定位技术,导航正在成为大众媒介的一部分,全方位渗透到人类社会空间和日常生活当中,其历史、技术、文化逻辑值得重新审视。在历史逻辑方面,导航的历史展现了人类从视觉想象到空间探索的过程,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并形塑了现代世界的样貌;在技术逻辑方面,导航作为虚实共生、脱域再定位的混合媒介技术系统,实现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定位的技术链接,完成了泛在媒介中“脱域”到多维空间中“再定位”,也在日常全方位浸润中建构了数字化平台的它异关系;在文化逻辑方面,导航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认知和感觉结构,成为标识当代人“迷失”与“定位”的文化表征,形成了一种新语境、新感觉的文化。认识导航作为平台媒介的三重逻辑,有助于总结导航发展的历史经验,反思技术文化钳制形成的数字迷思,为建构更加公平、民主、公共的数字化世界,推动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与实现而努力。

关键词: 导航;平台;媒介;时空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160-11

2020年6月23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这一由我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1],成为联合国卫星导航委员会认定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四大核心供应商之一^①。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重大技术支撑系统和战略威慑基础资源,是建设和谐社会、服务人民大众、提高人们生活的重要工具,而且正在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时空体验、媒介生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时代的一种“存有”^[2]¹⁷。相比过去使用罗盘、地图、电子罗经、航海雷达等实现导航,以GPS、北斗为代表的导航系统,涉及软件、平台、硬件和电子生态系统,共同构成了对“导航”新的认知,也形成了各种新兴形态——平台商务模式,如北斗、GPS等的商务服务;位置媒体所展开的非物质工作,对实践活动提供基础支持;网络空间中的各种数字服务,如各种媒体的数理逻辑界面等——改变着人们对空间、世界乃至

自我的认知。

一、作为补救性媒介:导航成为平台社会的基础设施

人类在山河湖海、沙漠丛林中穿梭,完成生存所必需的活动,必须创造和使用各种古老的导航方法,他们或依靠日月星斗的指引,或观察飞禽走兽的踪迹,或依靠名山大川作为标志,或者标记各种神秘的人工符号,并逐渐发明地磁罗盘、指南针、六分仪、牵星板等机械。在漫长的生产和科学实践中,随着航海和天文学的发展,因为人类对技术运用的纯熟、对生存空间的开拓以及信息传递方式产生的变化,人们不仅不断“定位”自身,而且还发明了一套庞大的导航技术系统,满足人类日益发展的各种需求。在今天,导航日益从航空航天航海通信的军事领域进入民用领域,日益从物体的导航进入个人(个体)的导航,并作为一种大众媒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收稿日期:2024-04-02

作者简介:秦红雨,男,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重庆 400715)。

“分布并嵌入许多复杂的社会技术基础设施里”^{[3]34}。正因如此,人们身边出现了移动终端的侧向定位技术、便捷的打车软件、电子导航地图、共享单车定位、订餐聚餐定位乃至“摇一摇”等各种导航技术的应用服务,并真切感受到导航技术的进步“不仅决定着人类精确控制自身活动的的能力,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4]。

导航,不仅被人类用来改造环境,而且作为技术系统生成和传播着新的知识,形成新的文化。“新技术在带来新的媒介文化的同时,也改变着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以及文化。”^[5]作为社会和文化的派生物,保罗·莱文森认为,在信息社会“超载”背景下,应该将“导航”作为一种“补救性媒介”^[6],要侧重于导航的实用性和应用性研究。而将导航作为位置媒介的研究,只是将导航作为提供信息的手段,研究导航所提供的“一切以地理位置、时间和网络移动终端为基础构成的时空位置智能感知、认知和决策综合服务”^[7],认为导航具有“从虚拟化到具体化”“从宏观到微观”“从通用到定位”“从行为到内容”“从推销到张贴”^[8]等五个方面的意义。国内学者认为,这代表了“当前新媒体领域从虚拟世界回归现实生活、从赛伯空间回归物理环境的趋势”^[9],正在日益嵌入人们的生活,并建构了诸多日常性、关系性和互动性传播实践^[10]。

今天,人们已经进入“平台化社会”,导航是当代社会重要的平台化系统。在平台化社会中,“由于平台相互连接,出现了一种新的基础设施:一个连接媒体的生态系统”^{[11]4},由交通、电信和传播等综合建构并维系的“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2],而导航恰恰处在这个系统的重要节点上。彼得斯特别提醒人们,要重视那些“不起眼的工具——指南针、日志和小数点”,因为它们具有自己的“媒介特性”(medium characteristic)^②,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关键内容”^{[2]129},也产生了“可供性差异(affordance)”^[13]。作为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导航“围绕技术规则形成了一整套物流体系和社会关系”^[14]。因此,既要认识导航在生活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认识这种媒介重构自然、改变世界、重塑自我的作用,也要注意像导航这样的媒介所具有的“隐喻功能”,是“技术文化建构的平台”^{[11]32-47}。想要对导航这一“媒介”所产生的独特文化影响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人们需要在导航技术作为媒介主导的传播中,理解“处于人、社

会、活动和精神交会点上的媒介,对人类实践活动的触发、组织、交合和转化”^[15]。

导航作为基础设施,是一种“情景化的技术系统”(situated technical system)^[16],是用技术、平台、物质建造的固定的结构体,是将底座深深打入某一特定社会的平台,然而它跨越了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频谱,支持并赋予了人类新的生活。重新思考创造导航空间背后的系统与建构,同时仔细回味在这些空间里所上演的自我再造(self-creation)行为,对于思考数字社会乃至元宇宙语境下人类的自身生存和存在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而导航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全方位渗透到人类社会空间和日常生活当中,在全球体系形成、技术霸权、空间开拓、生活服务、社会控制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认知和感觉结构。导航和其背后的软件系统,“渗透当代生活的一切领域:通信、媒体、表征、模拟、决策、记忆、视野、书写、互动——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意味着什么呢”^{[3]17}。这需要思考导航作为大众媒介对人类的作用和迷思,反思技术文化对人类的钳制,建构更加健康的主体世界。

因此,导航不仅发挥着平台功能,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复杂的数据生态,成为数字化社会的典型代表,其“技术逻辑”和“价值逻辑”的二重性^[17]日益得到关注,而对其技术历史的挖掘也需要得到认真的梳理。

二、历史逻辑:导航作为空间探索和世界塑形的媒介史

“导航”的术语源于16世纪30年代,英文为Navigation,源自拉丁文Navigare(navis表示船,agere表示指引),原意为“引导船舶航行”,现代引申为引导包括舰船、飞机、航天器、车辆等在内的运载体以及个人自出发点准确、高效、安全地到达目的地的过程^[18]。导航,是人类最古老的科学技术之一,其源于人类的本能需要,也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需求,更是人类原初的重要空间实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非常丰富和庞大的资料体系,在西方历史进程中也占据重要位置,“以至贯穿他们上千年的科技史,并且成为西方科技史上的脊柱,无论是数学、天文学还是物理学、地理学,都围绕着导航定位的发展而发展,甚至可以说,对于海洋国家来讲,就是因为这一问题才产生了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学

科”^[19]19。

李约瑟曾经把传统的导航方法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原始导航时期、定量导航时期、数学导航时期,他说:“要把旧大陆西方部分有关导航方法的丰富史料的要点加以扼要重述,甚至加以概括,自然都是不可能的。”^[20]因此,从最直观的“定位或导航的工具”^[21]7——地图入手,梳理其作为再现世界空间的媒介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能够追溯地图导航背后的历史轨迹和文化史意义。

1. 从土地的视觉想象到地理空间开拓

在人类的发展中,“作为内心精神世界和外部物质世界之间的媒介”^[22]1,地图是帮助人们以不同尺度理解现实世界乃至宇宙的基本工具。地图的创制,能够“创造一种视觉表现,用来帮助人们定义、描述、浏览地理或政治区域、真实或想象的空间抑或专项问题”^[23];视觉图像呈现的导航,“向观者提供对特定空间的解释,同时也借解释的权力,扭曲这个空间的实相”^[24]x。在中文里,“版”就是指户籍,“图”则是指地图,“‘版图’连在一起,意思就是在权力支配下的土地,也就是以人们生活着的空间为主要对象的地图”,“古代的地图也可以被看作为了说明国家支配的空间而描绘出来的说明书”^[25]5。英文中的“map”(地图)一词首次使用于16世纪,关于这一术语的解释有300种之多,“但现在多数学者普遍认同这样的定义:‘一种对人类社会中的事物、概念或事件的空间理解的图形体现。’”^[21]7绘制地图是“一种真正的全球性现象”^[21]7,在早期的亚洲、非洲、欧洲文明当中都存在着,更为重要的是,创制地图“不只是科学行为、艺术行为,更是政治行为”^[24]x。也正是在创制地图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将“时间和空间的事件编制在一个由语法和隐喻控制的逻辑关系网中”^[22]68,距离、位置、网络和区域等空间属性持续渗透到人类语言和文化网络中。中国的定量制图法比欧洲有更久远的历史,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张衡“似乎应当算是矩形网格制图法的创始人”^[26]553。他说:“事实上,在中世纪这整整一千年中,当欧洲人对科学的制图学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中国人却正在稳步地发展着他们自己的制图传统。”^[26]534郑和舰队也使用了不同的地图,后来被收录到《武备志》当中,“使用指南针的中国传统航海法的海域和使用伊斯兰世界天文航海法的海域采用完全不同的绘图方法进行绘制,并且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25]47,这些地图描绘了从南京到波斯湾霍尔木

兹港的漫长航线,将航海日志和海图合二为一,形成了“海上航线图”,帮助郑和完成了七次震古烁今的“下西洋”。中国古代史书中对指南车军事运用的记载,对于借助地磁指向北方的司南,甚至对于“牵星术”为主的天文航海导向技术的运用,都闪耀着古代中国人的先进智慧。“从《郑和航海图》到《东西洋航海图》,鲜明地揭示出一点:在世界开始紧密连结的时刻,中国人并非毫无反应,也绝非无足轻重。”^[27]正如李约瑟评价的那样:“中国人的主要目的从来就不是地理探险。他们所追求的是与他国人民,即便是尚不开化的人民进行文化交流。”^[28]因此,以中国海图为基础的导航,呈现了和哥伦布不一样的结果。

2. 在地理大发现中建构世界空间

关于“世界”的地理知识,也恰恰是通过地图的制造与导航,通过“地理大发现”,逐渐重塑、影响并向现实世界传播的。西方的世界地图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港的托勒密将前人积累的海图和地理知识准确地投影在平面之上,“描绘出俯瞰的世界地图”,成为“俯瞰的世界地图的起源”,“将与整个地球(geo)相关的信息图像(graphia)化”^[25]21-23。过去,依靠脚步丈量陆地的人们,所认识的空间仅限于已经开发过的“生活区域”及其周边地区,对外部空间的认知只能凭借现象,所以他们常常忽视海洋的存在。墨卡托投影将凸凹不平的地球表面建立起并强加以经纬构成的网络,绘制出了“在笛卡尔式的X轴和Y轴之间移动的航海图”^[29]174。德勒兹将此称为海洋“光滑空间”的“条纹化”,“在这个空间中,斗争会发生变化或被取代,生命会重新确立其核心利益,会面临新障碍,创造新速度,改变其对手”^[29]174。“英语中的‘世界’写作‘world’,其原意是‘生活的舞台’,至于引申义‘世界’就是一个扩大了‘生活的舞台’。”^[25]2托勒密的世界地图,在世界地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欧洲建设“海上航线”的时候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以托勒密地图为中心的导航,实际上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导航,“世界地图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展现了在实体上无从得知的世界面貌。制图者不仅是在复制世界,他们也在建造世界”^[30]6,把欧洲人的地理认知、空间征服与全世界的殖民融合在一起,“将亚洲、非洲、美洲纳入了一套新的空间—文明等级秩序中。‘亚洲’‘非洲’‘美洲’不再只是一种地理描述,而是成为带有文明论色彩的身份象征,只有放置在与‘欧洲’的对应关系中才能理解和表

述”[24]16。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各国都发现了海外潜在的巨大利益,他们或积极开展海外贸易,或发动战争,航海热带来了灾难,大批船只因为测不出自己的准确位置而迷失在大海中,导航的重要性被突显。“导航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如何测量经度的过程,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需要测量经度的领域也逐渐增大,从最初的陆地到海上,再到现在的太空,这是一条坎坷的探索之路,这条路显示了人类探索科学的智慧。”[19]43英国在系统性测量基础之上的海图,为英国的殖民开拓、工业革命乃至全球化的出现,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英国以建立自由贸易主义为基础的世界市场为目标,于是为了保证航行的自由和安全,就必须提高全世界海运行业的水平,不断地提供着准确的海图”[25]214,“可以说,‘海上航线’的共享,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25]215导航系统的进步,不仅显著地提高了“海上航线”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也使全球化的人员、物质、信息、文化等流动变为可能,“通过道路网和‘海上道路网’的连接及其形成过程,观察研究世界史的舞台究竟是如何展开的”[25]7。而航海图在这里恰恰成为一个符号,一个以“视觉化、印刷、书写等来定义”的铭写符号,不仅是世界空间和全球网络的视觉化表达和书写,也代表着人类看待世界的“视线(sight)的合理化”,让“商业利益、资本精神、帝国主义、对知识的渴望”不断流布,人类在日益复杂生存空间的地图知识构建和日益准确的导航,“并不单纯是科学理性的产物,更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与帝国争夺的产物”[24]x,甚至左右了地球的空间秩序。正如基特勒所说:“因为图画在移动中不发生变形,就有可能在线性透视的框架中建立一种他所谓的对象和形象之间的‘双向’关系。”[31]

3. 推动全球空间秩序不断重组

到了20世纪,导航技术更是日新月异,形成了导航技术网络,分为惯性导航、无线电导航、卫星导航、水声导航、光学导航以及环境匹配导航等,拥有了复杂的技术体系和应用领域,更形成了以美国的GPS、俄国的GLONASS、欧盟的伽利略和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DS)。“卫星导航具有武器与工具的两重性,既能增强军队能力,又能促进经济发展。是迄今军民两用最好的代表。”[32]尤其是美国的GPS卫星导航系统,对航行技术的改变是革命性的,也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人造卫星提供的准确信息使俯瞰的‘世界地图’再也没有了想象的余

地。利用人造卫星提供的图像资料,可以制作出准确度极高的世界地图。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非常简便地通过互联网找到自己需要的世界地图或者地区图。”[25]232导航使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也让美国的霸权延伸到全世界。伴随着导航技术的进步,“发行印刷的地图与海图,制作基于墨卡托绘图法将三个‘世界’连接起来的世界地图的荷兰,为了实现全球化的自由贸易而向全世界提供基于系统测量的廉价标准化海图的英国,以及为了从广阔的太平洋向亚洲进发,通过GPS、气象卫星以及天气预报使‘海上航线’更加稳定的美国,全都是依靠‘海上航线’成长起来的海洋霸权国家”[25]236-237。因此,伴随导航技术发展的历史,也是一段全球互联互通史,是美洲、非洲被发现被殖民的历史,是一段建构“现代世界体系”^③的历史,更是玉米、土豆的种子撒遍世界大地、病毒传遍地球、文化冲突不断、人种与民族融合的历史。导航作为一种转换讯息的媒介,“将自然完全变形或转换成人为技术的世界”[33],也组设了人类社会的时空感知与社会经验。而这背后,有着更加丰富的历史情境和文化因子,值得更加仔细地考量和呈现。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空间表象有时会使意识形态与知识在某种(社会—空间)实践中相结合。古典透视法就是对这种空间表象的最好的说明。今天的空间设计者们,他们给每一项活动分派点位精确的定位系统,则是另一个例证。”[34]

从历史的角度看,重思导航作为媒介的发展历程,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对地球表面形态信息的把握越来越精细和准确,但对于疆域的争夺、对地理环境的开发、对各种空间的控制也越来越加剧,“我们对现代的整体感知反而日益割裂——就像地图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边界线”[24]20。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从时钟、电报到广播、电视再到卫星、互联网、手机,任何一种技术的诞生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说,都是新技术,也是一种新的媒介方式,其“总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互交织,介入早已存在的时空结构模式之中,并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节奏和空间”[35]。应该说,从导航的历史逻辑中可以看到,伴随着导航技术的进步,导航被人类纳入了现代时空,更被带入世界体系中,成为帝国主义全球横行的过程,技术乌托邦的想象被殖民化、资本化、垄断化、全球化一再打断。即便到了GPS导航阶段,敌我划界、圈地占有、垄断控制、意识形态争斗等,仍然延续着导航历史逻辑的许多基因。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不仅是

一种技术系统的建立,更暗含着中国近代以降民族崛起的科技愿景以及对欧美国家建立的现代空间秩序的反抗与纠偏。希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担当中,可以为人类的现代时空指引方向,更为人类空间更美好的未来做出更大的中国贡献。

三、技术逻辑:导航作为虚实共生、脱域再定位的混合媒介技术系统

在中文语境中,《辞海》(第七版)中对“导航”解释为:“引导陆地、海洋、空中和空间载体从一地到另一地运动的活动及其技术的统称。包括天文导航、惯性导航、无线电导航、卫星导航、重力导航、地磁导航等。通常通过测定载体的位置和速度等相关信息实现。”^[36]将导航作为媒介,并不仅仅指的一项技术,或者技术叠加而成的系统,而是借助导航,“人体、器物、系统和智能程序在进行多层级的互动,产生意料之外的动态结果”^{[3]30}。未来世界“将被三大发展所转变:日益强大的系统、日益综合的技术和日益量化的社会。这些变化将共同带来一个崭新的、不同的集体生活——数字生活世界”^[37]。今天,人类已经身处其中,也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导航不仅仅是一个地图、一个软件系统或者App,在线传播也不只是人类的行为,而是技术物 and 不同类型的人(工程师、数字劳工、消费者、经营者等)协商的结果^[38]。

1. 实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技术链接

有学者根据麦克卢汉对于媒介的分期,将地图学史划分为“笔墨或绘本时代”,进而到“印刷地图”时代以及“电信(或屏幕)地图”时代^{[22]48},技术发展推动导航日新月异、面貌一新。在今天,卫星等媒介连通方式的出现,把越来越多的人与媒介技术联系起来。国外网络地图服务产品如Google Earth、MSN Virtual Earth、Yahoo SmartView、TomTom等,都开始提供影像地图服务,人们“已经被卫星导航、谷歌地图和全球定位系统所渗透”^[39]。在这样的过程中,位置本身只是一种位移的临时现象,人们发现越来越难以给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上定位,并面对着“由位移、迷失和不合节拍组成的洪流”^[40]。而在网络信息技术支持建构起来的虚拟空间和泛在服务环境中,人们能够再次定位自己,将此在与彼在、缺席与在场耦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由叠合、嵌入、回馈、关联等为一体的空间网络。

2005年,谷歌公司借助于卫星、计算机网络,发布了一个将地球图像数字化的程序——谷歌地球,谷歌地球建立了一个全球共享的虚拟化世界地图系统,更让地球的数字图像成为获取信息的媒介,任何信息搜索都可以立刻与地图应用进行比对,以确定信息所载的空间,“在谷歌手中,克劳德·香农的可计算信息理论终于找到了市场。在异地的虚拟影像中,天涯就近在咫尺,这些虚拟影像正是谷歌的巨大利润来源”^{[30]351}。今天,导航更离不开虚拟电子影像的建构,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的各种“界面”,尤其是基于位置的服务(LBS)发展更是迅速。LBS是指通过电信移动运营商的无线电通信网络或外部定位方式,获取移动终端用户的位置信息,在地理信息系统(GIS)平台的支持下,用户不仅可以通过定位获得当前自己所处的准确位置,还可以通过LBS获知周边的道路、加油站、电影院、餐馆、邮局等特定服务点的分布及当前状态,可以“摇一摇”查找“附近的人”。LBS以其强大的活力和组合张力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与大众最喜闻乐见的各种消费娱乐活动紧密结合,正在创造着一个连接广阔而潜力十足的新兴市场。这些在人们的多种定位终端中随处可见: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个人跟踪设备、可穿戴设备(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智能眼镜)、汽车导航设备、数码相机和便携式电脑等,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混合空间”,也形成了“一种深刻的议程设置,以及对空间的重新组合和切割,配合着对人类社会的分类和等级化以及对人类历史的线性排列”^{[24]155}——“位置媒体增加了流动空间的‘可读性’,从而使都市‘陌生’空间‘熟悉化’;移动路线的‘灵活校准’,从而改变人们在流动空间中的流动计划;社会交往的丰富性,从而使人的流动更加多元化”^[41]。

过去,都市的广场、建筑、街道、古迹、公园、绿荫、故居乃至郊区,都充满着故事,当它们映入眼帘,就如作家赫特曼斯所说:“人类的眼睛可以立即将记忆植入,构建一幅新画面,讲述一个新故事。”^[42]然而,在电子导航的指引下,“实体空间里的建筑和(身体位置确定但其电子延伸物却不固定的)网络空间里的建筑通过复杂的方式相互叠加、缠结、混合”^{[43]56},记忆被轨迹所代替,画面被目的所遮蔽,故事被消费所淹没,人际与群体交流变成有“多重入口”的“随着用户位置变化而变化的动态地图”^[9]。在这座“比特城市”中,“在电子空间里,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靠的不是真实的路径,而

是逻辑连接”，“里面的居民是没有具体形态的碎片化主体，以一群别名和代理人的形式存在。城市里的场所由软件虚拟而成，不是用石头、木头等实体建造。建筑之间通过逻辑链路相连，没有门，没有走廊，也没有街道”^{[43]30-31}。这种时空压缩，让都市人对空间的把握能力更强了，但是也变得更加直截了当，城市的无名细节中有着无穷的含义，只能失去了神秘感、空旷感，甚至变得更加索然无味。

2. 从日常全方位浸润到数字化平台的它异关系

导航是当代数字化社会的一个高频词汇，作为一个技术术语已经进入日常生活，它意味着电子地图对人们行为的一种导航，不仅成为人们出行的常用手段，而且还成为社会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成为社会性格的一部分，“一个综合、人为的身份制图学随之诞生，事物、人和事件都能定位了。基于个体识别的可寻址性有了，加上层次分岔系统和地址解析图表，堆栈就知道其范围内存在的一切”^{[3]117-118}。从大众的感受来看，导航，让旅行变得更加轻松、自在，少了许多的迷路、迷茫；让都市眩晕与迷航消失，进一步扩大了都市的空间与可控范围，电子地图形成屏幕界面，“地理数据和有关交通流量的信息被转换为动态地图，使我们能够在交通中导航”^[44]；也把空间化为不同的物体轨迹，使行人、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卫星、无人机等连为一体，让万物互联更有了方向，“它有助于人们在一个对我们极其冷漠无视的宽广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30]引言8}。但是，导航也让一种梦魇挥之不去，“通过垄断可量化的信息积累财务利润”^{[30]365}。在经典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中，智能计算机引导着人的太空旅行，甚至想取代人类独立完成探索任务。数字地图成为伊德所说的“它异”关系，地图导航作为具身体验的媒介逻辑，在数字地图中发生了变异，“使用数字地图，实际上就是与准它者接触。人不再通过地图感知世界，而是感知数字地图本身”^[45]。

从过去的舰船到后来的交通，再到现在的个体位置导航，乃至蔓延在各种网络程序和技术当中对个体轨迹和位置的“捕捉”，导航从有目的的控制，开始进入一个无意识的增强、控制阶段，甚至引发对同一时空的开发与利用，形成大规模的技术系统，组织和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技术对‘存有’同时具有揭示作用和替代作用。”^{[2]124}正如学者所评价的那样：“当每一种媒介被运用到社会生活中时，它就会在增进社会延展性的同时，为自己赢得某种独特

的社会角色。”^{[46]213}人类空间无限广大，生存场景不断变换，导航既便利着人们的生活，也对人们进行控制与绑架，“在这里，软件和密码共同组成一道隐形的编码屏障，创造出特定的社会语境、图像、文本和表演”^{[46]94}。导航在程式化的路线、政策、蓝图中是对信息的充分获取和高效搜索，而“没有信息含量的视域将被隐没。对事物的流连、凝视这种幸福的形式，将完全让位于对信息的猎取”^[47]。在图像时代的世界洪流中，信息变成了监控，意义变成了数据，不断制造着焦虑、迷茫与恐惧，人们亟须寻找真实空间的自我定位。

3. 从泛在媒介中“脱域”到多维空间中“再定位”

导航“曾经是国家 and 民族的势力范围和控制逻辑。制图人再清楚不过了：谁绘制地图，谁就得到控制权。今天，越来越多的制图和地理定位的应用和服务是私营平台（说清楚就是谷歌）的特权”^{[3]114}。随着各种导航系统的发展完善，导航的地图数据来源综合了地面照片、正射影像图、卫星影像、数字高程模型等，时空参量的泛在提供，天地一体化、服务泛在智能化将日益普遍和精细，人类关于时空感觉的变化还会进一步加剧，“它所提供的虚拟在场（virtual presence）的含义是，它将交际中的距离和时间因素缩减为零”^[48]。导航在尽力地压缩空间所带来的时间损耗，以便获得更大的闲暇时间，也将费瑟斯通所谓的“算计享乐主义”发挥到极致。因此，导航不仅成为重要的“空间中的媒介”，更创造了新的“媒介中的空间”；其不仅使标示的地方成为“媒介中的地方”，也创造了被无数大众依赖的“地方中的媒介”，来指导地方的生活和服务人们的行动。正所谓：“一方面作为行动元的媒介改造着行动者所生活的环境，另一方面行动者也被卷入新的网络、接受某种特定的媒介化形态。换言之，媒介既在属于它的空间中发展，又创造着这些空间。”^{[46]39}

随着人类交往空间的扩大、城市的扩容以及互动日益方便，在全球化、网络化的社会语境中，社会空间结构的改变造成了主体实践方式和活动时空的内在改变，吉登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脱域”的概念：“将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情境中‘脱离出来’，并穿越不确定的时空范围而得到重构。”^[49]正是现代人广泛的经济活动、跨地域的流通、跨社会的交流，“依托交往的网络化，营运的符号化，管理的数据化，情景的虚拟化，实现着生产的全球化，市场的世界化，服务的全域化”^{[50]109}，导致了人们在

不同的时空关系中穿梭,借助数字技术、射频识别技术、定位技术而对自我进行“导航”,在陌生的城市中行走,在“泛在”的网络空间中相逢,来实现自我的“再定位”。因此,通过“再定位”不仅实现了时空的物理秩序的重新确认,也实现了社会—技术秩序的协调,更改变着人的自我感知和环境感知,透露着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行为和意义,“完全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51]。当今物理空间的裂变,都市空间的重构,信息空间的聚变,制造了无数的场景,导致了个体在空间中的无所适从,“再定位”成为人类在不同场景之间穿越和生存的重要手段。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场景时代,随时在不同的场景之间随意切换。面对现实的忙碌生活,人类需要准确定位和抵达;面对网络空间的繁杂,人类也需要网络导航的再次帮助,以防在信息的黑洞中迷失。在今天的数字世界中,人们行驶在无限延伸的“数字高速公路”网络上,需要门户导航获取基本的生存技能与知识,导航已经成为一个文化隐喻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城市导航运用中,城市的地点都变成了一个位置坐标,变成了一种电子标记,“在我们所熟悉的、有特定空间的、同步的城市生活方式中,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时间和地点”^{[43]21},这种标记成为自己的运动数据,实时被记录又快速被遗忘。因此,随着人们借助电子媒介实现对空间的超越,不仅人们的生命体发生了变化,就连人们与城市时空、自然律令的节奏关系也发生了改变。电子导航和手机、视频录像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无缝连接而成一个集成系统,甚至把人变成了“电子人”,“把它们连接到全球数字网络中去的无线身体网”,电子人“可以重构,也可以无限延伸”^{[43]38}。这样,当人和无线世界、电子空间密切联系的时候,也改变了人们“居住”和“旅行”的意义,人成了环境的一部分,成为电子空间的一个“标识”,人与他人的“差异”也在电子空间中被重构。当人们在城市中漫游,电子记录簿记录其行动路线,各种各样的地图软件指示回去的方向,导引人们进入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所,而每一个工具的使用者都在完善自己运动或感觉的器官,或者消除器官功能的限制。

四、文化逻辑:导航建构新语境、新感觉的文化动力

从最初的导航工具到今天复杂的导航系统,不

断拓展着人对于整个世界空间宏观和微观的认知,丰富着全球地理知识,形塑着世界空间形貌。正如地理学家唐晓峰所说:“依托新的全球地理观,而将整个个人文空间时间化、历史化。”^[52]因此,了解导航是如何在今天的互联互通语境中发生深层次的演变、交互与渗透的,更需要思考和剖析支撑这一过程的文化逻辑。

1. 作为历史和现实交织的新文化语境

列维·曼诺维奇说:“数字媒介(digital media)改变了媒介逻辑(logic of media)。”^[53]今天,可编程的导航技术正在成为资本、国家和公众权力的竞技场,介入信息、知识、意义的传播中,正在塑造着人们的观念。对于这种技术政治,我们要关注其作为平台的“文化—社会逻辑”^[54]。正如彼得斯所说:“和天文导航技术一样,各种充满符号的人造物(artifacts)都早已成为人类重要的生存环境。人类具有的各种能力——航行、燃烧和书写编撰——一起都构成了我们最为重要的文化技艺。”^{[2]286}借助于电子导航,人类对城市的感知开始发生变化,开始用新的方式和新的思维了解和建构城市。城市理论家凯文·林奇曾经提出“城市意象”的概念,认为人的认知和大脑中的城市心理地图相联系,人对城市的认同与“城市意象”有着密切关系^[55]。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人工智能电子人来说,在街道上穿行和获得城市资源的能力并不都在我们的头脑中。我们越来越依赖我们的电子延伸设备——智能汽车、手持装置以及由电子定位系统提供的隐形地标——在城市中为我们指引方向,获取和处理我们对环境的知识,把我们带到想去的地方”^{[43]55}。而在这个系统的背后,导航既有着指明方向的基本历史逻辑,也融入对国族空间、社会空间、个体空间新的发展需要,成为历史和现实交织的媒介文化生态系统。

导航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是应对今天日益扩大的空间、日益频繁的身体“移动性”以及日益复杂的传播系统所必然发生的结果。军事的运用,对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的导航,进入日常生活的导航层面,展示着都市空间的巨大变化。“人们有大量的时间是在感受身体以外的东西,并与它们打交道,这便极大地延伸了他们生活常规的范围。”^{[46]190}尤其是在当代,“以计算机联网、移动电话、信息处理终端等技术手段组织起来的网络,其虚拟和仿真功能可以打破虚与实的空间界线,融通主体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具有化外于内和化内于外这样一种使主体与环境处于‘无间’状态的空间魔力”^{[50]353}。

人们很容易在信息爆炸、空间内爆的洪流中失去方向,迷失自己,导航成为“虚拟空间”的重要进入路径。从某种程度上讲,“信息高速公路”的称谓,实际上已经为数字“导航”埋下了未卜先知的一笔。保罗·莱文森认为,我们的时代出现“信息超载”,需要持续开发信息导航技术,开发出“有效的导航策略”^{[6]133}。作为数字资本主义重要一环的导航系统,是信息系统、定位系统、载体系统等的融合,继承了历史发展,也暗合了现实需要,更与世界的空间主宰和分配密切相关。在丹·席勒看来,这构成了今天的“信息地缘政治”,也成为导航媒介文化生态无法回避的话题,“不论在社会范畴还是地理范畴,利润最大化这一长期的资本主义欲望、成本效益和劳动控制这些最基本的资本主义逻辑不仅持续发展而且得到了极大的延伸”^{[56]170}。有学者甚至认为:“印刷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时代的导航都具有公共性,前者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公共性,后者是以企业为主导的公共性;前者是政治逻辑,后者是市场逻辑。”^[57]物理与虚拟空间的杂交,正在创造出导航更大的存在空间,也成为信息时代新地理环境的构成方式,正在成为互联互通的媒介文化生态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人们要更清醒地认识到,“支持这些媒体‘社会’形象的规范和价值观仍隐藏在平台的技术结构中”^{[11]14}。

2. 作为改变时代感觉结构的视觉动力

在理性化、科学化、祛魅化的时代里,社会的各方面都在“加速”,技术设施作为这些条件的物质性表征就会发挥影响力,使用者和社会必须适应它^[58]。为了避免社会的失序,需要不断地生产各种规则、规章,按照一些目的进行“导航”。“符号、标志和信号在人类经验中的相互交织创造出复杂和混合的地方感。不论是人对地方的亲身体验,还是通过媒介的间接和虚拟体验,都离不开它们的作用。”^{[46]134}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物质财富急剧膨胀的时代,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文明的快速现代化,为了不在都市空间的急速扩张中迷失,所依靠的只能是“导航”。“新的技术能力不知不觉地闯入了现今的生活方式之中”^{[59]108},导航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作为数字化社会的一种技术表达标志着后现代都市人的一种精神状态,不知不觉成为人们感觉结构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知和情感表达。

在当代社会,时空信息是信息社会最有价值的主体。尤其是在数字社会的构建当中,时空是数字

化社会建构的基础要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与手段,更是打开智能化宝库的钥匙。导航是人类对空间的一种更高维度、更复杂的一种控制和利用,也是人类对世界空间征服的一种体现,更是一种新发明的视觉语言,“围绕在我们四周,它表述着一种模型,一种关于社会如何体验、感知、评价与行为的指南,一种指引性的程序”^[60]。导航也成为一种可交流、可沟通、不变形的“流动体”,实现了基特勒所说的“视觉的一致性”,甚至成为一种学者们所说的偶生巨型结构(accidental megastructure)的“平台”,也叫“堆栈”(Stack),并具有“可编程性、隐匿性和主权”。“堆栈在多层次、多维度上起作用,调节和重写新型主权的逻辑、动力学和实践,软件在新型主权里起关键性作用,这种主权是自我或个人的主权,同时又是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主权。”^{[3]112}“有些发明——透视、投影、地图、航海日志等——可以实现不受变质的转译,只有靠这些发明建立起的双向联系才能令这种在场/缺席成为可能。”^{[31]46}对于导航来说,其作为平台“和社会实践的构建是相互的”^{[11]6},不仅揭示了地球村的存在,让遥远的距离、未知的恐惧变得更加容易把握,增强了人类作为控制者的信心,而且替代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寻,让对空间的感知变得更加直接,形成“时空压缩”。正如有学者指出:“面对赞助者、制作者、消费者和产生地图的世界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世界地图永远处于一个不间断的生成过程之中。”^{[30]357}同样,无论地图的媒介如何种类多元,伟大的地图都是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民众所必需的,“因为它们一直在为下面的几个人类最永恒的问题提供答案:‘我在哪儿’‘我是谁’”^{[21]17}。

3. 作为标识当代人“定位”与“迷失”的文化表征

过去,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的被发现,导航的过程也是人类“祛魅”的过程。“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61]韦伯所说的“为世界除魅”,意味着理性成为日常生活的智慧标准,人类也越来越觉得能够借助科学改变世界、创造世界,科学意味着理性化,意味着人类借助技术对自然的征服,意味着

理性化对自然的征服。但是,工具理性占据上风,价值理性被遮蔽,道德约束缺席,仍然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忽略了人文、艺术、伦理的底蕴、审美、约束,那么大家只会沦为不出错却毫无感情的机器和工具,这不仅违背了人性的本源诉求,而且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没有任何好处。”^[62]

今天,人们正在面对一个物欲横流的现实,面对不断扩张的空间,面对声色犬马的生活,目迷五色,耳乱五音,又如何获得“导航”呢?或者说,人们在现实世界被精确地“导航”,无人机、炸弹导航的画面在短视频平台不断呈现,其泛滥更需要人类不断反思。因此,在当今的现实语境中,导航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更加标识了当代人已经无法准确地把握自身的现实。或者说,我们在现实世界被精确地“导航”,却在精神世界、道德领域不断迷失,又该如何思考人类导航技术发展的新航向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轮又一轮的媒介融合所产生的碰撞和重组使新的媒介空间成为常态。人们进入这种传播空间,将自己的主体性转变为由远距离的表征和表演所构成的中介方式,原本内在的东西被外在化。在这种转化中,他们重新定义自己的社会角色以适应外部情境的变化。”^{[46]15}同时,以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代表的数字化发展,将不仅是一次导航的竞争、信息产业的竞争,更是信息主权的捍卫、全球信息结构的重组和数字技术公共性的重塑。面对由海图导航带来的帝国主义对全球的殖民和领土扩张,以互联网、卫星、GPS导航、数据处理为主的信息资本主义构建的单极全球化秩序,其媒介技术和信息实践将被人类赋予更多的期待。

结 语

人类依靠自身的记忆、空间的标志物乃至太阳、月亮、行星的方位等,建构自己的方向感,到达自己想去的地理位置。伴随着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开始借助于更加先进的天文学、航天学、电子学技术,实现对空间的辨识和征服。今天,导航不再仅仅是一个技术系统,一个再现空间的平台,更成为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语言,是“信息空间的建筑师,还是日常生活的组织者”^[54],成为建构人类生存的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融入文化血液,“生成并促进大众文化和艺术”^{[6]14},不断形塑着新的文化方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意义。因此,对于导航作为一个平

台的研究,不仅要考虑其所生成的媒体生态系统,更要思考其形成的社会与文化规范,“这种系统既滋养了社会与文化规范,反过来又为社会和文化规范所滋养”^{[11]22}。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也在对导航系统做着不同层面的开发和应用,还在不断形塑着人类生存的空间和世界的面貌。在快速变动的世界中,人类需要重新思考导航的价值与意义,在流动和变动中把握人类未来的航向。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经将导航比喻为“建立自己的视角”,把人描绘成在大海中航行的船长。掌舵的人已经就位,改变方向还是不改变方向都需要做出决定。

在丹·席勒所预言的“数字衰退”中,“数字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现代化”^{[56]185},以北斗信息系统为代表的中国数字化发展保持了“相对的独立与主权完整”,正在重构世界信息产业版图,重塑政治经济结构,也蕴含着“真正的民主社会重建的场所”^{[56]226}。人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提醒,警惕技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要把社会发展的重点放在“公共物品和普通民众的需求满足”^[63]上,防止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私人物品、消费主义为导向的老路。因此,要看到,今天导航如何满足人们——人如何被指引着到达旅游目的地,到达餐饮店、超级市场以及各种各样的市场;人如何在既定的道路上行驶,在钢筋水泥森林中穿梭。人们的消费、生产的需求被不断满足,背后越来越强大的是资本对人类生活的控制,技术对人类个体的绑架。在导航的一个个消费标记中,人们恰恰失去了自己,导航就像是边沁所说的一种“全景权力”,越来越主导人们的生活。“技术让这种全景权力变得越来越强大”^{[46]79},也许要时刻记住哈贝马斯的提醒,“技术上有用的知识的传播不能代替反思的巨大的力量”^{[59]96}。因此,面对人们的行为、生活、情感越来越被“导航”的现实,要记住彼得斯的警告:“数字媒介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便利都使我们更容易遭遇更大规模的灾难。”^{[2]180}人类不能停下反思的脚步,也许这样才能够借助于层出不穷的导航技术,将自己导航到一个更加有温度、有希望的未来。

注释

①另外三家是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NASS)和欧盟的伽利略定位系统(GALILEO)。②在媒介

理论(Medium Theory)提出者乔舒亚·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看来,每一种媒介都有自己的特性。参见 Joshua Meyrowitz. *Medium Theory*. In David Crowley and David Mitchell eds. *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p. 50-77. ③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是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首先提出。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从16世纪开始形成的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复合体。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罗荣渠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3页。

参考文献

- [1] 蔡婷.“长征”三号B成功发射第55颗“北斗”卫星 “北斗”三号全球星座部署完毕[J].中国航天,2020(6):24.
- [2] 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M].邓建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 [3] 亚卡托.数据时代:可编程未来的哲学指南[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 [4] 卞鸿巍,李安,王荣颖,等.导航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
- [5] 吴璟薇.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新闻:技术、媒介物质性与人机融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40.
- [6] 莱文森.莱文森精粹[M].何道宽,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7] 姜卫平,郭迟,左文炜.我国导航与位置服务的进展及思考[J].测绘通报,2020(1):1-4.
- [8] MCCALLOUGH M. On the urbanism of locative media[J]. *Places*, 2006(2):26-29.
- [9] 黄鸣奋.位置媒体:赛伯化的回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8(5):10-12.
- [10] 孙信茹,段虹.再思“嵌入”:媒介人类学的关系维度[J].南京社会科学,2020(9):103-111.
- [11] 迪克.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M].晏青,陈光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 [12] 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
- [13] 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1):2-19.
- [14] 孙萍,邱林川,于海青.平台作为方法:劳动、技术与传播[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A1):8-24.
- [15] 黄旦.报纸和报馆:考察中国报刊历史的视野:以戈公振和梁启超为例[J].学术月刊,2020(10):165-178.
- [16] PARKS L, STAROSIELSKI N. Signal traffic: critical studies of media infrastructures[M]. Urbana &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5:4.
- [17] 蔡润芳.“围墙花园”之困:论平台媒介的“二重性”及其范式演进[J].新闻大学,2021(7):76-89.
- [18] 赵琳,程建华,赵玉新.船舶导航定位系统[M].黑龙江: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21:2.
- [19] 李孝辉,李静怡.导航1号档案:导航方法之完全揭秘[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 [20] 李约瑟.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 物理学及相关知识:第3分册 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M].汪受琪,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604.
- [21] 布罗顿.伟大的世界地图[M].齐东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
- [22] 哈利,伍德沃德.地图学史:第1卷[M].成一农,包甦,孙靖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23] 里芬堡.皇家地理学会伟大的探险[M].章石,译.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4.
- [24] 宋念申.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 [25] 宫崎正胜.从航海图到世界史:海上道路改变历史[M].朱悦玮,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 [26] 李约瑟.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 数学、天学和地学[M].梅荣照,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 [27] 成一农.郑和航海图:“全球化”时代的明代中国[J].同舟共进,2020(8):13-16.
- [28] 李约瑟.中华科学文明史:下[M].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690.
- [29] 塔利.空间性[M].方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 [30] 布罗顿.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M].林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 [31] 拉图尔.视觉化与认知:用眼睛和手来思考[M]//唐宏峰:现代性的视觉政体:视觉现代性读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20:45.
- [32] 谭述森.卫星导航定位工程[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199.
- [33]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79.
- [34]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68.
- [35] 李斯特,多维,吉丁斯,等.新媒体批判论[M].吴炜华,付晓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271.
- [36]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七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770.
- [37] 萨斯坎德.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M].李大白,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3.
- [38] GANAIELE L, FENWICK M K, GREG E, et al. Mapping commercial Web 2.0 worlds: towards a new critical ontogenesis[J].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2009, issue14.
- [39] 托斯卡诺,金科.“绝对”的制图学:图绘资本主义[M].张艳,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39-40.
- [40] 亚当,贝克,龙.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M].赵延东,马缨,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254-255.
- [41] 许同文.“位置即讯息”:位置媒体与城市空间的融合[J].新闻记者,2018(6):12-18.
- [42] 赫特曼斯.大都市:空间与记忆[M].张善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1.
- [43] 米歇尔.比特城市[M].余小平,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
- [44] 瓦尔.作为界面的城市:数字媒介如何改变城市[M].毛磊,彭喆,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前言XVII.
- [45] 于成.媒介观念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97.
- [46] 亚当斯.媒介与传播地理学[M].袁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
- [47] 韩炳哲.资本主义与死亡驱力[M].李明瑶,译.北京:中信出版

- 集团,2023:36.
- [48] POSTER M. Hardt and Negri's the information empire: a critical response[J]. *Cultural Politics*, 2005(1):101-117.
- [49]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18.
- [50] 胡潇.空间社会逻辑寻绎[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 [51] 勒菲弗.空间与政治:第2版[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5.
- [52] 唐晓峰.地理大发现、文明论、国家疆域[M]//刘禾.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20.
- [53] MANOVICH L.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212-228.
- [54] 易前良.平台研究:数字媒介研究新领域:基于传播学与STS对话的学术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12):58-75.
- [55] 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3.
- [56] 席勒.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M].翟秀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57] 邓德花.媒介技术进化中的导航逻辑:从印刷时代到社交媒体时代[J].*中国报业*,2018(19):100-101.
- [58] WYATT S.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is dead: long live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M]//HACHETT E J, OLGA A, MICHAEL L, et al. eds. *New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MA: MIT Press, 2008:175.
- [59] 哈贝马斯.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生活世界[M]//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60] 弗卢塞尔.技术图像的宇宙[M].李一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33.
- [61] 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9.
- [62] 严飞.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272-273.
- [63] 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J].王洪喆,译.*开放时代*,2014(4):95-107.

Triple Logical Analysis of Navigation as a Platform Medium

Qin Hongyu

Abstract: As a kind of orientation and positioning technology, navigation is becoming a part of mass media, permeating all aspects of human social space and daily life. Its history,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logic deserve to be re-examined. In terms of historical logic, the history of navigation demonstrates the process of human beings from visual imagination to spatial exploration, promoting geographical discoveries and shaping the appearance of the modern world; In terms of technical logic, navigation, as a hybrid media technology system that coexists virtual and real worlds and relocates out of domain, realizes the techn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al world and virtual world positioning, completes the “delocalization” of ubiquitous media to “repositioning” in multidimensional space, and constructs the other relationships of digital platforms in daily immersion; In terms of cultural logic, it is changing our temporal and spatial cognition and sensory structure, becoming a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hat marks contemporary people's “loss” and “positioning”, forming a new context and new feeling of culture. Understanding the triple logic of navigation as a platform medium helps us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navigation development, reflect on the digital myths formed by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traints, and strive to construct a more fair, democratic, and public digital world,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realization of a network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as become a part of the mass media, penetrated into the human social space and daily life in all aspects.

Key words: navigation; platform; media; space-time

责任编辑:沐紫

教育融媒体建设的时代价值、现实挑战与未来进路

张 珊

摘要:教育融媒体建设是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教育融媒体建设的实践为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新引擎新视野,但在实践推进过程中也面临着内容、技术、平台三重挑战:教育内容融合创新挑战、教育数字技术赋能挑战及教育平台服务效能挑战。面对教育现代化、数字化发展要求,教育融媒体建设要从思想引领、内容创新、技术赋能、社会需求、人才培养五个方面优化教育融媒体建设路径;强化思想引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内容为王,增强教育育人实效;增强技术赋能,构建智能教育平台支撑;面向社会需求,全面深化产教融合发展;加强人才培养,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关键词:教育融媒体;教育数字化;教育现代化;媒体融合

中图分类号: G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4)09-0171-06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现代化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迅猛普及,数字技术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生产生活,重塑并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方式、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传播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是当前教育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强国放在重要位置,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1]33}做出全面系统部署,提出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3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2]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教育融媒体建设是加快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重要支撑,也是统

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的改革,要学习借鉴媒体融合的理念、技术和实践,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加快教育融媒体平台建设,发挥网络育人优势,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

一、媒体融合对教育现代化的变革

当今世界,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下,媒体融合已成为信息传播领域的重要趋势。媒体融合的力量跨越了媒介界限,不仅颠覆了传统信息传播的方式,还作为一股强大的驱动力,推动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教学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学习模式的个性化转型,进而促进高质量教育公平和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为构建更加开放、包容、高效的现代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媒体融合加速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

传统教育资源受限于地域、渠道、平台等因素,难以实现大规模共享和传播,少数顶级优秀教学资源集中在个别教学机构和教学名师之中。媒体融合

收稿日期:2024-05-30

作者简介:张珊,女,教育学博士,南阳理工学院范蠡商业思想研究院研究员(河南南阳 473004)。

通过数字化、网络化的手段,打破了教育资源“信息烟囱”,实现了各级各类教育资源的跨平台共享。通过在线课程、教学视频、电视图书、虚拟实验室等网络形式,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学生都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学习。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学生也能够通过在线教育平台享受到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这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同时,媒体融合还可以为视障人士、留守儿童等特殊教育群体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和服务。

2. 媒体融合促进现代教育理念更新

传统教育理念是以教育来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媒体融合有利于促进以人为本、社会参与、终身学习等现代化教育理念的形与发展。一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的形与发展。媒体融合背景下,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传授者,而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决定学习进度和拓展内容,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二是家庭、社会、学校协同育人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3]媒体融合可以通过手机终端把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有机融合在一起,构建社会多元参与共建的良好育人生态。三是终身学习理念。随着社会变革和信息技术的加速迭代,人们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媒体融合为终身学习提供了丰富资源和便捷渠道,有助于加快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

3. 媒体融合推动教学模式和评价体系变革

媒体融合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趋势,正在深刻改变着教学育人方式。教育工作者可以更加灵活地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资源,实现个性化教学和全方位育人。一方面,媒体融合推动了教学模式的变革。媒体融合可以促进线上线下教学资源的整合,形成混合式教学模式、未来人一机合作式教学模式^[4](人类教师将与智能机器人分工合作开展教育教学模式)、“自主与合作相融通”的学习机制^[5]。这些变革不仅可以弥补传统教育的单调性,增加学习资源的可选择性、趣味性和吸引力,还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参与度。另一方面,融媒体技术推动多元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通过融媒体平台收集的数据,学校可以更加精准地了解学生的考勤情况、互动情况、作业情况等教学全流程信息。这些数据比期末考试试卷更能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教学成果,

也可以推动教学评价体系的革新。从单一分数评价转向过程性评价、结果性评价、同伴评价等,可以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

4. 媒体融合赋能教育数字化发展

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推进教育数字化是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题中之义和必由之路。2022年3月28日,我国最大规模教育教学资源库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线。作为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重要抓手,平台能够打破地域限制、缩小校际差别,只需联网就能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直达,因此受到广大师生的喜爱。近年来,新技术不断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融媒体技术为教育数字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支撑、便捷的服务支持和良好的互动体验,是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强大动能之一。

二、时代价值: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6]。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教育现代化的支撑。教育融媒体在全媒体时代、数字教育快速发展背景下应运而生,是教育现代化、数字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创新平台,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工程。教育融媒体融合传统教育的内容和现代教育的方式,在媒体融合理念、技术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融合思想引领、舆论引导、新闻宣传、信息服务和融合传播等多种功能^[7],因此也可以说,教育融媒体建设是教育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是网络育人的重要途径。

1. 教育融媒体建设是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网络已成为广大青少年学习生活的重要空间,要提高网络育人能力,扎实做好互联网时代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较2022年12月新增网民248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其中青年网民群体掌握数字素养技能情况高于整体网民27.8个百分点。此外,《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

成年网民规模不断扩大,2018—2022年,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从93.7%增长到97.2%。面对日益增长的青少年网民规模,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需要高度重视教育融媒体发展,通过融媒体技术传播方式,运用交互的、生活化的话语^[8],将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与教育教学内容结合起来,整合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丰富宣传内容的表现手法,使得教育宣传思想文化的内容更加生动、形象,提升宣传思想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进而不断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更好地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2. 教育融媒体建设是推进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途径

建设数字中国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战略思想的重要举措。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一部分,推进教育数字化是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先手棋。在教育数字化背景下,加强教育融媒体建设已经成为教育领域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必然选择,同时也关系到能否为数字中国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推动教育融媒体建设,充分发挥教育融媒体在引领教育创新、驱动教育转型方面的先导力量,是面向国家战略、师生需求、教学场景和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教育融媒体的形式也在不断创新,在线教育平台、虚拟现实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使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地区、教育场景更加生动、教育服务更加个性化,国家教育数字化发展不断推进,有助于为数字中国战略提供教育基石支撑。

3. 教育融媒体建设是实现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终身化和融合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学习理念和学习方式的主要发展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科技人才单独成章进行布局,吹响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号角。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大战略任务。近年来,终身学习理念在我国已经深入人心。教育融媒体建设有助于全面整合优化教育系统各行各业优质学习资源配置,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全民终身学习的公共服务平台,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一方面,教育融媒体建设可以满足社会成员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让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成为日常现实和行动自觉。另一方面,教育融媒体建设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提升教育公平,促进全民教育水平提高,激发全社会共同参与全民终身学习的实践。

三、现实挑战:教育融媒体建设面临三重挑战

教育融媒体建设是国家媒体融合战略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体现,教育融媒体建设的实践为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新引擎新视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壮大主流舆论阵地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把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入推进,教育融媒体建设应运而生。2019年后,教育部先后启动两轮教育融媒体中心试点,至此教育融媒体建设进入蓬勃发展阶段。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以互联网思维优化资源配置,把更多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向互联网主阵地汇集,向移动端倾斜,让分散在网下的力量尽快进军网上、深入网上,做大做强网络平台,占领新兴传播阵地。在此背景下,2022年,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推进教育融媒体建设的意见》,加快推进全国教育系统的教育融媒体建设。近年来,教育融媒体建设已经成为教育改革创新引擎,在教学资源融合、教育媒介融合、教育服务融合方面不断加深,基本实现了融合教育科研、舆论宣传、服务社会于一体的融媒体功能,为构建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体系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然而,教育融媒体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整体性教育改革工程,在融媒体建设内容、技术、平台等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

1. 教育内容融合创新挑战

融媒体时代教育理念发生重要变革,从“自上而下”“一对多”的传统灌输式教育逐渐转变为平等对话、互动交流的互动教育。融媒体打破了灌输、宣讲、教化的服从与被教育^[9],更注重对话语交往的互动性、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内容生态的创新性。教育融媒体建设面临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重构、传统教学内容和现代化教学内容融合的形式重构。一是内容融合创新对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提出新要求。由于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教育模式,一些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存在习惯性守旧思维,未能充

分认识到教育融媒体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此外,一些机构和教育工作者虽然能紧跟融媒体时代步伐,但对教育融媒体建设思路和传播规律把握不准,存在被动“等、靠、要”心态。以上两种思维会对教学内容共建共享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内容融合创新对表现形式创新创造提出新要求。教育融媒体建设最终目的是盘活教育资源,让原本分散在各地各部门各领域的教学资源融会贯通、优化组合,形成内容丰富、形式生动的新内容,要求教学内容从数量、类别“相加”走向内容、形式“相融”,这就对教学内容的资源整合能力、创新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内容融合创新对专业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教育融媒体建设是教育紧跟融媒体时代发展的产物,要求融媒体建设者既要懂互联网传播规律,又要懂教育发展规律。但符合教育融媒体建设需要的融媒体人才与实际需要之间还存在较大缺口。

2. 教育数字技术赋能挑战

教育融媒体建设离不开各系统、全流程数字化技术支持。《2020教育政务融媒体海口宣言》指出,要紧跟先进技术发展趋势,让技术为教育融媒赋能。当前,5G、大数据、AI等技术迅猛发展并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应用,根据新技术应用推广规律来看,商业用途普及早于社会公益应用普及,这种规律在教育融媒体建设中也有所体现。一是数字技术加快教学资源实时更新对传统经验主义教学形成挑战。传统经验教学具有静态性和滞后性弊端,而融媒体教育只有及时更新教学资源数据,才能为更深层次的教育融媒体建设提供数据支持和发展动力,这就要求教学资源数据库建设要充分利用最新数据技术,实时抓取最新社会热点问题,用热点话题引导舆论、用现实问题照应书本理论。二是教育融媒体智能化、个性化教学模式发展对平台技术优化提出挑战。数字技术赋能教育融媒体平台用户界面、交互方式更加智能化、互动化,使得在线教育更加便捷生动,因此,对教育融媒体平台技术要求更加严格,只有不断提升客户端使用模块和用户操作界面的友好度,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教学资源的利用率。三是融媒体在线教育的实时性、交互性对教育融媒体舆论监督和信息安全形成挑战。如何保护在线教学互动中教师和学生个人信息、在线交流、学习记录、在线作业等隐私信息,避免这些数据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泄露和篡改,需要提升数字技术赋能。

3. 教育平台服务效能挑战

随着教育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不断推进,各地各

行教育融媒体中心平台不断涌现。但挂牌容易运营难,如何运用好教育融媒体平台,使传统教育资源真正能发挥“融合”作用,才是最大的考验。一是教育融媒体平台建设存在地域差异。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一线城市、发达地区教育机构及知名高校在教育融媒体硬件投入、资金支持、人才培养等方面支持力度较大,而二线、三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学校教育融媒体建设因为投入资源较少而步伐相对迟缓。二是服务功能难以匹配现实需求。教育融媒体中心能否与用户产生有效黏性,表现在教育融媒体中心的用户活跃度,取决于教育融媒体中心平台服务功能是否与学习需求精准匹配。在平台建设方面,一些教育融媒体中心盲目模仿国家层面或某一层级层面的思路,前期投入大量精力搭建大平台大框架,最后导致很多现有功能“用不着”,需要的功能“待开发”。三是线上教学互动效果和传统课堂相比有温差。融媒体教学虽然形式生动多样,有图文、音频、视频等各种形式,但在初期教学实践中,教师融媒体适应能力不足,一些教师只是套用了融媒体的外壳,将传统教学资源搬到屏幕上,但并没有技术、内容等方面的创新。学生“不在场”式的学习形式容易受到短视频、直播等具有社交属性平台的干扰,较难保持持续深度学习,学习效果甚至不如传统课堂。

四、未来进路:教育融媒体建设的提升策略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融媒体建设是积极适应数字化时代和媒体融合国家战略的重大部署,也是为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育新人”服务的使命任务。随着教育融媒体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教育媒体新的变革空间即将全面开启,建设融媒体已成为教育媒体战略转型的未来进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重要思想,做大做强教育融媒体,抢占宣传思想前沿阵地,发挥教书育人作用,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培养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强化思想引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要把思想引领作为教育融媒体建设的首要任务,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一要坚守网络阵地,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要主动适应教育融媒体建设的传播语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

国主义等理想信念教育内容,以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可视化多媒介形式呈现,如利用短视频、动画、微电影等形式讲述革命故事、英雄事迹,让学生在视觉和听觉上得到双重震撼,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力与吸引力,从而加深对理想信念的理解和认同。二是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提升互动沟通效果。挖掘和整理一批本区域内具有代表性、感染力的故事,巧妙运用生动性、贴近性、实用性的语言讲述;同时,利用在线互动工具进行实时交流和反馈,增加理念教育的感染力和凝聚力,推动教育融媒体成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阵地。

2. 坚守内容为王,增强教育育人实效

教育融媒体建设要贴近现代教育需求,汇聚行业资源,结合自身特色资源优势,打造核心教育资源,把特色做得更加鲜明。一是以合作共建促进资源聚合。要整合教育相关部门、媒体机构和学校资源,合作共建公共资源数据库、人才库,构建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教育融媒体平台资源。二是话语体系转变创新教育融媒体话语表达。要将政治话语、理论话语、学术话语为主的教学话语体系进行现代化、生活化、场景化的话语转变,用“多元”化话语体系取代“一元”化话语体系,以学生群体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教学内容,提升话语传播力、影响力。三是以“三全育人”为导向扩大优质资源供给。要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到教育融媒体建设全过程和各环节,整合协调各类优质教育资源,扩大优质资源供给,打造全方位、立体式的育人时空,以特色化、差异化、分众化内容聚焦学生、吸引学生,提升教育宣传实效。

3. 增强技术赋能,构建智能教育平台支撑

数字技术引领数字传播快速发展,对教育融媒体建设的内容布局、技术驱动、生态基础产生重大影响。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只有拥抱新技术、引领新趋势,才能牢牢掌握舆论阵地。一是强化数字技术引领。要积极主动迎接新技术挑战,利用5G、AI及大数据算法技术,构建教育融媒体“新闻+政务+服务+育人”格局,加强AI语音、虚拟主播、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在教育融媒体建设中的应用,增强网络传播阵地的互动性和吸引力。二是提升教育数字资源融合转化效率。着力解决教育资源数字化共享程度不高的问题,建立统一的数据共享标准,加强资源整合、功能聚合、工作融合,构建“共同策划、核心采集、资源共享、分类编辑、多种生成、多渠道推送、互动传播、舆情反馈”的信息生产传播机制。三是多

途径培养“融合型”技术人才。教育融媒体人才培养要把育人能力和融媒体传播能力结合起来:一方面,着力培育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融媒体技术素养,通过挂职锻炼、业务培训、研讨活动等方式,提升教育工作者的融媒产品生产能力和融媒产品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建议配备专业的融媒体技术服务团队,随时随地为教育工作者提供融媒体技术信息咨询服务。

4. 面向社会需求,全面深化产教融合发展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与价值链有机衔接的重要举措。深化产教融合,关键在于做好“融合”文章,培育协同育人“共同体”。一是建设产教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做好区域和行业各类教育资源和教育服务的整合与转化,提供精准化产教融合信息服务,不断完善教学平台新闻舆论枢纽、网络育人基地、文化建设平台、价值引领高地功能,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和活跃度。二是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改变传统单向度、灌输式教学育人模式,善于从“用户”视角寻找思路、策划选题,善于从学习进度、互动交流、作业解答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融媒体优质内容、参与式互动交流、沉浸式深度体验构建融媒育人新场景^[10],寻找双向沟通、互动有效的网络育人新模式。三是促进产教、供需双向对接。要发挥教育主管部门、教育媒体、教育机构、行业企业、教师、学生等各级各类社会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构建教育融媒体联合基地、重点实验室,实现业界、学界互动,理论和实践结合,加快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5. 加强人才培养,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人才是推动教育融媒体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没有大批高质量的人才做支撑,就难以推动教育融媒体的内容创新、资源融合和技术升级,难以实现教育现代化。一是加快建立教育融媒体资源人才专家库。要建立一支涵盖媒体运营、内容创作、技术研发等多个领域人员的专家库,通过定期交流、研讨等活动,分享交流教育融媒体发展经验,通过专职、兼职及各类柔性引进人才的方式拓展教育融媒体人才结构。二是提升媒介素养教育。要把媒介素养纳入教育融媒体从业人员岗前培训与在职教育之中,通过课程学习和考试测评等方式,全面提升其媒介素养。三是强化实战性演练培训。通过专家演示、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方式,增强从业者对融媒体技术的操作技能和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四是增

强学科融合互动。做好教育融媒体需要学科交叉思维,要促进教育学与传播学、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的融合,拓宽教育融媒体从业者的理论视野和知识边界。

结 语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³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教育现代化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在各领域运用的普及,数字技术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必然会对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教育理念更新、教育教学模式和评价体系变革、教育数字化发展等带来巨大变革。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教育发展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教育融媒体建设是教育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是网络育人的重要阵地。推进教育现代化需要借鉴媒体融合理念、技术和实践。近年来,教育融媒体建设已经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但教育融媒体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整体性教育改革工程,在实践推进中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需要在强化思想引领、坚守内容为王、增强技术赋能、面向社会需求、加强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断加以改进和提升,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强教育育人实效,

构建智能教育平台支撑,全面深化产教融合发展,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使教育融媒体在教书育人、教育强国建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4:5.
- [3]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李克强讲话,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N].人民日报,2018-09-11(1).
- [4] 王竹立.建构新教育学体系,发展新质教育:从数智时代新知识观入手[J].开放教育研究,2024(3):15-23.
- [5] 李志.融媒体视域下“学习强国”平台的育人机制探析[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21(6):55-59.
- [6] 张志勇,袁语聪.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刍议[J].教育研究,2022(10):34-43.
- [7] 于海.充分发挥教育融媒体的育人作用[N].中国教育报,2022-06-13(10).
- [8] 龙曼琳.融媒体传播格局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9.
- [9] 魏薇,毛萍,马继梅.融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变迁与进路[J].现代教育管理,2020(7):22-29.
- [10] 臧晓菲.教育融媒体:以高质量供给提升育人效能[J].人民教育,2022(6):54-55.

The Era Value,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Future Path of Education Integrated Media Construction

Zhang Shan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media in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consolidating the propaganda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ront,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digital China strategy, and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achieving a strong education country.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ed educational media has provided a new engine and perspective for promoting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media integration.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al promotion, it also faces triple challenges: innovation challenges in educational content integration, empowerment challenges in educational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ervice efficiency challenges in educational platforms. In the face of the requirements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digital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integrated media should optimize the path of educational integrated media construction from five aspects: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guidance,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ontent first, enhanc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meeting social needs, and intensifying talent cultivation;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tue and talent;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that content is the core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and nurturing; Enhanci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building intelligent education platform support;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Intensifying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olidifying the 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educational integrated media; dig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media convergence

责任编辑:白 杨

《中州学刊》启事

《中州学刊》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大型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自1979年创刊以来，《中州学刊》以“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提倡原创、打造精品”为办刊理念，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广集百家睿智，编发精品力作，弘扬中原文化，关注学术前沿，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着力推出人文社会科学精品力作。

《中州学刊》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河南省社科二十佳期刊、一级期刊。

一、投稿须知

《中州学刊》目前开设的主要栏目有：当代政治、党建热点、经济理论与实践、三农问题聚焦、法学研究、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伦理与道德、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研究、新闻与传播。各栏目的近期选题请参阅年初发布的“《中州学刊》2024年重点选题方向”。

1.《中州学刊》实行双向匿名专家审稿制度。作者来稿时请提供文章篇名、作者姓名、关键词（3~5个）、摘要（400字左右）、作者简介、注释与参考文献等信息，并请提供英文篇名、摘要与关键词，若文章有课题（项目）背景，请标明课题（项目）名称及批准文号等。

2.请随文稿附上作者的相关信息：姓名、性别、出生年份、籍贯、学位、职务职称、专业及研究方向、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电话、电子邮箱）及详细通联地址。

3.注释用①②③标出，在文末按顺序排列。

4.参考文献用[1][2][3]标出，在文末按顺序排列。参考文献书写格式请参阅《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

5.文章12000字以上，优稿优酬。文责自负，禁止剽窃抄袭。请勿一稿多投，凡投稿三个月后未收到刊用通知者，可自行处理稿件。

6.本刊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本刊没有在外设立任何分支机构，也没有委托任何其他机构及个人为本刊组织稿件。

7.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系列数据库、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及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及维普网、国研网、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等收录，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费一次性给付；另外，本刊微信公众号对本刊所刊载文章进行推送。如您不同意大作被以上数据库收录，或不同意被本刊微信公众号推送，请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8.本刊编辑尊重文中作者的观点，但有权对文章进行技术处理。

作者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以上要求。

二、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451464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恭秀路16号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州学刊杂志社

联系电话：（0371）63836785

在线投稿系统网址：<https://www.manuscripts.com.cn/zzxk>

各编辑室联系信箱：

zzxkzz@126.com（政治） zzxkjs@126.com（经济） zzxklaw@126.com（法学）

zzxksh@126.com（社会） zzxkll@126.com（伦理） zzxkzx@126.com（哲学）

zzxkls@126.com（历史） zzxkwxs@126.com（文学） zzxkbw@126.com（新闻传播）

中州学刊

(月刊 1979年创刊)

主管主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编辑出版 中州学刊杂志社
地 址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恭秀路16号
邮政编码 451464
电 话 0371-63836785
网 址 <https://www.zzxk1979.com/>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每月15日
国内订阅 全国各地邮局
国内发行 河南省邮政发行局
邮发代号 36-118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外代号 M824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075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1-1006/C
国内定价 15.00元

投稿网址 <https://www.manuscripts.com.cn/zzxk>

各学科编辑室电子信箱:

政 治 zzxkzz@126.com
经 济 zzxkjs@126.com
法 学 zzxklaw@126.com
社 会 zzxksh@126.com
伦 理 zzxkll@126.com
哲 学 zzxkzx@126.com
历 史 zzxkls@126.com
文 学 zzxkwxs@126.com
新闻传播 zzxkbw@126.com

装帧设计: 韩青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全国社科工作办举报电话: 010-63098272。



微信公众号

ISSN 1003-0751



9 771003 075241